

目 录

专题研究

区域研究的方法与现代中国研究	天儿 慧	1
近代中国地质学的渊源 ——以庞佩利为中心——	武上 真理子	17
20 世纪 30—40 年代中国的自由主义 ——在爱国和民主的夹缝间——	水羽 信男	37
围绕诉诸国联处理中国对外争端的国际关系（1920—1931） ——中国代表权问题与日本、英国、中国——	带谷 俊辅	48
绿洲项目调查记录 ——探索生活在大漠里的蒙古族人的水资源利用——	小长谷 有纪 秋山 知宏	76
关于现代中国“承包”与“发展形态”的考察	原田 忠直	80
中国经济学的展望	加藤 弘之	87
日苏（俄）关系与中国 ——其历史法则及变动机制——	赵 宏伟	93

书评·书介

评 森川裕贵著 《政论家的矜持——中华民国时期章士钊与张东荪的政治思想》	水羽 信男	104
---	-------------	-----

评 彭慕兰著 《大分歧——中国、欧洲、以及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 ——超越“大分流”——	村上 卫	108
评 俞敏浩著 《国际社会中的中日关系—1978～2001 年的中国外交与日本》	井上 正也	114
评 吴茂松著 《现代中国的维权运动与国家》	及川 淳子	116
评 知足章宏著 《中国环境污染的政治经济学》	北川 秀树	119
评 北川秀树 编著 《中国干燥地区的环境与开发——自然、生计与环保》	知足 章宏	122
评 久保亨・波多野澄雄・西村成雄 编 《抗战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容》	松本 俊郎	124
评 岸本美绪著 《风俗和时代观》、《地域社会论再考》	则松 彰文	127
评 深町英夫编 《中国议会 100 年史》 ——从中国议会史看立宪制和代表制——	光田 刚	134
评 菱田雅晴、铃木隆著 《超大国、中国的去向 3 共产党和治理》	毛里 和子	136
评 坂元ひろ子著 《中国近代的思想文化史》	张 碧惠	139

区域研究的方法与现代中国研究

天儿慧

(早稻田大学)

引言：区域研究正在走向衰亡？

回首 20 世纪 90 年代，观察国际学术界的走向，就会发现随着冷战体制的崩溃以及全球化的发展，美国的区域研究走向了衰退，跨学科的研究逐渐受到忽视，而偏重学科研究方法的风潮日渐高涨。日本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的这种影响，即便在此前专心致力于中国、韩国、印尼等区域研究的学者中间，也经常听到各种议论，诸如“区域研究的时代结束了”、“跨学科研究手法只是通识教育上的课题，而不应被看作专门领域的研究”、“我们大学的区域研究讲座已经被叫停了，名称改做了比较研究”等等。

美国的区域研究是伴随着冷战爆发，作为针对敌对国家（社会主义各国）的研究而真正兴盛起来的。如何分析、判断敌对国家领导人、民族性格、行为倾向、民众与领导人的关系、领导体制、乃至综合国力等，以满足本国战略需要，是美国区域研究的目的。因此，在研究上，必须动员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国际关系等所有学科进行综合分析。然而，此类综合性的研究手法并不明确，很难避免陷入分析人员恣意判断的危险。例如，有着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背景的学者，总是存在某种倾向，容易受自身所擅长领域的吸引进行思考。社会科学式的研究手法值得怀疑。而且由于冷战的结束，被特定为敌国的国家变得极少。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区域研究的意义的确已经大为降低。

强调需要根据学科研究方法进行区域分析的学者们，认为只有使用政治学或经济学的普遍性的分析框架，通过植入“客观数据、信息”，才能推导出有意义的、可以进行比较的“客观”结论。但是，上述主张，立即引来了如下的疑问，即客观的普遍性的分析研究方法是什么？这些分析研究方法大多产生于欧美学术界。欧美与亚洲在历史社会背景方面大相径庭，在这些领域中，将上述框架预先设定为前提条件而直接加以应用是否合适呢？例如，通过基于官僚制类型的政策决定过程论、或者应用于国际关系论中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等研究手法以及博弈理论等等，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该地区政策决定过程进行具有现实意义的、深入的分析？当然，笔者并非否定这些分析框架的意义及其必要性，仅仅是对无限制、无制约地应用这些分析框架存在异议。

在积极推动此类分析的学者眼中，区域特殊性的问题似乎并不存在。例如，即便是在以理性选择政策制定的相关要素为前提的官僚制类型的分析研究方法中，“理性”的内容也会根据特定地区的不同环境及政策制定者的价值观等因素而有所不同，并不能简单地普遍化。也就是说，如果根据该地区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等独特的背景，以及参与者各自奉行的评估标准、价值标准（个性），判断如何进行理解、如何进行政策制定的话，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不必待言，“理性判断”本身会呈现“就××而言”、“从××的角度来看”、“在××的意义上”是合理的这样一种形式，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理性本身就是具有多样性的¹。

但是，重视既定的教科书式的学科研究方法的“理论性”分析家，希望仅仅在学科所规定的概念（例如“理性”）范畴内分析现象。至于超出这一范畴的内容，或者最初就不将其作为分析对象，或者将其作为“特殊事例”而暂时排除在分析对象之外。例如，在研究政治体制的变化时，有一种“体制转换论”在欧美政治社会学界被视为常识，该理论认为，传统的专制主义独裁体制或者极权主义独裁体制，由于经济近代化的发展，会转化为威权主义式的独裁体制，并进而在其所带来的经济、社会阶层的变化中，向民主主义体制过渡。将这一理论应用于亚洲、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社会，进行体制转换研究，是学术界的一大趋势。

¹ 参见マックス・ウェーバー（马克斯·韦伯）『権力と支配』（濱嶋朗訳、講談社学術文庫、2012 年）。

然而，政治体制这一现象，本来就是该地区为政者与民众的关系、权力观、国家-社会关系等独特的历史要素、政治文化、或者政治空间的规模性等因素高度附着的同时，形成并发挥作用的，因此，我们又怎能将一般化的、普遍化的体制转换模式无条件地加以套用呢？本来，区域研究学者们是在充分考虑“区域性”与“区域个性”的同时，试图理解政治、经济、社会等诸现象的。正因为如此，就产生了如下的疑问：是否可以认为，根据普遍化的“社会科学方法”，如果将理论发展得更为严密，应用收集得到的详细信息，就能够理解该地区的各种现象呢？而我们也不必特别强调区域研究的必要性呢？对于各个国家所牵涉的国家的实际情况、居住在那里的人们的特征，我们也没有必要突破表面现象，进行深入发掘和理解呢？

世界的全球化浪潮方兴未艾，经济壁垒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削弱，交通手段及情报信息手段迅速发展，由此使得走出国门的机会、获得海外信息的机会得到了飞跃性的增加。国际商务交涉、政治谈判、抑或是文化交流成为日常活动中的一环。交流、接触的激增的确增加了共同的认识、价值观以及手续等。但是，如果观察各个国家的判断标准及行为习惯，就会发现仍然存在着难以改变的“区域性”，而且这些“区域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接触、交流增加、日常同国外的关系的重要性提高的情况下，仍然不能忽视“区域性”。换言之，可以说，在当今时代，不囿于战略角度而是综合性了解对方国家的必要性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在这一意义上，区域研究不仅未走向衰亡，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它在增添了新的意义的同时，其研究的必要性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重建区域研究所带来的课题

区域研究的目的，旨在综合分析特定的对象区域，并进一步分别理解政治、经济、社会等现象。平野健一郎曾指出，“区域研究的本质，首先是期待着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把握”，“可以称之为田野牧歌式的研究特权，来源于伴随着交通、信息手段的迅速发展，任何人都可以观察内部，区域研究本身也可以触及内部的细微部分，惟其如此，在整体上把握对象变得更加困难”²。

区域研究是以该区域的整体为对象的，因此，仅依靠特定的学科研究手法是不充分的。但是，仅仅是从获得的大量信息中挖掘关于该区域的知识也并不充分。虽然困难，但是我们必须形成综合性的理论性的方法论，将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等都包容进去，并尝试以之进行分析。如果这一尝试没有成功，我们就难以反驳区域研究并非理论研究的论断。然而，区域研究的学者们是否带着这一问题意识进行了研究了呢？

3

下面，我将以本身的专业研究领域——中国为对象，进一步进行阐述。冷战时期，特别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美国虽然进行着有关现代中国的理论性区域研究，但是基本上，他们的立场都是应用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模型的框架分析各种现象。例如，关于中国现代政治的经典著作詹姆斯·R.汤森的《中国政治》，就将毛泽东时代放在“激进的极权主义”框架中加以理解⁴。并将毛泽东之后的时代，即邓小平的时代，放在“威权主义模式”、“威权主义体制”的框架内加以把握⁵。这样的认识，是将邓小平之后的时代中国必将走向民主化道路作为潜在的前提。但是，中国走向民主化的路线图在 1989 年的“天安门事件”中被打破了。开发独裁、开发政策所带来的近代化和经济的发展逐渐催生出带有权利意识、利益意识的大量市民，以他们为原动力必走向民主化道路，这样的设想崩溃了。当时，美国现代中国研究权威

² 平野健一郎「グローバル化時代の地域研究」西村成雄・田中仁編『現代中国地域研究の新たな視図』世界思想社、2007 年、18 ページ。

³ 例如，也许笔者的评论有所僭越之嫌，富田广士、横手慎二编著的《地与研究与现代国家》（『地域研究と現代の国家』慶応大学出版会、1998 年）中刊载了多篇优秀论文，但是在该书中，包括序的部分，对于区域研究及其方法的认识未作任何涉及。

⁴ James R. Townsend, *Politics in China*, second edition, 1980,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⁵ 毛里和子《现代中国政治》第三版（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2 年所作的整理颇为明了易懂。笔者本身对于如何将中国的特性体现出来，同时妥帖恰当地描述邓小平及之后的政治体制同样煞费苦心，最终以“小瀑布群型的威权主义体制”这一词汇进行了表述（『中国共産党論』NHK 新書、2015）。

迈克尔·奥森伯格坦率地作了自我批判。他指出，“我们研究中国的学者未曾找到那些导致了天安门事件的、流淌在中国最深处的本质部分”⁶。此后又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漫长岁月。中国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令世人瞩目。但是，共产党独裁体制仍然被维持下来。通向所谓的多党制、言论和出版的自由、人权保护等的民主化道路至今仍然闭塞不通。依然固执地拘泥于欧美的尺度，单纯将上述现象解释为“落后”，这是否充分呢？迈克尔·奥森伯格所指出的“找到流淌在中国最深处的本质部分”的工作虽然已经稍嫌迟缓，但是，这不正是今天我们必须大力追寻的吗？

关于中国研究，我们需要将其定位为重视区域现实情况的区域研究，使其得到复兴和发展。回顾日本现代中国研究活动的成果，实际上，抱着“找到（中国）本质”的问题意识，试图开展独创性的中国研究的学者并不在少数。例如，沟口雄三曾提出，由于冷战格局的瓦解，“出现了变化，进步·保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先进·落后这种单纯的二元论的构图崩溃了”，因而需要“重新思考战后以来的方法论”⁷，并进而进行了如下阐述。他认为，“在思考亚洲近代的时候，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都必须从基于前近代的、各自有别于欧洲的独特性的角度加以考虑……世界史上的普遍性当然也必须立足于这一各自不同的独特性”⁸。简单表述的话，即不应生硬套用起源于欧美的价值观、概念和分析方法分析亚洲的不同国家，必须在认识到围绕这些问题的各自的区域独特性的同时，分析、说明各种现象，起源于欧洲的“普世”性概念本身也必须从不同地区的独特性角度加以相对化。此外，其他一些学者抱着几乎同样的问题意识，也曾作出过类似的论述，例如仁井田升《何为东洋？》（『東洋とは何か』東京大学出版会、1968年）、竹内好《日本与亚洲》（『日本とアジア』筑摩書房、1966年）等著作中都可见到。

当我们纵览包括战前被称作“支那学”的日本的中国研究时，客观来看，在国际上达到了相当高水平的研究俯首可见。这些研究主要是依靠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研究进行的，能够使用汉字、文化及社会习惯方面存在着许多共性，使得日本学者与欧美等其他国家的学者相比，更容易进行这些研究，这是日本的中国研究的一大特点和优势。但是，日本的中国研究作为理论研究比较脆弱。的确，跨学科研究手法本身就是零散的，要把它们综合起来，使其相互关联，创造出某种框架，并进而作为理论提出是极为困难的。当然，并不是没有学者尝试理论化，在日本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极为尖锐深刻的主张，这些研究基本上来源于实证研究的积淀和作者本人的尖锐洞察力，尝试着从理论上阐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

例如，战后初期，一桥大学的经济学家村松祐次考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史，试图厘清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描绘出未来中国政治与经济的独特的动态和静态的关系结构。在其成果《中国经济与社会态制》（『中国経済と社会態制』東洋経済新報社、1949）中，他将政局转变和制约政局转变、并与其相互影响的社会经济结构描述为“态制”，指出其特点在于，“同长期不断变化的政治变动相表里的，是经济某种意义上的稳定的、静态循环的持续。而且，那些看起来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仅仅是一种态势的两个侧面。”⁹。当然，村松是经济学家，该书使用大量篇幅论述了与经济有关的历史、结构、农工商业的特点、处于公有化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前景等等，并使用“经济的外部态制”这一概念，着力分析了政府机构、统治结构、村·宗族·行会这些政治社会课题，从而真正成为了跨学科研究的典范性成果。

此外，最近英年早逝的加藤弘之，在其费尽心力撰写的最后的著作《“暧昧的制度”——中国类型的资本主义》（『「曖昧な制度」としての中国型資本主義』N T T出版、2013年）的序文中明确指出，该书最大的目的，在于“考察实现了高度发展的中国经济体系背后所隐藏的中国独特的制度的本质是什么，专注于中国的独特性”。所谓的独特性，是指“创造社会经济秩序的背景中，文化信念的制度所赋予的特征”。其特征在于“深藏于制度之中的暧昧性”，加藤着眼于象征性地体现了暧昧性的现象——“包”，并进而进行了分析。为了解析这一“暖

⁶ Michel Oksenberg, Confession of a China Watcher, *Newsweek*, June 19, 1989.

⁷ 溝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国』東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pp.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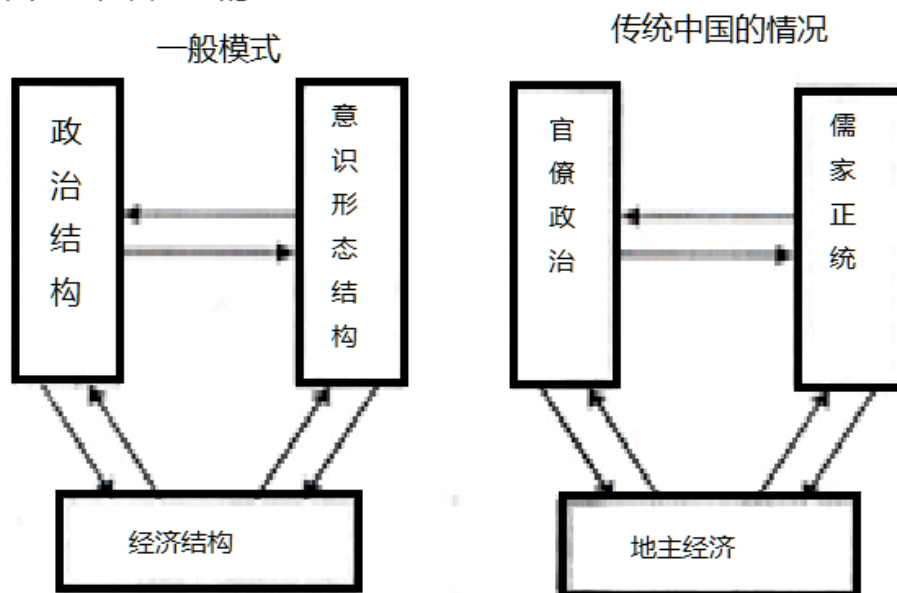
⁸ 同上，pp.30。

⁹ 村松祐次『中国経済の社会態制』東洋経済新報社、1949年、p. 8。

昧性”，加藤尝试引入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论、法理论、契约观、国家-社会论等内容，使其理论化。

以上介绍了两例关于经济方面的理论分析性的中国研究，下面仅就政治方面的既有成果中一例类似的研究成果介绍一下。这一例成果是金观涛、刘青风所著《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中国社会の超安定システム』研文出版、1987年）¹⁰。据作者所言，改革开放路线走上轨道之际，中国的历史学会也围绕着反省历史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为何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长达两千年的历史这一问题¹¹。为了寻找这一疑问的答案，作者并没有象以往那样分别探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而是从整体的角度，也即从这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角度——并不是将各部分的总和作为全体的特征，而是认为这些部分都是整体结构的相互依赖的组成部分——换言之，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探讨这一古老的难题¹²。他们的结论是，在关注三个子系统（意识形态结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在历史进程中相互作用的同时，可以看到一个特征，即“中国封建社会并非没有任何发展变化的完全停滞的社会，其社会结构不断重复瓦解与重建的过程，但是整体上没有变化发展出新的结构”。作者将上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构归纳为下图。图左为基本的一般结构，图右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

图5-1 社会结构的子系统



资料来源：引自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大一统”的机制》

如图所见，作者对于延续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王朝体制，从意识形态（儒家正统）、政治（官僚制）、经济（地主经济）这三个子系统的相互关系的角度加以分析，至少直到毛泽东时代，这一基本结构似乎仍然能够适用。即，在意识形态方面，共产党的一党体制附着在共产主义、官僚制之上；在经济方面，逐渐过渡到公有制的同时，农业经济与国家掠夺的结构没有改变，在相互依赖中支撑着统治体制。笔者甚至认为，当今的体制仍然可以适用这一理论。即，意识形态方面，爱国主义与儒家正统思想相结合，政治结构方面，官僚制与一党结构相结合。经济结构方面，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市场化，资本主义化获得了发展，结构上出现了重大的改变。但是，由于三者结构的关系，意识形态与政治制约着经济的幅度，维持着整体的“态制”。这些关系结构今后会出现什么变化，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以上这些研究成果中相同之处在于，为了解读中国所引发的各种各样极富特点的现象和

¹⁰ 原题为，金观涛《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

¹¹ 同上，pp. 7.

¹² 同上，pp. 9.

疑问,就必须专注于超越时代的、潜藏在中国这一区域最深处的独特性,由其特征来说明、理解各种现象和疑问。的确,村松将动态性政治与静态性经济社会汇总为一个“态制”的思想、加藤认为正是以“包”为中心的“暧昧的制度”带来了中国经济活力的看法,以及金观涛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三者结构相互关联的观点都值得关注。而这些研究中相同之处在于,在理解中国社会时存在着至关重要的一点——作为该区域特征的“区域独特性”。

分析方法论——基层结构论

在将区域研究方法理论化这点上,笔者对于上述研究成果寄予了高度评价。但是,正如重视学科研究方法的学者们所反复强调的那样,在如何利用其它区域的研究中也可同样使用的方法论进行研究这一点上,区域研究的方法论仍然极不充分,不得不说仍处于探索阶段。我们甚至要提出疑问,这种普遍适用的方法论是否能够存在?但是,如果说区域研究是在应用数种学科研究方法的集合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区域的独特性——借用刚才所引用的米克尔·奥森伯格的话来说是各个区域的“流淌在最深处的本质部分”——对各自区域所出现的各种现象、各自的行为习惯进行现实的分析,我认为,肯定能够构建共同的方法论。

笔者认为,构建共同方法论的突破口在于带来“区域独特性”的多种多样的因素所形成的“难以改变的特质”——难以改变并不是“不变”。因此,笔者将不易改变的、有意义的关联性集合体,定义为“基层结构”,认为这一“基层结构”正是理解各个区域现实情况的基础和分析框架。探究“作为区域的个性”的动态性结构,不仅对于在理论上理解该区域各种现象极为重要,通过考察“难以改变的特质”本身,还可以预测该区域的中长期的变化矢量或者找到本质性的内容。换言之,我认为,这是进行中长期前景展望的不可或缺的分析研究方法。

例如,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日本本身的“难以改变的结构”这一身边的事例。首先,关于日本的特征,经常被提到的有:1)日本是一个岛国;2)与其它国家相比在种族、语言、文化、生活等方面有着较高的共性;3)有着比较鲜明的季节变化(四季),有着丰美的山林和肥沃的土地、水等自然资源丰富、人们依赖于自然并在与自然和谐的关系中生存;4)从总体上来看,历史上几乎没有外敌的入侵,没有出现导致国家分裂的激烈内战。以此为线索,我们在思考日本的“难以变化的本质”时,可以作出以下的解读。关于1),日本周边存在着海洋这一天然要塞,运用本身力量守卫本国疆域的防卫意识并不强烈。而且所谓的具有岛国特性的、内向型或者家里称雄式的人才较多。而且国内的人员往来、信息和文化的交流较多。与2)相重合,日本形成了“同质化的社会”。关于3),借用陈舜臣的解释,中国人将自然作为斗争和需要克服的对象,与此相反,日本人希望与过度稳定的自然保持和谐,结果产生了“伤感”、“朴拙、空寂”等独特的观念¹³。总之,这是一种可以被称作与自然相处中产生的感性的敏感性。在4)的问题上,除了源平之战、蒙古来袭、战国时代、幕府维新之外,在国内没有出现可称为大规模动乱的事态,基本上始终保持了秩序。既没有必要如欧美那样,国家与社会为了秩序达成契约,也没有必要象中国那样,通过皇帝与庞大的官僚权力建立和维持秩序。

因此,在思考日本的“难以改变的特性”时,其特征可以看作是岛国性=内向型、共同意识、集体力量、同质性、与自然协调的意识、敏感性、不付高额代价的秩序观和防卫观等。当然,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超出这些特征的事例。而在思考产生这些特征的基础性因素时,特别重要的几点是:①国家所处地理特性的社会意义、②通过漫长岁月积淀下来的历史意识、③人与人、人与自然反复创造的人类观、广义上的社会结构等。这些要素的关联的集合体,如果总结为日本的“基层结构”的话,有如下几点:(1)在岛国,因内向型交流活跃,产生了“共同体”的空间,在行动能力上具有强大的“集体主义”、“集体力量”。(2)喜和谐而厌剧变,以万世一系的天皇为象征的血统主义式的民族观念强烈。(3)虽然存在家族式血统式的阶层性,但是普通百姓也拥有接受教育和医疗的机会与机制,不存在为政者的强权式统治以及官僚制统治所维持的秩序,是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结构。

¹³ 陈舜臣『日本人と中国人』恒文社、2005年版、p.78。

那么下一步，对于韩国，我们也运用同样的观点，尝试推导出其基层结构。我们在思考韩国的国情时，可以看到以下几点：（1）西邻中国、北接俄罗斯、隔海在东南方向与日本相望，而韩国正是处于这三大国的夹缝之中，这一因素给其地缘政治带来的约束很大。特别是 19 世纪后半期后，直至今天韩国仍然受到这些外部因素的摆布。这些因素导致的结果，造成了 1910 年韩国被迫沦为日本帝国的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经朝鲜战争，朝鲜半岛南北分裂的局面胶着固定下来，直至今日。特别是隔 38 线与北朝鲜对峙的紧张关系，不仅对韩国的外交和安全是一个重大问题，对于围绕朝鲜半岛在内的亚太地区的安全而言，同样是一个重大问题。（2）众所周知，韩国在文化方面是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韩国甚至曾自称“小中华”，对于中国之外的国家抱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但同时，韩国也同样存在完全放弃汉字、自创韩国文字的激烈的民族意识。今天，仍然有一些学者在强烈意识到中华世界的同时，从谋求建立自立性的韩国这一角度，提倡复活“小中华”。

（3）在经济方面，韩国的数大财阀占有压倒性的比重（2011 年三星、现代、LG 等十大集团所占 GDP 的份额超过了 76%）。因此，韩国在经济上极为单纯，而且产业集中在首尔，也是其显著特征。这些大财阀及中小企业是创业者和其子孙、家族共同拥有的家族企业，与日本的“家”的观念所产生的继承关系不同，父亲的财产基本上被分割开来。这一点与中国儒家的遗产继承很相似。同时，经济与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深入融合、勾连结合在一起，对整个韩国社会发挥这影响。

因此，当我们思考对韩国的思维、战略、行为习惯产生重大影响的基层结构时，以下几点是始终需要考虑到：（1）处于大国夹缝中的地理和地缘政治上的位置与规模；（2）受到儒家文化强烈影响的历史特性；（3）血统主义式的人脉关系与领导整个社会的精英群体和普通民众之间各种各样的巨大差距所形成的结构。同样，对于美国的基层结构，笔者同样非常关注。但是，笔者不得不承认，自己缺乏在此进行评论所需要的基础知识，因此姑且将其作为今后的课题。

中国的基层结构 1——四个大规模性

试图在理论上提炼出广义上的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容易。上述村松祐次、加藤弘之、金观涛和刘青峰等人的研究在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性特征的重要截面挖掘出来这点上取得了成功。然而，仅仅如此，要实现区域研究的理论体系化，可以说仍然并不充分。如何从整体上总结出体系化的区域独特性的集合体，并以之作为区域研究方法的基础呢？笔者于 1980 年代后期在中国常驻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其后也频繁访问中国，几乎考察了全国的省市自治区，在调查的过程中，找到了作为中国这一国家独特性的、固有的、难以改变的几种要素。而且笔者认识到，能够而且有必要将这些要素综合在一起，通过观察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性，找到作为有机集合体的中国的区域独特性，即中国的基层结构¹⁴。

我认为，通过对各个地区的各种各样不同的特性进行认真分析，进而尝试进行取舍选择并将其综合起来，可以总结出中国基层结构的“四个大规模性”和“四大断裂性”的特征。此后，通过文献研究，笔者认定，这些特征并不仅仅是今天的各种要素所形成的，而是传统文化经济历史、或者地缘政治人口统计学等方面，长期持续的各种因素所造成的。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大规模性”的第一特征，就是领土的大规模性。在原黄河流域被称作中原之地的一带地区，发达的文化逐渐向外延扩张，出现了古代王朝。大约公元前 221 年，秦国统一了各地，之后，在汉、唐、宋、明等王朝，北方以万里长城为界，西方直至兰州、成都皆为汉人统治，而西域则存在着与中国王朝具有臣属关系的边境民族的地区。除了

¹⁴ 笔者最初想到这点，是 1986 年在北京与费孝通博士见面，相互交换意见的时候。见拙著《中国改革最前线》（『中国改革最前线』岩波新書、1988 年、159 ページ以下）。此后，笔者将这些观点总结为“基层结构论”，首次在学术界发表，是拙著《中国——变化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溶変する社会主義大国』東アジアの国家と社会 1、東大出版会、1992 年）。此后，在石田浩《中国农村社会的基层结构》（『中国農村社会の基底構造』中兼和津次編著『講座現代アジア 2 近代化と構造変動』東京大学出版会、1994 年、113 ページ以下）、佐佐木卫《现代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佐々木衛著『現代中国社会の基層構造』東方書店、2012 年）等著作中，作者怀着相同的问题意识，对中国进行了独自的分析，阐述了他们的理解。

南宋、北宋分裂的时代、以及蒙古入侵后的元王朝，中国所统治的地区一直如此。清代，中国领土扩张，扩大到了现在的蒙古、海参崴一带，以至于统治的领土超过了今天。现在中国的陆地总面积为 960 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十五分之一，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占世界第三位。

领土的大规模性理所当然地给“统治”的思维方式（思想）、形态、及为此而倾注的人员和财政资源等带来了重大影响。这点与日本形成了鲜明地对比。持续数百年、投入庞大人力物力建设万里长城，是为了应对北方的威胁。现在人数超过三百万、规模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存在，基本上也是为了应对国内外的威胁，从古至今的防卫观似乎并没有重大的改变。

而领土的大规模性，又使得中国在各个方面包容了多样性，并不对它们加以否定。在气候上，从北方的寒冷地区到南方的热带地区、从西北的干燥地区到西南山林和东南沿海的多湿地区等等，多种多样。在体型上，北方的高大和南方的矮小形成鲜明对比，语言上，各地方言让其它地区的居民仿佛外语一样听不懂。饮食文化、风俗习惯、经济水平等等也多种多样。如果加上少数民族地区的话，其相差之处就会更加显著。

作为“大规模性”的第二个特征，我想举出的是人口的大规模性。中国的人口数字从历史上来看，古代王朝时代开始，大概在 5000 万人左右上下浮动。1711 年清朝康熙年间，人口超过了一亿（据联合国的推算，大约在同一时期，世界总人口大致为 6 亿 6000 万人），以后人口以每 50 年增加一亿左右的速度增加。人口增加与第一个特征中所提到的统治疆域的扩大关系密切。康熙年间中国的统治疆域大幅扩张。此后，统治疆域的面积大体上没有太大的变化，而人口持续增加。一般认为，这是经济发展、人员流动活跃等因素产生了影响。民国时代（1947 年），中国人口已经达到了 4 亿 5000 万人。

此后，1954 年中国正式进行了人口普查，发表的数字为 5 亿 4000 万人。文化大革命期间为 7 亿人，改革开放后虽然推行了著名的“一胎政策”，人口增加并没有停止，目前达到了 13 亿人，为世界第一（世界总人口 2015 年大约为 72 亿——在世界人口中中国所占比例与康熙年间没有太大的变化）。顺便提一句，日本在江户时代初期的 1600 年代，人口超过了 1500 万，江户时代末期达到了 3000 万人以上，明治初期为 3400 万人，直至 2005 年人口仍然处于上升趋势，但是 2005 年后出现了若干减少，此后持续着微增、微减的状态，2015 年人口为 1 亿 2710 万人。人口的大规模性与第三、第四项的大规模性具有很深的关系。毛泽东独特的战争论——人民战争论也是在这一大规模性的背景下产生的。1980 年代，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路线，走上了实现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优先的道路，而为了有效地推动这一发展方向，中国采取了“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这是针对人口大规模性带来的负面影响所推行的重大政策。

作为“大规模性”的第三点特征，我想指出的是思想的大规模性。在此包含了两种涵义。一是思想上重视大而统一，并以之为善的观点，二是思想上以自我为世界中心，以如圆锥形延展扩张下去的阶层式为善的观点。关于第一点，除了①疆域庞大②人口规模庞大这两大特点之外，中国长期以来，在经济上保持了农业经济，是信息、交流网络并不发达的社会。因此，可以说国内各个地区极为分散，将其组合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和社会非常困难。古代黄河文明之前，长江文化、四川大溪文化、湖北石家河文化等各地多种多样的独特文化曾一度繁荣。这些时代，货物交换的度量衡及货币等都各有不同，至于语言方面，虽然现在普通话以北京话为标准，但是广东话、福建话、上海话自不必待言，四川、陕西等中国的各个省的内部的语言也非常独特，直至改革开放的今天，仍然有很多人使用地方方言，而这些语言对于习惯于北京话的人来说也有如外语一样。这是笔者在中国旅行的切身体会。

在中国，不像欧洲大陆那样，先是无数小国兴亡起伏，逐渐形成民族国家群，并进而收敛为欧盟，中国并没有走上这条道路，尽管同样经历了暂时的混乱，但是历史上总有庞大的王朝国家相继更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形态的历史变迁呢？此外，人口规模巨大、领土疆域广阔这些特征当然也给统治的方式、围绕统治的争执与纠纷带来了重大影响。世界上领土、人口规模庞大的国家，如继承苏联的俄罗斯、印度、美利坚合众国等，都是采取联邦制的统治方式。然而唯有中国没有采取这样的制度。这是为什么呢？

在思考这些疑问的答案时，第四个特征和这里提到的“思想的大规模行”（第三个特征）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有“大一统”这一提法。其涵义为“以一统（聚合在一起）为大（优越）”，这是支撑金观涛所说的“超稳定结构”的基本的思想。统一的国家，与其说是由制度和法律框架所建立的，不如说是由“大一统”的思想所实现的。“一统”所表达的意思中，包括了聚合多种多样部分的涵义，而未必是要将其“统一为一种颜色”。这一思想，和加藤弘之所指出的“包”的概念有相同之处。

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代表的儒家强烈提倡这种观点。这一点可以说是贯彻在儒家经典的四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五经（《易》《书》《诗》《礼》《春秋》）中的基本思想。论述天、道、德、仁、义，论述理想的社会、社会形态，论述人特别是君主、统治者的人生指南和生活方式、论述君主这家臣的关系、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其核心在于如何实现社会的稳定秩序。其象征性的说法是“修神-齐家-治国-平天下”。进行个人的修养锻炼，实现家庭的稳定和和睦，保持家父长与其他家族成员、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君主与家臣权威关系的稳定，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实现社会与国家的稳定，才能使天下安宁。而站在诸国君主之上的皇帝（天子）为顶点，根据中华文化的有无、浓淡，将世界想象为上下有别的、具有强烈权威性关系的、重叠式并无限扩展的巨大圆锥形，这就是显示出“思想的大规模性”的第二个特征，也就是所谓的“中华秩序”。

笔者对儒家文化是否深入渗透到普通民众的层次抱有少许怀疑。但是，陈舜臣指出，与日本对儒家文化的摄取相比较，在日本仅仅从理念上融入了儒家文化，而生活中还没有达到融入儒家文化的程度，与此相对，“儒教是中国诞生的思想体系、生活规范体系，乃至生活本身”¹⁵。确实，“修身”或者是“齐家”都决不仅仅是统治者的问题。作为与儒家相对照的思想，人们往往提到道家的思想，老庄的思想也将“天”或“道”作为其根本。然而与儒家思想重视“人为”不同，道家思想提倡自然、无为的价值。此外，春秋战国时代产生了诸子百家，其探讨的对象、观察思考的深入发掘等方面，其规模之大，可以与古希腊思想相匹敌。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的文章，乃至今天许多领导人的讲话，都经常引用儒家为首的诸子百家的思想。直至今天，传统思想仍然在中国的政治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关于“儒教”观的统治，共产主义者、共产党在正式场合都作出批判，认为它们是封建主义的统治观念，但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中共领导人都曾屡次引用儒家为首的诸子百家思想，展示了这方面的知识。现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开始提倡和摸索“中国模式”，其中传统思想本身及其运用的色彩极为浓厚。

关于“大规模性”的第四个特征，我想指出的是权力的大规模性。曾经撰写过《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描绘出历史性的亚洲（中国）国家肖像的卡尔·魏特夫（汉名魏复古）提出过一种观点，他着眼于亚洲存在的大江大河反复泛滥和带来的丰厚的肥沃土壤，认为由于大规模治水灌溉工程（人工灌溉、水利）与水利的应用，产生了得以垄断性征集生产物资的巨大权力机构。他以此为基础，论述了中国形成中央集权式国家权力（皇帝权力）的依据。

权力在广义上，是拥有者对于社会的压倒性的力量，如果观察历代王朝，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一点。在制度上，中央设有被称作六部的官僚机构，加上军对和监察机构，通过地方长官的任命权和“回避制度”等控制地方，从而形成了牢固的权威式的阶层结构。最先进行这种统治机构建设的领导人是秦始皇。他在统治组织方面，创建了由中央派遣官僚至各地的、被称作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制，统一了文字、货币和度量衡。而为了防范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的入侵，他筹建了著名的万里长城，这些措施如果没有权力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的。当然，秦始皇的尝试由于其猝死而成未竟之业，但是对于此后中华帝国的统治方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随着产业兴起、贸易活跃、经济发展，帝国内部的交流增加，形成了松散的集合。但是，民众本身，后面也有所触及，正如老子所说的，仍然是“小国寡民”的世界，或者如孙中山所说的，是“一盘散沙”。他们并非希望对国家发挥某种积极影响的、自治的、自律性的社会，

¹⁵ 陈舜臣『日本人と中国人』恒文社、2005年、p. 25。

而是对权力、对自然更替循环有着强烈的被动的、看破红尘式的观念。

关于共产党的统治，目前拥有近 9000 万党员的共产党附着在中央、地方官僚机构之上，此外还拥有巨大的暴力机关，包括 230 万人民解放军、150 多万专门担负国内治安工作的人民武装警察。1960 年代前后的大跃进时期，由于毛泽东的冒进的激进政策，据说饿死者人数超过了 3000 万人，其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害者据说不下一亿人，而无论是大跃进时期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都没有显露出打破共产党体制的动向，这是因为民众认识到了压倒性的“权力的大规模性”。

中国基层结构 2——四大断裂性

“难以改变的社会”的结构性特征是由社会内部观察所推导出来的，这是下面一个课题。从社会内部进行观察的视角，即社会、文化、经济的价值、阶层、制度等关系结构。或许存在过于简单化之嫌，我认为可以将中国难以改变的社会结构，即“基层结构”理解为“四大断裂性”。即，（1）干部与民众的断裂性、（2）关系与制度的断裂性、（3）城市与农村的断裂性、（4）政治与经济的断裂性。

（1）干部与民众的断裂

这点要由我个人的经历谈起。笔者开始进行中国研究的时候，正是毛泽东思想璀璨夺目的文化大革命时代。毛泽东思想、中国社会主义的特征是什么？笔者自问自答，在比较了苏联官僚主义式的社会主义后，得出了自己的答案，“关键是平等主义”。在全国建立自给自足的人民公社，将内部权力机构精简化，否定专门的精英阶层，在军队也废除阶级制度等，为了实现平等社会，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蔚为壮观。但是，1976 年夏，我得到了初次踏足中国大地的机会。第一次到北京，我去了天安门广场，参观了革命纪念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等地，对于在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的普通老百姓，给我们访华团作向导的干部，简直像驱赶打扰我们的人那样，态度蛮横地将民众的队列挤开，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得以“正大堂皇”地进场，在馆内也得以优先参观。在各地的欢迎会、宴会的座次、干杯的方式等方面都是权威式的、形式化的，令人厌恶，我清晰地记得心中产生的疑问，“这是一个平等社会吗？”。此后，1986 年至 1988 年我得到了常驻北京的机会，知道了医院的挂号处、电影院和车站的售票处等地方有着干部专用和普通民众专用的不同窗口，干部受到了特别的优待。

在作为权力中枢的北京“中南海”，内部是什么样子的呢？内部在做些什么呢？外国人当然不清楚，对于普通中国民众而言，这也是一个不透明的未知的世界。当然，有些消息泄露了，在里面召开了左右整个中国的重大会议，展开了权力斗争，有着最高领导人的私人游泳池、舞蹈会场、子弟学校，但是基本上还是让人一无所知的。尽管如此，南临长安街的中华门入口处，放置着遮挡内部的巨大竖牌，上面大书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名言，门的两侧站立着荷枪实弹的公安警察，普通人不能踏足一步。这是一幅象征着干部与民众之间的深刻断裂的景象。

从民众与市民的角度进行分析的西方政治理论中，例如 G.阿尔蒙德和 S.韦伯所提出的类型化，将民众分为参加型-臣服型-未分化型等三个类型，通过观察未分化类型至参加型的转变，具体分析政治变动的内容，这是他们的研究手法¹⁶。但是，我们是否可以不考虑中国民众与权力的特殊关系而通过这样的普遍理论来论述中国政治呢？

在此介绍一下传统的统治者（士大夫）与民众（老百姓）之间的关系。首先看一下孔子，“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卷二里仁四）。而孟子则指出，“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卷 5 下滕文公章句上）。他认为，士大夫（干部）与普通民众所思所想的有着鲜明的对比，其结果形成了“统治-从属”的关系。

士大夫与普通民众相区别的关键之处，在于是否学到了文化和教养。士大夫被称作读书人，而读书人的涵义与日本大相径庭，这是一群与权力距离很接近的人。一般而言，汉字文

¹⁶ 参照 Gabriel Abraham Almond &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化本身就让人很难读懂，需要相当程度的教育训练。而且，集中学习中国文化的努力与科举考试结合在一起，成为晋身官僚队伍的重要的第一阶段。“读书”的意思就是“为当官而学习”。

官僚·精英主义在现代社会依然色彩浓厚。建国以来，共产党本身是唯一的精英们的政党，存在着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党校、各地的党校、重点大学和高中等各种培养精英的预备组织。改革开放以来，在上述途径之外，由新型先进企业、重点企业的精英中吸纳入党的情况也很普遍。在近年的研究中，经常有人指出，权力精英与金钱精英相结合，他们对于庞大权利的垄断，说明了目前新形式的精英与民众之间的断裂在加深。

与此相对，我们思考一下民众的情况。传统的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典型的景象，是与当权者无关的、沉浸在自然循环中的生活姿态，所谓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由哉？”（先秦《击壤歌》）。老子也就庶民之态提出“小国寡民”。即“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隣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¹⁷。今天这些内容同样适用。

中国的当权者与这样的民众之间的关系，正如儒家所主张的那样，为政者与民众的关系是单方向的，所谓“民主”，是认真倾听民众的声音，为了民众能够过上幸福生活而施行仁政，这并非作为西欧政治基础的、通过一定的制度性手续，使得民众能够自身选举产生为政者、进而通过民众的意志更换为政者、或者根据民众的共同意愿决定某些政策的机制。问题是民众本身长期习惯、沉浸于同统治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认为“由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人民民主的毛泽东的思想，与传统的儒家民主观念是一脉相承的。

例如，在抗日战争即将结束时召开的七大闭幕式上，毛泽东以《愚公移山》为题，做了演讲。其中提到，愚公的坚强意志与不懈的努力感动了上帝，上帝从天而降帮助愚公移山，现在的大山就是“帝国主义的大山与封建主义的大山”，推开这些大山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感动上帝，而“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¹⁸。同样的观点在习近平的发言中也可以看到。他同样主张“必须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并进而引用古语，谈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引自《管子·牧民》）¹⁹。

的确，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由于经济的发展，今天的群众形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关于所谓的激增的“中产阶级”，据说如果以资产达到5万美元（约590万日元）至50万美元作为中产阶级的标准的话，目前中产阶级的人口已达到1亿以上，2000年后，中产阶级急速扩大，与美国相比已达到其规模的两倍。他们享受着现代的生活方式、饮食生活、多样化的信息等市民阶层的生活。与此相对，关于被抛在经济发展之后的“贫困阶层”，每天生活在1.25美元之下的“绝对贫困”阶层，2008年占中国总人口的12.3%，约为1亿6300万人，2009年占中国总人口的11.8%，约为1亿5700万人，2010年占9.2%，约为1亿2300万人，人数缓慢减少。每天在1.25-2.5美元以下，年收入5百-1千美元多一点的“准绝对贫困”的阶层，2008年占总人口的25.8%，约为3亿4200万人，2009年占24.7%，为3亿2900万人，2010年占22.8%，为3亿0500万人，这一阶层的人口也在逐渐减少²⁰。抑或是其他的数据，如美国的盖洛普调查显示，2007年中国贫苦率为26%，2012年经过6年时间下降到约4分之1，占人口总数的7%²¹。

从以上的发展趋势来看，也许可以认为，中国社会阶层正在趋向相对的中产阶层化。但是，是否因此而觉醒了独自的权利意识和价值观，针对当权者提出异议呢？确实，在一些地区，市民与农民发生了激烈的抗议活动，当局被迫改变政策的事例也不在少数。但是，与巨大的权力进行直接碰撞的事件仍未成为主流。

仁井田升考察中国民众史，曾经指出，“东亚式的自由所处的另外一个境地，就是从现实

¹⁷ 世界の名著4『老子 莊子』中央公論、1984年版、p.147。

¹⁸ 『毛沢東選集』第三卷、p.393。

¹⁹ 『習近平・国政運営を語る』外文出版社、2014年、p.28。p.295。

²⁰ 渋谷司「見逃せない中国貧困層」『経済界』2015年3月25日号。

²¹ 「チャイナネット」2013-12-25 15:58:48

的东亚式的专制统治的地方逃避并保持沉默。而且逃避虽然并不是否定现世本身，但是在抛弃了超越现世的解脱的同时，也抛弃了希望改变‘统治原理’的意愿”²²。可以认为，这种当权者与民众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适用于现代中国的内部世界。孙隆基指出，建国后，“大一统”与“小国寡民”的相互依赖关系同样被建立起来。而且进入文革时期，“小国寡民”，即“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更加突出²³。总之，对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中权力的狂乱、1978年的“北京之春”、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等扼杀民主化的事件的民众而言，从专制统治逃避并保持沉默是其生存之道，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与权力保持距离，培养自己的生活空间（“市民空间、生活圈”），并从中找到生存的乐趣。

（2）关系与制度的断裂

中国人际关系的方式，还有一项重要的特征必须指出，那就是“关系与制度”的断裂性。本来，一般的情况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社会在各方面建立了制度、规则，人民遵循这些制度和规则进行活动，通过尊重这些制度和规则并反复遵守，使得对制度和规则的依存及依赖度提高，规范化获得发展，全体社会成员以制度为轴心开始运转，人们行为的可预测性逐步提高。这被称作制度化²⁴。

然而在中国，制度、规则、规矩未必会成为处理事务的基本方法。当然，中国也存在着制度、规则和规矩，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遵循这些处理事务的事例。但是，这些制度、规则、规矩往往被无视，诸如纠缠到重大的问题，当权者的意向起作用，人们强烈地强调自我等等，在这些特定的情况下，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恣意地、凭借权力处理事务的事例。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如果按照制度行事，那么第35条所规定的那些内容都应该可以自由进行。但是，民众们明白，即便不“反对共产党”而仅仅是采取了违背了党的意向的行动，也肯定会受到当局的拘捕，并受到某些处罚，因此他们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反过来讲，有些当权者具有多次“受到背叛”的经历，因此并不片面地相信制度和规则。这是民众的消极方面，但这也是聪明的判断。或者，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国的环境法，内容上与发达国家可以说差不多。但是实际上这些法律很少被认真执行，环境问题始终在恶化。为什么呢？

这是与中国人为了使事务按照自己的希望发展而如何做、依靠什么等疑问密切相关的。最终，法律和规则并不能当真，中国人不想依赖这些。例如，即便知道工厂排出的废气是周围大气污染的重要原因，工厂的负责人会因为利益优先，而不改善对排放废气的控制，不缩减生产。与其如此，他们会利用同当权者的个人关系，行使贿赂来消弭问题。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正是如此。

日本也并非没有这种现象，但是一经发现，就会遵照法律受到惩罚，接受社会上的制裁。但是，在中国普遍不会这样。无论弱者还是强者，想要成事，想要保护自己的时候，最值得信赖的不是法律也不是制度，而是关系。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中国人处理事务的“智慧”。面对反复爆发的战乱和大规模灾害催生出的无秩序和强大的权力，人们始终在思考如何生存下去，如何处理事务对自己有利，结果就产生了这种现实的处世之术。

围绕某个人的各种各样的“关系”所产生的中国式的有效的组织结构或集合体，被称作“圈子”。原本费孝通将人际关系比作落在水面的石子所形成的同心圆式的波纹，他将这一波纹似的“亲近-疏远”关系描述为“差序格局”，而所谓的“圈子”，是他对这一波纹似的关系中最紧密的同心圆所做的描述²⁵。“圈子”一般是指某个人感觉到的自己可以信赖的、并且能够互相帮助的人际关系的集合体（网络），是以血缘、地缘、同窗等人际关系为基础形成的非正式的网络。当笔者大学中很多中国留学生被问到“如果你想做什么的时候，最值得信赖的是什么？”，回答说“圈子”的占压倒性多数。而进一步问道“相关的法律或规则是否重要？”

²² 仁井田陞『東洋とは何か』p. 15。

²³ 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構造」』崑山出版社・香港、p. 332。

²⁴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²⁵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p. 21。

的时候，同学们几乎都笑着摇头。探究中国政治结构的机能时，这一“圈子”极为重要。有一本书中写道，“圈子在政治系统中，是成员保护自己切身安全的基础……圈子是重要的政治势力。如果被置于圈子之外，就会被边缘化”²⁶。

总之，在一般的近代化理论中，利益意识和权力意识会顺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扩散，而且拥有对利益和权力理性思考的人会增加，由此产生了基于规则和规矩、制度进行判断和行动的倾向。这种状况和权利意识、重视公平手续的氛围会被营造出来，手续民主主义会成长起来。但是，在中国，即便是目前的情况下，关系、圈子仍然是他们行为习惯的最为重要的基础。制度和规则正在渗透到人们思维方式中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与急速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现代化相比，思维方式的变化则是缓慢的。

（3）城市与农村的断裂

中国传统的都市和农村的形象是清晰的，都市被称作“城市”，指的是由四面的城墙所围起来的内部空间。在这里，进行政治和商业活动，一到晚上，城门会关闭，与外部世界隔绝。城外，基本是广大的农村地区，住在农村的，除了地方干部（乡绅）以外，就是老百姓（农民）。都市与农村的断层正如城墙所象征的，城外的农村地区没有文化，是上述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景象。主要围绕 20 世纪 30 年代-40 年代中国农村进行频繁的调查活动的福武直，详细分析了县政府及区公所和农村的各种关系，评论道，“可以说，各个村落并没有因为行政关系而特别紧密连接起来”²⁷。李大钊在“五四运动”时期，曾呼吁年轻人，为了改造断绝的、黑暗到极点的农村而到农村中去²⁸。

建国后，人们觉得实现了平等自由的社会，然而不久之后随着社会主义体系的建立，在基层的常委会的严密监视之下，城市形成了单位社会，而农村形成了人民公社，移动的自由被剥夺了。而且，通过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等户籍制度，两者之间的断裂被固定化下来。1980 年代以后，在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城市和农村的流动性提高。特别是在中国加入 WTO 的 2000 年以后，发生了农村的年轻人口（农民工）大量涌入沿海城市地区的现象，有人认为，两者之间的断裂性逐渐缩小，以致将逐步消除。

笔者常驻中国期间，进行了很多地方调查，那时的交通手段基本上是火车。从北京到西安、广州、上海、越过哈尔滨到大庆等的旅途自然是坐火车，到更远的地方，从北京经内蒙古，经过宁夏、兰州到乌鲁木齐的旅途也是坐火车。从车窗观察到的中国的风景，对于描绘出中国的整体形象作用很大。列车经过各个省的首府及第二大城市时，车窗外会突然城市的风景，而不久之后，又变成广大的农村的风景或沙漠、草原地区，一直蔓延到远方，这样的风景的变化可以反复看到。看到这样的风景，笔者不禁浮想起濑户内海的例子。农村是广阔的大海、城市是漂浮于其中的各个岛屿。城市与农村的风景差别如此之大，由此创造出了中国大地这样的“大海”。当然，这样的风景本身，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城市与农村所具有的结构性的差异——断裂性的基本部分，是否依然没有改变呢？

农村自改革开放初期以来，农业（生产）问题、农民（行为主体）问题、农村（社会）问题这三大要素，被称作“三农问题”，比起其他国家中的内部差距，中国存在着更大的独特的差距。除生产差距之外，还有信息、通信等近代化和文化方面的方便程度、以及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福利方面的差距。中国强调要通过充实这些领域，努力实现农民生活的稳定，但是由谁、使用什么资金、投入多大的力量、是否持续实施呢？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点，从目前的趋势上看，不得不说，最终“三农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而且，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迎来了被称作“新常态”的经济低迷期，现代化的普遍趋势开始放缓。普遍性的社会发展论认为，通过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发展，使社会走向均质化，城市与农村差距得以消除，一些人由此预测中国的“三农问题”会得到解决。

但是，社会学专家孙立平将今天的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形容为“断裂社会”，并进行了如下解说。“以前，城市人口的生活必需品中有很多东西，例如粮食等依赖于农村社会的供给。但

²⁶ 张亚明 陈健鹏《圈子》当代世界出版、2006 年、p.7。

²⁷ 福武直『中国農村社会の構造』大雅堂、1946 年、p.199。

²⁸ 《青年与农村》《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 年、p.146。

是现在，中国进入了耐用消费品消费的时代。耐用消费品主要由城市部分供给，与国际市场紧密结合在一起，甚至一部分粮食也由国际市场供给。在既有的户籍等制度存在的同时，伴随着经济的市场化，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也就是说，目前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二元结构，出现了比以外都更为深刻的断裂的情况”²⁹。中国社科院原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陆学艺指出，“因为户籍制度的存在，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向上层流动受到了阻碍”³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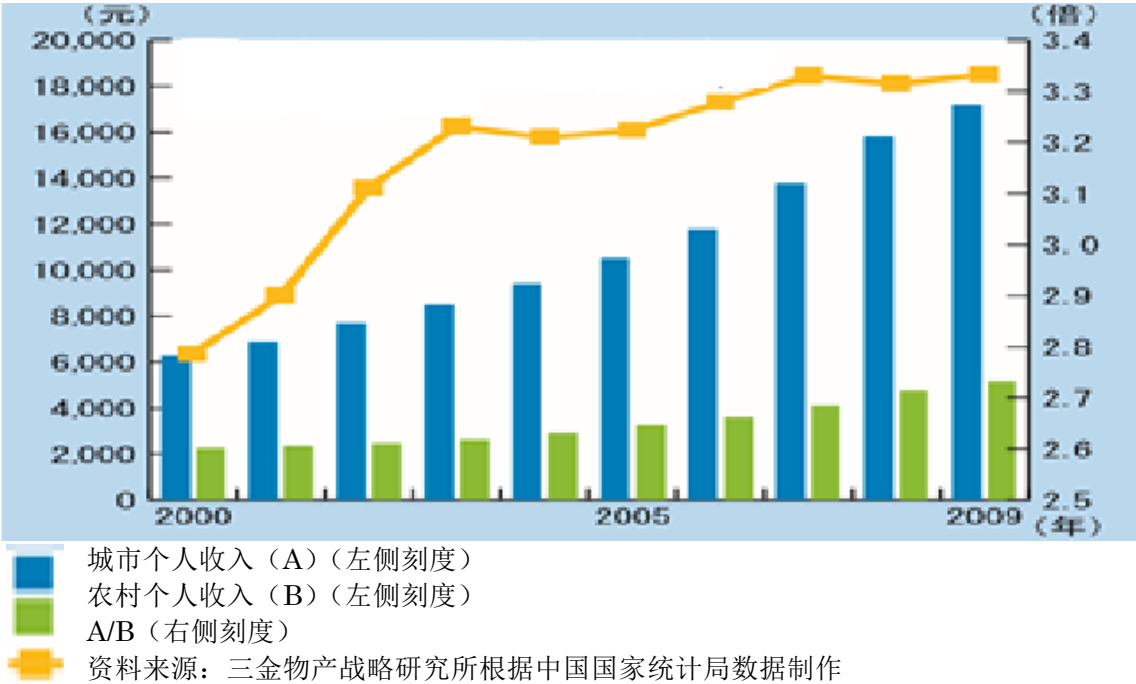
图 1 显示了户籍制度的一般性改革的现状，城市户籍与农村户籍本身被保留了下来。而图 2 显示出，尽管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城市与农村个人所得差距依然没有缩小。

图表 1 中国户籍制度的变迁

区分	时期	内容的变迁
第一期	1949 年-1957 年	承认国民居住与迁移的自由时期
第二期	1958 年-1977 年	严厉限制由农村迁移至城市的时期
第三期	1977 年-1992 年	迁移的限制有所缓和的时期
第四期	1992 年-2000 年代	尝试进行户籍制度的改革
第五期	2010 年-	通过促进农村居民向中小城市移居推动城市化

资料来源：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

图表 2 城市与农村个人收入变迁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城市与农村的断裂性作为一大课题依然存在。

（4） 政治与经济的断裂

“政治与经济的断裂性”的说法可能立即会招来反驳。在过去王朝的历史中，经济混乱引发农民起义并最终导致政权崩溃的事例不胜枚举。相反，如毛泽东时代那样，政治的狂乱使经济陷入崩溃境地的情况也曾出现过。在此我想指出，作为问题关键之处的“断裂性”，并不是指这二者之间的“破坏性的介入”，而是指二者日常的、或者普遍的“相互渗透性”，换

²⁹ 孙立平《断裂的社会——二元社会结构》百度文库。

³⁰ 陆学艺《“三农”新论——当前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言之，政治领域的各个问题与经济领域的各个问题相互影响，可以说是政治与经济的普遍关系。而在“相互渗透性”这一前提下，人们提出了上述的“体制转换论”，即主张通过经济发展，带来中间阶层和市民的兴起，这又会导致价值和权力意识的多样化，促进对于市民行活动的参与，最终向民主化转变。但是在中国，不得不说，这种“相互渗透性”是非常薄弱的，所以笔者用“断裂性”来形容这一现象。

我们重新回想一下前面提到过的村松祐次的观点，即，“与长期的不断变化的政治变动相表里，在经济领域的某种意义上，稳定的静态性的循环一直持续着”。在经济的静态循环这一意义上，长期以来中国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这种经济的运转受到四季和昼夜等自然循环的制约。不断变化的政治变动，是指围绕权力的斗争这一人的循环。特别是村松所考察的对象——清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大约一个世纪——更是如此。

研究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时，必须理解“虚”与“实”的关系。20多年前，笔者阅读《邓小平文选》时，在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讲演中，有一段解说，“这是邓小平统治在中央务虚会上的讲话”。之后在关于1989年4月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索胡耀邦之死的报道中，又出现了“务虚会”的提法。所谓“务虚”是什么呢？与此相对，还有一个词汇是“务实”。后来我才知道，所谓“虚”，并不是按照日语所理解的“虚妄”“空虚”的意思，而主要是指“用眼睛看不到的、无法诉之于形的实体”。政治、思想、规范等可以归在这里面。因此，“务虚”，是指论述和掌握政治、法律、思想。“虚”的实践产生的是“框架模具”，在中国，这往往是以威权主义式的阶层的形式显现出来的。而与此相对，“实”是“眼睛看得到的、可以诉之于形的实体”，指物价、贸易经济、环境、医疗等社会生活。“务实”是思考这些问题并进行实践。而“实”的实践结果通过“利益”显现出来。“虚”与“实”被认为是一体两面，但又是各自独立的实体，这样的所谓二元论式的理解，正是中国的特征。其根本之处还在于传统思想的“阴阳二元论”的思维。

将政理解为“虚”的观点可能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强烈影响。为政的君主和统治者“不语食、怀德”，老百姓“思食、怀土”，这种说法正是二元论式的表述。尽管很多民众甚至每天不能吃饱饭，毛泽东仍然号召进行“触及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出演“伟大领导人”的角色，而周恩来在支持越南的反美民族解放战争的同时，在中国仍处于贫困的现实之中，通过谋求中美接近的尼克松访华，出演了“大国中国”的角色。可以说，这些演绎的正是所谓的“虚”。对照我国和其他国家首脑的行为习惯，这是不可思议的思维方式。

今天通过推动改革开放路线，经济获得发展，对政治的确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在这一意义上，可能一些人会认为，政治和经济将进一步相互渗透性，断裂性将有所消除。但是，当人们觉得随着经济改革的发展，政治民主化也会有所发展时，爆发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此后，“经济上开放-政治上抓紧”的模式一直持续下来。今天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以至于我们可以看到数以亿计的中产阶级的崛起，但是政治改革仍然停滞不前，甚至对共产党发出稍许批判声音的人士被陆续拘捕，在经济对外开放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钳制思想、封锁信息”的方针得到了加强。这样的现状无疑正反映了政治与经济的断裂性。

如何将现代的多重断裂性与中国的前景预测理论化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对目前及今后中国的前景进行展望。近三十余年来，改革开放的发展给社会带来了巨大改变，无疑促进了上述四大断裂性的变化。我们可以观察到以下几点：（1）虽然精英与民众的断裂性依然存在，但是其内涵的确发生了改变。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结合显著，产生了新的精英与民众的断裂。民众层面的利益、权利意识的确有所提高，但是并没有轻易地带来政治意识的觉醒和提高。民众只要获得利益，问题就解决了，他们并不希求更多的东西。尽管可以被称作精英的人们在精英内部开始重视民主手续——例如“党内民主”就是一例——但是他们并不期望大众参与型的民主。当然真正地自律性地谋求以民众为主体进行参与的民主主义的呼声有所增加。但是，由于权力的严厉镇压，这些呼声很难进一步扩大。

（2）关于关系与制度的断裂性，毫无疑问，在各种领域，局部的制度化有所发展。但是，“党的领导”依然是最优先的，现实中政治可以无视规则介入人们的生活，人们切身感受到了

“法治”的局限性。在这一意义上，人们依然存在着某种意识，那就是自己所能依靠的是“关系”，而不是“法律”。

(3) 关于城市与农村的断裂性，有观点认为，伴随着经济活动的变化，大量人口由内陆农村涌向沿海城市，包括农村社会，互联网、智能手机、手提电话等信息社会化的迅猛发展令人瞩目，中国的面貌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即便如此，城市与农村的户籍制度、经济社会差距仍然非常明显。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作为农民工流入城市后，城市中被称作“城市与农村的二元结构”（陆学艺）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歧视依然非常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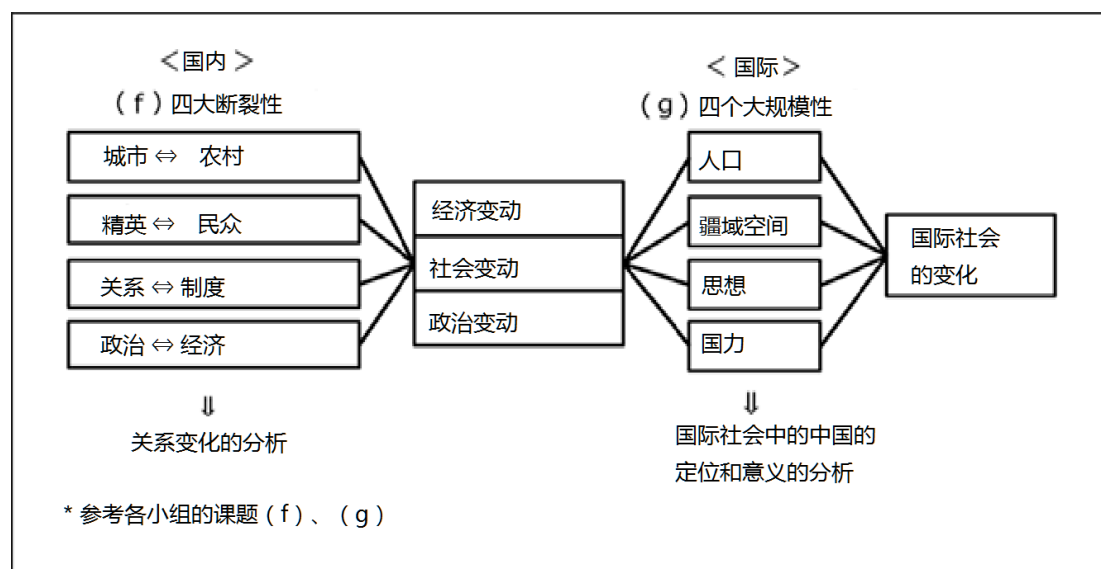
(4) 在政治与经济的断裂性方面，如前所述，“经济上开放、政治上抓紧”的结构依然强势存在，经济、社会的变化并不能轻易地导致政治的变化。因此，单纯依靠经济逻辑的延伸，并不能搞清政治的变化。

但是笔者想强调的，不是“不变化”这一现象的本身，而是“难以变化的结构”正在逐渐地产生变化，这些变化的特征是什么呢？只有从显著的变化和难以改变的特性这两方面考察社会的变化，才能找到客观、理论化地预测中国未来前景的关键。

而且“四大断裂性”给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带来了强烈的影响，受其影响的同时，“四个大规模性”同样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冲击。因此，我认为，我们通过分析“四个大规模性”的影响，可以对“新兴大国中国”的前景进行展望。

历史跨过 20 世纪末走到了今天，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崛起在世界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但是对于中国前景的展望，往往局限于个别现象的案例研究——例如对 GDP 增长率的预测、差距与腐败的增加等，人们以此为依据提出悲观论（中国崩溃论等）或乐观论（中国治世论等）。但是，即便中国最终能够描绘出与普遍性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相同的世界（笔者是如此认为的），中国也不得不走过某些特殊的道路，也许其发展方向也与普遍性的现代化道路有所不同（这一点是和“基层结构”问题密切相关的）。

我们在研究国际社会中的中国未来前景时，在思考上述这些问题的同时，还要以国力的大规模性为核心，在分析人口、疆域空间、思想的大规模性等要素怎样相互纠结的同时，探索中国的新的“定位”及其国际影响等问题，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本文中所阐述的笔者个人的区域研究论“基层结构论”，目前仍需要通过各种实证性研究使其更为严密。因此，如下面的关系结构图所示，笔者将关于中国“基层结构”研究的研究课题罗列了出来。



首先，这里标示了以下“四大断裂性”的课题。

- (1) 精英与民众的断裂性：历史文化的断裂性（读书人的形成、官僚制度等）
- (2) 教育制度的断裂性（干部制度、重点校教育制度、官僚意识等）
- (3) 关系与制度的断裂性：人治与法治、“关系”形成的历史、统治者与民众对

制度的认识和态度等、“关系”与圈子和制度、无视制度的现实与思维方式

(4) 城市与农村的断裂性：历史文化的断裂性、制度的断裂性（户籍制度等）、政策的断裂性（限制移动政策等）、社会生活的断裂性

(5) 政治与经济的断裂性：政治文化所带来的断裂性（经济为政治从属物的观点等）、并不连动的政治与经济（民国时代的事例、共产党时代的事例）

下面，列举了“四个大规模性”的课题。

(1) 人口：13 亿多人口的巨大规模本身的意义、向海外移动的潮流的现状及其意义

(2) 疆域空间：对于作为安全保障空间的海域、空域的扩大态度积极。在经济空间方面，贸易量、人民币的使用、海外直接投资等显著扩大，是否正在形成“中华经济圈”？

(3) 思想：在大国民族主义凸显的同时，开始强调以儒家为首的传统思想，在海外设立的众多“孔子学院”的状况。

(4) 国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大国意识的外交实力、重视软实力的特点

这四个大规模性对社会影响的力度并不相同。政策制定者（集团）是如何认识这些问题的？在战略和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是如何处理的？其影响和意义会因此而大为不同。例如，关于（1），在改革开放战略实施的最初阶段有着负面意义（因此采取了“一胎化政策”），在加速期则具有积极意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4）中的硬实力的增强有力促进了（2）中的疆域空间的扩大和（3）中的大国民族主义的抬头，成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及影响力的核心要素。

在思考上述问题的同时，进一步对“四大断裂性”和“4 个大规模性”这一基层结构本身进行动态分析，将这些要素关联在一起，对政治、经济、社会等个别领域的个别研究课题进行考察，这些研究将进一步深化作为区域研究的现代中国研究。

（黄斌 译）

近代中国地质学的渊源

——以庞佩利为中心

武上真理子

(京都大学)

绪言

1865年8月26日,美国国家科学院第四次会议召开,其中有一篇题为《中国、日本、蒙古的地质学观察报告》的论文。作者庞佩利(Pumpelly, Raphael: 1837-1923),刚刚结束自东亚横断西伯利亚的实地大调查后回国的新人地质学者。1863年3月,林肯总统签署成立美国国家科学院,至今仍是群英荟萃的科研机构。庞佩利在此作报告时才27岁,当然还不是会员。但与其他报告人的代读论文不同,庞佩利不仅可以亲自宣读,会员们还围绕他的论文内容展开了激烈讨论¹。该论文后来又刊载于《美国科学与艺术》杂志,这是美国创刊时间最长的科学杂志,总编即为“美国地质学之父”丹纳(Dana, James Dwight: 1813-1895)²。论文虽然只是以题目中的三个地域、尤以中国为焦点的短小随笔,但随着该文的公开逐渐在美国科学家群体中站稳脚跟的庞佩利,终于有机会发表自己历时四年的调查记录《中国、蒙古、日本的地质调查:1862-1865年》(以下略称《调查》)。记录通过了以“人类知识的增进与普及”为目的的史密森学会的严格审查,作为学会发行的《史密森对知识的贡献》系列之一出版³。读过《调查》的人无不感觉即将迎来东亚、特别是中国“科学性”地质调查的黎明⁴。大约三年后,又出版面向一般读者的旅行游记《横断美国·亚洲》⁵,这让异境开拓者庞佩利的名字更加广为人知。该书的评论者们在言及《调查》时,几乎都对他“严密的科学成果”做了高度评价⁶。

现代人说起近代中国地质学的历史时,有多少人能想起美国地质学者庞佩利的名字呢。地质学是源自近代西方的学术,所以引进至非西方世界时自然需要外国人的介入,中国也不例外。现代中国的科学史概论中,提及清末中国开展调查活动的外国地质学者,首位即为庞

¹ 关于庞佩利论文的发表以及刊载过程,参考 Champlin, Peggy, *Raphael Pumpelly: Gentleman Geologist of the Gilded Age*, Tuscaloosa, Al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94, pp. 70-72.

² Pumpelly, Raphael, “Notice of an Account of Geological Observations in China, Japan and Mongolia,” *Ame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 [2nd Series], vol. 42, no. 124, July, 1866, pp. 143-145.

³ Pumpelly, Raphael, *Geological Researches in China, Mongolia, and Japan, during the years 1862 to 1865*,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1866, also appeared in *Smithsonian Contributions to Knowledge*, Vol. 15, 1867. 庞佩利论文有《对知识的贡献》第15卷(共收录4篇论文,每篇单独标记页码)收录版与单行本(《对知识的贡献》丛书202),京都大学工学研究科资源工学资料室所藏为单行本,以下该书略称为 *Researches*。

⁴ 全部10章中有8章是关于中国地质及矿产资源的记述。

⁵ Pumpelly, Raphael, *Across America and Asia: Notes of a Five Years' Journey around the World and of Residence in Arizona, Japan and China*, London: Ganesha Publishing and Tokyo: Edition Synapse, 2003; reprint, New York: Leyboldt & Holt, 1870. 该书是纽约与伦敦同时出版(London: S. Low, Son and Marston, 1870),直至第5版都受到高度评价。另外庞佩利晚年出版的自传中也收录了该书,内容几乎没有删减。Pumpelly, Raphael, *My Reminiscences*, 2 vols., New York: Henry Holt, 1918.

⁶ “Literary Notices: Across America and Asia,” *London Quarterly Review*, Oct. 1870, vol. 35, no. 69, pp. 244-246; “Across America and Asia,” *The Athenaeum*, Jan. 29, 1870, no. 2205, pp. 153-154; “Across America and Asia,” *Saturday Review of Politics, Literature, Science and Art*, May 7, 1870, vol. 29, no. 758, pp. 613-614. 这些书评没有单纯关注《横断美国·亚洲》的旅行记与冒险故事,而是重视庞佩利科学的观察方式,以及没有被人种或文化偏见所束缚的共鸣力量。

佩利⁷。但此类记述很难摆脱“帝国主义”“殖民地主义”的桎梏，例如近代中国地质学泰斗李希霍芬（Richtshofen, Ferdinand von: 1833-1905），虽然对其学术业绩评价甚高，但仍然是“直接或间接地为殖民主义侵略服务”的外国人⁸。庞佩利的研究业绩早于李希霍芬调查（1868-1872），自然也在此文脉中被定位⁹。

近年来，关于中国地质学先驱庞佩利的研究不断涌现¹⁰。但大多数研究将他当时的学说比照现代地质学进行评价，就显得过于粗糙或有明显谬误，结果就是再次确认了庞佩利学说的“局限性”。实际上，无视当时的时代科技水平，从理论与技术都有日新月异变化的现代地质学高度很难“客观地”评价庞佩利的学术业绩。另外，即使承认“第一位在中国进行地质考察的西方地质学家”庞佩利“在中国地质学历史中具有特殊意义”¹¹，但如果将考察对象仅限于中国，很难否认其成果与李希霍芬大作《中国一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相比会黯然失色。那么在李希霍芬之前，初次接触庞佩利报告的美国人的惊奇与兴奋从何而来，他的考察旅行成果在中国如何被继承（或如何没有被继承），本文的出发点来自这个朴素的疑问。

下面首先从欧洲与美国地质学史的角度，概观 19 世纪中叶“绅士探险家兼科学家”¹²庞佩利所生活时代知识与学术形成的情况，同时讨论庞佩利作为先驱者，在地质学诞生后进入美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然后重新梳理庞佩利中国考察的足迹，尝试从多角度具体分析他与“中国地质学”——中国的、中国人做的、为了中国的地质学——成立史的关系。最后阐明与庞佩利一脉相承的中国地质学者的系谱，进一步理解现代中国文化的深层构造。

一、草创期的美国地质学与庞佩利

1、近代地质学的成立与地理学

在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中，地质学（geology）一般认为是比较年轻的学问，“地质学作为地球研究的一般性词语普及于 18 世纪末”¹³。1788 年至 1797 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第 3 版中没有“geology”项，而 1810 年第 4 版（第 9 卷）中则有了长达 80 页的单独说明，由此可知当时地质学的飞速发展¹⁴。以古代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中关于宇宙秩序（cosmos）的考察——天地之学——为开端，16-17 世纪科学革命时期整合的“地球理论”终于作为近代科学的一环得以成立。地质学作为近代科学，摆脱了个人思辨议论的倾向，重视基于现场调查与观察的理论。该背景是 18 世纪西方各地进行了有组织的科学探险，大量收集世界各地的地理信息以及珍稀矿物和化石。而且，地质学研究伴随一定规模的共同作业，比之前的“地球理论”具有更强的社会性。

⁷ 卢嘉锡主编，唐锡仁、杨文衡分卷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地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年，482-486 页。杜石然等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391-392 页。

⁸ 前注《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391 页。

⁹ 李希霍芬于 1860 年随普鲁士外交使团来华并尝试中国地质调查，但因为太平天国事件治安恶化，最终没有被允许进入内地，所以他开始调查的时间晚于庞佩利。李希霍芬论文对山东省出煤港胶州湾表示关注，导致后来德国的占领所以必然遭到批判，但庞佩利并没有类似具体的“罪状”。本文讨论的中心是现代中国地质学史的大潮流中庞佩利的地位。

¹⁰ 陶世龙《从庞佩利（即庞佩利）到维里士》，《地质学史论丛》1995 年第 3 期，15-22 页。杨静一《庞佩利与近代地质学在中国的传入》，《中国科技史料》第 17 卷第 3 期（1996 年），18-27 页。杨静一还有与新南威尔士大学的 Oldroyd 共著的英语论文，是梳理庞佩利中国调查旅行足迹的研究，但主旨与中文论文无甚区别。将庞佩利的业绩与中国地质学史或同期的社会状态进行比照分析的尝试性研究，一般局限于概论或推论。Oldroyd, David and Yang Jing-Yi, “On Being the First Western Geologist in China: The Work of Raphael Pumpelly (1837-1923),” *Annals of Science*, Vol. 53, Issue 2, (Mar., 1996), pp. 107-136.

¹¹ 前注杨静一《庞佩利与近代地质学在中国的传入》，18 页。

¹² Champlin, *op. cit.*, p. 214.

¹³ “地质学 Geology”，太田次郎总监译《现代科学史大百科事典》，朝仓书店，2014 年，497 页。

¹⁴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or, A Dictionary of Arts, Sciences, and Miscellaneous Literature*, 4th ed, rev. and enl., vol. IX, Edinburgh: A. Bell and C. Macfarquhar, 1810, pp. 550-629.

（<https://archive.org/stream/encyclopaediabri09edin#page/n7/mode/2up>、2014 年 5 月 1 日）。以下将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略称为 EB。

18-19 世纪,地质学从诞生到成长,并非一开始就是独立的学问领域。首先看其与地理学(geography)的接近性,如《大英百科全书》第 4 版中所说,“以前该学问领域一直被称为自然地理学(physical geography),但现在一般相当于 geology 和 geognosy”¹⁵,一般认为地质学是地理学的分支。

比如,达尔文进行贝格尔号航海时(1831-1836),携带了莱伊尔著《地质学原理》初版(第 1 卷)。而且达尔文以此次航海调查与发现为中心,在地质学方面取得各种成绩,这在科学史上也经常被提及。但达尔文登上贝格尔号进行长达 5 年的航海探险,其契机之一是德国地理学先驱洪堡(Humboldt, Friedrich Heinrich Alexander Freiherr von: 1769-1859)的南美探险旅行,非达尔文研究者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¹⁶。达尔文曾亲口承认他受洪堡的感化¹⁷,航海归来后成为伦敦地质学会(Ge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1807 年成立)和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1830 年成立)的会员,并被选为评议员¹⁸。虽然达尔文在皇家地理学会只发表过 1 篇论文,但他确实“在巡游南非和太平洋诸岛的旅行家们(travellers)向学会的投稿中被频繁提及”¹⁹。同一时代的人眼中,达尔文是地质学者也是地理学者,甚至还是探险家。

解释地质学与地理学的接近性,并非为了强调 19 世纪的学术未分化情况,而是为了确认当时两门学问共有的学术方向与冒险主义。探险旅行是地质学与地理学发展的原动力,它既是细致观测并分析新研究对象的“科学”行为,也是对未知世界的“冒险”。很多“科学”性发现,其共通背景均为数学或物理学理论的发展,以及观测机器的改良与开发等。学会与学术杂志上的报告或各种讨论,无疑充满未曾有过的知性刺激。另一方面,所谓“冒险”,首先是激发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憧憬,其次是为了实证造物主伟业的宗教性尝试,还有就是为了满足现实利益欲望的挑战。因为这诸多原因,所以人们热衷于探险旅行带来的新信息与新奇事物,然后期待更多的新发现。

探险旅行带来的现实利益中,与地质学最紧密相关的是地下资源的发现及开发。鉴于地质学派生于自然地理学,如果将地理学称为地质学之母,采矿学(mining)与矿物学(mineralogy)一后文简称二者为“矿业学”一的学问,也可以说是几乎同一时期被社会认知的“兄弟”。德意志萨克森公国的维尔纳(Werner, Abraham Gottlob: 1749-1817),对希腊语中“大地之论”(γεω- [geo-] + -λογία [discourse])一词的语源“geology”所暗示的偏重理论倾向表示反对,他用“geognosy”替代“geology”。维尔纳在矿山之城弗赖贝格的矿业大学学习,1775 年就任该校教授,是他将弗赖贝格学院推向世界。维尔纳定义 geognosy 为矿物学(mineralogy)的一部分,他所谓的矿物学是“将各种矿物看做是地球的一部分,主要研究其产出与相互位置关系的学问”²⁰,所以可看作是与矿床地层学分析相关的实证性或实用性地质学。被铁和煤炭支撑的产业革命时代,地质学与矿业学联手为产业近代化做出了贡献。

如上所述,如果德意志的弗赖贝格是实用性地质学的圣地,那么理论性地质学的学术中心则在伦敦。赫顿(Hutton, James: 1726-1797)、威廉·史密斯(Smith, William: 176

¹⁵ EB, 4th ed., p. 550.

¹⁶ 鲍勒(Peter J. Bowler)指出,达尔文对热带地域抱有研究热情,很大原因是受洪堡《南美纪行》的影响。另外山田俊弘认为要关注“达尔文当初是在德国自然志家、著名科学旅行家亚历山大·冯·洪堡的影响下进行工作”,并着眼于达尔文地质学是继承了以“世界的自然志”“地球理论”“自然地理学”为重要研究对象的“洪堡科学”。彼得·威廉·波塔著,横山辉雄译『チャールズ・ダーウィン 生涯・学説・その影響』,朝日新报社,1997 年,58-59 页。山田俊弘『ダーウィンとフンボルト——20 世紀における東アジアの一地学者の視点』,『生物学史研究』84 号(2010 年 10 月),88-98 页。

¹⁷ “我长期观察热带地域的情况与植生,是想与洪堡走同一条道路”,Letter of Darwin, C. R. to Fox, W. D. [7 Apr., 1831], Darwin Correspondence Project, letter: 96 (<http://www.darwinproject.ac.uk/entry-96>)。后来达尔文也在各种文书中多次表达对洪堡的敬意。

¹⁸ Woodward, Horace B., *The History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London: Geological Society, 1907, pp. 126-127; Mill, Hugh Robert, *The Record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1830-1930*, London: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1930, pp. 48-49.

¹⁹ Mill, *op. cit.*, p. 49.

²⁰ EB, 4th ed., p. 550. 洪堡在弗赖贝格矿山学校师从维尔纳。

9-1839)、莱伊尔 (Lyell, Charles: 1797-1875) 等学者辈出的英国, 占据“地质学英雄时代”的中心。这一认识虽然有些陈旧²¹, 但拥有世界最早的地质学会——伦敦地质学会的伦敦, 无疑具有出色的凝聚力。只是这里所谓的地质学是博物学 (natural history) 的一部分, 其发展过程有自然神学 (natural theology) 的强力作用²²。解读“神创自然”这一普遍学理的研究, 在创世理论失去影响力后仍有比实学更加重视理论的倾向。而且英国学术界有重视社会阶级与大学出身的传统, 所以伦敦地质学会可以说是聚集“绅士地质学者 (gentleman geologists)”的知识沙龙。

2、美国地质学的先驱

英国的“绅士地质学者”, 对他们过去的殖民地美国的地质学发展做出很大贡献。1840年, 费城成立美国地质学家协会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logists), 它部分模仿伦敦地质学会和英国科学促进协会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英美地质学者们在此交换信息并进行学术交流²³。然而在新大陆开花的地质学, 与伦敦精英们的学术稍有不同, 一言概之即专业意识。

广大国土不断扩大且迎来经济发展期的美国, 正需要与实用相结合的地质学。但这并不意味着轻视理论, 而是时刻意识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拥有地质学与矿业学知识技术的人们, 兼有“经济地质学者” (economic geologist) 和“应用地质学者” (practical geologist) 的自豪感并得到社会的尊重, 兼具开拓者精神与专门知识技术的专业集团, 是美国地质学者的第一代。

19 世纪初的美国并没有相应的地质教育机关, 是弗赖贝格矿业大学接收了富有野心与探索心的美国青年。1819 年起, 进入该大学学习的美国学生年年递增, 1860 年代占据全校外国人学生的首位²⁴。毕业后的美籍弗赖贝格人作为“世界产业开发先驱中的矿业传教士”²⁵活跃于各地。庞佩利从 1856 年开始在该校学习了 3 年, 是这批人中的佼佼者, 被称为“我们美国的洪堡”²⁶。而庞佩利的实学及开拓志向, 与其日本之行以及中国调查有关。

庞佩利 1837 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奥韦戈, 故乡的大自然培育出他开拓者的素质, 其家族是当地望族, 在华盛顿政界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母亲热心于子女教育且不吝金钱, 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 对他影响甚深²⁷。1854 年, 庞佩利放弃耶鲁大学的入学资格, 与母亲一起去德

²¹ 关于地质学历史观的变化, 参考矢岛道子、和田纯夫编著『はじめての地学・天文学史』, ベレ出版, 2004 年, 126-128 页。

²² 关于英国地质学与创世说的密切关联, 参考 Gillispie, Charles Coulston, *Genesis and Geology: 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of Scientific Thought, Natural Theology, and Social Opinion in Great Britain, 1790-185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repri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²³ 美国地质学史主要根据 Champlin, *op. cit.*, pp. 29-50.

²⁴ 此处的“美国”是南方与北方的总和。根据比庞佩利在籍时稍晚的统计, 1866 年德国人 (萨克森以外的德意志诸邦) 13 名/美国人 (USA) 14 名, 1867 年德国 10 名/USA 15 名, 1868 年德国 10 名/USA 13 名, 1869 年德国 6 名/USA 10 名, 1870 年德国 5 名/USA 4 名, 1871 年德国 13 名/USA 8 名。由此可见 1860 年代该校在美国的人气程度。上述 6 年间, 其他外国人留学生分别是英国 3 人, 俄罗斯以及奥匈帝国各 8 人, 墨西哥和挪威各 4 人, 意大利和荷兰各 3 人等。自 1765 年建校以来的 100 年间, 登记学生总数为 2465 人, 其中 1225 人是萨克森出身, 782 人来自其他德意志诸邦, 326 人来自德国以外的欧洲诸国, 132 人来自欧洲以外的国家 (推测大多数是美国人)。Hoffmann, Walter (Hg.): *Bergakademie Freiberg – Freiberg und sein Bergbau. Die sächsische Bergakademie Freiberg. Reihe Mitteldeutsche Hochschulen* Bd. 7, Weidlich-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59, pp. 66, 76-77.

²⁵ Corning, Frederick Gleason, *A Student Reverie: An Album of Saxony Days (Freiberg near Dresden)*, New York: Privately printed, 1920, p. 33.

²⁶ *Ibid.*, p. 39.

²⁷ 关于庞佩利的人生经历主要根据以下 2 部文献。Willis, Bailey, “Biographical Memoir of Raphael Pumpelly 1837-1923,”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Vol. 36, 1925, pp. 45-84. Reprinted in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Biographical Memoirs, Vol. 16, presented to the Academy at the Autumn Meeting, 1931, pp. 23-62; Amstutz, G. C., “Pumpelly, Raphael,” *Complete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 Electronic Book*, vol. 11, Detroit, Mich.: Charles Scribner's Sons, 2008, pp. 209-211. (Gale Virtual Reference Library, http://go.galegroup.com/ps/aboutEbook.do?source=&actionString=DO_DISPLAY_ABOUT_PAGE&inPS=true&pro

意志旅行。此时的庞佩利还没有去弗赖贝格矿业大学的念头，对自然科学也没有特别的兴趣，长期巡游欧洲的目的是为了增长见识，这一点与英国青年贵族的游学旅行相似。但就在这次旅行中，庞佩利决定了今后的方向，他经过莱茵河溪谷时燃起对地质学的兴趣，在观察了瑞士、法国、意大利、科西嘉岛等地的山岳与火山后意志更加坚定。1856年秋，庞佩利与当时著名的德国地质学家艾诺格拉特（Nöggerath, Johann Jakob: 1788-1877）见面，并听从他的建议进入弗赖贝格矿业大学。在那里，他学习矿物、冶金、采矿、地质等，1860年回国后很快在美国西南方的亚利桑那州圣丽塔矿山就职，走上矿业技术人员的道路。

即使弗赖贝格矿业大学的毕业生，也并非要注定一生从事矿山开发。虽然庞佩利的大多数同学一直是专门技术人员，但“我们美国的洪堡”在迈出第一步后（在此期间庞佩利不限于采矿和冶金的技术层面，还充分发挥了其商业才能），开始向更广阔的领域开拓。

庞佩利在阿帕奇族统治的亚利桑那州滞留不足一年后，加州科学院（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欢迎他绝处逢生后的归来。当时美国第一流的地质学者们都承认他的功劳，所以他首次获得在国内学会发表论文的机会。该论文《亚利桑那银矿山的矿物学梗概》²⁸，虽然以矿物学为题，但充分展现出庞佩利对地质学的全面关心，这是他走向下一目的地的坐标。时值太平洋彼岸的日本德川幕府请求派遣技术人员传授矿山调查与采矿技术，在亚利桑那州积累了宝贵经验的庞佩利自然成行。

1861年秋，庞佩利与太平洋铁路地质调查与矿山开发技术顾问布莱克（Blake, William P.: 1862-1910）一起出发前往日本。翌年早春到达横滨，在北海道的箱馆就任，5月开始着手培育田野调查与技术人员。《横断美国·亚洲》一书中详细记载了二人在日本的活动，此处不再赘言²⁹。约一个世纪后的日本，对二人的评价是“我国初次将火药用于采矿”，“两次实地考察基础上完成的渡岛半岛地质图，是日本最早的地质图”，特别强调“PUMPELLY是东亚地质的先驱者”³⁰。

然而幕末日本政情不稳，无法继续雇佣两个外国人，所以他们与幕府的合同仅1年（在北海道执行业务只半年有余）就结束了。1863年春，庞佩利来到中国大陆，他的中国考察将于下节详述，先梳理庞佩利从中国横渡西伯利亚、再从欧洲渡过大西洋（即环球一周），时隔5年后才回到祖国以及其后的经历。

1865年回国的庞佩利，仿佛与南北战争后的美国经济发展步调一致，名副其实地成长为美国代表性地质学者。他主持了密歇根苏州必利尔湖周边铜铁矿脉的探索（1866-1877，间有中断），参与策划密苏里州政府地质调查（1871-1872），统括美国地质调查矿产部门（1879-1881），指挥了横断北美大陆的地质调查（北太平洋铁路建设区域的地质矿产调查，1882-1884）等。经济地质学者庞佩利精力充沛地参加各种活动，同时还在哈佛大学成立不久的矿业学科授课³¹。更令人瞩目的是其丰富的学会活动³²，他是美国矿业工程师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Mining Engineers: 1871年成立）与美国地质学会（Geological Society of A

dId=GVRL&userGroupName=kyotodai&tabID=&searchId=&docId=GALE%7C9780684315591&contentSegment=9780684315591¤tPosition=&eisbn=)。

²⁸ Pumpelly, Raphael, “Mineralogical Sketch of the Silver Mines of Arizona,” *Proceedings of the California Academy of Natural Sciences*, Ser. 1, vol. 2, Dec. 1861, pp. 127-139. 庞佩利的著作目录，Champlin, *op. cit.*, pp. 250-253是最完整的，但有若干错误，例如该论文的刊载年被记成1863年。

²⁹ 《横断美国·亚洲》中，伊藤尚武将日本滞留部分抄译为日语，分别是《解说》、『パンペリー日本踏査紀行』、『シュリーマン日本中国旅行記／パンペリー日本踏査紀行』（新异国□□第二□6），雄松堂□店，1982年。二人的日本滞留年表，参考地德力「蝦夷地質学の式：ブレイク&パンペリー（1）」、『蝦夷地質学』（<http://agch.cside.ne.jp/members/yezogeology/index.html>）。

³⁰ 小林貞一『R. PUMPELLYと日本で最初の地質図』、『地学雑誌』第89卷第3号（1980年），plate 1-2。小林的文章里有庞佩利的肖像照片与附在“Geological Route-Sketch, Southern Yesso, Japan”之后的解说。该地图是 *Researches* 收录的 PLATE 8。

³¹ 热衷于田野调查的庞佩利似乎不太喜欢在教室内教理论性知识，1867年初虽承诺担任教授，但实际授课仅有1869与1870的两年。Champlin, *op. cit.*, pp. 80-81, 89-90。

³² 关于庞佩利的学会与社交活动，参考 Champlin, *op. cit.*, pp. 130-131。

merica: 1888 年成立)³³的创立会员, 1905 年担任地质学会会长。拥有环球一周探险旅行经验的庞佩利, 在美国国家地理协会(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1888 年成立)成立第 3 年时加入, 还先后加入美国科学发展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1848 年成立)、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863 年成立), 在 1891 年华盛顿举行的国际地质大会(International Geological Congress)上担任副议长, 是其国际地位的显示。

然而, 庞佩利并不是官僚或者封闭式学者团体的首领。他最喜爱的是与艺术家、作家、地区领导、慈善家们的交流, 其中尤为喜爱纽约的世纪俱乐部(Century Club, 1867 年入会)与波士顿的星期六俱乐部(Saturday Club, 1883 年入会)。所以庞佩利不仅在专业方面卓有成就, 还是一个多面手。他在地质调查中, 用鸟瞰视野(bird's-eye view)来把握大局, 用锐利的洞察力(eagle eye)进行详细分析³⁴, 还探索自然环境与人类文明的关系史。1903-04 年, 庞佩利在卡内基财团的支持下开始中亚探险旅行, 即现在所谓的地质考古学(geoarchaeology)的先驱性尝试。

庞佩利传记的作者钱普林形容他是“繁荣昌盛时代的绅士地质学者”³⁵, 庞佩利在各地学会与社会活动中活跃的姿态的确称得上是绅士。只是这位“绅士地质学者”在重视实学和实践方面与以前的伦敦精英们不同, 在专业知识和技术方面也是专业人士。庞佩利是具有象征性的绅士, 他象征着社会充满能量、在实践与理论以及各学术领域无界限地贪婪摄取知识的“繁荣昌盛时代”。1863 年, 庞佩利踏上中国土地时还未被社会所普遍认知, 只是在亚利桑那州和日本积累了经验的他已经具有开拓者心性, 成长为兼具博物学、地理学、矿物学等各种学问的地质学者。

二、庞佩利的中国调查(1863-1864)

1、调查旅行的概要

与日本德川幕府的正式邀请不同, 庞佩利来中国与清政府无关, “他正好很期待对刚刚允许西方人进入的未知国家的探索, 所以被中国吸引”³⁶, 他的行程与其说是周密计划的学术调查, 不如说是各种临机应变、充满冒险的旅行。因对未知国度及其国民的兴趣, 以“探索”为唯一目的的旅行, 留下了本人也预想不到的精彩成果。行程主要分以下 4 期³⁷。

1) 沿长江对两岸地质进行的调查: 1863 年 5-7 月。最初计划湖南地区的煤炭调查, 从汉口沿长江与湘江逆流而上(5 月 23 日), 但因为当地的排外只得在湘潭放弃原计划, 经由洞庭湖回到长江。再经宜昌(6 月 21 日)到达秭归(6 月 28 日)、巴东(湖北省与四川省边境附近), 又从该地折返回到汉口(7 月 19 日)和上海(7 月 29 日), 约两个月的乘船旅行。

2) 对京西煤矿的调查: 1863 年 10-11 月。由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Burlingame, Anson)与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Bruce, Frederick)推荐, 庞佩利受清政府委托, 调查北京西郊的煤矿现状。调查人员还有英国公使馆的翻译官默里(Murray)与清朝方面的 1 名军人(马)与 2 名文官(王和杜)。10 月 17 日离开北京, 在斋堂逗留 6 天调查了 4 座矿山, 又在门头沟和房山各逗留 4 天, 各调查了 1 座矿山。11 月 6 日回到北京, 向清政府和北京美国公使馆提出了共计 21 天的调查报告。

3) 张家口地区的地质调查: 1864 年 4-6 月。4 月 5 日离开北京向西北进发, 从南口到宣化、张家口, 并以此为起点西进至蒙古高原南端的岱海附近, 回程通过更南边的路径绕回张

³³ 美国地质学家协会因为想维持专业地质学者的高水准而比较保守, 所以美国科学发展协会成立时被兼并。

³⁴ Willis, *op. cit.*, pp. 33-34.

³⁵ 关于美国地质学的“英雄时代”与庞佩利, 参考 Champlin, *op. cit.*, pp. 203-215.

³⁶ Champlin, *op. cit.*, p. 62. 布莱克没有参加庞佩利的中国调查旅行, 而是经由阿拉斯加回国。

³⁷ 庞佩利对中国地名的英文表述(原则上是威妥玛拼音)中有很多不统一及不正确之处, 地名表述参考注释 10 的各篇论文, 其中 Oldroyd 和杨静一的英语论文中, 整理总结了长江流域地质调查与北京西山地区煤矿调查相关地名的拼音与汉字对照表。根据相关研究, 庞佩利的调查记录和日记(Henry E. Huntington Library San Marino, California 所藏的 Pumpelly's papers)大多数是片段性的, 很难与已公开刊载的庞佩利著作做比较。

家口，归京。这是 6 周左右巡游山岳的陆路旅行³⁸。

4) 蒙古、西伯利亚之行：1864 年 11-12 月。11 月 12 日离开北京，经张家口于 12 月 12 日到达库伦（现乌兰巴托），12 月 21 日到达恰克图。其后至翌年初横断西伯利亚，经由莫斯科、彼得堡、巴黎、伦敦回到美国。据庞佩利所言，这是冒着极寒与西北风前进的冒险旅行，地质观察记录是片段化的³⁹。

图 1 表示庞佩利去日本之前从亚利桑那州银矿开发开始的环球旅行轨迹。虽然中国调查旅行所占比重并非特别突出，但从他回国后立即发表的论文《中国、日本、蒙古的地质学观察》可知，有关中国的记述贯穿始终，一直保持对中国的关注。也许是庞佩利察觉出当时美国社会急需有关中国的信息，所以把中国作为研究重点。那么 1865 年 8 月出席美国国家科学院会议以及读过该论文的人，又如何评价庞佩利的报告呢。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并不是地质学专家，关于中国的知识也许很少，但其社会地位与知识层次均较高，我们以此为背景来讨论庞佩利报告的社会评价。

对读者来说，庞佩利首先是“中国地质学的开拓者”⁴⁰，因为他是第一位深入中国内陆进行调查的地质学者，但他的中国调查旅行是否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呢。先不说有明确目的和范围的京西煤矿调查，另外的三次调查其实更符合地理探险或冒险的定义。庞佩利当然是从地质学者的观点亲自观测中国各地地质的，但是几乎没有手拿铁锹、采集标本的情形发生。他自身也承认调查范围很狭窄，旅行中得到的数据主要来自以下 3 个方面，1 自主观察的结果，2 其他外国人的观察结果（数量极少），3 从中国地志上得到的信息，主要是长期散见于各文献资料中关于矿产的记述⁴¹。第 2 种数据来源，无疑是明末耶稣会传教士们长期以来积累的地理信息。19 世纪以后，除了传教，外国人因军事目的或博物学兴趣来到中国内部（即使伴随相当风险）并非不可能。庞佩利把一般学者可能会舍弃的信息也吸收为自己的数据充分利用。下面例举两种“调查”的附图，从侧面显示了他的“中国地质学”内容。

³⁸ Pumpelly, Raphael, “Repor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n a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of the coal districts of the Si Shan, in the province of Chili,” attached to “Mr. Burlingame to Mr. Seward (Jan. 4, 1864)”, *Papers Relating to Foreign Affairs, accompanying the annual message of the President to the second session thirty-eighth Congress*, Part3,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65, pp. 363-368. “Murray” 是指 Murray, John Gillespie (1841-1874, 1860 年格拉斯哥大学毕业后来华，在北京公使馆担任布鲁斯公使的秘书)。

³⁹ *Researches*, p. 70.

⁴⁰ Willis, *op. cit.*, p. 38.

⁴¹ Pumpelly, “Notice of an Account of Geological Observations in China, Japan and Mongolia,” p. 1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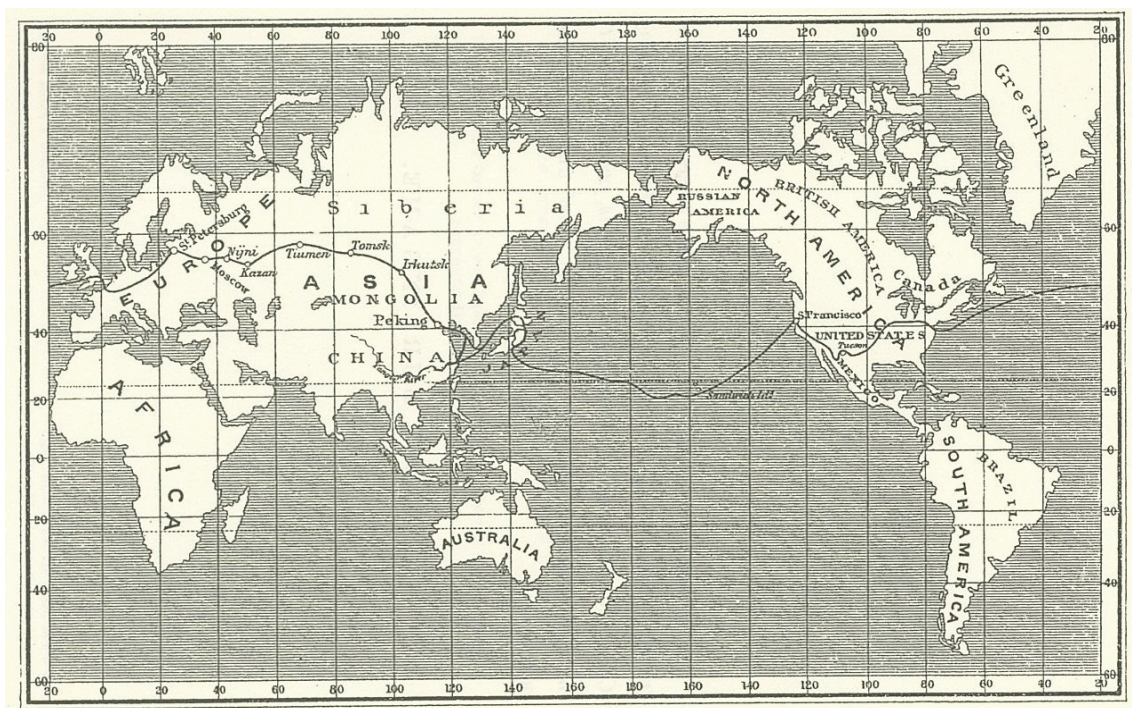


图 1: 庞佩利环球 1 周的轨迹图, 1860-1865 (*Across America and Asia* 卷首插图)

2、庞佩利学说的成立

首先来看名为《中国地质构造的假设地图》(PLATE6: 图 2)。“假设”的理论基础是庞佩利第 1-3 次的旅行观察结果, 实际调查范围用虚线大致标识, 在地图上只有北部和中部的一小部分。他将中国全域分为六类并分别上色, 即“后第三纪”(Post Tertiary)、“中国煤系”(Chinese Coal Measures)、“泥盆纪石灰岩层”(Devon, Limestone)、“粗面岩状的斑岩层”(Trachytic Porphyry)、“粗面岩状的玄武岩层”(Basaltic and Trachytic)、“花岗岩和变质岩层”(Granitic and Metamorphic), 其中煤系约占中国全境的一半。这主要是在第 1 次调查旅行的观察基础上, 加上既有地理知识以及愿望性推测的结果。煤系以外的地层分布也是从前述 2、3 分类数据中推断出来的。如此说来该“地质图”不过是庞佩利空想的产物, 但也不能断言它无任何意义。从该地质图中可以看出庞佩利主张的中国地质的基本构造——他仿照中国古代名称命名“震旦上升系”(Sinian System of Elevation), 其最大特征是中国大陆从东北至西南的隆起线, 这不仅被构想为东亚全体(当然包括日本)地质构造的主线, 还暗示与相隔太平洋的北美大陆东岸阿巴拉契亚山脉的类似性⁴²。虽然该学说自身过于粗糙, 被后来的学者不断修正, 但庞佩利的“假设地图”让人对中国全域的地质构造一目了然, 对人们的认识冲击很大, 为中国大陆在世界地质史中的定位提供了审视基准。

⁴² 东亚全域的“震旦上升系”在 *Researches* 附录的 PLATE7 中有更为明确的图示。现代地质学中所谓的“震旦系”(Sinian System), 是指广泛分布于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属新元古代震旦纪的地层, 即对应地质年代的层序划分名词之一, 与庞佩利所言表示地形构造特征的“震旦上升系”有原理性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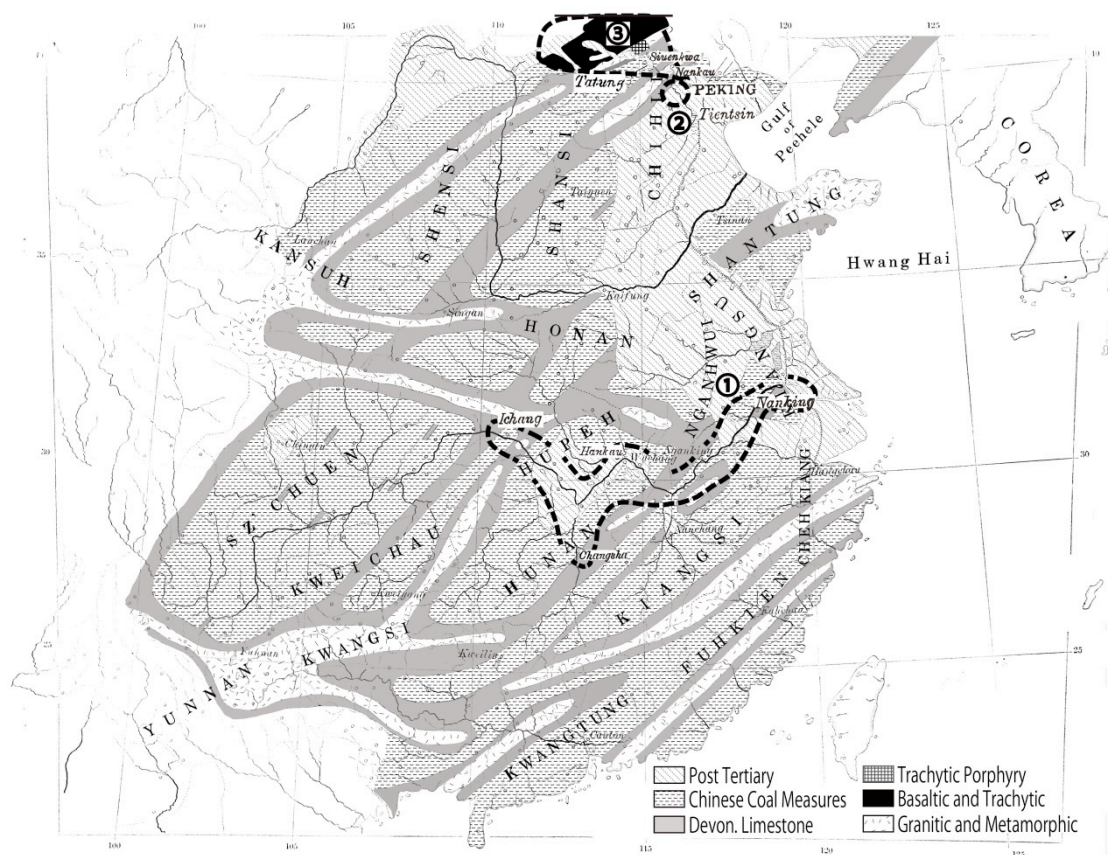


图 2: 庞佩利制作的《中国地质构造的假设地图》

根据 *Geological Researches in China, Mongolia, and Japan* 所收录的 PLATE6 做成。虚线表示庞佩利调查（1-3 次）区域的概略，只是大体范围，原版用彩色区分 6 种地质。

《黄河流域历史变迁图》(PLATE4,5) 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了共计 10 张地图，主要描述从公元前 602 年至庞佩利来华的 10-15 年之前，黄河下流的流域变化以及随之形成的三角洲，第 11 张则是整合了黄河全流域地图与古代湖水系的推断图。这些地图的信息来源是前述 2、3 类的文献，所以与其说是地质学，不如说是文献学的研究报告。《调查》序言中，庞佩利对在中国地理文献调查过程中给予自己重要支持的人⁴³表示感谢，如果没有这些在京外国人的支持，不懂中文的庞佩利一个人是绝对无法完成的。庞佩利地图按照时间顺序，排列黄河文明发源地形态变化，具有历史画卷一般的故事性。特别在 1860 年代的美国，密西西比河水运与河口三角洲开发备受关注，庞佩利带来的地图是具有单纯历史故事价值之上的“调查”结果。美国当时建国尚未满百年，调查两千余年历史的特定河川流域的变化并将其图像化，在此之前是几乎不可实现的，庞佩利的“调查”结果无疑是应美国人的欲求而生。

如上所述，庞佩利的中国地质学，也许被认为是在非科学基础上积累起来的“空想”性地质学，但事实并非如此。庞佩利获取的信息中，虽然来源于现代性田野调查的东西很少，但他将其最大限度地灵活应用，根据自身的问题意识与其他各种多样信息进行再整合，形成的框架即为庞佩利所理解的地质学理论，使用的词汇也是最新的地质学用语。上述黄河流域的变迁图，也是用地质学者的观点将涉及中文文献的成果再次整合，所以一系列的地图具有强烈冲击性。很多人不满足于一些主观旅行记录或断片式报告，所以认为庞佩利的调查具有科学的历史性且值得信赖。庞佩利带来的信息，是具有广阔时间性与空间性的科学故事，在

⁴³ Dr. W. Lockhart, Mr. C. Murray, Dr. S. W. Williams, Rev. Mr. Edkins 的 4 人。“Preface,” *Researches*, p. iv.

非地质学专业的人们之中也大受欢迎。

3、庞佩利与中国煤炭开发

一般大众所关心的，不仅是对未知国家的憧憬或好奇，还有逐渐高涨的中国矿产资源开发的欲望，其中最紧要的任务就是获取优质煤炭。以产业革命鼻祖英国为首的欧美各国，19世纪后半期开始担心自国煤炭产量，所以主张海外煤炭开发⁴⁴，而经济地质学者庞佩利不可能对该实利欲求毫不关心，北京西山地区的煤矿调查即为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该调查因为具有清政府邀请这一官方性质，所以庞佩利的报告书不仅在美国，英国和法国也认为其可信度极高⁴⁵。

实施上述调查的直接契机，是“李泰国阿思本”舰队事件。所谓“李泰国阿思本事件”，是指清政府计划从国外购买西式舰队来镇压太平天国，最终决定向英国购买 7 艘军舰，但在舰队指挥权方面中英之间产生纠纷，结果不了了之⁴⁶。一般认为庞佩利是为了从中国国内供给该舰队的煤炭（从英国进口煤炭确实浪费经费和时间）而接受委托调查北京西郊煤矿。这个说法来自庞佩利的回忆⁴⁷，但实际上调查的直接目的并非如此。因为清政府与总税务司李泰国（Lay, Horatio Nelson）在英国进行交涉之后，海军大佐阿思本（Captain Osborn, Shera rd）率领的舰队于 1863 年 9 月抵达上海，此时已确定由中国指挥该舰队，而阿思本却置之不理直接提议解散舰队。舰队的最终处置权交于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10 月舰队解体撤出中国。此时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担心解散的舰队会落到本国南方军手中，所以主张马上从中国撤退。如果是这样，庞佩利在舰队瓦解之际受清政府委托赶赴煤矿调查明显是不合理的。而且向清政府推荐庞佩利的蒲安臣与布鲁斯二人对“事件”参与甚深，在 10 月份不可能要求向舰队供给煤炭。事实上，英国政府批准成立舰队后的 1862 年 10 月⁴⁸，即实施了为阿思本舰队寻求煤炭供给可能性的调查。该调查似乎并没有矿业技术员同行，从报告书中可知调查的明确目的是西山地域的煤炭价格、运输方式，以及煤矿的经营方法。

那么庞佩利的调查目的又是什么呢，推测如下。与其说是对特定舰队的煤炭供给，不如说是适应世界性规模汽船网络的扩充趋势。京津附近的煤矿能否提供优质煤炭，这需要专门人士的长远性意见。借蒲安臣之语，实施“北京近郊的科学调查，尤其关于煤矿发现和开发”⁴⁹时，庞佩利是最合适的人才。庞佩利向蒲安臣提出的报告中，有很多关于煤炭标本的化学分析结果，以及煤矿经营和运输方式等诸多具体性建议。他高度评价斋堂地区出产的烟煤与无

⁴⁴ 例如 1867 年出版的英国煤矿技术人员入门书籍中也特别设立了“英国煤矿的存续时期”这一章。Smyth, Warrington Wilkinson, *A Treatise on Coal and Coal-Mining*, London: Virtue Brothers, 1867, pp. 237-250. 该书中文版（《开煤要法》）将在下一节论述。

⁴⁵ 庞佩利向美国公使馆提出的报告以及在英法两国报告公开过程如下所述（未找到法国版与英国版。书籍信息来自 Champlin, *op. cit.*, p. 228, n. 54 以及 British Library OPAC）。英国版是最初在 *The Friend of China* 杂志上的文章升级为小册子。Pumpelly, Raphael, “Repor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n a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of the coal districts of the Si Shan, in the province of Chili,” attached to “Mr. Burlingame to Mr. Seward (Jan. 4, 1864)”, *Papers Relating to Foreign Affairs, accompanying the annual message of the President to the second session thirty-eighth Congress, Part3*,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65, pp. 363-368; Pumpelly, Raphael, “Combustibles du Se-Shan, Chine,” *Annales des Mines* 9, 1866; Knight, Sparrow and Pumpelly Raphael, *The Coals from Se-shan, (the hills west of Peking) communicated to the ‘Friend of China’*, Shanghai, 1867. 另外《横断美国·亚洲》中附有中国与日本煤炭的成分分析表，这也说明其对亚洲产煤炭的关注。Pumpelly, *Across America and Asia*, APPENDIX IV, pp. 442-443.

⁴⁶ 关于“李泰国阿思本事件”的经过，参考井上裕正『レイ・オズボーン艦隊事件の外交史的意義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第 34 卷第 2 号（1975 年 9 月），1-28 页。

⁴⁷ Pumpelly, *Across America and Asia*, p. 289.

⁴⁸ “Mr. Bruce to Earl Russell (Received April 17)”, *Papers Relating to the Affairs of China. (In continuation of Papers presented to Parliament in March 1863.)*, China, No. 3. (1864.), London: Harrison and Sons, 1864, pp. 52-57. 海军大尉 Lieutenant Howarth 负责视察，公使馆派出翻译研修生 Brown, John McLeary 同行。Brown 起草了向公使馆提出的报告书（完成日期是 1862 年 12 月 8 日）。1867 年时该报告书是与庞佩利的调查并列记载的，所以可以认为在北京居住的外国人已经普遍知悉庞佩利的存在。Edkins, Joseph, “The Bituminous Coal Mines West of Peking,” *JNCBRAS*, New Series No.4 (Dec. 1867), 1868, p. 250.

⁴⁹ “Mr. Burlingame to Mr. Seward (Nov. 4, 1863)”, *Papers Relating to Foreign Affairs*, p. 332.

烟煤，建议导入西方采矿技术并铺设铁路，甚至提议清政府援助与引进内外资本，这应该是庞佩利关于矿山技术和经验的全面展示。所以与美国一样，对中国煤矿开发抱有欲望的欧洲诸国也很重视他的报告。总而言之，庞佩利是未知大陆的知识向导，也是开拓未知财富的先驱。那么在美国内外引人注目的庞佩利，他的存在以及研究成果于中国有何种意义，又得到了怎样的评价呢。

三、庞佩利与洋务运动

1、庞佩利与西学翻译书籍

庞佩利的京西煤矿调查报告（中文版）⁵⁰也提交给了清政府，虽然并没有运用于实践，但他的调查成果在后来的洋务运动中留下了痕迹。1868年，上海的江南制造局为了“开煤炼铁、自造大炮、操练轮船、翻译西书”而附设翻译馆。最初完成的四部译著中，就有关于煤矿开发的《开煤要法》⁵¹。

该书是英文著作《煤炭与采煤论》⁵²的中文版，原书是关于煤矿开发与矿山运营的技术性入门书，包括矿山技术员必备的地质学基础知识。汉译时虽然舍去了最新地质用语、包含欧洲地名的地质学概论、地质年代表，欧美的煤矿分布状况（《泰西数国产煤纪略》）也大多被省略，但是“尽可能地显示了在各种地域使用的（采矿）方法和器械概要，重点在于英国国内外的主要煤炭出产地域和保护人命必需的各种预防装置”⁵³，基本上沿袭了原著主旨。另该书在改编之际考虑到中国读者，追加了《中国数省产煤论略》一节⁵⁴。

《中国数省产煤论略》列举了从华北到华南各地的主要煤矿，其中从原著中翻译过来的只有“浙江金华府”煤矿概述。煤矿所在地用具体地名显示，为了记录各处出产煤炭的质、量、价格等，译者（傅兰雅口译，王德钧笔录）必须搜集信息。他们充分意识到该书对中国煤矿开发的意义，身为外行人还是尽力搜集有益的信息，他们的依据正是来华外国人的记录。

《中国数省产煤论略》开头为以下内容：

京师西山素称产煤富有地。今有西人前往考察，得所见闻，随时记录，并寄至泰西各国，

互相衡较。余曰甚佳。惟取煤各法，未造精妙，恒费工多而得煤少。⁵⁵

此处提到的“西人”很容易让人想到庞佩利。第一，江南制造局成立数月之前，庞佩利向清政府提出的京西煤矿调查报告书，很有可能已经被创建人李鸿章阅读。笔录者王德钧是李鸿章的同乡，常伴他左右且担任制造局会弁⁵⁶，他对庞佩利报告书应该非常上心。更进一步说，《中国数省产煤论略》中还有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地区分会会报（1867年版）论文《山东省的产物—主要关于矿物资源》⁵⁷的抄译，同一期刊载的另一篇论文《北京西部的烟煤矿》⁵⁸也多次言及庞佩利的调查。既然傅兰雅在《中国数省产煤论略》中引用了《山东省的产物—主要关于矿物资源》，应该也参考了《北京西部的烟煤矿》。可以说庞佩利的中国煤矿调查成果被江南制造局的翻译事业所继承了。

⁵⁰ 关于庞佩利报告被翻译成中文并提交给清政府的过程，参考 Edkins, *op. cit.*, p. 249.

⁵¹ 士密德辑、傅兰雅口译、王德钧笔录《开煤要法》（又称《泰西采煤图说》）。根据傅兰雅（Fryer, John: 1839-1928）的信件，《开煤要法》的翻译在1868年7月末已基本完成（1868年7月28日傅兰雅书简。戴吉礼主编《傅兰雅档案》第一卷，37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⁵² Smyth, Warington Wilkinson, *op. cit.*（参考注44）傅兰雅在1868年3月订购该书，并特别注明要“最新且最完全的版本”（前注《傅兰雅档案》第一卷，350页）。

⁵³ “Preface,” Smyth, *op. cit.*, p. iii.

⁵⁴ 前注《开煤要法》卷三，一丁表一三丁表。

⁵⁵ 前注《开煤要法》卷三，一丁表。

⁵⁶ 欧阳跃峰《李鸿章幕府的形成及其主要特色》，《安徽史学》2011年第3期，92-93页。

⁵⁷ Williamson, A., “Notes on the Productions, Chiefly Mineral of Shan-Tung,”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ew Series No.4 (Dec. 1867), 1868, pp. 64-73.

⁵⁸ Rev. Joseph Edkins, “The Bituminous Coal Mines west of Peking”, *ibid.*, pp. 243-250.

《开煤要法》问世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进入高速扩展期，地质学方面还翻译了专业性更强的《金石识别》⁵⁹（矿物学概论）与《地质浅释》⁶⁰（地质学概论）等。从煤矿开发到矿物学，再到地质学基础知识，一系列译书的涉及范围逐渐扩大，而且保持着一定的连贯性。《金石识别》与《地质浅释》二书，自明治时期传入日本后流传甚广，甲午战争后中国“二次输入”，还在新式教育中被选定为教科书，受到高度评价⁶¹。与它相比《开煤要法》的关注度较低。如果只看这个事实，也许会认为与庞佩利有关的因素在此几乎消失，但在同时期的中国，比起矿物学者与地质学者，更需要实务知识与技术兼备的矿业技术员。在培养这些中国技术员的地方，我们又看到了美国第一代矿业技术员庞佩利的身影。

2、“留美幼童”与美国矿业学

1872-1875 年之间，一群中国少年渡过太平洋去学习“西学”，他们大多未满 15 岁，这就是每年派遣 30 人、总计 120 人的公费留学生“留美幼童”。该留学生派遣事业的主倡者是美国留学归来后任曾国藩及李鸿章幕僚并推动洋务运动的容闳（1828-1912）。后来清政府担心学生的过度西化而中止了最初 15 年的留学计划，1881 年大部分留学生中断学业回国，其中数人为中国实现近代化贡献了力量⁶²。这 120 人中考入国内大学继续深造的有 43 人，其中 29 人是理工学科⁶³，这反映出洋务运动的实学倾向。众多少年希望成为高级工程师，他们之中的杰出人物是“中国铁道之父”詹天佑（1861-1919）。其他想成为矿业技术员的也有 10 人左右⁶⁴，而他们的人生选择其实是被清政府所掌控的。

清政府派遣美国公费留学生时计划要“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⁶⁵，即全面学习实用性西学。但在第一期学生即将升学时，李鸿章对他们的未来做了如下具体指导。

其选入大书院者，能否令其各习一艺？中国所极宜讲求者，煤铁五金之矿，未洋法得，则地宝不出。现在台湾、湖北等处开煤，所请英人，高下不等；所用机器，原委难明；

其余各省因无人指授，不免观望。如出洋学生内有颖异可造之才，望送入矿务学堂，先穷究其理器，一二年后再令游览美国五金矿所，或暂充工役，或随同研究，必自能辨识地产之有无厚薄，机器之如何用法，融会贯通，可得上等考单，确有把握，然后遣回，

⁵⁹ 代那撰、玛高温口译、华衡芳笔录《金石识别》，1871 年。

⁶⁰ 雷侠儿撰、玛高温口译、华衡芳笔录《地质浅释》，1871 年。

⁶¹ 关于《地质浅释》在中日两国的流通及其评价，参考武上真理子『漢訳地質学書に見る「西学東漸」——江南製造局刊『地质浅释』を例として』、『東洋史研究』第 73 卷第 3 号，2014 年 12 月，95-128 页。关于《金石识别》，虽没有和译本或刻本，但在一日语矿山开发教科书中被频繁引用，即何礼之译·杉次郎抄译《金石学必携》内编上，1878 年。

⁶² 关于留美幼童史，主要参考以下三书。钱钢、胡劲草《大清留美幼童记》（增订本），香港：中华书局，2009 年；李喜所主编、刘集林等撰著《中国留学通史 晚清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 年；Rhoads, Edward J.M., *Stepping Forth into the Worl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72-8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⁶³ 园田口『容闳一米中間で揺らぎ上昇する境界者』、『講座 東アジアの知識人』第一卷，有志舎，2013 年，39 页。

⁶⁴ 关于留美幼童与近代中国矿业，参考以下论文。茆诗珍、徐飞《留美幼童与中国早期地质学——近代中国发表的首套地质矿产图》，《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第 22 卷第 2 期（2005 年 12 月），88-91 页；吴玉伦《近代矿业工程教育之缘起》，《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3 卷第 2 期（2006 年 3 月），89-93 页；鲁涛《留美幼童与近代中国实业》，《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8 卷第 5 期（2010 年 10 月），114-117 页。19 世纪末的中国，铁道与矿业技术人员并没有各自明确的分工，所以很难将归国留学生按照专业领域分类。另外，现场技术人员和管理运营人员的划分标准也不明确。关于矿业技术人员的数量，有说 15 人（茆诗珍、徐飞，89 页），有说学习矿业的 7 人、回国后成为矿业技术人员的 5 人（吴玉伦，89 页），还有说回国后从事矿业的 8 人、以此为毕生职业的 5 人（刘集林等撰著，123 页），矿业技术人员 6 人（鲁涛，114 页）等各种说法。关于归国留学生们的主要经历，参考《中国留学通史 晚清卷》85-92 页的一览表。

⁶⁵ 《同治十一年三月初三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年，107 页。

再发往各省矿局试用，庶于国计有裨，千祈留意。⁶⁶

上述言论如实反映出《开煤要法》出版以来清政府对煤矿开发的强烈欲望。当时在直隶省唐山地区，为以官督商办形式开设开平煤矿而奔走的李鸿章，深刻感受到中国技术人员的欠缺。最后通过聘用英国技术人员，于1878年正式成立开平矿务局。所以除了资本与经营，技术也在希求本国化，这个希望寄托于留美幼童的未来，开平矿务局也是归国留学生的接收地。在此先不说留学生在中国矿业开发中的业绩，仅讨论其与庞佩利的关系。

首先，1868年缔结的《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也称《蒲安臣条约》）为中国人留学美国创造了环境。该条约一般多被提及的是美国对中国人的移民政策，其第7条规定，两国公民希望进入对方公立学校学习时可享受最惠国待遇⁶⁷。中方代表蒲安臣任美国驻华公使时期与庞佩利关系甚密，但也只能推测他们可能讨论过通过留学培养中国技术人员的必要性。庞佩利逗留日本期间曾指导日本矿业技术人员，离开时建议他们去美国留学⁶⁸，所以可以想象他对中国人也抱有同样想法。但是他的中国调查旅行中完全没有中国技术人员，而且没有找到庞佩利与容闳有直接接触的史料，所以留学少年们在前进途中即使有庞佩利的引导，也是经由蒲安臣的间接关系。但在他们学习的新天地中，庞佩利即将迎来人生的巅峰。

庞佩利的主要著作，有面向一般读者的《横断美国·亚洲》。该书出版于1870年，即留学生赴美两年之前，在美国国内外获得好评。生动的描写，且带有异文化共鸣的中国纪行书（全书445页，大约一半描写中国），在中美之间架起了桥梁。该书作为英语学习教材，或者作为寄宿家庭以及同学之间讨论风土的话题，应该很受留学生的欢迎。赴美后较早熟知庞佩利之名的留学生中，选择矿业学的人与他更为接近。因为当时的美国，庞佩利毫无疑问是中国矿业或者地质学的第一人。

下表是在1912年出版的《中国矿物资源及地质关联书目》（以下简称《书目》）⁶⁹基础上，以留学生归国的1881年为分界线，比较相关文献数量的表格。《书目》的作者也明白信息不全，但这仍不失为把握当时学术状况的一条线索。

中国矿物资源、地质资源相关文献分类表（1912年之前）

出版年		类别	~1881	1882~1912	不明	合计
英文	煤炭		8	55	17	80
	其他矿物		3	128	26	157
	矿业·冶金		1	38	8	47
	地质学		23	45	11	79
非英文 (德、法、 俄、英等)	煤炭		6	52	5	63
	其他矿物		8	68	6	82
	矿业·冶金		3	19	6	28
	地质学		43	118	14	175
合计			95	523	93	711

⁶⁶ 《复区海峰容纯甫》（光绪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前注《洋务运动》（二）176页；前注茆诗珍、徐飞论文88-89页。

⁶⁷ “Additional Articles to the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Ta-Tsing Empire of the 18th June 1858.” *Treaties, Conventions, etc.,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 2nd ed., vol. 1,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17, p. 732. 该条还保证了在对方外国人居留许可地区中设立学校的权利。

⁶⁸ 庞佩利的同志布莱克，据说回国时非常希望带回日本留学生。另外函馆奉行给庞佩利的谢函中说“（矿业学）讲义虽一时中断，但仍派遣留学生去贵国”，可以确定庞佩利确实有接收日本留学生的想法。参考『初期のお雇い外国人：ラファエル・パンペリーとウィリアム・P・ブレイク』，《日米交流》网站

（<http://www.japanusencounters.net/oyatoi.html>）、9页；Champlin, *op. cit.*, p. 61.

⁶⁹ Wang, Chung Yu, *Bibliography of the Mineral Wealth and Geology of China*, London: Charles Griffin & Co., 1912.

- * 文献中包含杂志论文、单行本、政府报告书等。
- * 同一文献有可能在不同类别中被重复统计。

从上表可以看出,无论是矿业还是地质学,留学生们在美国甚少能接触到有关中国的知识。1881年之前,非英文的地质学文献数量很多,尤以李希霍芬最为突出。他的大著《中国一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第1卷⁷⁰于1877年在柏林出版,在此之前已经发表了很多德语论文,都存于《书目》中。李希霍芬的英语论文数量虽不及德语,但也壮大了同时期地质学英文文献。赴美尚不足10年的留学生们似乎还不能读解德国出版的李希霍芬著作,英语论文中虽然有刊载于著名的《美国科学与艺术杂志》的论文⁷¹,但大多数都是在上海出版过的报告,很难说在美国也已经普及。其他的英语文献,多是上海出版物或陈旧的旅行记录。总而言之,关于中国矿产和地质的信息大量进入美国是在20世纪以后,留美幼童学习的年代,可以说并没有超越庞佩利调查书(史密森学会出版)的权威书籍。

下面转换角度来看矿业学专家们的学习经历。回国后“终生服务于中国工矿业”的工程师⁷²5人(吴仰曾、邝荣光、陈荣贵、梁普照、邝贤俦)中,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与拉法叶学院的各2人,麻省理工学院1人⁷³。全美最早的矿学科在哥伦比亚大学(1864年创立),拉法叶学院矿学科则创立于1866年,麻省理工学院是1865年建校时就设立了地质与矿学学科,矿学技术者辈出⁷⁴。与此相比,庞佩利就职的哈佛大学矿学与实用地质学科并没有卓越的业绩,也没有留学生学习的记录。

虽然庞佩利没有亲自教导过中国留学生,但他通过地质调查与学会活动,与留学生在籍的各大学矿学科的人建立起关系网。如德朗(Drown)⁷⁵是庞佩利在弗赖贝格的学弟,1869-70年度在哈佛大学教授过矿学与实用地质学。他于1874年就任拉法叶学院教授,至1881年离职,被称为“拉法叶最强人物之一”⁷⁶,后历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1885-1895)、里海大学校长(1895-1904)。德朗在美国矿业工程师协会中与庞佩利同样是创立会员,历任事务局长(1873-1883)与会长(1897-1898)等要职。德朗的学生、年轻的矿业技术人员聚集在协会中,无疑成为庞佩利率领的美国地质调查(USGS)中矿物与地质部门的主力。中国留学生们不仅在美国的矿业名校中学习,也进入了该人际关系网,回国后仍互相保持着联系。

3、中国矿业工程师的诞生

归国留学生中,包括上述5人在内,共8人被分配到开平矿务局开设的唐山路矿学堂继续学习矿业。他们的教师是美国技术巴特(Buttles, E. K.),所以教育内容应该有一定的连贯性。第一期留学生、回国时正就读拉法叶学院的邝荣光(1863-1964)⁷⁷,在唐山路矿学堂

⁷⁰ Richthofen, Ferdinand von, *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3 vols.- I (Berlin, 1877); II (1882-1885), which is pt. 3 (1882), on North China; pt. 4 (1883), on paleontology; and atlas (1885); III (1912), E. Tiessen, ed.. 第2卷(第3部、第4部)是1880年代,第3卷是李希霍芬时代的1912年出版的。

⁷¹ Richthofen, Ferdinand von, “Geological Exploration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 [2nd Series], vol. 50, no. 150, Nov., 1870, pp. 410-413; “On the Porcelain Rock of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 [3rd Series], vol. 1, no. 3, Mar., 1871, pp. 179-181.

⁷² 前注《中国留学通史 晚清卷》123页。

⁷³ 这5人的经历参考“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Connections 1872-1881,” (<http://www.cemconnections.org/>) 以及《中国留学通史 晚清卷》123页。

⁷⁴ Church, John A., “Mining School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 112, no. 230, (Jan., 1871), pp. 79-80; Skillman, David Bishop, *The Biography of a College: Being the History of the First Century of the Life of Lafayette College*, vol. 1, Easton, PA: Lafayette College, 1932, pp. 281-282; “MIT History: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ttp://libraries.mit.edu/mithistory/research/schools-and-departments/school-of-engineering/department-of-materials-science-and-engineering/>).

⁷⁵ Drown 的经历参考 albot, H. P., “Thomas Messinger Drown (1842-1904),”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vol. 51, no. 14 (Dec., 1916), pp. 868-869, 其在弗雷贝格矿业大学在籍期间的经历参考 Coming, *op. cit.*, p. 34

⁷⁶ Skillman, *op. cit.*, vol. 2, p. 37.

⁷⁷ 邝荣光出生于1860年,卒年有1962和1965年等各种说法。

毕业后先后供职于临城煤矿、直隶省矿政调查局，他是第一位在实测与观察基础上绘成地质图、矿产图、化石图的中国人⁷⁸，在湖南省发现了湘潭煤矿，还在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时给予地质学方面的帮助⁷⁹。除了这些业绩，回国后的 1887 年邝荣光发表了英语论文《华北采煤》，该论文经过拉法叶学院导师的校订，在同年美国矿业工程师学会的杜鲁斯市大会上由导师代读⁸⁰，后来又在《工程与采矿杂志》上分两期连载⁸¹。第一次刊载时杂志的卷头语指出，邝荣光的论文主题即开平煤矿中废弃土沙的再利用，这是在美国逐渐引起关注的最新工法，“虽然论文没有展示出正确模仿美国方式的案例，但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让人称赞中国的技术水平。感谢介绍这篇论文的西利曼（Silliman）教授”⁸²。邝荣光回国后一直希望能再次留学但终未实现，不过留学时期建立的人脉一直在支持着他。

另一方面，也有在唐山路矿学堂完成学业后再次到海外留学的青年。吴仰曾（1862-1939）与邝荣光同为第一期学生，他从李鸿章处得到去皇家矿业学院留学的许可，1886 年赴英国，四年后毕业。回国后历任热河的银矿山技师、南京附近的煤矿以及铜矿的监督，后受命于盛宣怀进行湖北银矿山调查等。吴仰曾担任开平矿务局副局长时义和团运动爆发，他曾组织自卫团以确保向天津的煤炭供给⁸³。与邝荣光仅局限于煤矿的活动相比，吴仰曾还涉猎铜、银矿山开发等，并比较东西方的采矿与冶金方法以摸索适合中国的模式，显示出英国留学的成果。他的两篇论文也在美国矿业技术者协会发表，分别是《蒙古的银采矿与精炼》（1902 年纽约、费城大会）和《华北的焦炼制造》（1905 年，华盛顿大会），都是吴仰曾亲自在会场作报告。两篇论文都介绍了从美国矿业技术水平看来很原始的蒙古或华北的“土法”，被该协会的纪要所录用，前者的简介也被《工程与采矿杂志》刊载⁸⁴。其中特别应该注意的，是 1902 年大会报告结束后的自由讨论记录⁸⁵。

吴仰曾报告的评议人是莱曼（Lyman, Benjamin Smith: 1835-1920）。1872 年莱曼作为明治政府的外国雇员来到日本，对北海道等日本各地的地质与矿山进行调查，并且教授日本人矿山开发技术，他做成的 200 万分之一北海道地质图中还记录了庞佩利的调查路线⁸⁶。对有 9 年日本生活经验的莱曼来说，吴仰曾的研究报告无疑独具特色。莱曼首先引用美国人新教传教士丁伟良（Martin, W. A. P., 1827-1916）的著作，指出中国有凌驾于西方的炼金术，即在冶金与实用化学技术方面有着悠久历史。然后根据自己在日本的见闻以及庞佩利关于日本和中国的报告书，论述在精练银的灰吹法与矿山排水方法方面，蒙古与日本或中国之间有共同点。虽然这些土著方法效率极低，但在很多层面上与西方古代技术一致，作为非化学知识的经验技术被代代继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莱曼的结束语如下。

吴氏简洁明瞭的论文是耀眼光辉的前兆，即不远的将来我们可以预想受西方科学教育的中国人，会为众多尚未解决的东方或考古学诸问题带来曙光。换言之，他们的立场最

⁷⁸ 《直隶地质图》，《地学杂志》第 1 年（宣统二年）第 1 号，卷首插图。《直隶矿产图》，同第 2 号，卷首插图。《直隶石层古迹》，第 4 号，卷首插图。邝荣光被称为“中国第一位编绘第一张区域地质图的地质学者”

“中国第一位编绘古生物图版的学者”。黄汲清《略述中国早期地质工作中名列第一的先驱学者》，《中国科技史料》第 9 卷（1988 年）第 1 期，5 页。

⁷⁹ 前注茆诗珍、徐飞论文，90 页。

⁸⁰ 邝荣光的导师西利曼，1871 年至 1896 年在拉法叶学院教授采矿学和制图。Skillman, *op. cit.*, vol. 2, p. 330.

⁸¹ Kwang, Kwong Yung, “Coal Mining in North China,” *The Engineering and Mining Journal*, vol. 44, no. 13 (Sept. 24, 1887), pp. 220-221; no. 14 (Oct. 1, 1887), pp. 238-239.

⁸² *The Engineering and Mining Journal*, vol. 44, no. 13, p. 217.

⁸³ 前注茆诗珍、徐飞论文，89 页。

⁸⁴ Woo, Yang Tsang, “Silver-Mining and Smelting in Mongolia,”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Mining Engineers*, vol. 33, 1903, pp. 755-760; Foo, Yang Tsing [sic.], “Silver-Mining and Smelting in Mongolia,” *The Engineering and Mining Journal*, vol. 75, Jan. 24, 1903, p. 147; . Woo, Yang Tsang, “The Manufacture of Coke in Northern China,”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Mining Engineers*, vol. 36, 1906, pp. 661-664.

⁸⁵ “Silver-Mining and Smelting in Mongolia, Discussion of the Paper of Mr. Y. T. Woo, p. 755. By Benjamin Smith Lyman, P.A.,”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Mining Engineers*, vol. 33, pp. 1038-1041.

⁸⁶ 今井功『地質調査事業の先覚者たち(4) 炭田・油田開発の貢献者—ライマン—』、『地質ニュース』111 号（1963 年 11 月），33 □。

适合这项充满魅力的调查研究⁸⁷。

莱曼的评论明确揭示，美国矿业技术人员正将目光投向 20 世纪初的中国或东亚，这里需要注意三点。首先是对中国的理解，以《万国公法》的译者兼北京同文馆总教习丁伟良为首的“中国通”们带来了大量信息。第二，庞佩利及其自身的业绩通过科学性分析得到的数值已经公开。第三，对学到西方科技的中国技术人员来说，与矿山开发或通过引进最新技术来获得现实利益相比，他们更期待古代技术发掘这一考古学上的贡献。这样的思考逻辑，无疑是具有“边境探险家”性格的庞佩利开拓出来的。庞佩利与他的后继者们，试图用技术人员的眼光探查中国和亚洲广大地域下埋藏的资源，同时也探求古代文明梦想，即用现代所谓超越地质学的视野来看中国。所以美国矿业技术者协会不仅为近代矿业技术者或经济地质学者提供了平台，使其可以交流实务性信息，也是共同拥有对未知世界广泛关心与憧憬的场所。

会员邝荣光与吴仰曾等人的意识是否与美国技术专家完全一致，另当别论。对于莱曼的评论，吴仰曾首先说“现阶段没有需要追加的内容”，然后简洁叙述蒙古地区的矿山使用料占出产金银的 7%，现在的蒙古虽然是军政但未来也许会被文明政治所取代。这一回答的前提，是他确信技术专家们的主要关注点是矿业开发带来的实质利益。更有意思的是，邝吴二人的论文最后都涉及到当地人对煤炭与银矿石的“盗取”(stealing)。所谓东方人的道德堕落，是西方人形容东方的惯用句，归国留学生以西方技术开发中国矿山，同时带来了近代西方的伦理观念，所以申诉了中国司空见惯的盗窃行为，他们用西方技术的眼光来观察中国和蒙古的矿山，不仅将其现状写成论文，更难得的是有对异文化风俗的共鸣及憧憬。莱曼与吴仰曾的问答有微妙出入，与会人员对邝吴二人记述的盗取行为也无任何反应，似乎意味着中国第一代矿业技术人员与美国技术人员之间横亘着某种断层。

为了克服这个断层，中国技术人员必须摆脱实干型“矿师”⁸⁸的限制，进化成为赋予调查对象经济价值且能够评价其历史文化价值的广义上的“地质学者”。而要实现这种进化，时代环境比个人资质与努力更为重要。经历洋务运动与变法运动，于革命气氛逐渐高涨的 20 世纪初留洋的中国留学生们，开始面对建立“中国地质学”这一崭新课题。

四、“中国地质学”的成立

1、中国地质学者的自我意识

前述《书目》的作者，是留美幼童归国二十年后的 1901 年留学美国的王宠佑（1879-1958）⁸⁹。1904 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矿学以及地质学硕士学位后来到欧洲，在英国、法国、德国等地继续学习。他也隶属于美国矿业工程师协会，在《工程与采矿杂志》上发表短文《中国煤炭的产出》⁹⁰，并沿前人路线开始了矿业技术人员的生涯。在矿业开发方面，他将矿物资源的范围扩充至锑和钨等工业附加价值很高的矿物，为后世做出贡献。而他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第一位学习地质学的留学生”⁹¹，不仅是在采矿学基础上又履修了地质学这个事实，更因为从此迈出了“中国人地质学者”的第一步，他这种意识在《书目》某些项目中显示出来。

该目录中收录的文献按照语种分类，内容如前表所示，英语与其他欧美语言大致各占一半，但实际上还有未计算在内的中文文献。“中国矿物资源的中文文献中最重要的”四部书是《和汉三才图会》、《本草纲目》、《天工开物》、《中国矿物志》⁹²。《和汉三才图会》是大阪医生

⁸⁷ “Silver-Mining and Smelting in Mongolia, Discussion of the Paper of Mr. Y. T. Woo, p. 755. By Benjamin Smith Lyman, PA.” *op. cit.*, p. 1041.

⁸⁸ 《直隶矿产图》与《直隶石层古迹》图中写有“矿师邝荣光查勘（或考查）并绘”。

⁸⁹ 王宠佑的经历参考王仰之《王宠佑（1879-1958）》，《中国地质》1993 年 10 期，32 页。另外关于王宠佑的生年还有 1878 年和 1880 年两种说法。

⁹⁰ Wang, C. Y., “Production of Coal in China,” *The Engineering and Mining Journal*, vol. 84, no. 25 (Dec. 21, 1907), p. 1178. 该文章是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教授 Drake 介绍 1906 年中国煤炭产量推算值的短篇报告。

⁹¹ 前注黄汲清论文第 5 页。另外，虽然一般认为王宠佑在欧洲取得了博士学位（前注王仰之论文等），但其回国后出版的《中国矿物资源以及地质关联书目》封面上写的是“M.A.B.Sc”（硕士和理学士），所以应该视为没有取得博士学位。

⁹² Wang, Chung Yu, *op. cit.*, pp. 31-32.

寺岛良安根据明代王圻《三才图会》编纂的插图百科事典（全 105 卷），1712 年刊行。严格来说虽是日语文献，但基础是汉籍且用汉文写成，所以也可以说是中文文献。《书目》中提到的 59、60、61 卷分别是“金类”“玉石类”“杂石类”。该书在明治时期的日本也出版了复刻本⁹³并广为流传，应该是中国留学生较熟悉的书籍。《本草纲目》（全 52 卷）是药学史上地位最高的古典书籍，李时珍于 1578 年完成，1596 年在南京出版，后来传入日本且有很多抄本与和刻本，在《书目》中 8-10 卷（金石之一到四）被例举为“金属及矿物”卷。《开工开物》（全 18 卷）是总括中国古代产业技术的重要古籍，明末宋应星著，1637 年刊行。该书传入日本并对幕末科技发展作用甚大，在中国反而渐渐不受重视，清代以后几乎绝迹。章鸿钊（1877-1951）在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学习时，发现了和刻本并带回国内，使中国人得以再次评价它⁹⁴，《书目》中还添上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评价。

《中国矿物志》与上述三书明显不同。1904 年在东京出版后，1906 年 4 月刊行上海普及书局版⁹⁵，属于现代书。著者顾琅（1880-没年不明）⁹⁶与周树人（即鲁迅：1881-1936），1906 年 12 月修订后再版，1907 年 1 月增订第 3 版，由上海文明、普及、有正三书局同时出版。中华民国成立后的 1912 年 10 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订正第 4 版，可见其受欢迎程度。《书目》也高度评价其“1907 年出版，关于中国矿物资源的最佳书籍，附地图”。鲁迅赴日留学前曾在籍南京矿路学堂，学习江南制造局翻译的《金石识别》与《地学浅释》，且有矿山实习经验。他在 1903 年 10 月发表《中国地质略论》⁹⁷，如本人所述，这是对中国地质先行研究的抄录。如文中揭示的中国煤矿分布地图转载自日本杂志《太阳》⁹⁸，日本对中国煤矿调查成果的痕迹非常浓重，鲁迅的本意是“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覬觎者也”⁹⁹。《中国矿物志》是以该论文为基础、顾琅添加后来日本的研究成果而完成的。

上述四部书收录于《书目》中，可以体现以下重要几点。第一是日本的影响，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大量留学生赴日，带回大量新知识与新词汇。王宠佑本人虽没有留日学习经验，但其 1908 年回国时日本传来的信息已经大量流通，这不仅说明信息来源的多样化，还意味着归国留学生们形成的人际关系网更加多元化与多层面化。其中虽潜伏着各出身“学阀”之间发生倾轧的危险¹⁰⁰，但并不意味着只从特定信息来源单方面接受知识，而是有选择信息的自由。

第二是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尊重。先不说鲁迅直接表达爱国心的文章，《书目》收录这些书籍即体现出无限西方近代技术、同时学习并继承古籍中经验技术的意识。当然，作为兼备最新知识技术的地质学者，从典籍中读取的不过是片段且偏实用的知识，但他们还是自觉继承

⁹³ 中近堂，1884-1888 年；中外出版社，1902 年；吉川弘文馆（缩印本），1906 年等。

⁹⁴ 关于“再次发现”《天工开物》的过程，参考田中正俊『ある技術書の軌跡—『天工開物』の三枝博音解説に導かれて—』、『田中正俊歴史論集』，汲古口院，2004 年，570-579 页。

⁹⁵ 关于该书刊行过程，参考刘书友《鲁迅与〈中国矿物志〉》，《沧桑》1995 年第 5 期，58-59 页。前注黄汲清论文《略述中国早期地质工作中名列第一的先辈学者》7-8、13 页。

⁹⁶ 顾琅是南京矿路学堂时期鲁迅的同学，还是同宿舍的好友。他与鲁迅一起赴日，经弘文书院进入东京帝国大学，专攻地质学。回国后在天津高等矿业学堂从事教育活动，后又投身矿业开发。关于他的事迹，参考吴凤鸣《关于顾琅及其地质矿产著作的评述》，《中国科技史料》第 5 卷第 3 期（1984 年），89-93 页。另外关于概论鲁迅与地质学关系的日语论文，有八耳俊文『鲁迅と地学』、『地質学史懇話会会報』第 34 号，28-29 页。

⁹⁷ 索子（鲁迅）《中国地质略论》，《鲁迅全集》第 8 卷（集外集拾遗补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5-24 页（原载：《浙江潮》第 8 期（1903 年 10 月），59-76 页）。

⁹⁸ 参考中岛长文『一切抜き帳より—鲁迅「中国地質略論」地図及びその他』、『颯風』34 号（1998 年 12 月），67-74 页。另有肝付兼行『東洋之煤源』（『太陽』第 9 卷第 5 号，1903 年 5 月，49-56 页），除地图外还大量转用了正文。

⁹⁹ 前注鲁迅《中国地质略论》6 页。

¹⁰⁰ 比如在民国初期在专门术语的选择方面，有主张采用日本词汇的日本派（章鸿钊）与反对日本派的欧美派（丁文江）的对立。参考翁文灏《对于丁在君先生的追忆》（胡适等《丁文江这个人》，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 年，25-26 页），翁文灏《回忆一些我国地质工作初期情况》（《中国科技史料》第 22 卷第 3 期（2001 年），198-199 页）。

先人的伟业。1922 年中国地质学会创立之际，章鸿钊作为首任会长做如下发言。

这种古代式的地质应用和观察，虽然是片段的不是科学的，然的确可以证明古人已有地质学的思想。这就是历史上的根苗。现在我们又将他接上一枝外国式的花种，预料开花时候，必更分外的灿烂了。¹⁰¹

中国地质学的悠长历史中，他们终于实现自我定位。考虑到《目录》的出版年代一民国初年，收录四部中国书籍可以说是年轻的中国地质学者民族主义的展露。但如果把他们的“民族主义”仅看成“爱国主义”与“救国主义”，就无法充分体现中国地质学第一代人的历史观与文明观，以及自我意识，他们的目光所向是世界规模的地质学界。

2、世界性视野的展开

若要引领中国地质学在国际地质学界中发出主体性声音，仅继承前人历史是远远不够的，比之更重要的是参照西方近代学术史来把握中国地质学史。这个历史虽然是外国人调查、研究的历史，但从世界地质学史来看，的确是中国新天地的开拓史，开拓者之一即庞佩利。

20 世纪初期，李希霍芬的研究成果对学习地质学的中国留学生具有绝对重要性。与想成为矿业技术人员的留美幼童不同，立志于地质学的中国青年们必读李希霍芬的著作。翁文灏（1889-1971）作为国费留学生，1909 年开始在比利时鲁汶大学学习，3 年后成为第一位取得地质学博士称号¹⁰²的中国人。他说“中华民国时代即 1912 年以来，中国地质学者才开始走上李希霍芬的道路”、“李希霍芬作为科学家，最早使用总括性观点理解中国自然科学的特征”¹⁰³。李希霍芬的影响力波及下一世代，在国内学习地质学的学生为了读懂李希霍芬的著作甚至必须先学习德语¹⁰⁴。

虽然如此，但中国地质学作为一门科学而独立，不能只依靠李希霍芬的著作。近代科学的特点是在庞大的先行研究基础上不断积累新的研究，王宠佑编成《书目》的目的也与此有关。前述翁文灏文章中先说“李希霍芬之前，中国的地质学只能通过华南的金思密（Kingsmill）¹⁰⁵与华北的庞佩利等偶尔到访学者的著作得知不完整的片段”¹⁰⁶，再历数李希霍芬的业绩种种。可见不仅是庞佩利，还有一般不为人所知的且完全是否定性评价的金思密论文。1917 年出版的《中国百科事典》“地质学”项目中陈述“美国人庞佩利是最早以地质学者资格造访中国的，他对中国和蒙古做了短期调查。但是真正的中国地质学基础，是由李希霍芬与洛川（Lóczy）¹⁰⁷所构建的，他们的伟大业绩直至今日仍是地质学信息的古典宝库”，还提及之后的外国人研究者¹⁰⁸，此处也有中国地质学先驱庞佩利的身影。

¹⁰¹ 章鸿钊《中国古代之地质思想及近十年来地质调查事业之经过》（民国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国地质学会第一次会议演说词），《地学杂志》第 13 年第 2 期（1922 年），57 页。

¹⁰² 1908 年的留学生考试中，翁文灏的志愿是铁道工学，在鲁汶大学进入了土木及采矿技术工科，该时期与留美学堂同样，实学倾向较强。翌年开始在地质学、矿物学、古生物学等教授们的指导下执笔博士论文，题目是《勒辛地区的含石英玢岩研究》（La porphyrite quart zifere de Lessines），取得矿物学博士学位。所以严格来说虽并非地质学博士学位，但博士论文在《鲁汶大学地质专刊》上刊载，可认为矿物学也包含在广义的地质学范围内。参考李学通《翁文灏年谱》，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年，8-31 页。

¹⁰³ Wong, W. H., “Richthofen and Geological Work in China,”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vol. 12, no. 3, (June 1933), pp. 311-313.

¹⁰⁴ Shen, *op. cit.*, p. 207 (n. 69).

¹⁰⁵ Kingsmill, Thomas William (1837-1910), 1861 年末作为土木建筑技师来华，对大运河北部流域以及山东省、四川省的煤矿等进行地质调查，后来成为上海租界的重要人物，任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地区分会会长与副会长。他先于庞佩利完成了广东省南部的地质图，并发表在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地区分会纪要上。Kingsmill, Thomas W., “A Sketch of the Geology of a Portion of Quang-Tung Province,”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ew Series, No. 2, Dec., 1865, pp. 19-34.

¹⁰⁶ Wong, *op. cit.*, p. 312.

¹⁰⁷ Lóczy, Lajos (1849-1920)，葡萄牙人，比李希霍芬略晚在 1877-80 年分别进入长江下流至四川、云南地区进行地质调查。

¹⁰⁸ Wang, W. H., “The Geology in China,” Couling, Samuel ed., *The Encyclopaedia Sinica*, Hong Kong: Oxford

如前所述，庞佩利与江南制造局的翻译人员以及留美幼童并非无缘，但当时他们并没有直接提及庞佩利。虽在欧洲广受关注却在中国退入幕后的庞佩利，这一时期终于登上了中国地质学史的舞台，而他是否占据“伟大先人”的位置并不重要。中国地质学史中仅次于李希霍芬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接受卡内基科学机构支援的维里士（Willis, Bailey: 1857-1949）的调查。维里士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很快成为美国地质调查的一员，受庞佩利的熏陶，在其去世后负责起草追悼文，可见二人关系之密切¹⁰⁹。更进一步说，维里士的中国地质调查得到了李希霍芬的具体指导，是对先行调查的拾遗补缺，在中国地质学者中得到很高的评价。例如 1913 年成立的地质研究所（中国最早的地质学教育机构）的第一期毕业报告中，维里士调查报告几乎与李希霍芬的同样被频繁参考，“本伯里”（庞佩利）则作为维里士的前辈出场两次¹¹⁰。还有一例，该研究所的毕业生们在进入地质调查所之后完成的第一部地质调查报告《北京西山地质志》¹¹¹引言中，以“研究西山地质者，首为美国地质学家崩派来（庞佩利）氏。西历一八六七年（有误，实为 1863 年），氏应我国政府之聘，遂赴京西调查煤矿，继又考察内蒙一带。共分地质层序为三大系，一结晶岩层、二泥盆纪之石灰岩、三三叠纪之含煤层”开头，其后自然是李希霍芬的调查和维里士率领的“加纳旗”（卡内基）调查团。从庞佩利经李希霍芬再到维里士的脉络，在中国地质学者的手中被编织成历史——即连接古代与现代的道路。

中国地质学者是将中国地质学史作为自身的历史来把握，中国大陆并不仅仅是被从外部调查和开发的对象，那是被刻上自身历史的“我国国土”。如果简单表达他们的自我意识，可以用“民族主义”一言以概之，但必须要注意这与容易概念先行的“救国”“爱国”言论不同的具体性。通过田野调查将“我国国土”的意识身体化的中国地质学者们，通过世界标准切实把握了学术与经济价值。这样他们就将中国国土作为一种资源，在国际学术研究界逐渐确立了“中国人的中国地质学”的地位¹¹²。1931 年，已经闻名中外的中国地质学者丁文江（1887-1936）明确表示：

科学是世界的，是不分界国界的，所以普通讲起来，中国科学家的责任与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完全没有分别。例如我们不能说中国的天文学者，算学者，或是理化学者，有与外国同类学者不相同的责任。

但是有几种科学，因为它所研究的材料，根本有地域性质，所以研究这种科学的人，也就因为地域不同的关系，发生不同的责任。地质学就是这种科学之一。所以研究地质的人，往往对于世界和对于本国，有特别的义务。¹¹³

他所谓“中国地质学者的责任”，是面向世界开放中国地质学（平等立场上的学术交流）与亲自守护“我国国土”的历史与资源，这可以说是凝聚了中国地质学草创时期的学者们世界观与自信心的话语。

结语

本文将美国地质学者庞佩利视为近代中国地质学的源头之一，尝试描绘出其脉络生成和发展、变迁的过程。当然中国地质学的起点并非只在庞佩利一人身上，他的地质学发端于欧洲地质学（可上溯至博物学）与矿业学，以新大陆经济地质学的能量为推动力来到了中国大

University Press, 1983; reprint,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17, pp. 201-202. 1917 年，该事典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¹⁰⁹ Willis, *op. cit.* 参考注 27。

¹¹⁰ 《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北京：警花印书局，1916 年（序），3 丁里，26 丁表。该研究所只有一期就结束了，后来的中国地质学教育，由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各所大学地质系（或地学系）承担。

¹¹¹ 叶良辅编《北京西山地质志（地质专报甲种第一号）》，北京：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920 年。

¹¹² 关于中国地质学者“国土”意识的成立及其向国际的推广，参考 Shen, Grace Yen, *Unearthing the Nation: Modern Geology and Nationalism in Republican China*,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Chicago Press, 2014.

¹¹³ 丁文江《中国地质学者的责任》，《国立北京大学地质学会会刊》1931 年第 5 期，1 页。

陆，可以说近代中国地质学从最初即有丰富的水源。为了使庞佩利带来的一条水脉成长为滋润中国的河川，中国地质学者们的意志与行动力不可欠缺。他们直接或间接利用与庞佩利相关的学识与人脉，从中国人自身的矿山开发到地质学成立，逐渐形成水流。然后又与起源于美国、欧洲诸国、日本等地的各条水脉合流。今后的研究课题，是建立“中国地质学”的人们与庞佩利之后的外国地质学者的具体关系，目的不仅是单纯描述以 20 世纪前半期的中国为舞台的全球一体化地质学网络（如果考虑时代背景，这既是知识又是政治网络，甚至包括以孙中山《实业计划》为代表的国家规模的经济开发计划）。虽然本文中未及讨论，但有必要将形成中国地质学地下水脉的智慧—自古代中国延绵至今的“地学”—具体可视化。

中国地质学者开始用自己的话语讲述中国地质学史的时候，地质学（geology）无疑还是来自近代西方的学问。即使如此，他们还是发展了古代中国相当于应用地质学的矿业，重视地质变动概念的存在（《诗经》：“高岸为谷，深谷为陵”、颜真卿《抚州南城县麻姑仙坛记》：“海中扬尘”、“东海之为桑田”等）¹¹⁴，即将固有文化的源流纳入视野，认为地质学会成为牵引近代中国的科学。第一代中国地质学者对文化传统的尊重如前所述，但如不阐明其“传统”本质，就无法明确他们试图构建的地质学蓝图。如果说近年来的研究¹¹⁵多着眼于科学探究的场所与科学知识流通的路径，即科学活动“空间”的重要性，那么新旧知识交错、多样学科信息交叉、试图产生新学术的近代中国这一“场所”的历史性，才是应该进一步考察的对象。

（张雯 译）

¹¹⁴ 章鸿钊《中国地质学发展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年，1-4 页。

¹¹⁵ David N. Livingstone 著、梶雅范・山田俊弘译『科学の地理学—場所が問題になるとき』，法政大学出版局，2014 年。

20 世纪 30—40 年代中国的自由主义

——在爱国和民主的夹缝间

水羽信男

(广岛大学)

前言

在近代中国，因为近代的“个体”未能从集团中分化独立出来，起源自欧美的 Liberalism（自由主义）亦未能以其原本的姿态被移植到中国，最终 Sino Liberalism（中国自由主义）诞生。换言之，同俄罗斯相同，欧美的自由主义未能在中国社会生根便早早枯萎。这一评价也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¹。

探讨中国民主化可能性的拉纳·米特也基本继承了这一对中国自由主义的严苛评价。在他看来，如今的中国“从在国内进行选举的意义上来说，虽然兴许能轻易实现民主，但是也有可能变成难以容忍政治多样性的一块铁板²”。另一方面也有人担忧当今的个人主义（不是利己主义！）可能会瓦解人与人之间的羁绊从而制造出病理性问题的困境，而重视儒教性的调和。他们强调用 Asian Way（亚洲的模式）代替欧美的民主主义制度。

对于本质上认为欧美的自由主义和中国的“自由”、民主主义和“民主”各不相同这一立场，无论是持批判性的·否定性的还是肯定的态度，无法否认的是到现在在日本和中国仍然有着根深蒂固的强大影响力。

在这样的研究状况中，笔者认为，虽然自由主义起源于欧美，但包含着不论地域理应实现“个体尊严”的保障等普遍价值。虽然经历挫折，但笔者考察了一群为了让自由主义诸价值在中国扎根而努力地知识分子。笔者立志于考察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到 1957 年反右派斗争为止的连贯思潮史，而不是 1949 年后断裂的历史过程。希望既能对 Sino Liberalism（中国自由主义）论进行批判，又能加深我们对于自由主义本身的理解。

笔者研究的内容曾经出版《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东方书店，2007 年，拙作 1）、《中国的爱国与民主——章乃器和那个时代》（汲古书院，2012 年，以下，拙作 2）³。本论文在本书的成果上增加笔者其后的见解，概括笔者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知识事业的轨迹。但考虑到篇幅，仅赘述到 1949 年革命为止。话虽如此，本稿涉及到的大部分知识分子都留在了中国（大陆），

¹ 关于这一点在笔者拙作《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东方书店，2007 年）进行了详细论述。本书可在“网页书斋”订书购买（<http://item.rakuten.co.jp/shosai/c/0000000648/>）。

² 拉纳·米特著·吉泽诚一郎译《五四运动的残响——二十世纪中国和近代世界》，岩波书店，2012 年，P283。

³ 众多人都有探讨过拙作 1。作为对各类意见的回答，笔者执笔了水羽信男“毛泽东时代的自由主义——围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日本现代中国学会编《新中国的 60 年——从毛泽东到胡锦涛的连续和不连续》创世社，2009 年）。关于拙作 2，味岡徹（《现代中国》87 号，2013 年）、中村元哉（《史学杂志》第 123 卷第 3 号，2014 年）、三品英宪（《东方》386 号，2013 年）、森川裕贵（《史学研究》第 281 号，2013 年）、吉泽诚一郎（《历史学研究》第 919 号，2014 年）、林礼钊（《广岛东洋史学报》第 19 号，2014 年）等人有所评论。在本论文中无法对各位一一指出的论点全部进行论述，但也是包含笔者对各位批评·疑问的回答。但因为篇幅有限，无法列举各位指摘论点的具体出处。笔者知道这是极其失礼的对应，也烦请多多理解和海涵。

尽管他们在国际性·国内性的环境下苦恼着，却贯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因此，他们在反右派斗争或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思想活动被迫停止。本稿希望可以为考察人民共和国时代自由主义提供基础知识。

1. 本稿观点

为了考察自由主义问题，为什么需要设计“爱国”与“民主”的课题？（下文省略“”）。为了解释这一问题，首先需要确认的是，就如笔者至今为止数次指出的一样，笔者认为贯穿 20 世纪中国的基本政治课题是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树立。众所周知，所谓民族国家是指在主权可及范围确定国境，理念上是由为了祖国亦可选择抛头颅洒热血的“国民”所支撑的国家⁴。

（1）关于爱国

把爱国意识定位于 民族国家树立最根源的动力是被一般所认可的。笔者的确也知道有所谓应该区别 Patriotism（爱国主义）和 Nationalism（民族主义）的议论。但是如果没有对乡土、对家人的爱，毋庸置疑对民族·国家的爱亦是不存在的。我认为基于对乡土、家族的爱如何在各种意识形态下组织国民，是围绕着民族国家树立思想上的课题⁵。在此意义上本论文中使用爱国这一术语，表示 Nationalism。

这一爱国意识在政党和领导人的指导下，既可能发展为极端暴力无法控制的激情最终被政治化，人们的爱国意识也有可能被组织为理性的民主化斗争（人们的爱国意识当然也会影响统治者的政治性）。笔者把这一点作为展开议论的前提，虽然一直使用的是“冷静”的爱国意识这一表达，但这是以是否有意识用理性的控制来影响主动·被动爱国意识为基准的（这一意识成功与否虽然很重要，但算是其他课题吧）。此外，笔者认为进行这种理性的主动·被动控制的爱国，是“道具”的爱国。无论爱国意识是何种形态，当然都是带有热情的，把这种热情放在树立民族国家这一课题，又该如何去定位才是问题所在。

笔者认为爱国方式很重要的一个重要原因和 20 世纪日本对中国的认识有关。比如竹内洋说过，在满洲事变前（即九一八事变）（1931 年 7 月）对东京帝国大学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关于“对满蒙诉诸武力是正当的”的选项，有 88% 的人回答是“是”；有 52% 的人认为“应该即刻行驶武力”⁶。不难想象东京大学学生反华意识的根源在于，中国民众的爱国行动无视国际条约侵害日本的权益并且激化，以及对无法控制这一激化（或者说被认为在水面下煽动）的中国政府的愤怒。20 世纪中国的爱国方式触动了同时代日本人对中国人理解的那根弦。那么，有必要再次重新探讨 20 世纪中国的爱国方式。

（2）关于“民主”

如前文所述，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在清末被认为是必须的课题，因此提高国内凝聚力、最大程度动员民众个人力量亦成为了必须的课题，民主取代“君主”成为必要。在驱逐 19 世纪中叶发达资本主义的全面侵略和由民族国家形成的国际秩序中，对于想要提高本国地位的

⁴ 民族国家的定义想请参照木畑洋一的“世界史的构造和国民国家”（历史学研究会编《提问国民国家》青木书店,1994 年,P5）。关于为了祖国不惜选择抛头颅洒热血的国民的象征性定义引自村田雄二郎“作为 20 世纪系统的中国民族主义”（西村成雄编《现代中国的构造变动》第三卷,东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P55-56）。

⁵ 关于这一点，笔者到现在也支持丸山真男的古典定义——民族主义运动是“以大众无定形的国民感情为基础，领导人或多或少组织其发展为为自觉的意识和行动。”（《增补版 现代政治的思想和行动》未来社,1981 年,P283）。

⁶ 竹内洋《丸山真男的时代——大学·知识分子·新闻工作》中公新书,2005 年,P290。竹内参照的是大学新闻联盟《现代学生的实态》（鱗书房,1948 年,P59）。

后进国家而言，这是理所当然的对应⁷。该国·该民族的民族国家建设的个性会在民主化现状中展现。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如果爱国是民族国家建设的动力，民主化的构想就是决定国家性格的设计图。这也是本书着眼于民主的理由。

只是笔者一直把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广义上的，并不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定位为中国近代的三大思潮，却没有把 democracy=民主加入其中⁸。不仅仅是因为像前文说述那样民族主义和民主密切相关，更因为既有人主张中国的民主和广义的社会主义有共鸣，也把自由主义最终是的人也重视民主主义。

更进一步说，为了巧妙地将民众动员到自己的政治斗争中，宣传“民享（for the people）”或者“民治（by the people）”实现民主的人们也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在他们之中也有不承认所谓“民有（of the people）”这一基本立场却高明隐瞒自己态度的人。因此，民主不是可以概括近代中国特征的思潮，有必要在和三大思潮的紧密关系中探讨它的意义。

因此笔者将民主定位于自由主义等三大思潮的下位概念。为了在此基础上考察中国民主的特质，在拙作 2 中将民主定位于“人民的由人民发动的为了人民的政治”，从这三个分析视角进行研究⁹。

有的人认为民主是中国的思潮之一，他们批判笔者的看法，也有人评论在 20 世纪基本没有人公然批判关于作为“民有（of the people）”权利的民主。但如果把“民有”政治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共通理解，那么和先知先觉的圣贤相对，孙文把民众认作愚劣之民，他的民主还是 Democracy 吗？笔者认为正因为这把主权的所在暧昧化了，是不是才让本来彻底的 Democracy 不能充足，所以才可能会放弃关于民主主义的真挚讨论。

for the people（民享）也应看作是追求提高国民生活，但有人却抱有质疑认为不能理解其为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经济性民主”）。但是笔者所研究的不是林肯时代的美国，而是从无政府主义到列宁主义，更进一步到英国劳动党思想为止的广泛的“社会主义”传播，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下，差距不断扩大化的 20 世纪 20 年代-40 年代的中国思想界。笔者在探讨 for the people（民享）时，无论站在何种立场，均认为无法回避权力对财富进行再分配这一问题。

中国的民主也和爱国一样，在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比如，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关于国联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李顿报告书中认为“中国现在仍然固执其应和欧美诸国享受同等待遇，视其为单一组织国家”，日本政府指摘“在当日本生死必要成为问题时”不得不“探讨这一问题并自己设定界限”¹⁰。换言之，报告书里认为中国不是民族国家=近代国家。但做出这一理解的根源在于，这是在和实现政党政治和普通选举的立宪制国家日本=民主日本做对比，其强调中国的后进性、混乱和独裁的立场可见一斑¹¹。对于 20 世纪的日本，可以说民主的问题曾经也是理解中国问题的关键价值观。

⁷ 笔者在拙作中曾经指出对于民族国家，为了确立国民的认同民主化是必须的，但是即使参照国际社会，后发展起来的各国为了在以欧美为中心的国际社会提高地位国内政治的民主化是必须的。而关于后发展国家的民主化的国际契机，可以参照比如曾田三郎《立宪国家进程的开始——民治宪政和近代中国》（思文阁出版，2009 年）。

⁸ 将这三者作为三大思潮的论述早在 20 年前就被胡伟希·高瑞泉·张利民《十字街头与塔——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陈仪深《近代中国政治思潮——从鸦片战争到中共建国》（稻乡出版社，1997 年）等提出。

⁹ 对于林肯的 the government of people, by people, for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也有多种理解，笔者对此是持和《日本国宪法》的“前言”中相同的理解，即：“国政本来就是由国民的严肃嘱托而产生的，权威来自国民，其权力由国民代表行使，福利由国民享有”。

¹⁰ 西村成雄“贯通 20 世纪中国的《国民国家的论理》和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历史评论》515 号，1993 年，P516。

¹¹ 子安宣邦《“亚洲”是被如何叙述的——近代日本的东方主义》（藤原书店，2003 年等）。

总之，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不同，是以国家的存在·存续为前提的构想，在 20 世纪世界史中，毫无疑问自由主义正是在民族国家这样一个场所之中经受政治性的拷问，在考察中国自由主义时需要考察中国的民族国家的实质，更因此还需要考察中国的爱国和民主。

2. 中国的爱国

为了考察以树立民族国家为课题的爱国问题，首先必须分为对外的爱国和对内的爱国问题。

对外的爱国问题在民族国家间的竞争中，收敛于如何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一点上，富强国家的方针是对内的爱国，和对中国历史与现状的评价密切相关。进入 20 世纪，一方希望可以全面实现西欧化，另一方却可见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优于西方文明的立场（本位文化论）。但毋庸置疑的是两者均认为实现如欧美一般的工业化是必须的课题。两者的区别既在于思想的不同，也与民族自豪息息相关。

此外作为对内的爱国的一个问题，围绕应该爱的“中国”在哪里，谁又是中国的公民的探讨不断。众所周知，清末的“排满主义”者们反复讨论着仿佛是在追求小中国=仅有汉民族存在的民族国家形成的议题，最终未能成为大势所趋反而以继承清朝版图的多民族国家（“五族共和”）的形成目标。但是，围绕汉族和其他各民族的关系，社会上展开了从汉族同化论到承认存在自由的联邦论等各种讨论。

现在的共识是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研究的争论容易集中于在中国以树立实质性的政党=国家（Party State）为目标，国内少数民族的权利被剥夺，受到来自同化的压力这些地方。并且为了建立这样的强权国家，有时政治领导人甚至会过于强调来自外部的危机，强调统一民众。

但是像如此把爱国相对化的讨论在中国国内也是存在的。典型的例子是，共产党对胡适¹²的帝国主义免罪争论的严厉批判¹³。但是，1949 年后留在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却共享了以相对性的眼光去看爱国主义的这一立场。在笔者拙作 1 中所提及的施复亮¹⁴有以下的看法¹⁵。

*爱国主义·爱国运动是榨取阶级完全保持其地位扩张其权利的行为……
我们只是惧怕山东人成为日本的奴隶，怎么可能放任满蒙·西伯利亚人民已然
被日本人所残忍虐杀掠夺的事实而不顾……爱国运动，即是拥护强权的运动。*

即使是在爱国热情高涨的 1925 年五三〇运动进行时，王造时¹⁶认为“现在或过去所谓的国家主义”是“热爱本国”、“侵害他国”的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原形，就是军国主义自身，

¹² 胡适（1891-1962）。留学美国，是中日战争时的驻美大使，战后是北京大学的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离开大陆。

¹³ 胡适“国际的中国”《努力周报》22 期，1922 年 10 月 1 日，和“我们走那条路？”《新月》2 卷 10 号，1930 年 4 月或 5 月，P4 等。《新月》实际的发行时期众所周知有时和杂志内页所示并不相同。关于这一点，请参照王锦泉“《新月》月刊出版日期考”（《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业刊》第 8 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年）以及稻本朗“《新月》作者译者索引”（《左连研究》第四辑，1996 年）。

¹⁴ 施复亮（1891-1970）。来日本游学但被强制退学。1927 年退出中国共产党，此后成为民主建国会的领导性成员。

¹⁵ 存统（施复亮）“把‘爱国运动’变做‘社会运动’”《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1920 年 4 月 18 日。且关于施复亮，除在拙作 1 以外，还有平野正《政论家施复亮的半生》（汲古书院，2010 年）。笔者对于平野的立场，请参照《社会经济史学》第 77 卷第 4 号（2012 年）书评。

¹⁶ 王造时（1903-1971），在美国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接受了在英国劳动党的理论指导者拉斯基的指导。1936 年从事抗日运动被逮捕（“抗日七君子”）。

是战争的种子，是世界纷争的根源¹⁷。

在拙作 2 所提到的章乃器¹⁸也有相同的意见。他在 1928 年是这样阐述的¹⁹。

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区别并不显著。前者是人为的使用国家的权威，限制了应有的民族自由，后者是保持应有的民族自由寻求世界大同。前者体现在反动压迫和侵略，后者表现的进食解放反动压迫和抵抗侵略。

的确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后，随着日本侵略步伐的加剧，包括胡适在内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也开始加强爱国的言论。但是，章乃器即使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的前夜，仍把和日本战争的目的与单纯的排外主义区别开来，认为这场战争是对大众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的解放，即值得瞩目中国的民主化志向²⁰。

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自由主义者也会时而过度强调爱国。但是笔者认为，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爱国意识为了变革中国的手段，绝不是李泽厚²¹所指出的如“救亡胜过启蒙”那种爱国论²²。换言之，笔者认为他们组织爱国的言论是为了将各自的要求诉诸国民政府的一种战术对应。

确实在关于用爱国动员民众的手段这一点上，自由主义者和共产党是相同的。共产党虽然督促民众自身将爱国意识相对化，是不是在阻止民众暴走的方向上很薄弱？无论如何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如后文所述，在抗战时期或更进一步说在民国初期，都是持续重视着与集体相对的个体的尊严。

此外关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关系，蒋介石所强调的中华民族论，实质上是汉族中心主义，而不是对少数民族寻求同化。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政策最终也是虽然承认区域自治，却不承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离独立²³。

但是在被称为第三势力的民主同盟等小党派²⁴人士里，也有人对联邦制有志向。众所周知在 20 世纪 20 年代共产党也一度承认联邦制，但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40 年代间却被小党派的知识分子所继承²⁵。

比如抗日战争胜利后，具体讨论中国的国家建立成为现实课题，在这一阶段黄道庸²⁶如此

¹⁷ 王造时“新国家主义——救国良药（一）”《上海惨剧特刊》（三）（《京报》副刊第 175 号）1925 年 6 月 10 日。此外关于王造时，请参照水羽“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政治变动和政治学者——以王造时为素材”村田雄二编《自由主义的中国》有志舍，2011 年）。

¹⁸ 章乃器（1897-1977）。虽没有留学经历，但是前浙江实业银行的副行长，是“抗日七君子”之一。作为民主建国会领导人之一活跃。

¹⁹ 章乃器“非‘国家主义的爱国思想’”《新评论》第 16 期，1928 年 7 月 30 日，P11。

²⁰ 章乃器“为和平而战！为民族解放而战！”《生活星期刊》第 1 卷第 25 期，1936 年 11 月 22 日，P384。

²¹ 李泽厚（1930-）。北京大学毕业的哲学家，1989 年在民主化运动时批判了政府。现住在美国。

²² 李泽厚·坂元馆子等译《中国的文化心理构造——解读现代中国的钥匙》平凡社，1989 年，P242 等。可以和拙作 2P124 页相互参照。

²³ 松本ますみ《中国民族政策的研究——以从明末到 1945 年的“民族论”为中心》多贺出版，1999 年。

²⁴ 因为支持共产党而被赋予附加价值观的民盟等被称为“民主党派”，应称呼中立为“小党派”。以笔者浅见最早的例子是 Edmund S.K. Fung，“近期关于中国小党派和组织的研究”，《现代中国》，20-4，1994。（请结合水羽信男“关于近年以美国为中心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史研究备忘”《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55 卷，1995 年，P63-64）。笔者虽然也使用过“小党派”的表达，叙述却没有一贯性。在此笔者要再次表明应该遵循 Fung，用“小党派”的表述。

²⁵ 关于在共产党内部形成并遭到镇压的联邦制的讨论，请参照严家其《联邦中国构想》，明报出版社，1992 年）。

²⁶ 黄道庸（生卒年不详）。中日战争时期在四川任教的中国共产党员的历史研究者，专业是清代史。

阐述²⁷。

地方民主选举的实行是全国民主制度实现的初步基础，将来，为了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民主制度，首先需要夯实初步基础。

此外民主同盟的最高干部之一，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从事连省自知运动的沈钧儒²⁸也表示，作为“世界强国的条件”美国和苏联都采取联邦制，虽然中国谋求统一，但是“从民族来探讨应该采取联邦，如果从省来探讨应该采取连省”²⁹。

这样的立场，左派认识也有所提及，可以看到相应的发展³⁰。

在当今的世界，中国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盘。但是“从发展”中落伍的地区可以诉求社会主义的力量过于微弱……“现实的中国社会地区不同”现代化程度无法相同，计划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应该也会产生差异。

现如今区域自治不被允许，中国政府一直对国内的少数民族问题持严格的对应，笔者也不否认很多汉族人对此持肯定态度。此外在探讨中国政府的安全保障政策、资源政策时，也不认为可以立刻从根本变更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如果说以史为鉴有意义的话，笔者觉得可以更加关注 20 世纪 30 年代-40 年代包括左派在内的知识分子的联邦构想。

3. 中国的民主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接受民众=多数人不受控的赤裸裸的暴力是“大民主”。他们也许更被要求反省地看待原本意味着多数支配的民主主义，远远超过日本知识分子所被要求的程度。比如胡伟希在 1996 年，提出了把作为“手段”的民主主义和作为“目的”的自由进行对比的观点³¹。

在今天需要确认的是如果过度强调多数决原理，是否有不当侵犯公平性、正义或者是少数派人权的危险性³²。因为有共同的问题意识，所以笔者才着眼于中国的自由主义。从笔者拙作 1 开始，就有人批判笔者的自由主义者范围是否过于广义（笔者关于此点的立场，在前面

²⁷ 黄道庸“现行地方民选制度评议”《文萃》10 期,1945 年,P12。也可参照水羽“20 世纪 40 年代后半中国民主派知识分子围绕国家统治的论调”（横山英·曾田三郎编《中国近代化和政治统合》溪水社,1992 年）。

²⁸ 沈钧儒（1875-1992）。是清末科举考进士，后留学日本。是“抗日七君子”之一，也是民国首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²⁹ “沈钧儒在政协讨论修改宪章问题的发言”（1946 年 1 月 19 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年,P136。

³⁰ 静远“论地方自治”《周报》27·28 期合刊,1946 年 3 月 16 日,P22。根据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柯灵的回想《<周报>沧桑录》，静远的原名应该是潘齐亮。他是 1945 年时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学生，是在上海很有人气的《周报》上作为特约撰稿人撰写原稿最多人士之一，据说被纳入国民党黑名单

（http://www.mj.org.cn/zsjs/hsyj/hsgc/201109/t20110915_129879.html 2015/03/05 浏览）

³¹ 胡伟希“理性与乌托邦——20 世纪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许纪霖编《20 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下），东方出版中心,2000 年,P17。第一次登载在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

³² 比如野村修也在“多数决的反讽”（《东京新闻》2014 年 2 月 19 日）如此论述。“在五楼公寓，讨论电梯的整修费用。住一楼平时不用电梯的住户拒绝负担费用，但是五楼居民主张均摊费用。采取多数决，如果只是过半数可能会产生疙瘩，所以决定最后遵从五分之四赞成的方案。听上去是个很好的主意，……五楼居民的提议和不想负担费用的其他居民的想法不谋而合，结果五分之四的人都赞成由一楼居民负担所有费用的方案。这个故事不可笑让人心生寒意。多数决的结果并不总是正义。这是成为多数派时更该谨记的教训。”

提到的《毛泽东时代的自由主义》中已有体现)。拙作 2, 也受到了章乃器的思想很难认为是自由主义的批评。

容笔者对各位的批判批评进行如下概括。如果把遵守对个体的尊严作为评判自由主义者的最低条件, 有必要补充探讨其为了保护“个体”自由的制度保障、对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警戒和自卫策略。但是, 章乃器最终为了优先实现平等支持中共的政策, 并理解民主就是彼此站在理应有的正确立场上, 开始基本接受承认共产党的独裁。这最终会丧失自己和他人的尊严, 不能称为自由主义者。

笔者也无法反驳和章乃器等人同时代的胡适的以下论述³³。

主张彻底改革的人没有一人没有走上绝对性的专制道路, 这在“世界近代史”上也有所背书。这是因为只有绝对性的专制政治才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他们能以最残酷的方法达成他们所认为的根本革命的目的。他们不会承认也许他们的见解是有错误的。他们对反对自己的人, 亦不会承认那里可能存在值得思考的理由。因此, 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和自己不同的, 以及自由思想和言论。

胡适的确曾经是反共产主义者, 但也一直批判国民党的一党独裁, 立足于此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胡适持续强调哈耶克、柏林流消极的自由的珍贵, 是中国思想史上可大书一笔的存在³⁴。

但是把胡适批判的积极的自由从自由主义范畴排除也是错误的吧。笔者认为, 世界史中的自由主义者不断被如何取得两者间的平衡所拷问。之所以如此认为, 也是因为保守的政治家利用贫苦的大多数在压倒性的差距面前寻求平等时的愤怒力求实现全体主义政治的历史不断反复上演, 那么重视自由主义的人们, 就不得不考虑平等=“公平”的实现问题。

关于这一点, 笔者将自由主义者们按和爱国论之间的关系假设性地做了以下四个区分。

- I: 更加重视自由, 支持全面西欧化论的人们 比如胡适等人
- II: 更加重视自由, 支持本位文化论的人们 比如张君勱³⁵等人
- III: 更加重视平等, 支持全面西欧化论的人们 比如罗隆基³⁶等人
- IV: 更加重视平等, 支持本位文化论的人们 比如梁漱溟³⁷等人

这一假设有一个巨大缺点, 即没有将对待少数民族的看法列入其中。但是被归属到 I 和 II 的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 参考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离开大陆来看, 他们如何看待平等是如何评价 1949 年革命的思想的根据之一。的确结合每个知识分子的情况, 当然, 关于

³³ 胡适“自由主义”《世界日报》1948 年 9 月 5 日(笔者翻译砂山幸雄《在世界冷战中的选择——从内战到社会主义建设(新编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 第七卷)》岩波书店,2011 年,P133-134。)

³⁴ 水羽信男(郑晓琳译)“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分歧——20 世纪 30 年代的胡适和罗隆基”潘光哲主编《胡适与现代中国的理想追寻——纪念胡适先生 120 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

³⁵ 张君勱(1887-1969)。留学早稻田, 后留学德国师从欧肯。1946 年全力制定《中华民国宪法》, 1949 年以后离开大陆。

³⁶ 罗隆基(1896-1965)。在美国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 跟随英国拉斯基学习。1920 年起被称为人权派, 1957 年被打成最大右派。

³⁷ 梁漱溟(1893-1988)。重视传统思想, 谋求通过农村复兴重建中国, 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干部。被称为新儒家的一人。

决定如何应对“革命”，包括人际关系在内的各种要素均会产生影响，很难说只有思想因素会产生突出影响。就如同杨绛³⁸曾经描述的一样，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支持“革命”留在大陆³⁹。但是，笔者认为如果以这点为前提限定思想上的问题，则可以锁定平等的问题。

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个平等和“个体的尊严”处于什么样的关系？比如，王赣愚⁴⁰在国民党强调国家自由而非个体自由的中日战争时期，作出如下描述⁴¹。

西欧的自由主义的关键是以“人”为目的，不把人作为手段……正因为个人有相当的自由，才能发挥寄宿于生命中的价值，同时追求和世界上的人们和谐携手向前……对个人自由的切实保障是民主政治成功的条件。

他在战后又是如此批判全体主义的⁴²。

“对于全体主义者”不仅仅是少数人成为自己的主人，而是所有人成为自己的主人。那是因为他可以分辨自己的利益代表集团，实现无上的利益。

对于王赣愚而言，不争取自身的自由实际上不仅仅是放弃自由，而是也放弃了个性和人格，放弃自我个性和人格是扼杀自我生命、允许榨取自我精神⁴³。

这一重视“当事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原则⁴⁴”的立场，在著书1中也有论述。这一立场在后来支持共产党持率领民主同盟的罗隆基、施复亮身上也有所体现，他们主观上认为以倡导新民主主义的共产党为核心的联合独裁政府，既是主动参加的民主权力，又能通过此权力让实现平等和个体尊严同时成立。

章乃器身上的这一立场很典型。这一立场和胡适相比，可以批判性认为他相信共产党是非常天真的，而对胡适的消极的自由的批判也是妥当的。但是，胡适亦未能树立自由中国。无论如何当时的思想界，为了脱贫向拥有强有力的执行权的政府谋求经济建设，为了实现平等向政府谋求财富的再分配本身，对于多数知识人来说都是一个选择。置该事实为无物很难说是历史学应有的态度⁴⁵。

确实章乃器没有从制度上让保护个体尊严可能化的政治远景，这在拙作2中曾多次指出，和在拙作1中介绍的罗隆基相比，不难发现章乃器对于民主的制度设计并没有充分的认识。更进一步说，就算拿章乃器和同样搞实业出身的冯少山⁴⁶作比较，也不难发现其思想上的不充

³⁸ 杨绛（1911-）。《结婚狂诗曲》（岩波文库，原名：围城）的钱钟书夫人，文学研究者。翻译了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

³⁹ 杨绛·中岛绿译《洗澡》みすず书房,1992年。

⁴⁰ 王赣愚（1906-97）。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中日战争期间在昆明执教，1949年以后担任天津南开大学教授。

⁴¹ 王赣愚《民治独裁与战争》中正书局,1941年,P11。关于他也想请参照水羽“王赣愚的民主主义思想——以‘自由’论为中心”《中国——社会与文化》第22号,2007年）。

⁴² 王赣愚《新政治观》大东书局,1946年,P13。

⁴³ 王赣愚《民政新论》大东书局,1946年,P5。

⁴⁴ 宫村治雄《新订日本政治思想史——以“自由”的观念为轴》放送大学教育振兴会,2005年,P210。在拙作2笔者中以宫村志雄为例，指出“当事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原则”是“近代日本自由主义者不能容易接受的”（P219），但是如下文所论述，宫村认为问题是“日本功利主义信奉者们”（同前）。

⁴⁵ 在这一点上，下出铁男在全面肯定美国、认为资本主义无限制的竞争社会是理想的刘晓波的思想里感受到了违和感，笔者也基本赞同（下山铁男“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是否可行？——与‘〇八宪章’有关”《野草》第88号,2011年）。但是笔者和无法将“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绝对对立起来描述的下出的意见立场不同。

⁴⁶ 冯少山（1884-1967）。带领上海资本家团体活动，但在1928年受到蒋介石镇压。战后是民主促进会的创始

分性⁴⁷。

但笔者之所以关注章乃器，是因为他激烈地强调个体的尊严。宫村认为，这种“当事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原则”将“日本的功利主义信奉者”并未充分重视的地方作为了问题点，笔者从中获得灵感。宫村的论点在笔者总结看来，在日本，知识分子对于民众的政治能力有很强的不信任感，结果代替民众由精英来做出正确判断开始被认为理所当然，在大众运动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共鸣高涨中，知识分子开始无法贯彻以个体尊严为根本的自由主义。

在章乃器的思想模式中，存在着人们主动地·自律地选择他所认为正确的道路，追求“清一色”，强调积极的自由的人们的陷阱。但笔者认为章乃器的思想和行动里有和重视“当事者主权”的立场共鸣的地方。“当事者主权”在当今的日本也被视为问题，是指“自己身体和精神不容任何人侵害的自我统治权，也就是自我决定权”⁴⁸。

“当事者主权”一词在相当现实的运动论中也被探讨，可以解读其与“当事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原则”相当，如果运用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当然会带来很强的违和感。事实上，笔者并非全面性支持论述“当事者主权”者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也并不想在此进行探讨。

但是和“当事者主权”相关的以下精英主义批判，如果把“专家”一词用共产党来替换，笔者认为和章乃器在1957年迎来巅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期不断强调的工商业者有自己做决定的能力和权利的观点相通⁴⁹。

专家被赋予了普通人所没有的权威和资格。这些专家通常的态度是“我比你更了解你的事，我会代替你来判断什么最好”，这个叫做温情庇护主义。

章乃器因为持续坚持“当事者主权”，坚持“当事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原则”，所以被打成了右派。将这一点和王雨所指摘的“到现在，现代意义上的自觉、主体性、独立思考能力仍未树立”相结合思考⁵⁰，在持续强调个体尊严这一点上来看，笔者在拙作1·2中所举出的三人——罗隆基·施复亮·章乃器、个别谈论到的储安平⁵¹、王赣愚以及王造时等人是共通的。笔者可以虚心接受将章乃器定义为自由主义者是根据薄弱、接近杜撰的批评，但是立足于他们经历的多样性，笔者认为有必要再探讨中国近代史里个人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深度。

结束语

在围绕中国现状的问题中，至少日本的媒体认为中国以其爱国的面孔制造对外的并不存在的危机、尝试对外扩张、正在调整美国所构建的战后秩序，关于国内问题，媒体批判为了维护共产党的独裁中国压制民主化的进程、汉族对少数民族的人种主义的态度也并未收敛，中国还有资源、安全保障、台湾问题，对少数民族的独立倾向进行弹压。此外，日本的媒体认为爱国的文化面上，在国内外赞扬和复活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在共产党政权的指导下就发

成员之一。

⁴⁷ 关于冯少山，可参考金子肇“批判冯少山的‘训政’和形成‘国民’”（曾田二郎编《中国近代化过程的领导人们》东方书店,1997年）。

⁴⁸ 中西正司·上野千鹤子《当事者主权》岩波新书，2009年，p.3。

⁴⁹ 同上,p3、13。

⁵⁰ 王雨“‘群’和‘个’的最后较量——历史视野与比较视野中胡风理论的再认识”（吉林大学研究生论文,2004年,p34）。如果让笔者概括王雨的论点，胡风也是主观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客观上来看，也能说他是一个想要让自由主义在中国扎根的思想家之一。王雨论点的独特性即在此，笔者也是持相同观点展开分析的。

⁵¹ 储安平（1909-66）在英国师从拉斯基，既是国民党机关报纸的编辑，又作为1946年创刊的《观察》编者成为论坛的宠儿。

展经济，通过以抗日战争时的记忆为借口，旨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而日本重视强调这一见解的报道。

但是如本论文想要探讨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虽是爱国者，但是在对外的爱国上却也以合理控制这种运动为目标，也有人构想在国内进行联邦制。诸如他们的构想泡汤、诸如他们之中也有轻易放弃其构想的人，他们身上有不少应该去探讨的地方。但是在探讨当今中国的爱国时，如果无视他们所体现的“另一种可能性”，将会妨碍对中国的全面理解吧。

在此基础上，将今后的研究课题聚焦到以下两点并在此做一个备忘。首先，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是如何面对传统这一问题。在前文对知识分子的四个分类中也有提及，也有很多自由主义者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持肯定看法。关于这一点，20 世纪 20 年代至今即使在中国也是争议不断，即使在日本的学术界也有只有全盘西化中国才能再生的意见⁵²。笔者也无法否定这种持有启蒙性的市民思想下的西化论者真挚地对现状进行批判的意义。但是，不能移花接木也是事实。笔者认为“西方的近代社会虽然是‘近代’的一个典型，但不得不规定这是‘某一特定社会的‘传统’的内在革新的结果”⁵³。

站在这一立场，章乃器向故宫博物院捐赠了自己收集的中国文物。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可以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典型⁵⁴。他将气功当做自身的健康法，出版了《科学的内功拳》（1928 年初版、1935 年再版）。拙作 2 中也有所介绍，在他的“自序”中，他反对将西洋和东洋=精神文明绝对性对立起来的两分法，“东方文明表面上有缺陷也不完全”，但是却认为也潜藏着重大的科学价值，诉说了“以科学方法整理文化遗产”的重要性⁵⁵。

还有一个是支持中国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形成的问题。关于这一点也如众所周知一般，从伴随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期待中国中产阶级形成的意见，再到批判这种期待，存在过各种各样的讨论⁵⁶。意见太过复杂很难在此得出简单的结论，但是从研究知识分子的立场上仅提出一个问题，希望得到诸位读者的批评指导。那就是在中国基层社会相互扶持的发展和民主化运动的关系。

在描述 1989 年的民主化运动和其镇压（“六四”）的纪录片《天安门》中，梁晓燕（1957-）如此描述⁵⁷。

民主主义的基本是个人的尊重。如果不承认个体，和你们所批判的（共产）党岂不是一样……在中国永远是这样。为了实现目的总是想要排除异己。

想要重视“当事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原则”的梁晓燕的立场很明确，她在“六四”

⁵² 比如板野长八在半世纪久以前，批判梁启超的大同思想是“内含传统之下的新兴的事物，因此在歪曲新兴事物的同时，虽然将传统观念化但是力图保存传统的体制”（板野长八“梁启超的大同思想”《东洋史论——和田博士花甲游记》讲谈社，1951 年，P84）。

⁵³ 这点是参考以在市井三郎·布川清司《传统的革命思想论》（平凡社，1972 年）里得到启示展开论述的嵯峨隆的意见（嵯峨隆《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研究》研文出版，1994 年，P4）。

⁵⁴ 故宫博物院编《捐献大家章乃器》紫禁城出版社，2010 年。

⁵⁵ 章乃器“‘科学的内功拳’出版自序”（1928 年），同前“‘科学的内功拳’再版自序”（1935 年），章立凡编《章乃器文集》（下）华夏出版社，1997 年，P32、34。

⁵⁶ 关于这一问题，无法一一枚举，再次列出高桥伸夫等编《市民社会（现代亚洲研究 第二卷）》（庆应义塾大学出版社，2008 年）。

⁵⁷ 本纪录片的导演·制作为卡玛·欣顿和理查德·哥顿，1995 年由美国 Uplink 公司发行。关于电影内容参考该电影宣传册内容介绍（P4、7）。希望能参照水羽“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饭岛涉·久保亨·村田雄二郎编《全球化和中国（系列 20 世纪中国史 第三卷）》（东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

以后，成为了中国民间环境保护“自然之友”的领导人，现在是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⁵⁸。她在“六四”后仍旧留在中国，可以说她是通过改善基层社会的生活而持续民主化运动的。

此外工人·韩东方（1963-）在电影《天安门》中说“谁都对自己的言行不负责。对此我非常痛心。所以我才率先自报姓名张嘴说话。语言是承担责任的意思表达。改变社会必须要改变自己”，他想要将个人的自律性·自主性作为行动的根本。他在美国接受身体治疗后希望返回中国国内却遭到拒绝，现在在香港从事改善劳动者待遇的运动⁵⁹。

这种民主活动家想在基层社会让自由主义者的价值得到发挥的举动，和民间的志愿团体活动⁶⁰相辅相成，可以看出不断产生中国的新变化。确实，过大评价这一变化需要谨慎。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过去日本的中国研究，比如在中日战争时期的平野义太郎等，拿西方的标准评判中国产生误读中国的可能性⁶¹。

笔者认为自由主义者的思潮在 1949 年以前存在，在 1949 年以后的大陆·台湾·香港也依旧持续，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为止对国共两党持续进行自由主义的诉求，最终被严厉镇压潜伏。也就是大陆 1957 年的“反右派斗争”，是台湾 1960 年的“雷震事件”。

但是 2014 年台湾的“向日葵运动”和香港的“雨伞运动”也许会成为中国自由主义者潮流涌出的契机。笔者也认为不能否定大陆民间社会微小的活动的发展。可以说作为一介居住在亚洲的市民，我们需要思考今后将如何评价这样的民主化的潮流，又将会和这些活动如何相关。

⁵⁸ 关于她的经历参照 <http://zh.wikipedia.org/zh-tw/梁晓燕>（2015/04/29 阅览）

⁵⁹ 关于韩东方，希望可以参照网页“中国劳工通讯”（<http://www.clb.org.hk/schi/>）。

⁶⁰ 西本紫乃“中国的民间公益活动和媒体——关于社会媒体和社会关系资本的广东省事例”《中国研究月报》第 67 卷第 3 号,2013 年。

⁶¹ 关于这一点，参照了长岡新吉《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群像》Minerva 书房,1984 年,同“平野义太郎的‘讲座派’理论轮回和亚洲认识”《经济学研究》第 34 卷第 4 号,1985 年,岸本美绪“中国中间团体论的系谱”，同编《东洋学的当地》（“帝国”日本的学知·第三卷）岩波书店,2006 年等。

围绕诉诸国联处理中国对外争端的国际关系（1920-1931）

——中国代表权问题与日本、英国、中国——

带谷 俊辅

（东京大学）

绪言

近年来，关于国联的研究进展显著。在日本，以东亚经济社会领域的活动为主的研究成果相继涌现。¹这些研究阐明了国联作为一个主体在经济社会领域内取得了一定活动成果，以及通过国联内部的讨论形成了国际性的规范和限制。另一方面，国联为国际调处争端提供了一个新的手段，但这对于东亚国际关系中“高政治（high politics）”的影响仍有待深入的考察。²即便有时争端最终未被国联受理，但在联盟框架内解决作为一个选项存在也对相关国家的外交带来了巨大影响。九一八事变前英国与中国已探讨过将中国的对外争端诉诸国联，而日本及国联秘书处也被迫予以应对。本文围绕中国的对外争端诉诸国联，分析国际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具体而言，分别考察日本、英国、中国对国联介入中国问题的态度演变过程，对比各方的逻辑，辨析其逻辑的共通性和差异如何影响了各国之间应对的协调与分歧。³

有关东亚 1920 年代“高政治”的研究中，“华盛顿体制”论的影响深远。近年的研究也认为，在东亚“华盛顿体制”代替了国联。⁴然而，也有研究指出，当时英国政府内并不存在“华盛顿体制”这一比照标准，英国与日本的协调也并不一定成立。⁵因此，本文拟对基于华盛顿条约等的列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日英关系与尝试利用国联之间的联系进行再考察。

在论及 1920 年代的中国及列强的对华外交时，除了受到国际承认并在国联拥有代表席位的北京政府外，也不可忽视与中央政府争夺正统性的国民政府的存在。1926 年国民政府开始北伐，当统治区域扩大并威胁到列强的权益后，也随之产生了在国联的代表权问题。本文揭示日本与英国以代表权问题为由否定了国联审议中国的对外争端后，两者对于该问题解决后的展望则大相径庭。此外，同时关注中国在认识到代表权问题存在后，试图采取行动保持向国联申诉权利的动向。

本文第一节考察各国对国联介入中国问题的态度演变过程，第二节至第四节分别以北伐后出现代表权问题时英国出兵上海，北伐完成前夕国民革命军与日军冲突的济南事件，及国民政府统一中国解决代表权问题后的中苏纷争及九一八事变为例，运用日本、英国、中国及

¹ 代表性研究包括后藤春美：『アヘンとイギリス帝国—国際規制の高まり 1906～43 年』（山川出版社，2005 年），安田佳代：『国際政治のなかの国際保健事業—国際連盟保健機関から世界保健機関、ユニセフへ』（ミネルヴァ書房，2014 年）。

² 作为极少的例外，参阅探讨美国外交与日美关系的 Nishida Toshihiro, “US-Japanese Relations and the Increasing Influence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in East Asia, 1927-1931”（《藝》2 号，2005 年）。

³ 关于各国的国联外交及相关个人的研究，参照海野芳郎：『国際連盟と日本』（原書房，1972 年），伊香俊哉：『近代日本と戦争違法化体制—第一次世界大戦から日中戦争へ』（吉川弘文館，2002 年），唐启华：《北京政府与国际联盟（1919～1928）》（东大图书公司，1998 年），洪岚：《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James Barros, *Office Without Power: Secretary-General Sir Eric Drummond 1919-193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311-320.

⁴ アントニー・ベスト：『戦間期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国際連盟—国際協調主義・地域主義・ナショナリズム』（□方□子，半□朝彦□：『グローバル・ガヴァナンスの歴史的変容—国連と国際政治史』，ミネルヴァ書房，2007 年）。Nishida, op. cit., pp.6-7.

⁵ 河合秀和：『北伐へのイギリスの対応—“クリスマス・メッセージ”を中心として』（細谷千博，斎藤真編：『ワシントン体制と日米関係』，東京大学出版会，1978 年），后藤春美：『上海をめぐる日英関係 1925～1932 年—日英同盟後の協調と対抗』（東京大学出版会，2006 年）。

国联的史料探讨向国联申诉的相关问题。

一、日英中对国联态度的形成

在国联刚成立后的巴黎和会上直接收回山东权益的尝试失败后，北京政府试图诉诸国联。⁶对此，日本外务省确定了拒绝的方针。外相内田康哉训令驻法大使松井庆四郎通过在行政院会议事先设定大会的议题，采取措施阻止将“对华问题”的议案提交国联。但出席大会的日本代表（驻英大使）林权助认为，如“势力范围、借款、税权、裁判权等有关中国各问题”需要相关各国协商的话，应允许提交国联讨论。关于山东问题，则与上述问题切割开，以“《凡尔赛条约》已经决定的事项”为由毋庸再议。⁷大会开幕前，经内阁会议及外交调查会决定，内田发出训令，要求对华关系方面仅提及山东问题，宣称此为“在公正基础上确定的事态”以阻止中方的提案。⁸此时，日本在国联全面排除“对华问题”的方针尚未固定下来。

英国在国联大会开幕前，也就应对措施进行了讨论。外交部远东司官员兰普森（Miles Lampson）认为 1917 年英日有关山东权益的密约曝光后，造成了 1919 年抵制英国的危险及损害了国家形象，中国诉诸国联时英国将遭受更多批评，此举并不明智。远东司长韦尔斯利（Victor Wellesley）则担心如在向国联申诉问题上支持日本，“英国的在华权益或有可能陷入极为危险的境地”。⁹

而在大会的各国代表中，鉴于英国与日本的密约以及巴黎和会中英国的举动致使其在华威信下降，英国确定方针为“必须避免所有试图阻挠中国在具公平资格的国联，至少获取公正的听证会的行动”。¹⁰另一方面，大会代表的枢密院议长贝尔福（Arthur Balfour）表示，如同意诉诸国联“我们在日本的威信必将完全丧失”，担忧此举有损日英同盟关系。¹¹但外交部明确表示将坚持不妨碍中国诉诸国联的方针。¹²

然而，英国的决断略显来迟。中国的国联大会代表顾维钧此时已决定暂不将山东问题提交国联。顾维钧认为无法期待各国的支持，应待美国加入国联后再行提出。¹³在无奈放弃申诉后，顾维钧等认为国联是“数大国”把持的外交机关，降低了对它的期望值。¹⁴而山东问题也于约一年后华盛顿会议举行之际，在英美观察员列席下通过中日直接交涉得到解决。¹⁵

尽管如此，华盛顿会议后仍存在国联介入中国问题的可能性。1923 年 5 月津浦铁路遇袭，众多英美乘客被劫持的临城事件发生后，英国曾提出铁路警察的国际共管方案，但遭到了日本的反对。¹⁶

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韦尔斯利认为，日本“在华推行的政策基本上完全违背九国公约的原则”，且并不期望出现“强大统一的中国”，鉴于其无意真正与其他列强展开合作，因此

⁶ 唐启华，前引书，第 69-96 页，川岛真『中国近代外交の形成』（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 年），第 259-264 页。

⁷ 外相内田康哉致驻法大使松井庆四郎，1920 年 9 月 7 日，驻英大使林权助致外相内田康哉，1920 年 9 月 26 日收（《国际联盟总会第一回》第一卷，2.4.2.20-1，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

⁸ 《閣議決定》，1920 年 11 月 9 日（『日本外交文書』，[以下略称为《日外》]，大正 9 年第 3 册上卷），第 273-279 页。

⁹ Minute by M. W. Lampson, November 10, 1920; Minute by V. Wellesley, November 10, 1920, F2697/33/10, FO371/5321, The National Archives, Kew（下文所引 FO371 及 CAB 档案均藏于 The National Archives）。

¹⁰ M. Hankey to Balfour, Fisher and Barnes, November 26, 1920, F2871/33/10, *ibid.*

¹¹ Brigadier-General Wilson to Curzon, November 19, 1920,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First Series, vol. XIV, pp.185-186.

¹² “Foreign Office Memorandum respecting the Shangtung Question”, December 8, 1920, *ibid.*, pp.192-193.

¹³ 《收法京顾代表电》，1920 年 11 月 8 日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日关系史料—山东问题》上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 年），第 288 页。

¹⁴ 《国际联合会全权代表函一件》，1921 年 2 月 6 日收，03-38-007-01-041（外交部档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台北[以下略称为外交部档案]）。

¹⁵ 服部龙二『東アジア國際環境の變動と日本外交 1918-1931』（有斐閣，2001 年），第 99-102 页。

¹⁶ 酒井一臣『近代日本外交とアジア太平洋秩序』（昭和堂，2009 年），第 179-185 页。

无法期待“盛顿政策”的实效性。而作为跨越日本的干扰与中国民族主义这双重阻碍的方法，韦尔斯利提议“将中国的外交事宜置于国联的庇护之下”，以保障中国不受其他列强侵略。其考虑如以某个具体问题为契机促成中国的申诉，也许不会与非国联成员国的美国产生太大的隔阂。助理常务次官泰瑞尔（William Tyrrell）对此也表示赞成，指出只须施以巧妙的操作，美国应不会提出反对。¹⁷

另一方面，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Ronald Macleay）指出，出于民族主义、因山东问题对国联的失望、强烈的亲美倾向等因素，中国主动同意接受国联保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预测一旦遭受列强中某国的侵略，中国或许将诉诸国联寻求保护。¹⁸此时英国已设想日英协调不一定成立，且“华盛顿政策”也不奏效的情况下，开始考虑在国联处理中国问题的可能性。

然而，该时期日本与中国却因科孚岛事件这一看似与东亚毫无关联的事件改变了对国联的认识。1923年8月，由“协约国大使会议”派出的划定希腊·阿尔巴尼亚边界的意大利委员及其数名随从在希腊境内遭到杀害。为此意大利向希腊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道歉赔偿，并处以凶手死刑，但遭到拒绝，因此侵占了希腊的科孚岛。希腊依据国联盟约第11条与第15条于9月1日诉诸行政院，当时的行政院主席正是日本驻法大使石井菊次郎。行政院决定采取与“协约国大使会议”合作的方针，但在大会上小国纷纷批评意大利的行动与行政院的决定。尽管石井不认可意大利的行动，但其指出“难保与中国相邻的日本不会采取近乎意大利之举的态度”，认为不应站出来批评意大利。最终当事国双方接受了“大使会议”提出的解决方案，行政院也予以承认，该事件得以平息。¹⁹

身为国联行政院主席，石井在审议科孚岛事件的过程中，一直遭受了来自大会各小国的批判和压力。正如石井所指出的，日本在对华关系方面有可能面临与意大利相似的立场，届时也将会陷于被小国批判的境地。石井这一深刻的担忧也在后述的“济南事件”中得到了佐证。

与此同时，国联大会的中国代表也注意到国联行政院作出了干预的表示，以及40多个国家参加的大会从旁“监视”，促使成功解决科孚岛事件。²⁰

对于国联大会“监视”作用的高度评价，直到1926年大会上中国在处理与列强的对外争端时也有所提及。1926年9月因四川军阀杨森扣押英国轮船，发生了英国军舰炮轰四川省万县街市的万县事件。中国驻国联大会代表为推动解决该事件，9月24日在大会演说中公开宣布了万县事件的经过及受害情况。在随后发往本国的报告中也称，国际舆论“足为我国交涉之后援”。²¹可见中国将国联大会视为表达、形成国际舆论的场所，试图利用此获取支持，以争取交涉对己方有利。中国的国联外交，开始朝着日本所担心的方向发展。

二、英国出兵上海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出现

自1926年下半年起，中国及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随着国民政府的统治区域逐渐扩大并逼近华中，也威胁到列强的权益。另一个变化是北京关税会议失败后，英国的对华政策开始放弃与日美的协调，转为单边主义。²²关于北伐，英国在后述致国联的公函中，指出广东政府“认为不受中央政府的代表在华盛顿缔结条约之制约”，且主张其统治了长江以南的广大区域，应作为全中国唯一政府受到承认的事实，“更改了基于华盛顿政策的前提条件”。²³但这与日本的想法大相径庭，日本外务次官

¹⁷ Minute by V. Wellesley, January 23, 1924; Minute by W. Tyrrell, F83/83/10, FO371/10258.

¹⁸ R. Macleay to MacDonald, April 15, 1924, F1914/237/10, FO371/10274.

¹⁹ 国联大会代表致外相伊集院彦吉，1923年9月23日，驻希腊临时代理公使诸井六郎致外相伊集院彦吉，1923年9月27日（《日外》大正12年第三册），第380-382页，第382-392页。

²⁰ 《续陈第四届大会会议议希等案各情》，1923年11月2日收，03-38-010-01-012，外交部档案。

²¹ 《联合会代表处函一件》，1926年9月19日收，03-38-033-01-006，《收日来弗朱王代表电》，1926年9月26日收，03-06-034-02-007，《国际联合会第七届临时报告》，1926年10月24日收，03-38-033-01-012，外交部档案。

²² Richards S. Grayson, *Austen Chamberlain and the Commitment to Europe: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24-1929*, Frank Cass, 1997, pp.174-187. 河合秀和，前引论文。

²³ A. Chamberlain to E. Drummond, February 8, 1927, F1203/115/10, FO371/12443.

出渊胜次认为“依我看来，华盛顿会议当时的中国与如今的中国并无太大差别”。²⁴而这种列强之间协调关系的瓦解，正如英国外相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所称，“若中国寻求国联的帮助，我将押注于协调解决的方向，不幸的是列强之间最初就存在分裂，此后也将不断持续”，从中可知国联干预的可能性原本是存在的。²⁵

国民政府于1927年1月1日迁往武汉，1月3日与6日分别在群众运动的支持下收回汉口与九江的英租界。英国担心这一风潮也将会波及上海的公共租界，在内阁的主导下，英国政府经1月17日的内阁会议，决定派遣13000多人的军队赴中国。²⁶

英国外交部内负责国联政策的官员本廷克（Victor Cavendish-Bentinck）在内阁会议的决定出台前，已指出不可依赖美国，与华盛顿条约各签约国的协调也“不合时宜，步调参差”，提议为在国内外争取“道德上的支持”，可诉诸国联，或退而求其次向行政院发送声明。远东司官员格瓦金（Frank Ashton-Gwatkin）也在内阁决定出兵后，设想一旦与国民政府的交涉决裂应向国联申诉。尽管如此，既然派兵为内阁决定，最理想的情况自然是英国的行动尽可能不受限制。外交部法律顾问赫斯特（Cecil Hurst）建议，如根据国联盟约第11条第2项率先将问题提请行政院或大会注意，且不要求具体措施的话，不仅可以避开来自国内外所谓侵犯中国主权的批判，英国的行动也不会受到阻挠。赫斯特认为不要求具体措施，即不会产生遵守该措施的主体该为北京政府或国民政府的问题，也就不会涉及政府承认的问题。进而即使英国的政策在行政院遭到责难，赫斯特乐观的认为行政院负有保护英人在上海的财产及生命安全的义务，也可缓和外界的批评之声。由此可见，英国外交部未充分认识到诉诸国联将会威胁到英国在上海的权益。上海的公共租界原来就是列强之间通过合作实现“国际”共管的场所，英国如对在国联的发言权具有自信，就不会特别反对交给国联审议。远东司长莫塞（George Mounsey）虽然也认可诉诸国联的利处，但强调这与国民政府逐一与列强交涉的倾向背道而驰，预测国民政府将会反对。²⁷

另一方面，负责国联政策的兰卡斯特公爵领地总裁塞西尔（1st Viscount Cecil of Chelwood）则态度消极，其指出“仅就我们而言，如能将争端交至日内瓦自然有利”，“但在日内瓦唯一代表中国的政府是与我们无任何严重争端的北京政府，将我们与广东（国民政府）的争端诉诸国联的提议恐怕不会令陈友仁及其同志满意”。塞西尔点出国民政府与北京政府各自为政，一方与各有重大争端，另一方却又在国联代表中国，由此产生了代表权问题。塞西尔建议在向行政院公开的前提下，致函国联秘书长德鲁蒙德（Eric Drummond），声明“如有合适机会，英国愿意随时主动接受国联的斡旋”。²⁸

在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代表的原则下，塞西尔的主张具有说服力。而这一措施无疑也不妨碍英国出兵。因此英国政府采纳了塞西尔的提案，1月26日的内阁会议上全体阁员就“驻日内瓦的是北京政府代表，广东政府未被列强承认，依据此事实可见按盟约各条款诉诸国联并无益处，恐怕也会给行政院造成困扰”的认识达成一致，决定向国联发表声明，解释英国的政策。²⁹

2月8日，英国政府以外相张伯伦的名义向国联秘书长德鲁蒙德发出公函。除了提及英国政策因上述“华盛顿政策”的更改而转变外，还声明“对于解决中国的困难有待国联的援助，但又束手无策的现状，英国政府感到十分遗憾。然而如有要求国联斡旋的机会出现，英国随时乐意加以利用”。³⁰同时，塞西尔在致德鲁蒙德的私信中叮嘱，只要北京政府在国联拥

²⁴ 『对支新政策ニ関スル英国政府覚書ニ付キ英国大使出淵次官来訪ノ件』，1926年12月24日（《日外》大正15年第2册下卷），第1183页。

²⁵ 关于国联调停中国内战可能性的意见。Minute by A. Chamberlain, January 10, F65/65/10, FO371/13198.

²⁶ 后藤春美，前引『上海をめぐる日英関係』，第98-105页。

²⁷ Minute by V. C. Bentinck, January 5, 1927; Minute by F. Gwatkin, January 18, 1927; Minute by C. Hurst, January 24, 1927; Minute by G. Mounsey, January 25, 1927, F115/115/10, FO371/12443.

²⁸ R. Cecil to A. Chamberlain, January 25, 1927; Minute by R. Cecil, January 26, 1927, ibid.

²⁹ Cabinet 4(27), January 26, 1927, CAB23/54.

³⁰ 同注23。

有代表权，“作为中国唯一的政府，……你不能同广东政府进行交涉”。³¹

英国同时也对代表权问题解决后的前景进行了展望。对于法国提出由国联进行调停的建议，英国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如法国认为能够克服这些困难，也不排斥交付国联”。³²在此基础上，外相张伯伦解释称，“如由国联应对、行政院作出劝告后，接受并履行该决定的中国政府存在时，无论何时英国原则上绝不排除国联的介入”。³³具体而言，张伯伦表示“若法国政府认为南北政府可采取统一行动，由国联受理该问题，英国将十分放心”，设想通过南北双方的协调行动解决代表权问题。³⁴

北京政府于1月31日向英国驻华公使兰普森抗议，指出英国的出兵违反了国联盟约第10条与华盛顿会议的决议，中国驻法公使兼国联代表陈篆也提出了书面抗议。³⁵此外，当时在行政院担任理事一职的中国驻意公使朱兆莘公开宣称自己代表北京政府与国民政府双方，反对中国代表在国联内的职能受到限制。但是，其声称即便处于内战对外问题方面中国仍保持统一的主张，仅仅被视为中国外交官向国民政府改换门庭的前兆而缺乏说服力。³⁶实际上，原为国民党员的朱兆莘在当年7月即公开声明脱离北京政府，试图以南京国民政府代表的身份参加国联行政院会议与全体大会。³⁷

以秘书长德鲁蒙德为首的国联秘书处认可了英国致公函声明的手段。但国联事务次长、意大利人巴隆尼（Giacomo Paulucci di Calboli Barone）在承认英国的方法“无疑是特定情况下的明智之举”的同时，也对其适用于一般论表示了担忧。³⁸德鲁蒙德秘书长在同一时期也从“国联的普遍性”这一“基点”出发，表示“与现在的欧洲相同，数年后这种重要的政治活动极有可能在太平洋发生”。³⁹英国发表声明的手段，产生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特定情况”而受到赞许，如该问题得以解决，“普遍性”这一国联的基本原则将更受重视。尤为重要的是，虽然指出代表权问题的存在，但英国自身也表示，如该问题解决并不介意主动将中国问题诉诸国联。

四、“济南事件”与中国代表权问题

在英国之后，日本也再次面临着与中国的争端被诉诸国联的可能性。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山东半岛后，日本为保护当地侨民出兵济南，5月3日爆发了日军与国民革命军武力冲突的“济南事件”。⁴⁰

南京国民政府5日召开临时会议确定了外交解决的方针，其中之一即按照盟约第10条及第11条，要求召开行政院会议。⁴¹5月10日，国民政府谭延闿主席致电国联秘书长德鲁蒙德，要求根据盟约第11条第2项召开行政院会议，进行国际调查或国际公断。⁴²

³¹ R. Cecil to E. Drummond, February 24, 1927, Add.51111, Cecil of Chelwood Papers, British Library, London.

³² Cabinet 9(27), February 10, 1927, CAB23/54.

³³ A. Chamberlain to Crewe, February 24, 1927, F1802/2/10, FO371/12402.

³⁴ A. Chamberlain to Crewe, February 15, 1927, F971/2/10, FO371/12400.

³⁵ 《英国政府派遣重兵来华与华府会议之各议决案及国际联盟会盟约之精神相背特提出抗议请速撤回以固邦交照会》，1927年1月31日，沈云龙编：《外交公报》第67-68期（文海出版社，1987年），第67期，政务第1-2页。《晨报》（影印版，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1927年2月9日，第40分册，第253页。

³⁶ *Daily Telegraph*, February 14, 1927; *Morning Post*, February 14, 1927 (F1563/115/10, FO371/12443).

³⁷ 朱兆莘回国后，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唐启华，前引书，第173页。

³⁸ Minutes of the Directors' Meeting, April 13, 1927, Directors' Meeting Papers and Confidential Circulars 1927, League of Nations Archives, Geneva（以下略称为LNA）。

³⁹ Note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March 24, 1927, Confidential Circulars 13. 1927, ibid, LNA, 关于国联的“普遍性”问题，参阅带谷俊辅：『“普遍的”な国際連盟の模索—1926年の理事会拡大改革とチャコ紛争（パラグアイ・ボリビア紛争）』《国際関係論研究》第30号，2013年）

⁴⁰ 服部龙二，前引书，第202-207页。

⁴¹ 周美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3 民国17年4月至7月》（国史馆，2003年），1928年5月6日，第281-282页。

⁴² 《国民政府主席为日军在济南启衅通告国际联盟会要求国际调查公断电》，1928年5月10日发，中华民

但此时在国联代表中国的仍为北京政府，并非南京国民政府。原为日本外交官的国联事务次长兼政务部长杉村阳太郎效仿英国的先例，利用了这一情况。杉村与德鲁蒙德协商后，一致同意“南京政府未得到国联的正式承认，因此手续上无法受理作为非国联成员国的该政府申诉”。同时，德鲁蒙德劝说日本向国联发表声明，杉村也接受其建议，向日本驻国联的秘书长佐藤尚武转达“认为应当像英国政府以前出兵中国时一样，进行公开宣告”，可见杉村明确参考了英国出兵上海时采取的措施。⁴³

与其他列强一样，英国外相张伯伦以“行政院的中国代表持有北京的任命书”为由对国联受理表示了怀疑的态度，英国驻华公使兰普森也向本国政府进言，指出“与统一政府对立的政治派别拥有申诉的权利”，将会给全世界带来负面的影响。法国外交部同样认为国民政府“还未受到各国的承认”，不应受理其申诉。⁴⁴藉口代表权问题已有上一年英国的先例，同时“手续问题”也可解释为非带有政治意图，因此国联秘书处与英法之间迅速容易达成一致。

另一方面，杉村也报告称“如行政院的中国代表转达南京方面的要求，行政院将不得不讨论该问题”，这与日本驻法大使安达峰一郎的看法不谋而合。即日本认识到如无“手续方面”的问题，将无法驳回中国的申诉。⁴⁵如上所述，这与上一年英国的明确表态相同，如南北两政府采取统一行动，国联将受理该问题。

而实际上南北双方也试图进行合作以实现诉诸国联。北京政府外交部条约司5月10日参照国联处理争端的先例（包括成功实现撤兵的科孚岛事件），要求依据盟约第10条、第11条提出申诉。此举旨在“我国领土主权得藉世界公论加以保障”。⁴⁶

当5月10日国民政府向国联申诉的消息传到北京政府后，诉诸国联又附加了另一层意义。5月9日刚刚执掌北京政府的大元帅张作霖以内乱影响到外国人，导致发生外交问题为由，通电发表停战宣言。⁴⁷北京政府外交部结合停战宣言与原先探讨的向国联申诉，将张作霖的通电解释为“对外合作”精神的体现，主张应与国民政府“一致对外”诉诸国联。⁴⁸对政权岌岌可危的北京政府而言，为解决代表权问题共同在国联申诉成为实现和平的大义名分。

当时，国民政府的要人胡汉民、伍朝枢、孙科、王宠惠等人均在欧洲。他们于5月12日致电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命驻法公使陈篆向国联申诉。⁴⁹北京政府外交部长罗文干就此回电称，如张作霖停战宣言所示要求早日实现和平与合作。⁵⁰但因胡汉民坚持以张作霖退出关外为条件，交涉遂无下文。⁵¹而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也要求张作霖退回东北的同时，继续进军直逼京津。⁵²停战最终未能实现，“一致对外”诉诸国联一事也未有进一步的进展。

日本政府5月28日按照杉村的忠告，向国联秘书处提交了声明。其内容是完全主张日本在出兵及武力冲突过程中的正当性，控诉国民革命军方面的暴行，也未有对今后的国联政策

国重要史料初编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绪编（1）》（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40-141页。

⁴³ 《济南事变》及相关附件，国联事务次长杉村阳太郎致国联帝国事务局长佐藤尚武（附件第4号），1928年5月11日，杉村致佐藤（附件第5号），1928年5月11日（『国际联盟事務局關係一件 東京支局關係 杉村次長報告集』，B.9.1.0.4-4-1，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第1-16页。

⁴⁴ Minute by A. Chamberlain, May 12, 1928, F2327/65/10; M. Lampson to F. O., May 18, 1928, F2494/65/10, FO371/13198. 『事件と国际联盟』（『松本記録 支那内乱關係一件 国民軍ノ北伐關係 帝国ノ出兵撤兵關係』第11節，松A.6.1.5.1-2-9，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第134-135页。

⁴⁵ 前引《济南事变》，第2页。前引『事件と国际联盟』，第138-139页。

⁴⁶ 《国务会议案》，1928年5月10日，03-33-182-02-173，外交部档案。

⁴⁷ 《晨报》（影印版），1928年5月10日，第45分册，第392页。

⁴⁸ 《致保定张杨军团长电》，1928年5月12日发，03-33-182-02-068，外交部档案。

⁴⁹ 《收法京来电》，1928年5月13日收，03-33-182-02-087，外交部档案。

⁵⁰ 《晨报》（影印版），1928年5月15日，第45分册，第442页。

⁵¹ 胡汉民：《在法交涉山东事件之经过及其他》，1930年9月1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19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57年），第1395-1397页。

⁵² 《事略稿本3》，1928年5月12日，第322-330页。

进行任何展望。⁵³

杉村报告中指出，“不排除南方在北京成立中央政府，获得各国承认后将济南问题等提交行政院的可能性”，预测国民政府或将直接取代北京政府，并派遣代表继承在国联的席位。杉村认为如届时中国根据盟约第 11 条第 1 项要求国联介入，预计行政院“将不得不采取某种措施”。作为应对之策，杉村考虑召开北京公使团会议或九国公约会议，并认为“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从法律上确定了中国问题的根本原则”，这也是九国公约会议凌驾于国联的依据所在。⁵⁴杉村的目的在于通过华盛顿条约确立的列强之间协调关系使得国联徒具形式，但其认为的列强协调关系在此时是否真正存在呢。

英国外交部内部担忧在国联受理山东问题可能波及到满洲，从而与日本形成敌对关系。⁵⁵如按照这种论调推动对日协调，杉村的设想则有可能实现。但远东司长莫塞认为除了对日关系，“有必要同等慎重的处理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因此“对于申诉国联的问题，必须小心翼翼的处理，避免主导一切所有可能导致与任何一方为敌的做法”。⁵⁶当以手续问题无法再阻止国联受理中国申诉时，英国的这一态度对日本毫无裨益。在南京国民政府尚未统一中国，也未得到各国承认的阶段，英国外交部也未将对日关系摆在优先地位，可见杉村寄望的协调关系明显不存在。

五、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消除至满洲事变

1928 年 6 月北京政府瓦解，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宣告北伐完成。中国实现统一，南京国民政府也成功得到国际上的承认，并获准派代表参加 9 月召开的国联大会。⁵⁷由此代表权问题不复存在。

日本深恐 9 月的大会上或有可能提及济南事件。在接受石井菊次郎的授课后，昭和天皇表示，科孚岛的例子是“大国威逼小国”的结果，“导致了极其麻烦的局面”，并称“必须好好的参考意大利的先例”，可知科孚岛事件的教训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反响。⁵⁸

尽管杉村也要求“由东京方面制定对策”，但日本政府并未采取有效的对策。⁵⁹具体而言，出席国联大会的代表通常全部是由三名驻欧洲的大使或公使组成，充其量只是将其中一名改为由原递信大臣、贵族院议员藤村义朗担任。⁶⁰

当时，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 7 月在南京会谈之后，围绕交涉“济案”的地点，日中双方争执不下，⁶¹8 月 30 日王正廷发表声明，表示日本如不急于解决将向国联大会申诉。同时，大会的中国代表、驻比利时公使王景岐向日本驻法大使安达峰一郎暗示，中日间交涉如无令人满意进展，受舆论影响，将不得不采取某些措施。⁶²但由于诉诸国联将导致中日已开始的直接交涉受阻，国民政府只是虚张声势，旨在推动交涉取得进展。

虽然避免了在国联大会上提及济南事件，但作为随员与会的日本驻捷克斯洛伐克公使木村锐市指出，大会“作为小国对抗大国的机构实际上确有意义”，由于小国的代表“在是非

⁵³ 『濟南ニ於ケル日支兩國軍隊衝突事情』，1928 年 5 月 28 日公布（《日外》昭和期 I 第 1 部第 2 卷），第 384-389 页。

⁵⁴ 前引『濟南事变』，第 60-64 页。

⁵⁵ Minute by F. Gwatkin, May 22, 1928, F2524/65/10, FO371/13198.

⁵⁶ Minute by G. Mounsey, May 22, 1928, ibid.

⁵⁷ 入江启四郎『国連の中華人民政府容認問題』（『アジア研究』第 1 卷第 1 号，1954 年），第 30-36 页。

⁵⁸ 『覚え 八月十四日記ス』，『支那問題其他秘密書類』所收（『牧野伸顯関係文書』R32，文件部分第 460，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所藏）。就该笔记的背景，参阅柴田绅一：『昭和期の皇室と政治外交』（原書房，1995 年），第 16-23 页。

⁵⁹ 前引『濟南事变』，第 27 页。

⁶⁰ 神山晃令『史料紹介 昭和 3 年 10 月 11 日付吉田茂宛佐藤尚武意見書』（《外交史料館報》第 25 号，2012 年）。

⁶¹ 白井勝美『濟南事件交渉経緯』（『外交史料館報』第 3 号，1990 年），第 4 页。

⁶² 《时报》（上海）1928 年 8 月 31 日。国联三全权致外相田中义一，1928 年 9 月 13 日（『日外』昭和期 I 第 2 部第 2 卷），第 241 页。

问题上均明确同情中国，反对日本”，因此再次提醒“尤其是中国问题，绝对不应在国联全会上进行讨论”，必须避免重蹈意大利的覆辙。⁶³但据大会代表观察报告称，“今后长期不将中国问题列入全会的议程或将不再可能”，无疑已预感坚持阻止申诉的举措将不再奏效。⁶⁴

之后 1929 年的中苏“中东路事件”使得中国再次面临是否向国联申诉的局面。为强行收回中东铁路，中苏之间关系紧张，并发展为断交及军事冲突。⁶⁵11 月 7 日苏军发动大规模攻击大败中国军队后，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依据盟约第 11 条与第 17 条向国联申诉。⁶⁶但经驻外公使们与所在国首脑接触，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英国外相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均以苏联非国联成员国为由表示了反对意见。币原认为，预计苏联将无视国联的要求，既然不能采取强制措施，只有“劝告尝试进行直接交涉”。而翌年国联秘书长德鲁蒙德的备忘录也采取了几乎同样的表述。⁶⁷从他们的逻辑出发可以看出代表权问题已然消失，其态度消极的理由转为了非国联成员国问题。

同时，英国政府内部存在着呼吁国联积极干预中苏纷争的声音。在英国外交部裁军仲裁委员会上，身为委员长的塞西尔表示，中苏交涉失败时不仅不应阻挠中国向国联申诉，英国应根据盟约第 11 条主动在行政院上加以讨论。而外交政务次长达尔顿（Hugh Dalton）发言称，鉴于英国与苏联的历史关系，应鼓动斡旋中苏交涉的德国将此事提交行政院为佳，这一意见也得到了委员会的一致赞成。⁶⁸与决定出兵上海时不同，塞西尔认为中国代表权问题既然已不存在，国联就应进行干预。但中国并未诉诸国联，12 月 3 日东北方面与苏联签署协议，决定将中东铁路恢复原状。⁶⁹

那么，在代表权问题不存在的情况下，中国与国联成员国发生争端时又如何进行申诉呢。接下来以 1931 年的满洲事变为例进行分析。

1931 年满洲事变爆发后，日本驻国联行政院代表芳泽谦吉及杉村试图通过提交“备忘录”的手段避免将该问题“公然诉诸国联”。这也沿袭了英国出兵上海、日本在济南事件时采取的做法。外相币原也指示“务求设法不发展为国联的问题”。⁷⁰但代表权问题消失后，照搬以前同样的手法是否仍可行呢。19 日在行政院主席国西班牙的要求下，日本不得不在会议一开始即发表声明。⁷¹

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 9 月 19 日致电驻国联代表施肇基，要求正式将该问题提交国联。施肇基于 21 日依据盟约进行了申诉。蒋介石也于 21 日的紧急会议上称，“此时惟有诉诸公理”，支持提交国联。⁷²

在顾维钧试探英国对诉诸国联及九国公约成员国的反应时，驻华公使兰普森表示“中国的申诉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尽管其顾虑日英关系而拒绝由英国主导申诉，但与济南事件

⁶³ 日本驻捷克斯洛伐克公使木村锐市致外务省次官吉田茂，1928 年 10 月 1 日（『國際連盟帝國事務局關係一件（国际会议帝国事務局）人事關係』，B.9.1.0.5-1，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木村直到上一年一直担任外务省亚细亚局局长。

⁶⁴ 国联大会全权致田中，1928 年 9 月 28 日（『國際連盟總會關係一件 第 9 回總會關係』第 1 卷，B.9.1.0.2-9，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

⁶⁵ 服部龙二，前引书，第 255-263 页。

⁶⁶ 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市档案馆编：《蒋作宾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年），1929 年 11 月 25 日，第 117 页。

⁶⁷ 『露支紛争ニ関スル幣原外務大臣、汪支那公使会談要録』，1929 年 11 月 17 日（『日外』昭和期 I 第 1 部第 3 卷），第 388-390 页。A.Henderson to M. Lampson, November 29, 1929, F6217/3568/10, FO371/13955. Note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February 27, 1930, 1A-19175-13390, R1852, LNA.

⁶⁸ Minutes of the Sixth Meeting of the Foreign Office Committee on Disarmament and Arbitration, December 3, 1929, W11415/50/98, FO371/14116.

⁶⁹ 服部龙二，前引书，第 261 页。

⁷⁰ 国联行政院代表芳泽谦吉致外相币原喜重郎（第 45 号），9 月 20 日收，芳泽致币原（第 46 号），9 月 20 日收，币原致芳泽，9 月 21 日（《日外》满洲事变第 1 卷第 3 册），第 152-153 页，第 156-157 页。

⁷¹ 芳泽致币原（第 48 号），9 月 20 日收（同上），第 153-154 页。中国也同样发表了声明。

⁷² 《外交部致日内瓦施代表等电》，1931 年 9 月 19 日发，《蒋主席招集会议决定对日方略记事》，1931 年 9 月 21 日，《我驻日内瓦施代表照会国际联合会秘书长》，1931 年 9 月 21 日发，《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绪编（1）》，第 321-322 页，第 280-281 页，第 323-324 页。

时不同，并不反对中国申诉之举。⁷³英国外相雷丁（1st Marquess of Reading）得知中国提交国联后，作为受理申诉的当然前提，指示身在日内瓦的塞西尔批准国联提出的撤兵要求及派遣观察员的方案。⁷⁴22 日国联召开行政院会议并发表主席宣言，敦促日中两国保持克制毋使事态进一步恶化，表示将努力实现两国撤兵。⁷⁵由于国联的初始反应迅速，受理中国的申诉本身并未成为讨论焦点。

结语

至 1920 年代中期，日本、英国、中国各自确定了向国联申诉中国问题的态度。英国的方针是阻挠中国诉诸国联，避免自身的在华权益受到侵害，由其主动积极推动在国联框架下解决也是选项之一。而这一态度的延续也出于对日本以及“华盛顿政策”的不信任。另一方面，日本在科孚岛事件后，亲眼目睹了小国在国联大会上对意大利的猛烈批评，从而加深了对国联的警惕感。中国（北京政府）则一直将国联视为大国中心的机构，科孚岛事件后也意识到其作为表达、形成国际舆论场所的意义。

然而，随着北伐的进展，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出现一度改变了这一格局。并非与列强存在严重争端的国民政府，而是统治区域有所缩小的北京政府拥有国联代表席位的事实，使得在维持一国一政府的原则下，很难将中国问题提交国联讨论。英国出兵上海时指出了该问题，并将其作为不向国联申诉的理由，国联事务次长杉村也仿效英国，在济南事件后成功阻止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申诉。日英通过运用同一逻辑，在应对上出现了暂时的合作。

但代表权问题本身在北京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合作以及中国实现统一后自然消失。此时英国已预先明确了支持向国联提交中国问题的态度。英国没有强词夺理以加深与日本暂时的合作，在该问题上日英未达成协调。而统一中国后的南京国民政府以诉诸国际舆论及“公理”为目的积极地向国联申诉。日本政府在既无法未依靠列强之间的协调，又找不到可代替代表权问题逻辑的情况下迎来了满洲事变。

（薛轶群 译）

⁷³ Killearn Diaries, September 19, 1931, Middle East Center Archive, St. Antony's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 Oxford.

⁷⁴ Cabinet 62(31), Septembet 22, 1931, CAB23/68.

⁷⁵ 芳泽致币原（第 68 号），1931 年 9 月 23 日收（『日外』满洲事变第 1 卷第 3 册），第 167-168 页。

绿洲项目调查记录

——探索生活在大漠里的蒙古族人的水资源利用

小长谷 有纪 秋山 知宏

(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

I.项目的开端

1.初访极度干旱地区

好热！不，与其说是热，倒不如说是喉咙发干。回到旅馆买来冰水，立起塑料瓶一口气灌下。冰水在口中一刻也不停留，通过喉咙直达胃部，水的可贵瞬间渗透了五脏六腑。这里是位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¹西端的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下文简称额济纳），当地人的发音听起来则更像是额则内（译者音译），亦或是额吉内（译者音译）。我们先来看看地图吧。图1是一张将世界上的干旱地带（表1）按照干旱程度一分为四的地图。我们的调查地额济纳位于欧亚大陆的中部。在划分出的四个干旱度中，额济纳属于极度干旱地区。绘制这张世界地图的是秋山知宏君。2002年6月，我们一同调查了居住在这片干旱大地上的蒙古族人的水资源利用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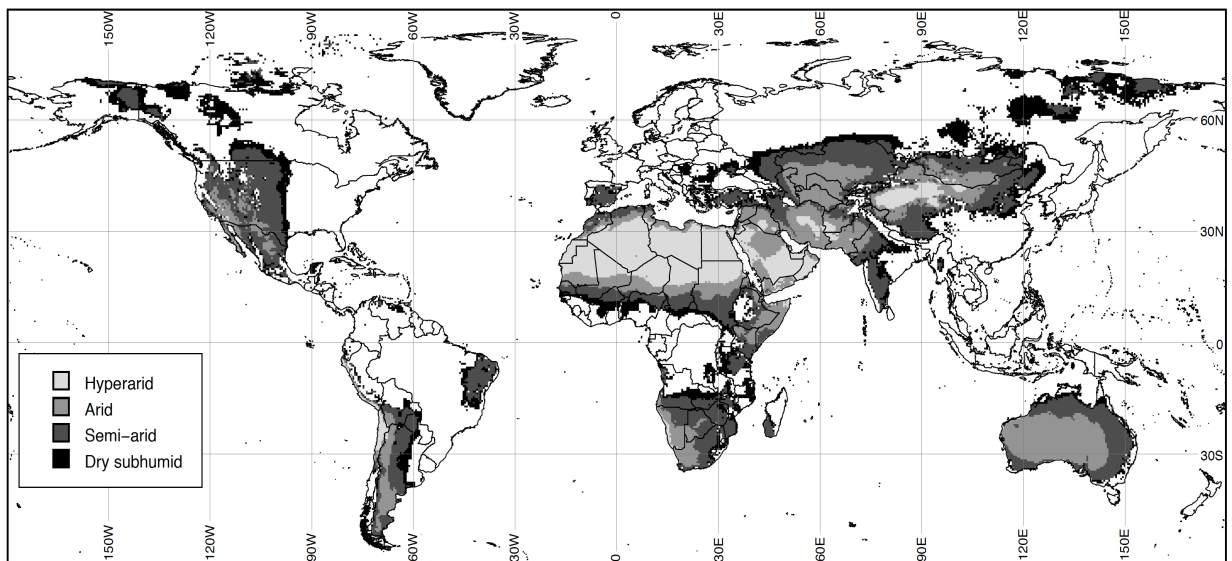


图1：世界干旱地带的分布（依据 Trabucco and Zomer（2009）Global Aridity Index 数据绘制）

表1：干旱地带的世界分布

根据联合国环境计划（UNEP）的定义，按照年平均降水量和潜在蒸发量的比值，可将干旱地带划分如下。

¹ 中国的行政区划一般按照省、市、县、乡(镇)划分，而内蒙古的一些地区则沿用了清朝划分游牧民的名称——盟、旗。盟的中心地带为县级市，旗的中心地带则为苏木(镇)。另外，近年来盟辖区整体升级为地级市，经济发展得以推进的同时民族自治程度逐渐变小。

极度干旱地区	降水不规律，有些年份完全无降水。几乎看不到植被的沙漠地带。占干旱地带总面积的 16%。
干旱地区	多为年降水量低于 200 毫米的区域，降水量的年变动率为 50~100%。占干旱地带总面积的 25%。
半干旱地区	夏雨型地带年降水量大多低于 800 毫米，冬雨型地带年降水量大多低于 500 毫米。降水量的年变动率为 25~50%，草原多生，高气温地带生有灌木林。占干旱地带总面积的 38%。
干旱半湿润地区	具有分明的雨季，降水量的年变动率低于 25%。植被较为丰富，高气温地带生有常绿灌木林，低气温地带则呈阶梯状生长。

四种类型合计所得的干旱地带面积为 61.5 亿公顷，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比例高达 47%。

如图 1 所示，北纬 60 度至南纬 54 度之间的大陆都存在着干旱地带。

秋山君当时是名古屋大学的研究生，专门研究干旱地区的水循环。所谓水循环是指雨水降至地表后，经由地表和地下流入大海，蒸发成云再次变为降雨这一连串水在地球上的运动过程（图 2）。而我一直在做蒙古高原游牧民的生活方面的研究。这次调查可谓是文化人类学与水文学²的“文理融合”。我在给第一次在蒙古族聚居区开展实地调查的秋山君做翻译的同时也开始了我们的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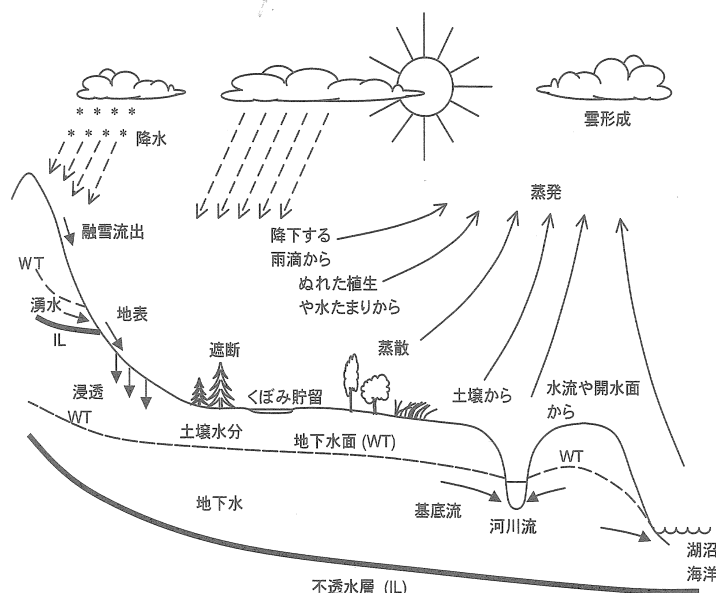


图 2: 水循环概念图（引自杉田, 2008）

除了我和秋山君，中国社会科学院³的色音老师和张老师也作为整个调研的协调人参加了调查。托他们的福，我从准备工作中解脱出来，得以把精力集中到秋山君关注的水井调查上来。

连日以来持续着 40 度以上的酷暑天气。以至于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酷热不已。尽管我一直以来都在这比日本更为干旱的蒙古高原上进行调查，然而当时的我还没有在如此酷热干旱的地区开展调查的经验。同时，与如此这般完全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组队一起四处奔波的经历也是第一次。

² 以水循环为核心概念的学术领域。如天文学和人文学那样，是研究水文环境的学问。

³ 建立于 1977 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最高学术机关。中国哲学及社会科学的最高学术机关。据主页介绍，分为文哲学部、历史学部、经济学部、社会政法学部、国际问题研究学部、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由 40 多所研究所构成。

这是我第一次造访极度干旱地区。同时，也是人生首次的跨学科调查。所以我觉得回忆会如此炙热也不光是气温造成的。不同领域的研究观点相互契合迸发出的新能量仿佛加热升温了我的记忆。正是因为此番缘由，下文将采用“学科融合”的方式来介绍这次的田野调查。如果能将各自领域的研究方法有什么不同，我们在此背景下又是如何开展合作的过程清楚地传达给各位读者，也就达成初衷甚感荣幸了。

2.综合地球环境学的起源

我们的调查作为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⁴（以下称为地球研）开展的项目——“沙漠绿洲地带水资源变动负荷的适应力评价及其历史变迁”（2001~2007 年度）的一部分得以实施。由于项目名称很长，所以我们一直将其简称为“绿洲项目”。用这一简称开设的项目网站沿用至今，读者们可以参阅相关网页。

担任“绿洲项目”领队的是曾任南极越冬队队长的冰雪学专家中尾正义⁵老师。中尾老师在介绍本项目的『地球環境を黒河に探る』（[日]勉诚出版）（译者注，书名意为“从黑河探索地球环境”）这本书的开篇中写道：“结识小长谷有纪只能说是命中注定”。所谓命中注定，大致也就是说“并非出自他的本意”。事实上并不是中尾老师选中了我，而是我在 2000 年 4 月偶然担任了地球研创建任务的学术调查官⁶。同样被任命为调查官的还有东京大学的城山英明老师（行政学）和冲大乾老师（水文学）。我们参与了思索新研究所研究课题的设定方法等基本框架的构建工作。翻过年，2001 年 4 月地球研顺利成立，在那之前不久我们启动了研究项目的规划工作。也就是要具体商定在哪里进行怎样的调研，计划弄清楚什么问题。带着给新研究所树立一个研究事例范本的干劲，我们在伊豆半岛的畑毛温泉召开了一场研讨会。

在中尾老师最初的设想里，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研究对象的第一候选地，所以当时的探讨会上从事该地区相关研究的历史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专家汇聚一堂。然而，会前有一位专家突然取消了演讲，只好临时由我补上。

当时我作为临时替补在会上介绍了前一年造访额济纳的情况。汇报了当地人如何在用水问题上焦思苦虑。没想到之后这成为了绿洲项目启动的契机。

这出乎意料来形容是再合适不过了。

3.曾经的沙漠乐园……

著名的斯文·赫定⁷（Sven Hedin）调查队曾于 20 世纪 20~30 年代在额济纳开展过实地调查，其中亨宁·哈士伦·克里斯滕森（Henning Haslund-Christense）也曾额济纳集中录制过民族音乐。2000 年 8 月，我（小长谷）与来自藏有当年录音带的丹麦博物馆的安妮特·埃勒（Annette Erler）一同在额济纳进行过采访调查，寻访能够按照过去的唱法唱出 70 多年前民谣的人。这可以称得上是一种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当时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现已去世的黎古劫（译者音译，下同）婆婆（照片 1）对我们说的下面这段话。

“以前有很多白杨树。也能听得到布谷鸟的叫声。布谷鸟叫得频繁就会下雨。河流沿岸长着芦苇，高得足以挡住骆驼。现在土地还在却见不着草地了。有的只是苔藓般的细草。以前有很多植物。现在只有白杨、红柳和藜草。”

⁴ 2001 年 4 月创立，旨在构建解决地球环境问题的学问。与（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和（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等机构同属（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

⁵ 冰雪学专家。第 12 次（1970-1972）和第 14 次（1982-1984）南极观测队越冬队员，南极观测的行家。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设立之初的成员之一，牵引绿洲项目的领队。编辑撰写了本项目相关的大量著作，另著有『ヒマラヤと地球温暖か消えゆく氷河』（[日]昭和堂）（校译者注，书名意为“喜马拉雅和全球变暖消逝的冰川”），以自传体诉说了自己的专家之路。

⁶ 日本文部科学省的一项制度，发挥较年轻学者各自专业领域的特长以投入到振兴学术研究相关的各项工作中来。例如，总结评审委员对大型研究项目提出的意见，从事研究教育项目的企划立案等工作。

⁷ 1865-1952。瑞典地理学家，著名的中亚探险家。特别是于 1900 年发现了古代城市楼兰的遗址和位于其东的罗布泊湖的河床，推断出湖泊的位置不断变动，从而提出了“游移的湖泊”这一说法。1927 年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实地调查了中国东北至西北的广大地区。

照片 1 :2000 年 8 月调查时的黎古劫婆婆

确实，斯文·赫定当年调查时所拍的照片上，河面水波荡漾，河流周边树木丛生（照片 2）。穿越沙漠抵达此地的斯文·赫定在其游记『ゴビ砂漠横断』（译者注，中译名《横渡戈壁沙漠》）中将沿河伸展的绿洲⁸赞为“人间乐园”。

照片 2: 洞道河(Donda gol)畔迷人的森林 (Sven Hedin, 1943,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vol.1* (日) 国立情報学研究所 Digital SilkRoad Project『東洋文庫所蔵』貴重書籍 Digital Archive)

然而，2000 年我第一次到访额济纳时河流却处于随时可能断流的状态，河畔周边的树木也弱不经风。很多胡杨⁹的枝头已经枯萎，仿佛是自动缩小树冠以忍耐地下水的减少（照片 3）。多少还生长着一些树木，所以还可以称之为树林，但是布谷之类的鸟儿的鸣叫声大概是怎么也听不到了。踏出树林一步，映入眼帘的便是广袤的沙地（照片 4）。



照片 3 胡杨景观

⁸ 干旱地区像沙丘中的水洼般能够获得淡水的地方。生有植被的泉水地带也被称为绿洲。以这类绿洲发展起来的城市被称为绿洲城市。黑河流域的张掖市和酒泉市就是人口超过 100 万的绿洲大城市。

⁹ 杨柳科落叶乔木。白杨的一种。蒙语中音近“陶来”(toorai)。



照片 4 沙漠景观

人生一世的几十年间，景观会有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吗？确实，不论是在日本还是在其他国家，一旦建起水坝，就会发生村庄沉入水底这般的景观剧变。当代也有日本鹿吃光树芽导致山林荒秃的情况。然而，额济纳的剧变究竟缘何而起？当地居民的话语里包含着开展水资源不足相关调研必要性的诉说——“全球变暖的影响今后会怎么样”，“上游的用水量再这样增加下去，下游的我们还能在这里生活下去吗”，“沙漠化的原因就这么一直归咎于我们畜牧吗”？

综合人们所说，可以发现水资源不足的真正原因似乎在于上游用水过多。尽管如此，人们却总将原因归咎于下游居民的“过度放牧”。明明是上游的错却一直责怪下游，这种不满若隐若现。如果这些不满符合实情，那可说是极具政治色彩的问题了。如果对政府开出的政策处方说三道四，可能会变成干涉中国内政。所以我最初就没有把这个问题当做自己应当涉足的研究课题。抱着再也不会来第二次的想法，我在调查中将这个课题放在了一旁。

然而，在上文提及的伊豆研究会上汇报额济纳现状的那一瞬间，事态急转。当地人的苦恼一下子变成了研究者们应当着手进行国际性调研的环境问题。

额济纳的居民们所烦恼的水资源不足，正是干旱地带中依赖地下水的沙漠绿洲地区才会出现的环境问题。是必须探明深藏于地下肉眼无法观察到的地下水的动态才能搞清楚的问题。

在这一片地区内，南边的祁连山脉有冰川，居延海¹⁰这一已经消失的湖泊的遗址内还留有湖底堆积物（照片 5）。据说还存有二战前发现的多达 3 万枚的“居延汉简¹¹”。这里自古以来便是边塞军事战略要地，因此存有不少历史文献。也就是说，无论是从理科角度还是从文科角度来看，都具备探索长期环境变动所需的资料！

¹⁰ 发源于祁连山脉的黑河向北流入沙漠形成的尾间湖。汉代时称为“居延泽”。蒙语音近“嘎顺诺尔(gashuun nuur)”，意为“苦海”。湖如其名，为盐水湖。

¹¹ 斯文·赫定的调查队 1930 年在望楼遗址挖掘出部分木简，以此为契机后又出土了大量汉代木简。取出土地名和年代名，命名为“居延汉简”。其中大部分为防止游牧民等入侵而守卫此地的军队的驻屯记录，是了解汉代边境统治情况的一级资料。



照片 5 消失的湖泊——居延海

诸多领域的研究者们发挥各领域的特长，探明长期环境变动的机制以及人们是如何应对这些变化的。在此基础上思考现代社会应有的姿态。这不正是以区域为例，综合探索全球性问题的极好研究项目吗？

于是这项研究课题就这么横空出世了。

□.预备调查

1.黑河的水流和额济纳的绿洲

我们先于 2001 年开展了预备调查。为了掌握黑河¹²流域¹³的现状，我们用了约一个月跑遍了从上游冰川到下游末端的居延海遗址的整个黑河流域（黑河流域的位置和流域图分别参见图 3 和图 4）。此外，我们还与中方的合作学者们就已有哪些观测设施、能取得哪些数据，还有更具体的去哪里调查、调查哪些内容等等进行了商讨。

¹² 发源于祁连山脉的河流原被称为“弱水”。向北分流为二，东侧是额济纳河、纳伦河（细小河流之意），西侧是木伦河（意指比河流更大的“河”），东西两侧河流名称相对。整条河流称为黑河。名虽为“黑”，并非得名于河水发黑，实际上河水反倒清澈见底。蒙语原本就用“黑”来形容透明。也许是表现水流奔涌水花激起泡沫的样子。

¹³ 落到地表的雨雪，一部分会因蒸发而回到大气中，剩下则在地表流动或渗入地下，最终流入河川。如此这般，河流汇集雨雪的范围被称作流域或集水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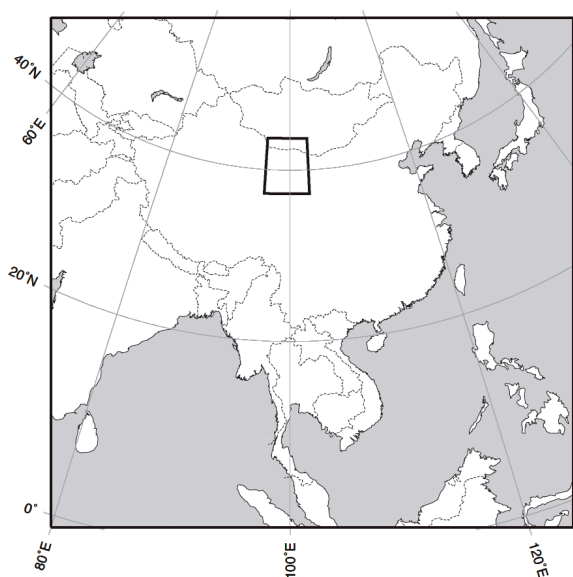


图3 黑河流域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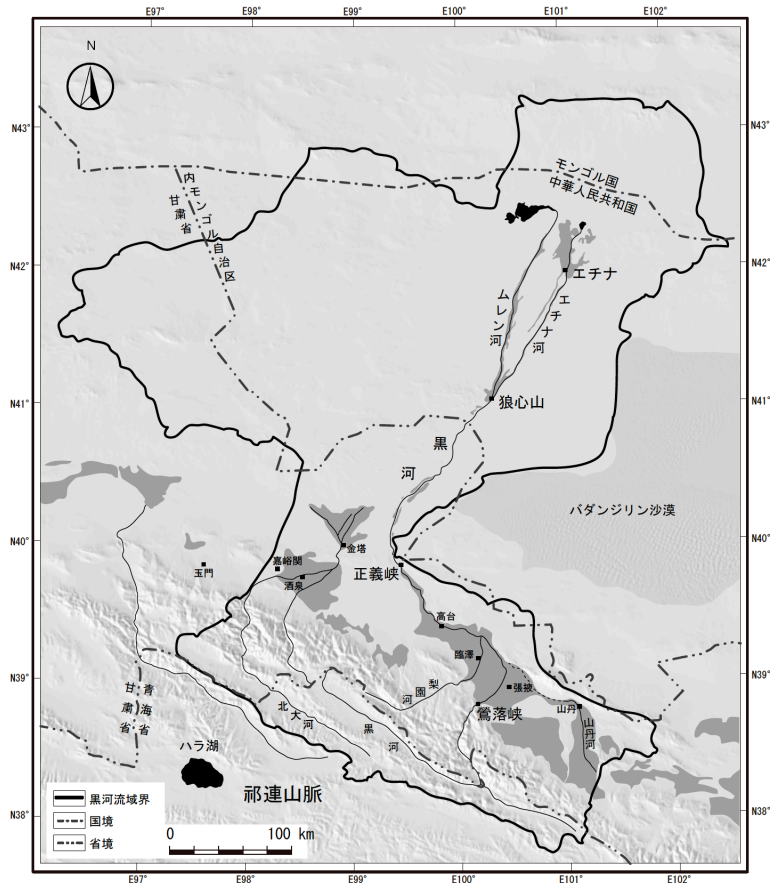


图4 黑河流域图。黑河由北向南流淌。巴丹吉林沙漠为沙丘沙漠。（渡边三津子绘图）

对从事田野调查的人而言，事前准备与实际调查同等重要。特别是外国人无法自由出入的地区，必须事先获得许可。额济纳周边有军事基地，因此必须造访当地的研究机构和政府机关，说明调查的前因后果，请求给予协助。黑河流域地处欧亚大陆中央广阔的沙漠地带中，自古以来既是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的要塞，又是北方游牧文化与南方农耕文化交融的十字路口。数千年来，宗教信仰、文化、生活方式各异的人们在此繁衍生息。现在，黑河流域流

经中国的青海省、甘肃省和内蒙古自治区。黑河位于东经 97~120 度，北纬 38~42.5 度之间，纬度跨度相当于从日本的新潟到札幌。

黑河的源头位于青藏高原北缘的祁连山山脉，经甘肃省的绿洲城市张掖向北流入内蒙古自治区，穿过广阔的沙漠地带，最终注入名为居延海的湖泊。与日本的河流不同的是，黑河不汇入大海，是一条内陆河。黑河全长约 821 公里。流域面积可达 13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黑河是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之后的中国第二大内陆河。

黑河流域以水文观测站所在的莺落峡和正义峡为界，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三个流域。各流域的降水量自上而下依次为 200~600ml、100~200ml、100ml 以下。这与日本的年均降水量 1700ml 相比，实在是微乎其微。另一方面，在水源足够的条件下能蒸发多少水分，这一指标被称为“潜在蒸发量”。黑河的年潜在蒸发量分别为上游的 1600ml、中游的 2500ml、下游的 3500ml。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定义，上游属于半干旱地区，中游属于干旱地区，下游则属于极度干旱地区（表 1）。

图 5 显示了黑河的水流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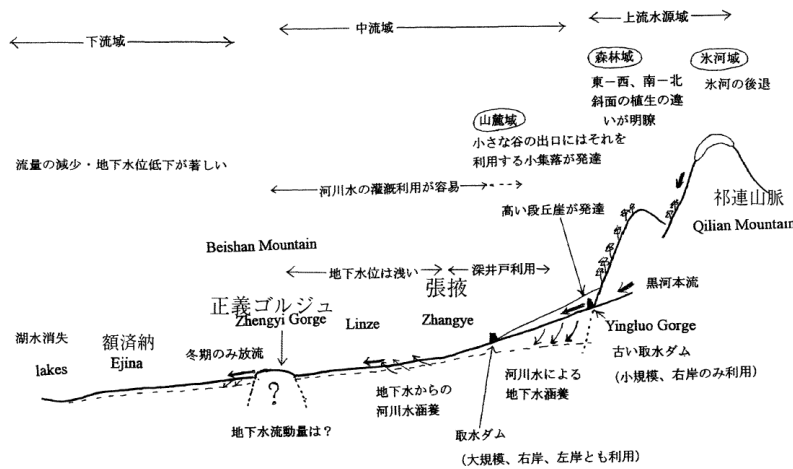


图 5 黑河流域概念图

上游的海拔为 2500~5547 米。主要水源为祁连山山脉的降雨、降雪及冰川融水。通常冰川存在与否取决于降水量的输入和冰川融水的输出这两者之间是否平衡。例如，降水量多，冰川面积就会增大；天气变暖融水增多，冰川面积就会缩小。近年来受到全球温室效应的影响，冰川融水量不断增大，结果就是冰川的不断后退¹⁴。冰川融水量增加，河流流量会暂时增大，然而一旦冰川融化殆尽，河流流量便会出现显著性的下降。在海拔 1200~2500 米的中游流域，黑河带来的充沛水流冲积形成了扇形地带¹⁵。在扇形地带的中心，一部分河水渗入地下。而在扇形地带的尾间，地下水¹⁶变为泉水涌出地面。沙漠绿洲就形成于这种扇形地带的尾间，自古以来便是人们繁衍生息之处。如今更是形成了像张掖市和酒泉市等人口超过百万的绿洲城市。而且水资源充足的中游流域又以农业发达而闻名，即便说黑河流域几乎所有的灌溉农田都集中在中游也不为过。中游出产的农作物如今被运送往全国各地，从而成为了中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之一。

自张掖市向北走，就进入了下游。虽说是下游，海拔也有 850~1200 米，高据于蒙古高原的一角。这里绵延着广阔的岩石沙漠，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戈壁沙漠”¹⁷。黑河流淌于沙

¹⁴ 冰川缩小时看起来像是从低海拔处向高海拔处融化后退，故称为冰川后退。

¹⁵ 由上流山岳地带冲积而来的沙土构成。这一地形从空中看呈扇形，故得此名。

¹⁶ 显微镜下的沙层呈粟米酥状构造。沙土颗粒相当于粟米粒，水则相当于粘住粟米粒的糖浆。糖浆填满所有缝隙时，也就是地层中水分饱和之时，这些水称为地下水。

¹⁷ “戈壁”在蒙语中是形容沙砾草原的地形用语。作为地名的戈壁沙漠，则是指横跨蒙古国和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的约 1500 公里的广阔地带。总面积为 130 万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沙漠。戈壁沙漠的南侧还有中国第三大沙漠——巴丹吉林沙漠，这里与其说是戈壁（砂砾草原），不如说是“芒哈(mangha)”（意

漠之间，两岸分布着胡杨和红柳¹⁸等植物，黑河的终点是位于中国与蒙古国边境附近的居延海。居延海的跟前有一片小规模绿洲地带，那便是额济纳了。

这片绿洲自古以来经历了匈奴、西夏、元等等游牧民族的兴亡。如今的额济纳生活着约两万人。截至 20 世纪 50 年代，当地的大部分居民是蒙古族游牧民，然而近年从事农耕的汉族人口的迁入急剧增多。游牧生活可以通过家畜的季节性移动来分散对植被的负荷，一旦变成定居一处的生活方式，就产生了无法分散自然环境负荷的问题的可能性。

2. 地下水的重要性

干旱地带的生活方式原本以游牧为主，偶尔也会在水资源丰富的绿洲周边开展农业。然而，近代以来，人们大规模的开垦灌溉农田，这是因为干旱地带在日照、气温等方面具备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条件，也就是说干旱地带成为了广阔的未开发耕地。而且，灌溉农田一般单位面积产量高，一年甚至可以收获两次或者三次。因此，20 世纪以来灌溉技术一经普及，粮食生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现在，中国国内粮食产量的半数以上都产自这样的灌溉农田。

但是，灌溉农业不断汲取地下水，导致地下水位急剧下降，日渐形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尤其是干旱地区降雨少，地下水的补给速度与日本这样的湿润地区相比极其缓慢，这其中更有历经数万年补给起来的地下水。一旦用水速度超过其补给速度，这些水源就会逐渐枯竭，而且几乎没有再次恢复的可能性，其影响将会十分深远。

例如，世界观察研究所的设立者 Lester Russell Brown 在其 1995 年出版的“Who Will Feed China? Wake-Up Call for a Small Planet”（日文题『だれが中国を養うのか？迫りくる食糧危機の時代』）（中文版书名《21 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中敲响了警钟：“尤其是在占中国粮食生产总量 40% 的华北平原，地下水水位正在以平均每年下降 1.5 米的速度递减。如果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地下水含水层¹⁹可能会枯竭，到 2030 年中国将每年从世界进口多达 3 亿吨以上的粮食。然而世界粮食市场并没有这种富余，中国的崛起从而可能会引发世界性的粮食危机”。尽管如此，世界各地对地下水的需求却只增不减。取水量伴随着内燃机、电泵的普及不断增大，近年来挖掘技术的进步更让人们向着前所未有的深度进发。全世界的灌溉面积亦不断增长，其影响已经涉及到了肉眼无法直接观察的地下水资源。如何利用有限的水资源实现可持续性发展，这一课题只能在全球层面解决。我们策划开展的研究项目便是这样一个案例研究。

3. 西部大开发给地下水带来的新负荷

包括黑河流域在内的中国西部内陆地区被定位为“贫困地区”。中国政府为了促进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其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实施了“西部大开发”这一国家级的重大项目。除了完善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发展科学教育等优惠政策，政府还提出了以边境贸易和旅游开发等为支柱的发展战略。

同时，生态环境保护也受到了重视。2001 年 8 月 3 日，中国国务院发布了“黑河流域近期治理规划”这项管理黑河流域的方针，据此方针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于次年 4 月制定了“黑河工程与非工程措施三年实施方案”这一具体计划。该计划包含了“生态工程”（旨在保护生态环境）和“水利工程”（旨在改善水资源利用）这两个项目。生态工程项目提出了搭建栅栏围护 30 万亩²⁰河岸林、建设 4 万亩家畜饲料生产基地、新建 110 口机械式水井、实施 1500 人规模的“生态移民²¹”等方案。“生态移民”是一种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采取的迁居政策。新建起了被人们称为移民村的小规模城镇，并鼓励居民开展圈舍养殖。建设家畜饲料生产基地和机械

为沙丘）。

¹⁸ 怪柳科落叶灌木。英文名为 Tamarix。蒙语音近“苏海”。

¹⁹ 地下水在地层中形成的饱和透水层。也称含水层。

²⁰ 中国的面积单位。一亩为 66.7 平方米。

²¹ 为保护环境和消除贫困中国于 2000 年前后开始积极推行的一项移民政策。额济纳的沙漠化被作为北京出现的沙尘暴的主要原因提出，这是一项将人们迁往城市居住以保护内蒙古尤其是河岸胡杨林的强制性迁居政策。

式水井也是生态移民政策的一个环节。另一方面，水利工程项目则提出了限制抽取河水、转而使用地下水、引入节水型作物、提高输水效率（翻修和新建水渠）等方案。这里所提及的输水效率高的水渠指的是混凝土管道，旨在防止水从渠底渗入地下。这些水渠遍布戈壁沙滩，就连干涸的居延海也引入了河水。表面上看起来水资源是分配到了各处，然而混凝土建成的水渠导致地下水无法补给。如此一来，地下水位下降的问题反而可能会恶化。

就在经济开发和环境政策发生着如此巨变的氛围中我们开始了预备调查。

我们调查队一行人先从北京飞往兰州，再从兰州乘车前往张掖。兰州距张掖约 500 公里。现在走高速公路五个小时左右就到了，2001 年时则需要整整一天时间。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有些路段甚至还是砂土路。

到了张掖跟前的山丹，可以看到汉代用泥土垒起来的万里长城。从车窗望出去，只觉得长城不断地向车身方向袭来，转眼间便横穿了过去。也就是说为了建设公路拆掉了万里长城的一部分。对于我（秋山）来说那是第一次中国之行，对此着实是大吃了一惊。比起历史遗迹，现代的基础设施建设似乎更为重要。当我们抵达下游的额济纳时，碰上了持续数日的突然停电。在人口不足 1 万 7 千人的额济纳，即便是市中心晚上也只有些许灯光，借着灯光几家街边小吃零星出摊。我们进行预备调查的 2001 年，可以说正是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前夜。

9·11 恐怖袭击发生的时候，我们也在额济纳。结束当天调查后回到宾馆，打开电视看到了大厦冒烟的景象，当时还以为是电影，后来才知道那是美国发生恐怖袭击事件的新闻。那一天的调查中，我们恰好视察了黑水城、绿城、温都格城²²等历史遗迹，还围绕这些文明为何衰落展开了讨论。或许正因如此，我看到新闻时感到“现代的社会体系已然崩塌”。沿用目前的价值观来继续推进开发和环保是否合适？我们人类是否已经到了必须转换思维模式的时候了？

地下水常被喻为是维系区域自然环境健全的血液。尽管人们担忧着这种生命之源的危机，然而将地下水作为可持续的水循环的一部分来加以保全的管理体制却并未建立。制定管理方针，首先必须搞清楚地下水是如何补给的，用水文学的专业术语来说这被称为地下水的补给机制。特别是我们对于极度干旱地区的地下水的补给机制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极度干旱地区的地下水究竟从何而来？掌握地下水的起源就是把肉眼无法看到的事物可视化的过程。

III. 2002 年 6 月 酷暑的开始 1 用水访谈——质性调查

调查记录本

田野调查的方法一般根据主题或是根据调查人有所变化。同样也可以说调查记录本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我（小长谷）却从大学时代起一直使用相同的记录本。细长的笔记本有着硬硬的封皮。内页是方格状的，既便于画图也便于记录文字。

从 6 月 2 日到 30 日约一个月的田野调查中，我用了两本调查记录本（照片 6）。既可以说少也可以说多。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如果是定点式调查会偏重访谈，同样一个月的时间应该会用到更多的记录本，如果是寻访式调查则需四处奔走，用到的记录本册数应该会更少一些。

照片 6 笔者调研时所用的两本调查记录本。右侧为 8 月 30 日的调查记录。

此次调查我们住在市区的宾馆，对约 200 公里流域范围内的人家进行走访，从形式上来说正好介于寻访式和定点式调查之间。所以用到的记录本册数不多也不少。下文我将一边翻阅两本记录本一边再现当时调查的情况。6 月 2 日我们先从日本出发，在北京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人员会合后飞往兰州，住了一晚后乘列车西行。穿过河西走廊，在列车上过了一晚，

²² 11 世纪藏系党项族所建的西夏要塞都市的遗址。因西夏被成吉思汗所灭，当地传有这些都市也是被成吉思汗所毁的传说。黑水城为沙漠中的遗址，1908 年由俄国考古学家科兹洛夫发现，出土了大量西夏文资料和佛教经典。随后奥莱尔·斯坦因也进行了发掘。西田龙雄以这些资料为依据，基本解读出了西夏文。

于6月4日在酒泉下车。在酒泉一行人分别坐上从额济纳开来接我们的汽车一路北上，开始了投宿额济纳的生活。额济纳的中心地叫作达来呼布镇。

“达来”意指海，“呼布”意指河岸，这个地名翻译成“海之渊”即“湖岸”也很合适，地名的来源在于从前多条河流在此汇流形成的沼泽地。现在则是街道齐整的小镇模样，很难想象出以往沼泽的景象。

次日5号，我们先前往外事办公室²³（俗称外办）打招呼。这是因为额济纳有军事基地，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得调研。晚餐是在额济纳的观光点“胡杨村”举办的欢迎宴会，为了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祝贺正式调查启动并祝愿调研活动成功而设的宴席，是不能轻易拒绝的。和最初的欢迎宴会一样，最后的宴会也是躲避不开的。我们离开之前会设答谢宴，这必须由我们来主办。

2002年时还没有像如今2014年这样的整顿纪律之风。话虽如此，也并非奢侈喧闹的宴会。有下文的访谈调查记录为证。

例如，这个观光点是2000年10月开始营业的。当地旅游局从北边的蒙古国买来直径7米左右的敖包（蒙古人的移动式住所），和民间资金合作开设。到了10月，胡杨叶凋落，主人会对聚集于此觅食落叶的骆驼进行辨别。类似银杏叶片的金黄色落叶铺就而成的绒毯和骆驼群的大集合，形成了当地独特的旅游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电影《英雄》（2002年上映）中身穿一袭红衣的张曼玉和章子怡正面对决的落叶镜头就是在额济纳拍摄的。当地人称，当时为了拍摄收集了大量的落叶。

骆驼主要是冬季的交通工具，夏天会被放养到远处，只需时不时派个人去检查一下即可。宴席之间我听到当地人迫切希望将秋季众多骆驼聚集一处，由主人们各自认领回家的方式开发为旅游资源。

对于端上来的菜，我也是抓住时机一一问过。在额济纳人们将骆驼奶发酵后做成酒精饮品，据说对甲状腺肿大具有疗效。

就这样我们在满怀谢意地接受宴请这一当地习俗的同时，积极地进行了采访调查。可以说这虽然是宴会，却已经形成了一种可以提问调查的人际关系。

虽说如此，却也不是什么都可以打听的。试想一下，假如你受邀参加朋友的婚礼，总不能突兀地问偶然同席的人：“话说，你的收入大概有多少”。无论是什么场合，做错一步就可能冒犯对方。

调查访谈，一般是满足调查者访问欲望的行为。正因为如此，体贴受访者的的心情是必不可少的。我觉得兼顾受访者的立场进行提问是田野调查最重要的事情。即便对方是野生动物或者自然风景，也应该这样做吧。

将调查记录转记成记录卡

6月6日开始进行正式调查。我们按照日期给访谈时去过的家庭编号。例如，正式调查中最初邂逅的是阿比卢麦特（译者音译，下同）。这家人的编号是“6号第一家”。有了这种通用编号，更容易实现信息共享。每天回到住宿地后，我都会和秋山君一起确认编号。地图上也会标注上“601”（图6）。

²³ 中国的省、市等地方政府所设的处理外国人出入等国际关系的部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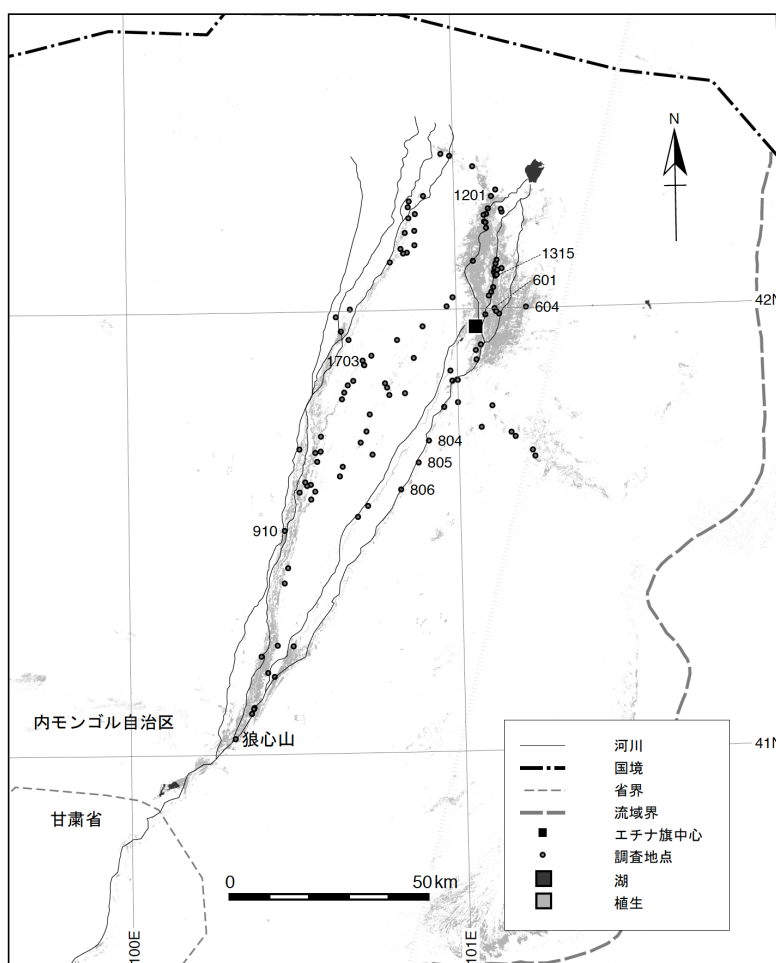


图 6 黑河下游流域的地图

沙漠的夏天很热。所以我们都是早早出发。6月6日早上八点从旅馆出发，访问了一户住在额济纳旗中心地达来呼布镇并有水井的人家。早上八点半，一位看起来50来岁的女性接待了我们。

访谈时必须先把自己的信息提供给对方。告诉访谈对象自己是为了什么找上门来的。有时候是我来说，有时候是同行的人来解释。在额济纳时当地的司机师傅实在给我们帮了大忙。他们有时会替我们跟对方解释，这些人是为了什么什么而来的。

之后是涉及个人信息的部分。询问对方的名字和年龄。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些信息无关紧要。特别是这次调研是为了调查水井的水位和水质，跟人名什么的没什么关系吧。但是，我们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取能够测量出的数据信息而来的。在量化调查的基础上，我们还想进行质化调查。不对，应该说质化调查才是重点，这点相信读者们随后便会明白。

量化调查（quantitative research）指的是从数量上进行研究，从众多样本中获取规律性的数据从而确保客观性。另一方面，质化调查（qualitative research）指的是通过访谈和观察等方式，调查无法用数量来掌握的事物。下文将会理清这两种调查相辅相成的关系，请务必坚持读下去。

即使访谈时从受访者处问到了用水情况，但是受访人是搬来这里的，还是一直就生活在这里的人呢？这些不经询问是无从知晓的。即使受访人详细告知了过去的用水情况，也有可能是受访人在其他地方成长生活期间的情况。所以，无论是什么主题，采访的时候，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对方的个人经历（成长史）。但是，也不能唐突地询问过于详细的内容，所以还是从询问名字和年龄开始。

首先，报上自己的名字，然后询问对方的名字。告诉对方自己的属相，再询问对方的属相。很多人会认为向女性询问年龄是很没礼貌的事情，但是先报出自己的年龄便能通过第一关。无论是在蒙古国，还是在中国的内蒙古，属相的风俗早已融入民间，所以从属相聊起即可顺利进展下去。只需要问“我属猴，你呢？”即可。我通过这个方法得知阿比卢麦特生于1948年，当时的年龄是54岁。

碰到爱说话的人，不知不觉就会多待一会，碰到不太好说话的人就早早收场。平均下来大约能集中采访30分钟。下面我将根据记录本中的记载顺序，尝试重现访谈内容。

井深23米，是两年前挖的。我父母20年前开始住在这里，他们在70年代挖的水井以前就在那儿。那口井深5~6米。现在不出水了就挖了新井。井已经干了3年了。我父亲大约是1977~1978年来到这儿的。我母亲是70年代初来到这儿的。现在，每天每人喝3斤（1.5升）。两个人一起过日子，大约要用5斤水（2.5升）。地里种着棉花、玉米和作饲料用的作物。棉花一年要灌溉四次。已经有十年不挤奶了。山羊和绵羊约有200头。另外还有驴子和骆驼。总共有308头。每天5次，每头喂10斤水。家畜用的水井是3年前挖的。深12米。跟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孩子一起挖的。灌溉农田用的水井是雇汉族人挖的。1990年挖了25米深。当时花了2000块。现在的话得要3000块了吧。6月10号到8月10号之间，按10天一次的频率灌溉。农田的总面积有10多亩（约70公顷）。我们这儿叫作吉日嘎郎图苏木（苏木是额济纳旗的下级行政党委，等同于乡或者镇）乌苏荣贵嘎查（嘎查是更下一级的行政单位，相当于村）巴衣吉咕陶来（音译）。

像这样如果按照回答的顺序来看，说的内容多少有些颠倒，不太好懂。而且接下来要询问每个家庭同样的内容，所以一定会造成混乱。按照水井、农作物、灌溉、家畜、灌溉情况等项目来将访谈内容归类当然更易于理解，这样虽说是质化调查，但也能在量上齐平，易于对比。也就是说便于分析。所以我们一般在访谈后都会将调查记录转记成记录卡（照片7）。

照片7 按访谈内容归类的记录卡和存档用的文件盒

回到日本后，我立刻整理了2002年6月的调查记录。按以下这些项目将调查记录本上的部分内容转记成了记录卡。

首先是家庭基本情况相关的项目，包括经纬度和房屋朝向、水井和用水、生活情况各方面。接下来是自然环境相关的项目，胡杨树、戈壁、植被、植物名称、动物名称、湖泊、河流、地形。此外，我个人的调查主题是畜牧生活相关的项目，家畜头数、疾病、饲料、挤奶、乳制品、骆驼、价格、喂水、与农业的关系、过去的迁移模式、现在的迁移模式、定居化、生态移民等。

按照项目总结后共得到了约300张卡片。一般来说，都是用这些卡片来撰写论文。但是当时我把精力集中到了与“生态移民”环境政策的斗争²⁴和收集当地居民的“口述史²⁵”上，由于这些原因，除了归纳成简单的调查报告以外，我就再也没用过这些卡片。这是第一次用上当时整理好却没有正式用过的卡片们。

与水相关的不可思议

²⁴ 小長谷有紀、シンジルト、中尾正義編『中国の環境政策 生態移民』（〔日〕昭和堂）（书名意为“中国的环境政策 生态移民”，译者注）

²⁵ 访谈听取人的一生研究，或指访谈所得的资料。在中国称为“口述史”。拜访老年人听其自述人生经历，将此记录下来，诉说的内容中自然含有对环境变化相关的认识。尤其是女性讲述人的特征是，她们会将食材作为一种自然资源，谈及如何使用这些食材。

小長谷有紀等編『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 エジネーに生きる母たちの生涯』（〔日〕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书名意为“口述史 额济纳的母亲们的一生”）。

在水井调查的卡片堆中，就像前文提到的阿比卢麦特家的例子那样，有关于井什么时候干枯的内容。这种情况我会在卡片上加一个“水位变化”的标题。如果是关于井水什么时候开始不能再饮用了的内容，我会在卡片上加一个“水质变化”的标题。

调查的第一天，有人对我们说“上层的水人能喝，下层的水水质就不行了”。这是 6 月 6 日第 4 户人家，也就是 604 号调查点的古恩书记说的。不具备地下水相关专业知识的我听了这番话觉得十分意外。

6 月 8 日沿着离城镇有些距离的额济纳河一路南下。额济纳河是起源于南边祁连山脉的河流，因此南下实际上意味着溯流而上。意外的是，河边有很多空房子（804 号调查点）。打听后得知地名叫做乌布鲁泾（ubuljin），蒙语意为“牧人过冬的营地”。奇怪，河边不是夏天居住的地方吗？从碰巧还住着人的 806 号调查点那里打听到，他们马上就会去东南偏东方向 3 公里外的夏营地。奇怪，那里不是戈壁吗？

随着访谈的深入，我们逐渐掌握了他们季节性迁移的模式，即“夏住戈壁（沙漠），冬住河流（音近“高路”）”。河岸分布着胡杨林，通风不好，所以适合在需要躲避季风的冬季居住。到了夏天就搬出胡杨林，迁到通风好的戈壁居住。

在连日高温的酷暑中，我们一心想着避开日光直射，所以一直寻找树荫。想当然地把胡杨林看作是夏天的居所，现实却完全相反。

更令我们惊讶的是，越是靠近河流地下水位就越低这一事实。

有人说，冬营地的水位在 2.5 米左右，这算是深的（805 号调查点）。奇怪，他们的冬营地不就在河边吗。河边的地下水位低²⁶吗？还有人说，现在冬营地的水井深度在 1.5 米左右，到夏营地的话水位会比较浅（806 号调查点）。奇怪，还有戈壁的地下水位更高这种事？

怀疑自己听错了的那种不安，被黎古劫婆婆的一番话打消了。2000 年 8 月，我们首次造访额济纳时生动讲述环境变化给我们听的黎古劫婆婆，还停留在额济纳河下游的冬营地（1315 号调查点）。她为我们做的说明清晰明了，甚至让我们觉得她或许是最快领会我们调查目的的人。

“戈壁有点高度，有风，凉快。夏天住。冬天就呆在红柳（Tamarix，蒙语音近“苏海 suhai”）林子里。夏天这里很热，根本没法住。如果是住在南河附近的话就不用搬到戈壁去了。如果是在北河附近的话，夏天就得迁往戈壁。河边水井的水远。大约 5 米。戈壁水井的水近。大约 2 米”

出生于 1932 年的她用“远”和“近”来形容水。近指的是离地表的距离，也就是浅的意思。此外戈壁上有水的地方还被称作“德鲁·奥丝(del wus)”、“桑达戈·奥丝(sanda wus)”、“萨布萨琳·奥丝”(sabusalin wus)，意为“上层的水”、“干净的水”、“夹缝中的水”。这不都是形容水经过沙层过滤的描述吗？！

后来实际到了戈壁的时候，我们试着直接用手挖了挖沙地。挖了 20 厘米左右就挖出了被水浸过的沙子。啊，这就是蒙语中叫做“塔透露”(tatuur)的简易水井。这跟纵向挖掘出的水井“侯达沽”(hudag)在叫法上就不同。

尽管如此，沙地下就隐藏着水，还真叫人吃惊。一直以为这是沙漠不会有水。一直以为越靠近河流水越多。着实惊讶这些地下水相关的意外事实。虽然这对当地的人来说一点也不奇怪。

额济纳流淌着好几条河流。东侧的主要河流是额济纳河，黎古劫婆婆称之为南河。最西侧的是木伦河，婆婆称之为北河（图 6）。额济纳的“民俗方位²⁷”差不多与自然方位差了 90

²⁶ 地下存在土壤水和地下水两种类型的水，这两者的界限称作“地下水面”，这种地下水面的水位称作“地下水位”。

²⁷ 以地球南北极作为南北的自然科学性的方位称作“自然方位”，与此相对的是居住在某地的人们根据习惯所定的方位（在日语中，校译者注）称作“民俗方位”。蒙古高原西北风强劲，因此人们大多将西北视为“北”，将东南视为“南”，和自然方位相差约 45 度。但是，在额济纳则是将东视为“南”，将西视为“北”，因此与自然方位相差约 90 度。这或许是反映了 18 世纪人们从遥远的里海附近的草原向东迁移返回故乡的那段历史

度，他们把东看作南。而且，房屋都是背对着肆虐的偏西风而建的。因为说话时用的是平时的表达，所以能让我们抓住他们生活方式的关键点。

黎古劫婆婆的解说也暗示着两条河流的不同。“木伦”在蒙语中原本是指比河（“高路(gol)”）更大的水流，也就表示水量比额济纳河多。此外，水量的区别也造成了河岸树木的区别。额济纳河沿岸都是胡杨，而木伦河沿岸还有沙枣树²⁸。简单地说，如果说额济纳河沿岸是树林的话，木伦河沿岸就可以说是森林了。婆婆所说的是否该迁移到戈壁的区别，大概就是应照了树木的茂盛程度吧。

另外，黎古劫婆婆把自己住的地方叫做“苏海里”，是用植物作参照物来表达额济纳下游的特征。像这样用平时的用词来讲述，对调查的一方来说是实际上是最大的收获，也会成为学术发现的契机。

父亲大约 20 年前挖的水井，现在到了秋天水位就会下降无法喂养家畜（910 号调查点）的那一番话，展现出了地下水的长期性变化和季节性变化。夏营地的水井五年前还有水，现在已经埋了，冬营地深井的水已经变苦只能用来喂家畜（1201 号调查点），那一番话则显示出水量减少的同时水质下降的情况。夹在两条河流中间的开拓地带，夏营地是北河，冬营地是南河，各自的水位原本约为 1 米，近年来夏营地的水位却变低了（1703 号调查点），这番话表明木伦河的水量变少了。学术性的发现原本就埋藏于当地人的生活之中，他们在无意识中向我们讲述。换句话说，应当将主观讲述出的事实转换为客观性的事实。将从口述中得到的信息（narrative-based）用科学依据（scientific evidence）予以验证，这就是我们进行的合作。

2. 测量水量和水质——量化调查

取水样

为了弄清楚地下水的补给机制，需要大量的水样。虽说都是水，也分很多种：雨水、河水、地下水、泉水等等。调查中我们需要不断采集这些水样。但是，取水样却并非易事。比如说，想采集雨水，却碰不到下雨天。雨水可能是地下水的补给源之一，所以能碰上下雨天也很重要。一般下雨了都要避雨吧，但是调查的时候，下雨就意味着开始工作。倾盆大雨时，为了取水淋到全身湿透。那时心里还十分高兴。那是因为极度干旱的地区，倾盆大雨是十分罕见的。而且，就算是同样的降雨，还必须得下在自己所在之处。确实只能求神靠天了。

另一方面，地下水则采自水井（照片 8）。也有自己用铲子挖井取水的情况，不过这次有人们平时使用的水井。然而，那也不是简单的事情。因为不知道用水井的人住在哪里。而且，多数水井都带有电泵的，能看到地下水水面的开放式水井很少。如果不是开放式的水井，根本无法测量地下水位。所以就算是为了进行量化调查也少不了质化调查。

照片 8 提取水样的我（秋山）

取水时必须过滤杂质。用没有针头的注射器采集水样，装上 0.20 微米的过滤器来滤除杂质。因为杂质很多，即使用力按注射器也只能一滴一滴地挤出来，以致于押得手疼。虽是费劲得来的水样，却也不能立刻装进容器。容器（30 毫升聚乙烯制容器、下文简称为聚乙烯瓶）必须用水样来清洗。清洗后，再重复用注射器采水、安装过滤器、用力按压注射器这一系列动作，将水样装进聚乙烯瓶中。而且，要密封聚乙烯瓶不让气泡进入。最后在聚氯乙烯绝缘胶带（简称绝缘胶带）上写上取水点编号和日期，贴在聚乙烯瓶上。如果想尽可能减少样本瓶中的雨水等受蒸发的影响，有时也会放入少量的石蜡油²⁹。从看得到地下水水面的开放式水井中采集到的地下水和河水等，原本就受到蒸发的影响，所以一般不加石蜡油。即便如此，有时为了掌握蒸发对样本瓶中的水样的影响，也会针对部分的样本，分别制作加入石蜡油和

²⁸ 柳叶胡颓子。胡颓子科落叶乔木。蒙语中叫作“吉沽道”（译者音译）。

²⁹ 液态石蜡，也可直接称为石蜡。碳氢化合物（有机化合物）的一种，碳原子数超过 20 个的烷烃的总称。存在于石油中，通过分馏获得。常温下为无色液体，几乎不溶于水。

未加入石蜡油的两种水样。

这次调研期间内的调查地点，如图 6 所示。因为是量化调查，所以想走访更多的地方。而且，为了探明不同地区的地下水补给机制存在怎样的差异等，想在空间范畴上近似均等地采集样本。也想尽可能大范围采集大量的水样。然而，蒙古族驾驶员告诉我“没有路的地方开不过去”。这是因为没有路就意味着有危险。这项调查离开当地人的协助无法开展，所以即使有想去却去不了的地方，也必须忍耐。就这样在 6 月 6 日到 21 日为期 16 天的调研中，我们一共走访了 138 处。

测量水样

采集到的水样，在实验室里进行分析。氢氧稳定同位素³⁰的比值尤为重要。水循环的主角水分子(H₂O)由氢元素和氧元素构成。而且，地球上存在的氢元素和氧元素各自具有质量数³¹不等的稳定同位素。质量数为 1 的氢元素(¹H)的稳定同位素是质量数为 2 的²H(重氢)，质量数为 16 的氧元素(¹⁶O)的稳定同位素是质量数为 18 的¹⁸O。质量数大的一方略重。也就是说，天然水中也存在较重的水和较轻的水。比如说，下雨时重的水先凝结，蒸发时则是轻的水先蒸发。水的状态发生这种变化时，同位素的含量就会产生偏移³²。

稳定同位素含量之比叫做稳定同位素比值。稳定同位素比值不同的水相混时，混合后水的稳定同位素比值会根据水量确定下来。例如，测量地下水的稳定同位素比值，即可获知地下水中混入了几成河水。稳定同位素比值用 δ 值表示。δ 值表示采集到的水的重量对标准海水重量³³偏差³⁴的千分比。δ 值越大，表示水越重。像这样弄清水的稳定同位素比值的差异，就可以推断出水的来源和流动路径。

民间知识的验证

首先笔者总结了访谈调查获得的信息（地下水补给机制相关的民间知识），汇总到了表 2 中。访谈调查的结果包含：①地下水位的深度、②地下水位的季节性变化、③河畔区和沙漠区³⁵地下水位经年变化的差异。下文笔者将用水文学手法对此进行科学性验证。

表 2 下游流域地下水补给机制相关的民间知识

	河畔区	沙漠区
宿营地	冬营地	夏营地
通风	不良	良好
体感温度（夏季）	暑热	凉爽
地下水水位深度	深	浅
地下水位的季节性变化	越接近秋季下降越多	几乎无变化
地下水水位的经年性变化	尾闾地区有下降趋势	几乎无变化

第一，测量 48 处游牧民拥有的开放式水井地下水位的结果表明，地下水位在河畔区和沙漠区确实存在不同的趋势。河畔区地下水位的变化幅度为 1.22 米到 5.49 米，平均为 2.4 米；

³⁰ 原子序数（质子数）相同，原子质量（质子和中子数之和）不同的物质称为同位素。同位素分为具有放射性会发生放射性衰变的放射性同位素和不会发生放射性衰变的稳定同位素两种。

³¹ 原子由带正电荷的原子核与带负电荷的电子构成。原子核则由质子和中性的中子构成。质子的数量和中子的数量之和称为质量数。

³² 专业术语称之为同位素分离，同位素更集中于其中的哪一种同位素的程度称作同位素分离系数。

³³ 判定氢氧稳定同位素比值的标准水。

³⁴ 某个母集团的平均值与该母集团内各之间的差值。此处标准海洋水的重量即为母集团的平均值。

³⁵ 游牧民秋天从沿河（“高路”）地区迁移动到河岸，冬天则在河边的胡杨（“陶来”）和沙枣（“吉沽道”）林中度过。另一方面，沙漠地区因树木稀少，成了度夏场所。沙漠地区有蒙语叫作“洮路”（译者音译）的洼地和名为“登济”（译者音译）的高地。洮路为以前的河床或是一时有水流流经的干枯河道等地，偶尔生有芦苇。靠近洮路的登济则被作为夏营地。

而沙漠区则为 0.87 到 2.88 米，平均为 1.5 米。访谈中提及的地下水位惊人般地接近观测值。

地下水位不同，是不是意味着河畔区和沙漠区的地下水补给机制也不同呢。于是，笔者对氢氧稳定同位素比值进行了分析。结果如图 7 所示。横轴表示氧元素的 δ 值 ($\delta^{18}\text{O}$)，纵轴表示氢元素的 δ 值 ($\delta^2\text{H}$)，然后代入样本的数值，这种图被称为 δ 线性图。河畔区的地下水 δ 值高，沙漠区的低。换句话说，河畔区的地下水重，沙漠区的地下水轻。而且，河畔区地下水的 δ 值落在了 δ 线性图上的灌溉期河水和非灌溉期河水之间。灌溉期指的是黑河中游流域进行农耕的 4 月到 9 月这半年左右的时期，非灌溉期则指休耕的 10 月到次年 3 月间约半年的时期。也就是说，河畔区的地下水是这两个时期的河水混合而成的。另一方面，沙漠区的地下水 δ 值低于任何一条河水的 δ 值。沙漠区的地下水比河水轻得多。这些情况表明河流和沙漠这两个地区的地下水补给机制是不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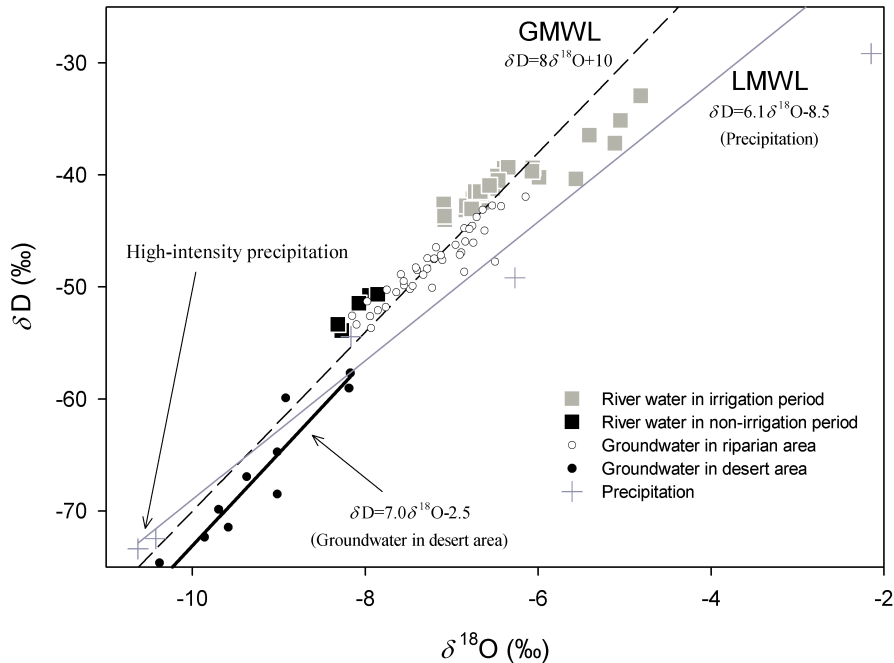


图 7 采自下游流域的水样的 δ 线性图

第二，关于访谈调查中了解到的地下水位的季节性变化，我们可以用设在观测点的水位自动记录仪（瑞士 STS 公司制 MC-1100）的观测数据来证明。图 8 显示了狼心山观测点（图 4）的河流日流量和三处距河流不同距离观测点的地下水位。在距离河岸一万米远的沙漠区，一年里几乎观测不出任何明显的地下水位的变化，而在河畔区（距河流 20 米及 330 米处），4 月到 9 月之间地下水位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这是因为夏季河岸植被的蒸发将地面的水分转移到了大气中。访谈中获知的地下水位季节性变化模式的信息也是准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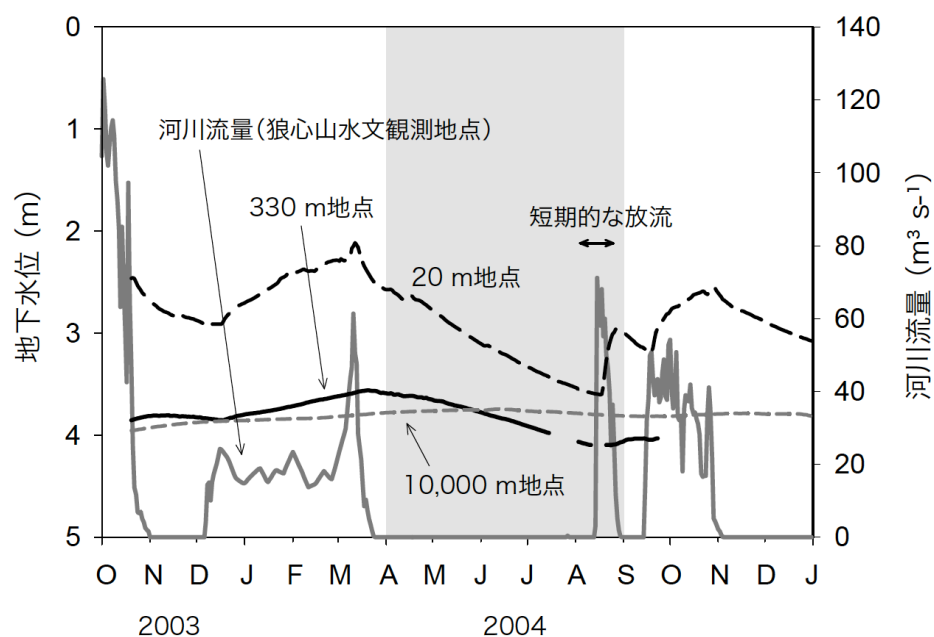


图 8 狼心山观测点（参加图 4）河流日流量和三处距河流不同距离观测点的地下水位。观测期为 2003 年 10 月至 2004 年 12 月，灰色部分表示灌溉期。

第三，下面我们将探讨访谈调查中了解到的地下水位的经年性变化。当地的水文观测站从 1988 年起持续测量的地下水位年平均值如图 9 所示。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图中可见尾闾地区的地下水位在 1990 年以后出现了显著性下降。尾闾地区 G6 处 1952 年的地下水位为 1.4 米，相当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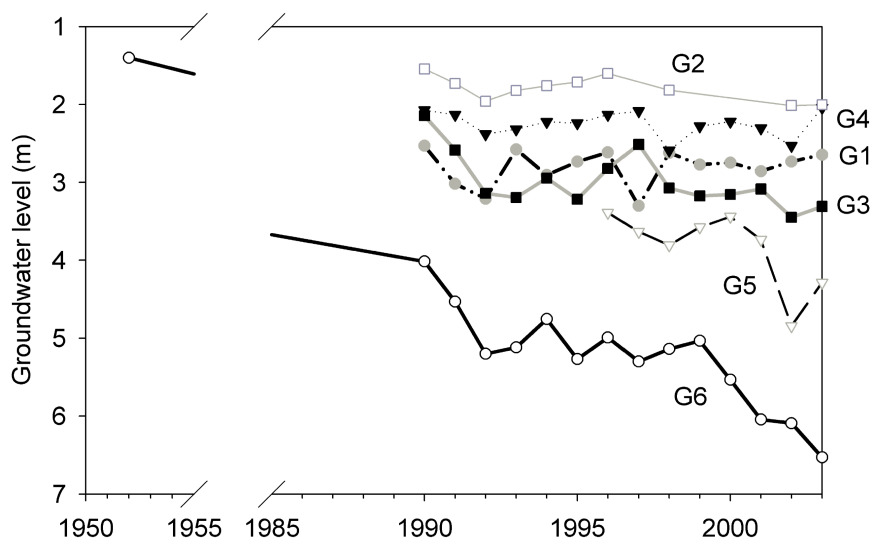


图 9 下游流域 G1、G2、G3、G4、G5、G6 处的年平均地下水位

河畔区的地下水补给机制

河畔区的地下水补给机制取决于地下水位和河流水位之差。地下水位高于河流水位时，周边的不承压地下水³⁶就会流向河道。反之，地下水位低于河流水位时，河水就会补给地下水。

³⁶ 指形成了地下水水面的地下水，也称为自由地下水。与承受加压层带来的大于大气压压力的承压地下水相对。

但是，灌溉期河水几乎不会流入下游流域。因为河水在中游流域已被汲取殆尽。河水放流仅限于不需大量取水的非灌溉期。也就是说，河道只有冬天才有水。更准确地说，近年来为了保护环境³⁷，即便是灌溉期也会暂时性放流。但是这种放流仅持续几天就结束，因此称为短期放流。河畔区的地下水补给机制必须综合河水放流的模式一起考量。

随着与河流间的距离变远，地下水的补给机制会有何不同呢？下文将带着这个问题，对照图 8 进行探讨。首先，在距河流 20 米处，灌溉期和非灌溉期都是一旦有河水流经，地下水位便急剧上升。地下水位上升意味着地下水得以补给。河水放流一结束，河道就没水了。如此一来，地下水位便逐渐下降。与此相对的是，在距河流 330 米处，地下水位在非灌溉期缓慢上升，在灌溉期则几乎没有上升。也就是说，地下水仅在持久性放流使得河道保持有水状态的冬季才得以补给，而灌溉期短期放流带来的临时性水流未能补给地下水。至于距河岸一万余米的沙漠区，地下水水位一年间几乎没有变化。

由此可以明确两点。第一点是，距河岸越远地下水的补给量越少。第二点是，短期放流几乎无法补给远离河畔区的地下水。因此，为了保护河畔区的地下水，必须持续性放流足量河水。

沙漠区的地下水补给机制

在远离河流的沙漠区，地下水如何得以补给呢？尽管没有极度干旱地区的观测实例，人们一直认为雨水无法补给地下水。但是笔者在 2002 年调查中遇上 30mm / 小时的大雨时，却产生了一种想法——即使是极度干旱地区，如果有强降水，地下水应该也能得到补给吧。因为极少下这么大的雨，可以说当时确实十分幸运。下文我们将就沙漠区的地下水补给机制进行探讨。

首先，我们分析了氢氧稳定同位素比值（图 7）。沙漠区的地下水 δ 值低于任何河水的 δ 值，却高于大雨的 δ 值。这表明了强降水具有补给沙漠区地下水的可能性。而且， δ 值落在大气降水线³⁸附近，这表明沙漠区的地下水几乎不受蒸发的影响。这一结果出乎意料。极度干旱地区的蒸发十分强烈，所以调查前我一直认为地下水的补给会受到蒸发的影响。在湿润地区，相当程度的降雨不会被蒸发而留在。这些水分会留有受到蒸发影响的痕迹，并最终补给地下水。其结果就是地下水里也留有受到蒸发影响的迹象。但是在极度干旱地区，停留在地表附近的降水会完全蒸发，只有未受蒸发影响迅速渗透到深处的强降水才能补给地下水。因此地下水不会有受到蒸发影响的迹象，这一点便是不同于湿润地区之处。

人类活动给地下水带来的影响

黑河流域在 20 世纪经历了大规模的水资源开发和灌溉农业开发。上游和中游建设了大量水坝和取水堰，尤其在中游的绿洲地区河水逐渐完全被用于灌溉农业。

图 10 显示的是过去 50 年间的河流年流量的变动趋势。位于上游和中游流域交界处莺落峡的河流流量尽管每年变化较大，但从长期来看几乎没有变化或仅呈小幅增加的趋势。因此，可以认为上游给整个流域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水量。与此相比，还可以看出中游到下游的放流量（正义峡）尤其是灌溉期的放流量在 20 世纪 90 年代急剧下降。这是由于中游流域对水的需求增大造成的。而到了 80 年代中游流域的地下水使用量也逐渐增加。为此，中游流域由地下水涌入河流的水量即地下水的出水量急剧减少。如此一来，灌溉期放流量减少和地下水出水量减少这两个因素，导致流向下游流域的放流量逐渐减少了。

³⁷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于 2002 年 4 月制定的《黑河工程与非工程措施三年实施法案》中，提议放流一定量的河水到下游。基于此方针，除非灌溉期外，还在相对不需农业用水的灌溉期末期向下游集中放流。

³⁸ 降水中的氢、氧稳定同位素各自的浓度间存在线性关系，这一直线称为大气降水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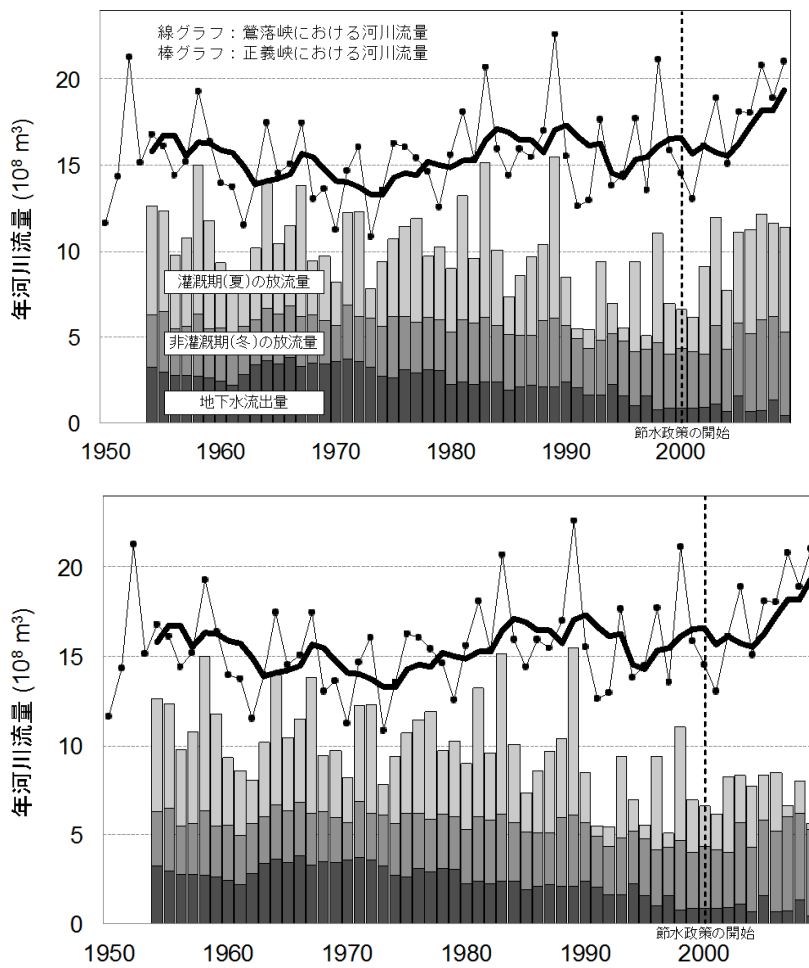


图 10 莺落峡和正义峡的黑河河流流量

上图 观测数据。莺落峡河流流量的粗线表示 5 年变动的平均值

下图 正义峡河流流量为假设上游流域降水量无增加情况下的推定值

放流量减少致使下游流域的地下水水位逐渐下降（图 9）。只有农业不需用水的 10 月至次年 3 月这段期间（非灌溉期）才有河水流入（照片 9）。于是，由于河里一直有水，地下水位便不断上升。可是，到了 4 月至 9 月的灌溉期，中游流域的取水导致河水无法流到下游来。这样一来，地下水位便不断下降（图 8）。因此，地下水位不断下降的原因在于不放流河水导致的地下水补给量减少。





照片 9 额济纳旗灌溉期（左：2002 年 6 月）和非灌溉期（右：2002 年 2 月）的黑河

下游流域的水不足问题日益严重，对此中国推行了各种政策以改善水环境。我们的地下水调查结果指向了以下 5 个政策制订及执行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根据上游流域的降水量来决定向下游放流的水量的政策。2002 年 7 月媒体大量报道了水流重回干涸已久的尾间湖这一情况。报道称这是本项政策的成果。从图 10（上图）来看，下游流域的放流量确实出现了增加。但是，来自上游的河水流量也在增加，因此下游的放流量增加事实上是上游降雨量增加的结果。如果没有这部分增加的降水量，流向下游的流量则会变成图 10（下图）那样。这与环境政策实施之前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流量依然很少。可以说目前的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缺水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在农业用水需求量相对较少的灌溉期末期向下游流域集中放流的政策。放流只在短期内实行，因此无法补给远离河流地区的地下水。要保护地下水，必须保证持续放流充足的河水。

第三个问题是为向湖泊引水而采用混凝土水渠这一土木技术的选择问题。彻底防止漏水的构造，导致即便将水流引入混凝土水渠也几乎无法补给地下水。而且，水渠有水时，原来的河道里就没水了。也就是说，水渠取代了自然河道成了放流通道。这可能在未来导致河畔区的地下水位进一步下降，也可能导致河畔的植被干枯而死。

第四个问题是沙漠区的植树造林活动。前文提到混凝土水渠遍布沙漠区。建设这些水渠的另一个目的实际上是为了绿化沙漠。水渠遍布各地像是在说“没有河的话，造出来就是了”。不仅如此，还挖掘了用于汲取地下水的深水井。沙漠区的地下水只能依靠罕见的强降水补给，其水量并不足以维持植树造林。汲取多少水，相应地地下水水位就会下降多少。这里原本就是沙漠。“把沙漠变绿洲”未见得是好事。

第五个问题是生态移民政策。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在于游牧民的过度放牧，这种认识催生了让游牧民迁居的政策。然而，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与其说是过度放牧，不如说在于河流放流量的减少。尽管如此，还是实施了生态移民政策。迁居安置地选择了地下水位下降显著的地区，还提倡人们开展以种植饲料为前提的圈养畜牧。可是饲料种植依靠地下水灌溉，从而产生新的用水需求，有可能在未来加剧地下水水位下降的问题。

这一系列政策尽管都源自保护环境这一崇高的目标，没想到却可能导致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保护地下水最重要的是防止河流断流。从流域规模的水循环来看，在减少用水量的同时，建立包括地下水在内的新型水循环管理体制也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的调研始于倾听当地人含糊的不安与不满，最终却探明了地下水的补给机制，并达到了向当地政府提供具体政策意见的层面。

IV. 跟进的社会项目

2007 年 3 月，绿洲项目结项了。作为项目的总括，我们在额济纳召开了国际研讨会，也邀请了许多当地的居民。这项研究的启动源于当地人的强烈意愿，也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才得以开展。

回顾黑河流域水资源利用的历史，人类一直通过从自己的生活圈外引水的方式来解决生产生活活动的日益活跃带来的水资源不足。土木技术等发达使之成为可能，这么说也不为过。甚至可以说，人们一直通过扩大生存空间的方式来解决环境问题。但是，在全球化日益凸显的当今，我们的生存空间已经扩展到了遍布地球这个有限空间的边边角角的程度。以往屡试不爽的“扩大生存空间”这一方法已经行不通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必须找出新的解决方法的时代。

于是我（秋山）想将研究成果还原成更具实践性的活动。正逢此时，小长谷老师在呼和浩特举办了一场生态移民的国际研讨会——“中国干旱地区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在会上我遇见了邓仪，可以说这是一场可贵的邂逅。邓仪作为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³⁹的中国非政府机构代表，做了一场题为“生态移民无法实现‘三生共荣’的内在性发展”的演讲。他在演讲里说道，在思索可持续性发展的理想方式时，实现“三生”，即生产、生活、生态的共同繁荣十分重要，他还报告了非政府机构开展“三生”实践活动的具体内容。当时我便与他意气相投，决定开展合作。

在绿洲项目结束之时，我恰好结束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并获得了博士学位，转到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在和与我同时上任的博士后李佳谈起绿洲项目时，我们两人不谋而合。她也是刚从名古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具有国际开发机构认证的项目周期管理主持人⁴⁰（Project Cycle Management Moderator）资质。我们加入了小长谷老师成立的非政府机构——蒙古合作伙伴研究所⁴¹，筹集海外活动所需的经费。我们共同提交申请书，应征原日本邮政公社（现邮政储蓄·简易生命保险管理机构）下设的国际志愿者存款基金，成功地获得了赞助经费。

我们在当地开展的各项活动中最受欢迎的是针对中小学教师的环境教育研讨会。多亏了邓仪，我们的活动得到了北京、西安还有当地的非政府组织⁴²以及阿拉善盟教育局的大力支持，我们从额济纳还有相邻的阿拉善左旗、右旗的每所中小学校各请来一名负责环境教育的教师。我和李佳就黑河流域环境问题的现状及其原因做了演讲，还介绍了绿洲项目的成果。同时，除了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的邓仪和丁平君，我们还从北京和西安邀请来两位环境教育界的专家（韩静老师和刘文化老师）作为讲师，举办了针对少年儿童的参与式环境教育的方法论讲座。

北京的韩静老师示范了如何通过丰富多彩的游戏促使孩子们学习的方法，对此当地的老师们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同时，参加讲座的老师们还向韩静老师诉说了环境教育一线的各种苦恼。据说在毫无环保意识的家长们的影响下，对孩子们进行的环境教育经常付之东流。老师们苦恼怎么才能将环境教育与大人们联系起来。对此，韩静老师建议用“小手拉大手”的标语，她说道“我们共同构建环境教育的机制，让肩负新时代的孩子们成为主体，引领社会进步吧”。参会的老师们对韩静老师所说的话感同身受，纷纷表示将努力在自己所在的学校实现“小手拉大手”。

西安的刘文化老师将孩子们开展社会调查得出的结果做成教材，讲述了从孩子们的视角

³⁹ 由 60 多位中国知名企业家出资于 2004 年成立的非政府组织机构。为解决气候变化及其他环境问题，推进各项实践性活动。活动目标不仅限于绿化沙漠，还包括提供农牧民培训和小额信贷等农牧业援助以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地区社会。

⁴⁰ 项目周期管理（PCM）法是指采用被称为“项目规划矩阵图（Project Design Matrix）”的项目概要表，对开发援助项目的计划、实施、评估这一系列周期性活动进行管理运营的方法。成为了国际协力机构 JICA 运营管理技术合作项目等的基本方法。主持人（moderator）（或推进人（facilitator））在学术讨论会上起到推进议程的作用。一般财团法人国际开发机构（FASID）制定 PCM 法研修讲师的资格制度。

⁴¹ 与蒙古开展实践性国际交流的组织，2000 年起开始活动，2001 年 6 月起获得非营利活动法人（NPO）的认可。对蒙古国和中国内蒙古地区进行市场经济化支援和雪灾灾后重建支援等活动。10 年来向蒙古国的中小学校捐赠了 1500 余块黑板。同时开展了登载非商业性广告以防这一地区成为国际性核燃料废弃场所的活动。

⁴² 阿拉善 SSE 生态协会、阿拉善盟传统文化与环境教育促进会、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及西安小天鹅艺术团。

编辑儿童教材的方法、意义还介绍了其他城市的案例。他还向与会者讲授了社会调查法的基础以及如何更好的让孩子们参与到社会调查中去。当地的老师们受到刘文化老师演讲的影响，提出了在各自所在的学校实施地域文化和自然环境相关的社会调查并以此为基础举办作文比赛的设想。

活动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蒙古族和汉族与会者跨越民族差异，共同就从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中获得环境保护教育的启示这一课题展开了积极的小组讨论。尤其是蒙古族老师们就社会变迁中传统文化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发表了各种意见，引发了与会者的深思。

此外，在李佳和我关于黑河流域整体环境问题的实情及其原因的演讲结束后，有人说“我们生活的下游流域陷入了缺水困境，没想到中游流域也很困难。一直以来我们只想着自己生活的地方，所以有些敌视住在中游流域或是从中游流域迁过来的汉族人。听了中游流域的情况，触动很大。觉得应该从更广阔的视野来思考流域范围内的环境问题”。

活动结束时，从与会者那里传来了“希望以后继续开展这样的活动”、“希望来我们学校直接和孩子们沟通”、“想以此为契机，重新审视我们蒙古族的传统文化，还打算把学到的方法用到学校的环境教育中去”的声音。那一瞬间我感到通过当地的中小学将影响扩大到整个社会这种方法或许值得期待，心中充满了幸福感。正如讨论环境问题时常会提到的“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从全球角度思考，从当地小事做起）的标语那样，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或许确实为生活于现代社会的我们指出了通往幸福的方向。

参考文献

- 中尾正義「黒河との出会い」『地球環境を黒河に探る』アジア遊学シリーズ 99 号, pp.2-9, 勉誠出版, 2007 年.
- スウェン・ヘディン『ゴビ砂漠横断』羽鳥重雄訳, 白水社, 1964 年.
- コズロフ『蒙古と青海』(西域探検紀行選集) 西義之訳, 白水社, 2004 年.
- 小長谷有紀「山には雪が降り積もり、人には…… 中国における口述史の試み」『図書』731 号, pp.21-25, 2010 年.
- 小長谷有紀「中国内蒙古自治区アラシャン盟エチナ旗における自然資源の利用」『オアシス地域研究会報』4 巻 1 号, pp.3-6, 2004 年.
- 小長谷有紀、シンジルト、中尾正義『中国の環境政策 生態移民』pp.36-37, 昭和堂, 2005 年.
- 本书の英译修订版如下。Ecological Migration: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China, Peter Lang, February 2011.
- 中尾正義ほか『中国の水環境問題』勉誠出版, 2009 年.
- 小長谷有紀、サランゲレル「消え行く歴史 ある老女の語りから」中尾正義、フフバートル、小長谷有紀編『中国辺境地域の 50 年 黒河流域の人びとから見た現代史』pp.183-200, 東方書店, 2007 年.
- 小長谷有紀、サランゲレル、児玉香菜子編『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 エジネーに生きる母たちの生涯』(オアシス地域研究会報別冊), 2007 年.
- 本书の英译版如下。An Oral History of Mothers in the Ejene Oasis, Inner Mongolia, RIHN, August 2011.
- UNEP. 1997. World Atlas of Desertification, second edition. Edward Arnold, London, United Kingdom.
- Trabucco, A., Zomer, R.J.2009. Global Aridity Index(Global- Aridity) and Global 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Global PET) Geospatial Database. CGIAR Consortium for Spatial Information (<http://www.csi.cgiar.org>).
- 榎根男『地下水土地系の科学』講談社学術文庫, 2013 年.
- 杉田倫明、田中正「地中水」杉田倫明、田中正編『水文科学』pp.133-165, 共立出版, 2009 年.
- ブルツァーアールト・ウィルフリート『水文学』杉田倫明訳, 共立出版, 2008 年.
- レスター・ブラウン『だれが中国を養うのか? 迫りくる食糧危機の時代』ダイヤモンド社, 1995 年.
- 榎山明『漢帝国と辺境社会』中央公論新社, 1999 年.
- 李佳、秋山知宏「環境保全と経済活動が両立できる社会システムをさぐる 中国内モンゴルから」『MoPI 通信』pp.2-4, 2009 年.

关于现代中国“承包”与“发展形态”的考察

原田 忠直

(日本福祉大学经济学部)

绪论

近年，围绕“承包”的重新评价，以岸本美绪所提之如下问题提起为出发点。“现如今，中国历史的‘发展形态’仍然尚未明确。我们如何理解柏氏、村松氏提出的‘中国独特形态’，以及如何评价其强烈的文化本质主义倾向，是一项崭新而有趣的课题。”（岸本・2006年 p.283-284）

针对历史学者岸本的设问，中兼和津次（2010）间接地回应说：“在中国研究领域，今后应该不断加强经济学与历史学，或者现代研究和近代研究的相互交流与切磋。”（中兼氏・2010年 p.11）另外，加藤弘之对岸本氏的设问与中兼氏的回应也作出响应，并以农村与基层政府、乡镇企业与基层政府、国有企业与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为维持各自关系而制定的制度、契约的视点为中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柏祐贤提出的“承包的伦理规律”进行分析，对“承包”的现代意义进行再次探讨（加藤・2010年 p.13-14）。本论的研究目的是针对岸本氏的设问与中兼氏的回应，从“承包”的角度对现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进行重新构建¹。因篇幅有限，无法进行更多探讨，本论主要以研究“承包”的意义为焦点，对“承包”研究的先驱——柏祐贤的学说，以及推进者——加藤弘之近年关于“承包”的研究进行验证，为探寻现代中国的“发展形态”提供线索。

一、柏祐贤与“承包”

1.1 对柏氏进行重新评价的意义

在《经济科学的构造》（1943年）一书出版后，柏祐贤提出了以下重要结论：“所谓经济秩序，不仅仅是机能主体性秩序，更是伦理主体性秩序，经济秩序的个性就是由此而来”（柏氏・1985年 p.193）。此外，在第4次中国当地调查（1944年）中柏氏提出：“中国经济秩序存在某种对自身进行规范的原理，这是我们在第4次中国旅行时得出的板上钉钉的定论。”并且，柏氏在论述发现“承包”的过程中如是说：“这个原理就是一种承包，而且无论何种情况都进行承包。正是这种类似承包伦理的事物支配着中国经济”（柏氏・1990年 p.305）。

也就是说近乎在同一时期，“伦理主体性秩序”与“承包”这两个关键词出现在柏氏头脑中并不是一次偶然。随着对在中国调查中发现的“承包”的理解加深，柏氏说：“我愈加深刻地认识到经济秩序中的伦理主体性规律”（柏氏・1985年 p.187）。柏氏回日本后，空袭愈演愈烈。正是在这样的战争时期，他撰写完成了《经济秩序个性论——中国经济的研究》（1948年）。也就是说，以熊彼特理论为发端的关于主体论的研究，与柏氏在中国的研究虽然完全不在同一领域，却在同时进行着，并在中国当地调查过程中开花结果。柏氏对伦理主体性秩序的概念愈加明确。对于柏氏来说，“承包”的发现不单加深了对中国研究的理解，也成为之后《农业政策论》《农学原论》《危机历史观》中展开的以主体论为核心的《柏史观》的起源。

但是，在《经济秩序个性论》问世之后，柏氏不仅偏离了中国研究的领域，并且没能积极展开对柏氏史观中伦理主体秩序的体现者——“承包”的承担者的研究。究其原因，主要分为以下几点：

1、柏氏在《经济秩序个性论》中提出，只要“承包”作为伦理主体性秩序发挥作用，中

¹ 笔者对关于“承包”的研究，可查看以下几处。原田氏・2011a pp.1~33 原田氏・2011b pp.57~69 原田氏・2013a pp.183~208

国经济就会“停滞不前”。然而，在此书出版后的第二年，中国爆发革命。“中国爆发革命=新社会的诞生及发展”，因此“停滞不前论”自然而然被埋没。另外，中国革命爆发预示着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胜利，而柏氏提出的中国经济“个性”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所以他的理论才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总之，中国革命爆发意味着夺取柏氏在中国的研究空间。

2、柏氏切断了自身与中国的联系。柏氏认为革命后的中国社会是由单一的马克思主义支配，也就是由机能主体性秩序统治。不能否定伦理主体性秩序的体现者——“承包”的承担者终将消失的可能性。换言之，柏氏的观点是革命后的中国社会是由共产党创建，人民是不可能成为主体的。俯瞰柏氏的研究不难发现，在无法感知人民主体性的社会中，无法理解其魅力也无可厚非。

3、柏氏认为，所谓“承包”就是“把经营的不确定性转嫁给第三者，从而使之确定化的秩序”（柏氏·1986a p.154），“特别是在人与人的交易关系之间，‘承包’是把经济者经营的不确定性确定化的准则”（柏氏·1986a p.157）。另外，“介入的第三者把自己经营的不确定性再转嫁给第四者，使之担负风险”（柏氏·1986a p.157）。换言之，“承包”就是通过“多层不确定性转嫁结构”，维持人和人之间的多层“承包”关系，使不确定性确定化的秩序。也就是说，“承包”不依赖于技术进步、不追求组织的合理性，这与欧洲的经济秩序大相径庭。另外，“承包”的承担者也与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家’不同，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自身努力来获取利润的群体。但是，“承包”的承担者也算是在进行一种商业交易，他们通过“承包”来获取额外利润，也就是用重复与他人的依存关系来获利。因此，柏氏从“承包”的承担者自身不付诸努力这一点上，看出了“寄生性格”。但是，柏氏因为无法接受这种伦理观，所以该思想并没有占据其研究的核心地位。特别是构成“柏史观”中一个结论——本职社会的共同体（柏氏·1986b p.282-283）的基础观点就是“劳动第一主义”，而该观点与“承包”的承担者的“寄生性格”完全是南辕北辙的两个概念。

柏氏之所以逐渐偏离中国研究领域，不可否认是因为在大时代的洪流中，他的研究不断被推翻，直至被埋没。假设中国革命较晚爆发或者说并未爆发，他的“史观”也许会发生巨变。又或者，假设他的研究没有被埋没，他的伦理主体性秩序在改革开放时代还尚有残存，现代中国研究便会发生巨变。时光无法倒流，但是把终结了的研究历史重新审视却很有必要。如果在重新审视该问题时，只是讨论中国是否还存在“承包”，“承包”是否还在发生作用等等粗浅表面的问题的话，便无法探讨“发展形态”的相关问题。对现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中存在的“承包”进行再次探讨，的确是一项饶有兴味的课题，但是有时不得不直面柏氏残留的课题，例如在探讨柏氏提出的伦理主体性秩序是否还存在于现代中国社会，“承包”的承担者是否仍然被伦理主体性秩序影响等等问题时，也许需要与之站在对立面。因此，本论通过对伦理主体性体现者——“承包”的承担者，与对柏祐贤本人的再次评价，同时以“承包”为基础重新探讨“发展形态”，从而寻找岸本氏提出的“中国独特发展形态”的核心部分。

1.2 柏氏的局限性

如上所述，“承包”的承担者的“寄生性格”与熊彼特提出的“企业家”是背道而驰的两个概念，柏氏的“停滞论”就是该结论的根据之一。并且，柏氏认为由于“承包”是通过人与人之间多层“承包”关系的叠加而成立的，因此利润被分散化，无法形成资本积累。因此，以“承包”者“自身缺乏努力”、“承包”导致“利润分散化”（用柏氏的言论来说，就是“利润社会化”）等理论为基础，柏氏提出了“中国停滞论”。相比大野英三郎（2011年）明确提出的基督教传教士报告、孟德斯鸠、杜尔阁、康德、亚当·斯密、马尔萨斯、黑格尔、马克思、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提出的“中国停滞论”（大野·2011年），柏氏的理论更具有说服力。但是，大野氏指出这些停滞论是不科学的，甚至可以说是在自负的西方进步论下形成的。并且，柏氏的“停滞论”也是在西洋展开的这些“停滞论”的影响下进行了考察。可以说，柏氏在研究时，对这些“停滞论”中提出的观点并不持有任何怀疑。例如，柏氏提出：“我们或许应该对这些问题（停滞论）进行相关史学性考察，但是现在我们暂且不论，而且即使我们之后要进行考察，在经济学者之间也只需保留我们深信中国经济的停滞性这一点。”（柏氏·1986b p.321）因此，我们不得不说，《经济秩序个性论》是在“深信”不科学的“停滞论”这

一背景下，形成了不科学的论据而完成创作的。换言之，柏氏只不过是囫圇吞枣把“停滞论”进行吸收，然后用该理论来说明“承包”。加藤氏指出了柏氏“停滞论”的局限性：“当时一般认为中国等于停滞，柏氏被这种观点束缚了，思想是不自由的”（加藤氏·2010年 p. 39~40）。

但是，针对柏氏的立场来说的确存在局限性，但是并不意味着对“承包”的否定。在研究现代中国的学者看来，这种局限性意味着没必要把自己束缚在“承包”=“停滞”这个等式里。因此，在描述以“承包”为基础的“发展形态”时，作为一项排除障碍的积极因素，应该从这个“诅咒”当中解放出来。但是，把柏氏研究的“承包”作为前提条件，直接应用到现代中国社会进行再次探讨时，还是存在许多问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以下将指出几点柏氏对“承包”所做说明的问题。

如上所述，柏氏认为“承包”就是通过“多层不确定性的转嫁结构”，使人与人之间维持一种多层“承包”关系，从而把不确定性确定化。换言之，所谓“承包”系统，就是指人们在规避不确定性（所谓的“风险”）时，不通过技术进步、个人努力等手段，而是通过多数“承包”者构建的一个多层“承包”结构从而规避风险。

针对柏氏对“承包”的上述说明，“承包”的承担者是否确实理解“确定化”这个概念，笔者心存疑问。如柏氏所述，“承包”的一项明显特征毋庸置疑是人们关系的多层重叠化，但是其构建多层次关系的真正目的，却不一定是规避风险，把不确定性的状态确定化。

例如，内山完造在对“承包”进行说明时（内山氏·2011年），就并未出现“确定化”这个概念。虽略微冗长，以下将如实引用内山氏针对“承包”的具体说明。

“中国有承包制的习惯，日语翻译成‘请负制度’。不可否认，不论是在土木、建筑、修理或者其他场所，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某项工作时，总是会使用‘请负’的方法。更极端的还有‘包医’的说法，就是指医生对疾病进行‘请负’治疗。‘请负’一日三餐的外卖店，叫做包饭，这也一点不稀奇。虽然日语把承包译成‘请负’，但是如果再深入分析的话，其实这是一种‘分隔’。一户人家是一种‘分隔’，一个街市建造城墙（可以说是武装或者防御）是大陆地带的‘分隔’（与村落中用土堆起来的堡垒类似），国境线是大陆的‘分隔’。用这种思考方式，可以看出中国人万事都会想着先‘分隔’。就是说中国人重客观实际，只会在可调整的客观范围内进行主观思考，不可否认这是一种相信宿命的民族习性”（内山氏·2011年 pp60~61）。

内山氏把“承包”表现为“分隔”，据笔者了解，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见解。从“分隔”的视点来理解“承包”的多层化结构，会发现“承包”者分隔的空间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每一个都是各自独立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至少从内山氏用“承包”描述的中国社会看来，中国人的首要目的是保全自己在社会全体中被‘分隔’的空间，并没有规避风险的意向。同时，自我独立必须建立在他人独立的基础上。换言之，自我获利首先需要他人获利，这是中国人的思考方式或是民族习性。也就是说，内山氏所谓的“承包”可以理解为人们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存空间，需要构建把他人分隔的许多空间。正因为中国人的这种民族习性，使得规避利益独占化的社会不断发展扩大，后述中作为“承包”成立的重要因素之一——“水平性”这一概念才浮出水面。

当然，柏氏与内山氏都注意到了“承包”中包含规避利润独占化的系统。因此，柏氏得出“安定的中国社会”这一结论。但是柏氏仍然未能对“承包”中隐藏的不确定因素置之不理。如上所述，因为柏氏认为“承包”的承担者存在自身努力不足或者“寄生性格”，所以他必须去寻找确定性因素。另外，“承包”关系是以契约为基础成立的，一旦到期，这种关系就会自动解除并消失。因此，随着时间推移，“承包”分隔的空间在中国社会产生、消失，然后再次产生、再次消失，周而复始。它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存在。然而，虽然柏氏瞥见了这种不具有稳定性的状态，但无法全盘接受“承包”产生的这种不确定性因素。

即是说，柏氏的另一个局限性就在于没有从“确定化的诱惑”中解放出来。换言之，柏氏无论何时都不得不排除不稳定状态与不确定因素，因为在排除之后就会出现“发展”这个概念。用这种思考模式研究的不止柏氏一人。如上所述，“中国停滞论”其实就是西洋进步主义历史观，或者说是把近代价值观指引下描述的“发展形态”作为一个着落点，从而换个

角度来理解、把握中国社会。因此要探寻现代中国社会以“承包”为基础形成的“发展形态”，我们就必须认识到在重新设定这种进步主义历史观、近代历史观，或者其它我们认为良好的着落点时，很容易潜伏着歪解“发展形态”的危险。因此，笔者认为探寻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形态”的第一步，就是设想内山理解的“承包”，也就是设想社会存在无数被分隔的空间，然后探究“承包”的承担者持有怎样的主观想法，另外是如何与国家、社会，或者是共产党进行对峙的，并且还需明确被分隔的空间之间是否是由柏氏所谓的伦理主体性秩序相连接的。

二、加藤弘之与“承包”

如上所述，加藤氏对现代中国社会存在的“承包”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就如加藤氏承认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所以仍然并未得出关于“承包”的结论。因此，可以说加藤氏对“承包”概念的总结是不完整的，接下来笔者将留意此问题，并提出几点加藤氏现阶段对“承包”说明中存在的问题。

1、加藤氏在探究“承包”的现代意义时，他提出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从“传统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两个矢量，也就是“二重转移”（加藤氏·1997年 pp.7~8；加藤氏·2011年 pp.7~8）对于如何理解这种“发展形态”之间的联系，笔者心存疑问。因为至少在“二重转移”模式下的“承包”至今还未出现。

2、当然，对“承包”的再次探讨，依然是中国社会、经济被“传统经济”支配的佐证，也说明通往“市场经济”的道路仍然只是初级阶段，这种见解或许就是以此为根据的。言下之意，可以判断从“传统经济”到“市场经济”发展的矢量轨迹不发生变化，对“二重转移”模式也没必要进行修正。但是，他把“承包”作为“中国独特性”（也称传统经济）放在现代中国进行再次探讨，在强调其重要性的同时，笔者不禁要质疑“二重转移”模式的说服力是否还能继续保持。另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矢量路径是否如加藤氏所述，是一条直线呢？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计划经济”的消亡毫无疑问是大势所趋。但是，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下，以“承包”的复兴为中心进行了发展，因此“计划经济”的消亡必然给“承包”，也就是给“传统经济”的复兴留有余地，可以说从“计划经济”发展到“传统经济”的矢量是存在的。更进一步来说，我们对从“传统经济”到“市场经济”是否存在矢量也心存疑问。“传统经济”是“停滞”的象征，“市场经济”是“发展”的象征，以这种固定化等式为基础展开论证是加藤氏与柏氏存在的共性。加藤氏作为结论提出的“市场经济”可以说是柏氏与多数先行研究者陷入“诅咒”并且一直未摆脱的记号之一。无论何时，只要持有加藤氏的“市场经济”这一结论，就会不断歪解对“承包”的再次评价。至少在现代中国经济与社会中，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承包”作为“中国独特性”随处可见，因此在“传统经济”的基础下，验证经济上、社会上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3、加藤氏把“承包”的特征概括为三点：“水平性”“多层性”“不确定性”。“多层性”与“不确定”已在前文中进行了论述，接下来就“水平性”进行说明。

加藤氏就“水平性”做出了如下论述：“在组织（例如企业组织）中或者组织外，无论组织内部的上下阶层命令系统如何，承包合约的当事人——‘出包者’（提供工作合约）和‘承包者’（承接工作合约）的关系是对等、平等的。”另外“在承包期间，剩余控制权利在‘承包者’手中，作为资本所有者的‘出包者’没有权力左右‘承包者’的决定。”“获取的利益由‘出包者’与‘承包者’进行‘平等地’分配”，另外，“熟知业绩好坏的应该是‘承包者’，因此事实上真正支配利益分配的也是‘承包者’。”如此这般，加藤氏认为“出包者”与“承包者”在关系较为平衡，或者说“出包者”占据优势的情况下，确保了“承包者”的权利，给予其主导权。因此可以看出其中的刺激积极性结构（加藤氏·2010 pp.22~23）。换言之之，“承包者”并不对“出包者”言听计从。并且“出包者虽然进行资金投入，但不（对承包者）进行干涉”，因此，自然而然能够提高“承包者”的积极性。另外，加藤氏认为农村与基层政府、乡镇企业与基层政府、国有企业与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自之间通过“承包”缔结关系，从而提高“承包者”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增长。

如加藤氏所述，“承包”中的平衡系统的确提高了“承包者”——“承包”的承担者的积极性。但是，笔者认为单从平衡性这个视角来论述刺激积极性构造或有欠缺。另外，加藤氏

介绍的各种关系当中都是以政府为中心展开的，假如“出包者”是政府或者共产党的话，其中平衡性的这个概念依然成立吗？笔者心存疑问。并且，与柏氏提出“承包”的时代不同，这个年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加藤氏在论述刺激积极性构造之前，有必要先明确，即使在政府和共产党大权在握的情况下又是如何保持平衡性的。

近年来，中国郊区兴起了别墅与小洋房的建筑热潮，四面设有围栏的新兴住宅街或者叫做新城的空间不断出现。在政府看来，类似这种住宅建设就是通过把土地使用权卖给建造商来获取利润。但是另一方面，又增加了政府建设基础设施的负担。其中包括为新兴住宅街的新住民提供教育设施机构（主要为中小学），因为此时不仅需要建设费，还要承担教工人员的工资以及建筑物的维护费等高额费用。因此，很多时候政府在给予建造商（也就是“承包者”）建设许可时，作为条件之一会让建造商承担相应教育设施的建设义务。另外，建设完成的教育设施不由政府直接经营，而是由民间团体“承包”，从而削减财政支出。

以上事例当中“承包”的平衡性从何得知呢？如上所述，在政府拥有巨大权利的前提下，政府作为“出包者”，把土地使用权卖给建造商，另外让建造商承担建设教育设施的义务，并且，从“承包”教育机构的民间团体那里获得巨额“承包”利益。这明显是一本万利，独占利润的结构。此外，在缔结“承包”关系的交涉当中，多数人通过贿赂政府官员从而获得“承包”的资格，因此可以想象政府官员中饱私囊的情况。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这样的结构当中根本不存在“承包”的平衡性。但是事实上，在该结构当中，以巨大的权力为背景，政府也不是没有付出任何努力就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还是用以上案例来分析，我们在考察政府是以什么为标准，如何筛选“承包”教育机构的人员时，会出现以下问题。从近期媒体报导的政府及共产党的腐败实情来看，容易认为筛选标准其实就是贿赂的金额大小。当然也不是完不存在贿赂。但贿赂绝对不会是筛选的标准。比如在这个案例中，对于决策者来说，需要考虑的是“承包”教育机构的人员能给建造商带来多少利益。当然，政府方面也不会要求建造商把教育机构的建设费上交。因此只有洞察了“出包者”——政府与建造商各自想要获取什么利益的人员才能成为“承包者”。

把建造商建设教育机构半义务化，原本就是政府的决定事项，是不可违反的。因此所有人都毫无怨言地接受。特别是在政府与共产党大权在握的现代中国社会中更是毋庸置疑。但是事实上，“出包者”——政府与“承包者”——建造商之间为了维持关系的平衡，第三个“承包者”即将登场。换言之，政府官员、建造商、还有希望“承包”教育机关的人员各自遵从与政府决定事项不同的价值观——伦理主体性秩序支配，并一直遵从这种秩序。可以说其中“出包者”——政府官员避免独占利益就是伦理主体性秩序的体现者。因此，他们在不同于政府决定事项的空间，能够保持着平衡性。

只通过加藤氏指出的给予“承包者”积极性，无法分析说明“承包”的平衡性。当然，建造商只要支付土地使用权的费用，就能不受政府的干涉，自由进行新兴住宅街的建造。另外，教育机构的“承包者”一旦缔结了“承包”关系，就能自由进行学校的经营。在这方面，可以说提高了“承包者”的积极性，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平衡性作为“承包”关系成立的前提条件，政府官员是伦理主体性秩序的体现者，这两个事实却被遗漏了。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政府官员与共产党员都是伦理主体性秩序的体现者。但是尽管这样的分析存在很多问题，在共产党政权稳坐江山的事实面前，伦理主体性秩序的体现者绝对不是少数。换言之，可以说存在接受给予他人（特别是民间团体）分隔空间，或者说尊重他人利益的政府官员。当然，这里只是就一个案例进行了“承包”平衡性的分析。对“出包者”——政府与相对应的无数“承包者”的案例进行继续分析是今后的重大课题。在大量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探讨出中国独特的“发展形态”。

三、“经商”的愿望

在考察关于“承包”，并以“承包”为基础进行“发展形态”的探讨时，容易碰到一个最困难的问题——无法对“承包”进行统计学上的总结。因此，除了不断进行不同案例的分析，进行实际状态的把握之外别无他法。但是，只是对案例进行分析，却无法把握“承包”的整体情况。比如说，在探讨“承包”是否在现在中国社会中发生普遍作用时，就需要对想成为

“承包”的承担者的人员进行量的把握。恐怕不仅是笔者，很多人都听中国人说起过“将来想下海经商”的愿望。但是具体有多少人，无法明确得知。如果并没有许多人，或者说人们生活在一个无法拥有这种愿望的社会，就无法探讨以“承包”为基础的“发展形态”。因此，笔者为了探究有多少人拥有“想经商”的愿望，以在浙江省生活的民工与其子弟和江西省地方城市、农村地区的高中生、工厂工人等为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

该问卷调查中回答“想经商”的数据结果如下所示：

① 以民工为对象的问卷调查（2009年11月在浙江省进行），240人中回答“想经商”的超过8成（82.1%）（原田・2010a pp.111~139）。

② 以高中生为对象的问卷调查（2009年9月在江西省的高中进行），221人中回答“想经商”的超过5成（52.9%）（原田・2010b pp.211~231）。

③ 以高中生为对象的问卷调查（2011年3月在江西省的高中进行。与第2条选取了不同高中的对象），1023人中回答“想经商”的有8成（80.5%）（原田・2012 pp.1~23）。

④ 以民工为对象的问卷调查（2012年7月在浙江省进行），896人中回答“想经商”的有6成（60.0%）（原田・2013b pp.37~63）。

⑤ 以工厂工人为对象的问卷调查（2012年6月在江西省进行），328人中回答“想经商”的有7成（70.7%）。

⑥ 以高中生为对象的问卷调查（2012年6月在江西省的高中进行。部分与第3条中属于一所高中），1001人中回答“想经商”的超过7成（72.8%）。

以上调查问卷结果显示，拥有“想经商”愿望的人群占多数。当然，笔者打算今后将扩大调查对象人群进行更多探讨。至少就现在的数据看来，可以明显知道许多中国人都拥有“想经商（或者说希望经商成功）”的愿望，借用柏氏的说法，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另外，在此次问卷调查中，出现了以下几个有趣的结果。

第3条中的调查是以4所升学率各异的高中作为调查对象展开的。笔者曾经猜想“想经商”的比例差异是否与升学率的高低相关联。但是结果显示这两者并无关联，无论哪所高中，“想经商”的比例都是8成左右。并且，并不是所有“想经商”的高中生在高中毕业或者大学毕业以后，都可以马上实现“经商”的愿望。在升学率低的高中，大部分学生毕业之后都成为3K劳动者，在工厂、餐厅或者建筑工地打工。另一方面，在升学率高的高中，大部分学生毕业后都成为了公务员或者工薪阶层。然而，对于他们来说，因为学历水平决定的就业岗位，并非一成不变。如第4条与第5条中的调查结果显示，即使现在身处3K劳动岗位，但仍然没有放弃“想经商”的愿望。

因此，像这样一直拥有或者说不曾放弃“想经商”这个愿望的现实，一方面表明人们在不断适应市场经济渗透，并且经营着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是在抵御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大部分人都只能适应市场经济而生活。然而，如果忽视这个愿望的存在，换言之就是无论学历水平低的3K劳动者，还是学历水平高的白领阶层，各自都只是适应市场经济并且趋于稳定，认为中国经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的，我们就无法探讨“发展形态”。所谓“发展形态”，是对人们愿望的描述，只有当人们积极行动时，这个轮廓才会趋于明晰。

结论

本论文引用并且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分析了柏祐贤与加藤弘之的研究成果，对关于“承包”与“发展形态”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当然，笔者自身对“承包”的研究也还处于摸索阶段，仍无法探讨出“发展形态”的轮廓。以下笔者将对本论文的结论进行最后概括。

1、用进步主义历史观或者近代价值观无法把握中国的情况。另外，在至今为止作为中国代名词的“停滞论”与我们难以接受的中国人的“习惯・伦理观”等等方面，往往最有可能隐藏着中国的本质。

2、关于“承包”的研究，特别是在案例分析积累方面不够充分，在中国社会中肯定还有许多案例值得被挖掘探讨。在分析这些案例的过程中，应该把平衡性、多层次结构、不确定性、利润社会化等新解释加入对“承包”特征的诠释当中，并从中获取探讨“发展形态”的

灵感。

3、有必要对“市场经济”的终点——“市场”这个名词提出质疑。至少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计划经济”到“传统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是一种矢量的存在。另外，在“市场经济”冲击“传统经济”时，肯定有人通过积极的行动来与其进行抗争。只有在这样的矢量交错碰撞中，“发展形态”的轮廓才逐渐明晰。

参考文献

- 内山完造（2011）『両辺倒』書肆心水、pp. 60-61。
- 大野英二郎（2011）『停滞の帝国』国書刊行会。
- 柏祐賢（1985）『秋の夕映え』（柏祐賢著作集第20巻）京都産業大学出版会、pp. 187、193。
- 柏祐賢（1986a）『経済秩序個性論 II』（柏祐賢著作集第4巻）京都産業大学出版会、pp. 154、157、321。
- 柏祐賢（1986b）『危機の歴史観』（柏祐賢著作集第7巻）京都産業大学出版会、pp. 282-283。
- 柏祐賢（1990）「補巻V 回想録」（柏祐賢著作集第25巻）京都産業大学出版会、p. 305。
- 加藤弘之（1997）『中国の経済発展と市場化』名古屋大学出版会、pp. 9-12。
- 加藤弘之（2010）「移行期中国の経済制度と『包』の倫理規律」中兼和津次編著『歴史的視野からみた現代中国経済』、ミネルヴァ書房、pp. 13-44、pp. 22-23、pp. 39-40。
- 加藤弘之（2011）「中国経済への招待」加藤弘之・上原一慶編著『現代中国経済論』ミネルヴァ書房、pp. 7-8。
- 加藤弘之（2013）『「曖昧な制度」としての中国型資本主義』NTT出版。
- 岸本美緒（2006）『「帝国」日本の学知——東洋学の磁場』岩波書、pp. 283-284。
- 中兼和津次編著（2010）『歴史的視野からみた現代中国経済』ミネルヴァ書房、p. 11。
- 原田忠直（2010a）「民工と自由」『日本福祉大学 経済論集』第41号、日本福祉大学経済学会、pp. 111-139。
- 原田忠直（2010b）「中国・民工第2世代（中学生・高校生）の現状認識と将来展望——浙江省A市のY民工学校及び江西省B県のZ高校におけるアンケート調査結果より」『日本福祉大学研究紀要 現代と文化』第121号、日本福祉大学福祉社会開発研究所、pp. 211-231。
- 原田忠直（2011a）「柏史観と『包』の倫理規律」『日本福祉大学 経済論集』第43号、日本福祉大学経済学会、pp. 1-33。
- 原田忠直（2011b）「中国におけるセーフティ・ネットと『包』の倫理規律」『日本福祉大学研究紀要 現代と文化』第123号、日本福祉大学福祉社会開発研究所、pp. 57-69。
- 原田忠直（2012）「中国・高校生の『希望』と学力差の関係性について——江西省T市及びY県の高校生に対するアンケート調査結果より」『日本福祉大学 経済論集』第44号、日本福祉大学経済学会、pp. 1-23。
- 原田忠直（2013a）『「包」についての一考察——鄧小平と『擦辺球』』『日本福祉大学研究紀要 現代と文化』第127号、日本福祉大学福祉社会開発研究所、pp. 183-208。
- 原田忠直（2013b）「民工（男性）の『希望』とその実現性について——浙江省H市における民工に対するアンケート調査結果を中心に」『日本福祉大学経済論集』第46号、日本福祉大学経済学会、p. 37-63。

中国经济学的展望

加藤弘之

(神户大学)

本章将立足于前一章的议论,从资本主义类型这一视角出发,对关于资本主义多样化的论点进行整理、之后要把焦点集中到围绕「中国式样的」这一论题上,对中国模式的资本主义去向作以讨论。

笔者认为,被冠以具有「暧昧性制度」的中国模式的资本主义,经过了 35 年的高度成长之后,今日正在进入一个大的转折点.在展望中国模式的资本主义将朝着哪个方向发展时,应该考虑的是「暧昧性制度」的终结点.综观到目前为止的分析,我们已经很明确的看到,给中国带来高度成长的制度性的要因,即「暧昧性制度」,在不断改变它的形式的过程中,顽强地保存了下来。关注这一点就可知道,「暧昧性制度」即使迫不得已有发生变化,它的核心部分也会以一些其他的形式继承下来,中国模式的资本主义特征一定会继续形成下去。研究它的最终到达点将是中国经济学要肩负的一个重要课题。

1、再论资本主义的多样化

到目前为止的各章节中,笔者以「暧昧性制度」为关键词对中国经济体系的独立性从多种侧面进行了讨论。以资本主义的多样化,即先验性为前提,理所当然地对中国模式的资本主义作为其中之一的课题进行了讨论,可是为了更加明确的指出中国的独特性,基于对资本主义类型的讨论,有必要对不同于其他形式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及有什么样的不同作以阐明。

在笔者的前一部著作里,从资本主义的类型这一视角出发,讨论了它的多样性,并试着对如何定位中国模式的资本主义进行了理论探索。(加藤, 2013) 这里让我们对其内容再做以简单地回顾。

从事法国保险业务的实业家米歇尔·阿尔贝尔(Michel Albert)曾指出,如以美国为代表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为资本主义的一端,以德国、法国等为代表的「莱茵模式」为资本主义另一端的直线上排列着所有的资本主义类型的话。(Albert, 2011) 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结合多种多样的要素,根据其本国的发展阶段,民主主义的成熟度,以及其国民所重视的价值观等,选择成为接近「盎格鲁萨克逊模式」,还是接近「莱茵模式」的资本主义。

另有,法国的经济学者布雷诺·阿玛布尔(Bruno Amable)在借鉴青木昌彦等的比较分析制度的观点,使用因子分析的手法测量了构成各国资本主义要素的几个指标后,把资本主义划分为五种类型,它们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模式」、「社会民主主义模式」、「欧洲大陆模式」、「地中海模式」和「亚洲模式」(Amable 2005)。

还有,伊拉斯姆大学的科恩·苏莱曼(Cohen, Suleiman Ibrahim)以更加广泛的视角把经济体系区分为 3 种类型。①以传统的家庭经济行为为特征和基准的「家庭经济中心体系」(house intensive system) ②以企业的行为模式为基准的「企业中心体系」(firm intensive system) ③以国家的行为模式为基准的「国家中心体系」(state intensive system)。

从各种不同类型的角度,我们应该如何来定位现在的中国的资本主义呢。结论是多种多样的。以阿尔贝尔的论点来看,中国被描绘成是一个向往「盎格鲁萨克逊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再看阿玛布尔的观点,他把中国的资本主义区分成与东南亚周边各国具有共同点的「亚洲模式」。另外,科恩把中国的资本主义看成是他所主张的 3 种类型之外的第 4 种类型,即适用于中国和印度的「多极化社会经济体系」(multi-pole system)。总之,虽然不能说这些都只是指出了中国资本主义特征的一个侧面,但是作为要表现本书中所探讨的以「暧昧性制度」本质的中国经济体系的独特性时,笔者确实感到这些论点的不足。

究其原因,对于阿尔贝尔的论点来说,想要把所有的资本主义类型摆放到「盎格鲁萨克逊模

式」与「莱茵模式」之间的狭窄范围内,这一课题的假设本身就让人觉得具有局限性。另外,对于设定了 5 种类型的阿玛布尔也同样,如排除「亚洲模式」,就与阿尔贝尔的框架没有太大的差别。再看科恩的论点,顾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家庭经济中心体系」和对应俄罗斯的「国家中心体系」在其分类中加进作为影响多种资本主义类型的要因,可以说比主要考虑欧美先进国家资本主义类型的阿尔贝尔和阿玛布尔的论点范围确实广泛些。但是,科恩把中国从第 3 类型划分出来并归纳到第 4 类型的做法,是原想把第 3 类型作为派生类型分类其他所有国家的经济体系中,但却不得不把中国和印度视为例外。

对前面类型化的讨论,还想追加以下两个新的论点。一个是美国经济学者威廉·鲍莫尔(William Jack Baumol)们总结的类型,鲍莫尔们把资本主义区分为 4 种类型 ①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 ②寡头政体 ③大企业资本主义 ④起业家资本主义。并且他们还主张起业家资本主义是最理想的资本主义类型。(鲍莫尔等,2014) 关注起业家的角色,这一点可以说是现存类型理论所欠缺的视角,但是,把国家主导型,大企业型,以及起业家型的所有要素都包含在作为对中国模式资本主义分析的概念里的话,不能说是有效的类型化。

还有一个作为类型化的理论、我们要看看强调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罗伯特·博耶(Robert Boyer)的“调节学派”。博耶在整理了大量的关于资本主义多样性的诸多理论之后,提出了“调节学派”的类型。“调节学派”是以战后资本主义的标准形态,特别是以很典型地存在于美国的「大量生产」形式为出发点,从展望资本主义历史性的发展阶段这一角度出发,探讨了经过「大量生产」时代之后,应该迎来的资本主义类型。而且,它并没有把资本主义收敛进一个类型,而是得出了保持多种类型的结论。(田中 2015b)

博耶用 5 种副系统整理了资本主义的特征 ①竞争形式 ②工资劳动关系 ③金融信贷关系 ④国家经济关系 ⑤与国际经济的接轨(博耶 2005)。但是,由于存在着「制度的互补性」,这 5 种制度形式的不同组合,并没有作为所有资本主义的类型而成立。结果,博耶得出的结论与其他的类型论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可以将其归纳为 4 种类型的资本主义。①市场主导型(以美国为代表—同下:重视市场作用) ②企业主导型(日本—大企业及业界团体的作用很重要) ③社会民主型(北欧各国—政治·劳动·工资的三结合) ④国家主导型(法国·德国—重视政府公共政策的作用) 表 1 列举了博耶以此基准整理的中国模式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

末章表1 制度的5种形式: 中国的布局

制度的形式	主要特征	对限制方式的影响	对积累体制的影响
①竞争方式	多数的,及多种经济形式主体的激烈竞争	生产成本,价格持续下降的倾向	积累的原动力
②工资劳动关系	都市,农村之间的双重构造被分断及细分化的工作内容劳动者自身组织团体的不存在	大规模农村劳动者群体对竞争性工资体系形成的影响	所得不平等:下滑趋势低的劳动分配比例
③金融,信贷体制	大规模的分权化和宏观调控必要性之间的矛盾	对国内,国际经济急剧变化的有效调节对应	维持高度发展的手段
④国家,经济关系	实利主义,多重次的,只顾眼前利益的,复杂的中央政府统治	对不均衡的快速反应	制度形式的频繁重组
⑤与国际经济的接轨	选择的结合 —对直接投资的制约 —外部经常收支的管控 —独特的国内标准	对应国内信用的变化 缓和外部冲击的关键是作为政治变数 的外汇兑换利率	贸易黑字是国内需求供给不平衡的结果

(注: Boyer (2012) 193 页图的一部分做以简化)

关于中国模式的资本主义是属于 4 种类型的哪一种,或者说是接近哪一种类型,博耶没有明确的指出。如关注 5 种副系统之一,即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就有点像属于市场型,多层次的复杂管理让人联想到虽是不同的经济主体却有大、中型企业及业界团体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对不均衡的快速对应,对国际经济有选择的接轨又有些像国家主导型的特征。结果,即使知道这不是社会民主形式,可是中国具有被套进其他哪 3 种类型都不会感到异样的特征。

从以上可以看到,使用现有的资本主义类型框架很难捕捉到中国模式的资本主义全景。结果是,只有一种方法可行,既是,要想弄清楚中国的独特性在哪里的话,不能从中国外部找答案,只有从中国内部出发。这里,再次想强调是,序章曾指出以探索中国特色这一基本分析视点,不是对中国经济特征进行个别的、逐一的分析,而是要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全面的」把握其重要性。如果非要把中国套用到模式化中来议论的话,笔者想要主张的是,它只能被称为中国模式。

2、围绕「中国式样的」

中国特色在哪里这一问题是贯穿本书的根本课题,关系到这一点,本书第 2 章提到了批判笔者的木越义则的讨论,他质问意味着广义的承包的「包」不是民国时期特有的现象吗?并且提问笔者主张的「暧昧性制度」是对「中国特殊论」的再论,还是与「中国特殊论」的决别?(木越,2014) 另外他还追加了更根本的论点,指出如果它是与「中国特殊论」决别的话,那么「暧昧性制度」是否能用比较制度分析来说明和解释,或者是没有能经受了实证研究的真相。

正如本书探讨的一样,笔者认为虽然中国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独特性,但是却从没有认为中国是特殊的。因为担心会造成误解所以不太想使用「中国特殊论」这一表现,但是如果木越要把与「中国特殊论」的决别和对中国特色的探讨作同样意思使用的话,我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极能成为对当前课题的回答。

研究中国历史的岸本美绪,列举了柏祐贤的「包」的伦理规律和村松祐次的个别主义后提出,「在中国历史中,『发展』的形式已不再是自明之理的今日,我们将再一次面对应如何去理解柏和村松的『中国式样的』这一课题」(岸本 2006)。岸本所说的「中国历史上的『发展』形式」用非常单纯化的整理方式来说,就是自建立人民共和国以来,本着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脚踏实地的稳步发展这一看法,并且与之相结合的形式去解释历史。因这种观点曾一时成为学会的主流,把中国经济停滞不前的要因归结为中国特色的柏和村松的论点几乎没有被顾及到。但是,改革开放后,当经济开始高度成长,被柏和村松指出的阻碍经济成长的要因,即中国的特色,为高度成长作出了贡献,于是也就出现了对「中国式样的」需要进行再评价的议论。岸本的这个问题意识也是笔者和木越所共有的。

木越对问题的提起,是把中国与日本资本主义论和日本形式的经济体系论作以比较为前提的,从中国研究的相对性这一角度出发的。换言之,就是对被大多数所认同的,即曾轰轰烈烈地,而今却一去不复返的围绕着日本形式经济体系的议论一样,笔者提倡的中国形式的资本主义特色的议论也将随着时代的进程被中国自身所废弃,从而被归纳到盎格鲁萨克逊模式里的这一预测,笔者要如何对答的一个本质性的提问。

对于木越的提问笔者的回答是,对「中国式样的」探求决不会仅仅是昙花一现。笔者这样认为的理由有如下三点。第一点,首先想到制度的多层构造,制度既有在 10 年、20 年的间隔里发生变化的,也有 10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不发生变化的。本着这样的视点,也许中国特色的一部分会消失,但总有应该被长期保留下来的部分。这作为对追求什么的一种尝试,引发笔者对「暧昧性制度」加以关注。第二点,出现了以「暧昧性制度」为前提的完善制度的前兆。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生产经营承包制,企业生产经营承包制,地方财政包干体制等,笔者认为各种形式复活的「包」(承包)都是把「暧昧性制度」具体化的事物。确实,由于引进分税制,从而废除了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在完善制度的进程中「暧昧性制度」的一部分被规范化的制度而取代。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都是这样。其中一例,就是在第 3 章详细探讨的关于土地的集团所有制这一「暧昧性制度」。土地改革不是朝着私有化的方向,而是在集团所有的前提下进行讨论。如何有效地利用土地,如何推进耕作权的流动化,各地方是沿着这一思路而在进行尝试。像这种尝试,虽说还多只是初级阶段,但是以此可以看出「暧昧性制度」为前提的完善制度的前兆。最后,

第三点是,认为近年对曾很少回顾的「日本式样的」探求,有可能再次得到瞩目。合并·重组·交易·企业集团·主力银行的制度等,这些作为代表日本模式经济体系的特征,现在回头想想,即使在经济高度发展时期非常适用,但是当泡沫经济崩溃后,在「失去的 20 年」的时间里,主张它的优越性的议论已经完全的消失了。日本模式的经济体系,其特征对于追赶欧美各国的阶段来说还是有效的,但是当这一阶段告已结束时,日本不得不接受具有全球规范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资本主义」这一想法成为主流,例如超大银行的出现和以至今日各种各样的放宽限制等等。对「日本式样的」探求的衰退,是与日本经济发展的停滞同出一辙的,同时又可以说是与接近全球性规范的潮流相呼应的。

如木越所指,日本经济史的实证研究的进展,揭示了向来被认为是「日本式样的」现象并不一定是日本独特的,就此不能否认对「日本式样的」探求的学术价值随之减少。但是,应重新论证是日本模式的经济体系是否仅适用于追赶欧美各国的阶段,还是由于它在向全球性规范接近的过程中,造成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丹尼·罗德里克(Dani·Rodrik)提出了①全球化,②民主主义以及③国家主权不会同时成立的全球化政治三刀法的议论。如果要追求全球化,就必须放弃民主主义或国家主权,如果要维护国家主权那就要对民主主义或全球化作以让步。罗德里克就是否应该捍卫民主主义和国家主权,而为此适当地限制全球化而提出了质问。(罗德里克 2013)

罗德里克所指出的问题在思考日本及日本经济体系的走向时提供了很重要的视角,同样的情况对中国也适用,据罗德里克指出,中国具有全球经济应主要克服的所有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整和由于开放的经济与低成本国之间的贸易所引发的分配和调整的困难。罗德里克指出,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拥有独特的社会制度,并且在世界市场中显示着巨大的存在感,处理此问题的适当办法不是用常说的把一些国际规范和国际协调强加于中国,而是,承认其实行的独特的经济体制和社会政策的空间,尽量减少由于跨越国境而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种方法,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很可能适用。(同上书 310 页)

超级全球化即不是很理想的也不是难已回避的,对罗德里克的这一主张笔者也表示赞同。日本和中国应该走的最好的发展方向,不是接受全球化规范,把自己国家的经济体系归纳到欧美的形式化中,而是谋求保持各自经济体系的独特性,用对自己国家来说最好的方式与国际经济接轨。

最后,再次回到木越的问题,笔者思考的「暧昧性制度」如被嵌入到超越时代的中国的独特性制度中,从此意义上来说,也可以理解为木越所说的是对「中国特色论」的再讨论。但是,笔者所说的「暧昧性制度」决不是指它是不变的构造,反而它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即使在现在它也是在变化当中。因此,用比较分析制度的视点对中国经济所特有的性质加以说明解释话,即探求中国的特色,不是对「中国特殊论」进行再讨论,而是意味着与「中国特殊论」的决别。

3、中国经济学的终点与展望

中国模式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向

正如本书所论,具有「暧昧性制度」的现行经济体制(中国模式的资本主义)同时具有过渡性和中国的独特性。而且,也指出处于脱离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 21 世纪的现阶段,它逐渐显现出到目前为止发挥了有效功能的经济体制所具有的负面影响,因此,只是维持现有体制,中国将不会再发展,这一点笔者与许多其他改革派持有同样的立场。

那么,中国要往哪个方向发展呢?或者说,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一个比较权威的见解是吴敬璠等主流派经济学者主张的议论,即彻底进行市场化改革,向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系靠拢,只有这样才是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唯一手段。在第 1 章介绍的主张综合性制度优越性的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罗宾逊(Joan Robinson)的议论也基本是支持吴敬璠的理论。但是,把中国发展的目标等同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系这一想法没有问题吗?关于这一点,笔者的前一部著书有以下三点提示。因为是重要的论点,让我们再做以重温。

第一点,即使最理想的结果是归结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系当中,但是制度是有赖以

生存的途径,体制的转变需要时间。还有,一些利益团体等的既得权利者的抵抗也可预想。因此,必须要估计到要有很长的过渡期,这期间,不容忽视保持了中国模式的资本主义的现有特征。

第二点,构成经济体制的各要素是相互紧密联系着的,只改变其中一部分也许会造成全系统机能的不完善。比如,对官僚的腐败现象实施严惩的话,从腐败那里没有得到利益的群体会大力支持,但是,就如在第 8 章讨论的,作为给予官僚的物质奖励,至少一部分的腐败(包含增加个人收益的灰色收入等等)是安镶在现行制度之中的。因此,对腐败的严惩也许会削弱官僚对经济发展改革的献身精神,阻碍发展经济。像这样对腐败现象的治理,如果不与对官僚的激励机制改革挂钩(比如,晋级的规定和对业绩评价的方法),很有可能给经济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第三点,中国的「国情」今后也不会改变。中国国土辽阔,是一个拥有 13 多亿人口,富有多样性的国家。这种「国情」下,只要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在今后很长时期也将是中国的一个特征,这是即使想改变也不可能改变的要素。笔者认为这种「国情」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国「暧昧性制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在「国情」不改变的情况下,「暧昧性制度」可能会很有必要以某种形式承接下去。

“暧昧性制度”是如何变化的

正如以上探讨的,即使希望归结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系中也不能够马上改变现有体制,目前,是维持「暧昧性制度」并尽量把其内容向所期待的方向改善,只有向前迈进没有其他选择。本书从第 3 章到第 7 章列举了很多关于「暧昧性制度」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例子。从中看到了在不断变化中顽强生存下来的「暧昧性制度」。并且,在第 8 章和第 9 章,提起了由「暧昧性制度」引发的二个问题点,讨论了对它的解决办法。下面,对其结论做以总结。

第一,以土地的集体所有为基础的集体经济正在重新复活。人民公社的解体,引进农村生产经营承包制,之后,在围绕着土地分配的调整以及乡镇企业利益分配上,乡村干部开始掌握了很大的权利,集体经济也可拥有实体经济了。乡镇企业的民营化和长期保障农民耕种权益的法律加以完善之后,集体经济的权力一时有所减弱,但是为了推进耕种权的流动性,以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形式,集体经济再次得以出现,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不断演化。

第二,地方政府之间,官僚之间的竞争机制,一方面有助于高度成长,另一方面也深化了像地方债务累积等发展至上主义的恶劣影响。既有主张抛弃发展至上主义,地方政府应该贯彻实施提供公共服务的论说,又有提议应试行一个官僚对一个河流的水质管理应负全责的「河长制」制度,即是把地方政府间,官僚间的竞争机制利用到环保问责制及技术引进等多种目的上的一种坚韧不拔的志向。

第三,国有企业将要退出市场竞争曾被大多数人所预想,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从 2003 年前后开始,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了加强国有企业的转变政策。在市场竞争中的混合型所有制企业,要维持一定的竞争力,在若干产业中有可能成长为代表中国的国家冠军企业。

第四,新兴产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由多数的组织部门及个人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产业组织,实现了以摹仿和设计为前提的独特的技术革新构造。可以想象这种构造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也将是 中国 在实施技术革新时所采取的重要手段。但是如果中国要追赶先进国家的话,就不能只是继续依靠外部开发的核心技术。能挑起新技术革新旗手重任的,不是政府和民间的二者择一,而是官民一体的技术革新结构,才能够发挥优势。

第五,90 年代后期,中国作为新兴援助者积极地进行对外援助,但是,中国的对外援助与国际援助社会的常识有很多不同的侧面。虽得到受援国家的欢迎,却被国际援助社会批判。中国的对外援助手法与日本过去的援助手法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充分吸取日本的经验教训,会以其独特的援助手法,获得有别于欧美的好评。

第六,作为「暧昧性制度」的问题点被多次提及的关于腐败和差距的问题,一味的将其原因归结为「暧昧性制度」,只要它不存在了腐败和差距也就消失了,这一想法过于简单了。「暧昧性制度」确实是腐败的一个要因但也是成长的一个能源。不能单纯的认为只要没有腐败现象就可以维持经济增长,差距也是如此,要看到事物的二方面,即由市场化进程带来的差距和市场化的不彻底而带来的差距。从利益集体化了的党,和政府官僚等的既得权利阶层被维持下来这个意义上来说,「暧昧性制度」确实是市场化不够彻底的一个要因,但是,贯彻了市场化就可

以缩小差距,这一想法是没有看到差距根源的另一面。

中国经济学要到达的目标

如上所见,「暧昧性制度」从社会主义到市场经济的过渡期,发展到法律制度不断完善和组织团体不断被规范化的今天,它不仅没有消失,而是以更加强健的姿态显示着它的存在。50年,100年后的将来,当然不会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但是,目前来看具有「暧昧性制度」特征的中国模式的资本主义是将要存续下去的。

要阐明「暧昧性制度」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这为更好的理解中国模式的资本主义是有必要的,但是也许有批判说对其他国家没有多少参考价值。确实,「暧昧性制度」是中国在长期的文化传统中继承发扬下来的,不是其他国家可以照搬套用的。笔者也想它大概也很难适用于其他国家。但是笔者认为「暧昧性制度」富有比对其他国家的参考价值更高的重要价值。这就是「暧昧性制度」给予我们到目前为止以不同框架审视经济学的一个契机。

本书在第1章介绍了关注制度作用的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他用以往的经济学为大前提,进行了以超越瓦尔拉斯(Marie Esprit Léon Walras)的范例为目标的大胆尝试。鲍尔斯作为依据的新的3个范例假设是,①不基于合同的社会性相互作用 ②适宜且顾虑到其他人的行动 ③一般化了的收入递增。鲍尔斯是从理论层面对以往的经济学进行了挑战,而本书探讨的中国的「暧昧性制度」也许可以看成是,从实践层面对以往经济学的研究框架所进行的挑战。

笔者并不想要主张中国的经验是鲍尔斯3个假设的整和。鲍尔斯的①的假设,作为「默认的合同」的「包」看上去好像暗示着某种普遍性,但是直觉上②的假设与「自我本位」为特征的中国经验并不相符。可是鲍尔斯列举的3个假设中也许哪个是错误的,而且现阶段也不可否认另外存有正确假设的可能性。这就如同从隧道的两端挖掘一样,一侧是理论层面,另一侧是实践层面,当隧道正好在中间开通时,即是理论与实践相吻合的时候,那么鲍尔斯所考虑的新范例也就实现了,那样的话,以关注「暧昧性制度」对中国的独特性所进行的探讨,也是对经济学的进步多少起到了一些贡献的,这就是笔者思考的中国经济学要最终到达的目标,本书是向此目标稍稍迈出的第一步。

(北蕾 译)

日苏（俄）关系与中国

——其历史法则及变动机制

赵宏伟

（法政大学）

绪论

约至 1980 年代为止，东亚指的是日本、苏联、中国及位于这三大国构成的三角区域当中的朝鲜半岛。二战后，特别是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美国的存在攫取了世界的主要关注，日苏（俄）中三国关系也从人们的视线以及研究人员的注目中淡出。拙文抛砖引玉，叙述二战后日苏（俄）中三国关系的梗概，尝试探索三国关系的历史法则及变动机制。

日苏（俄）中在各个时期对本国利益的认识都左右着三国关系。三国的国家利益意识，除了作为一个国家普遍拥有的政治·经济·安全保障等利益外，还包括从大国意识中衍生出的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并且，正是因为三国是永远的邻国，所以与地缘政治学相关的势力关系在三国关系中发挥着基本要素的作用。

三国关系在二战后，大体如下：①从日美中华民国与苏联的对立（1946-1949 年），到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盟与日美同盟的对立（1950-1960 年代中期）。②中美日对苏联的统一战线的形成（到 1980 年代）；③中俄日等距离的三角关系（1990 年代）；④由于中俄关系再次亲密化，为了保持对中关系平衡，日俄也反复摸索如何进一步发展关系（直至二十一世纪的现在）。

主要事项有①斯大林对中国的势力范围分配，构建势力均衡关系（power sharing），中苏对美日的东亚冷战；②到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毛泽东声明支持日本北方领土的主张；③七十、八十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中国对与苏联结盟的越南进行“惩罚战”（邓小平语），中美日的蜜月关系；④1989 年天安门事件以后中俄关系改善，日本改善对俄关系和努力解决北方领土问题；⑤二十一世纪中俄关系的紧密化、围绕北朝鲜核问题六国协议形成中俄对日的关系格局、日本作为牵制中国的一环，不断努力改善与俄关系等。

毋庸置疑，在这些关系之间，美国总是扮演着左右中苏（俄）日三国关系的主角。

一、战后东亚冷战秩序的形成——苏中同盟对美日同盟（1949-1966）

在战后东亚，美国·中华民国同盟和在 GHQ 占领下的日本建立了反苏反共集团，逐渐形成封锁苏联的地域秩序。苏联为防止被孤立，竭尽全力与中华民国缔结友好条约。在此时，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而打破了东亚反共秩序的形成。

美苏两大国，在摸索东亚新秩序中，将新生的中国也牵扯进来，试图尝试建立新的大国间的势力均衡关系。所谓势力均衡，指的是大国间相互承认对方的周边利益，其底线是不在对方国家周边树立或支持敌对势力。斯大林当权的苏联在 1949 年 7 月，预见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统一及将来的大国化，率先跟毛泽东提出势力均衡，在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名义下，承认中国在东亚地域的领导地位。¹斯大林邀请中共的二把手——刘少奇访问苏联，表明了如下的责任分配方针：在世界政策的原则问题上两国需要磋商，而对于东亚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地域的安全保障则均交给中国。

在一个月前的 1949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同意了驻南京的美国大使

¹下斗米仲夫「戦後ソ連の北東アジア政策—アジア冷戦への一試論」法政大学法学志林協会編『法学志林』第 100 卷第二号、2003 年 2 月、27-61 页。

司徒雷登访问北京，展示了灵活的外交姿态，但是由于美国国务院的禁止，双方未能会面。¹中共又因为秉持着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方针，因此也无法期待缓和跟美国的敌对关系，所以加入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便成了在国际关系上的唯一选择。在斯大林提出势力均衡的 1949 年 7 月，毛泽东宣布将对苏联的“一边倒”作为新中国的对外基本政策，表明将加入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² 1950 年 2 月缔结了包括中苏结成军事同盟条款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³

另一方面，在 1950 年 1 月，美国总统杜鲁门与斯大林一样，预料到中国将作为大国立足于世界，因此对中国提出了势力均衡这一概念。1 月 5 日，杜鲁门发表了以不干涉台湾问题为要点的总统声明，一周后（1 月 12 日）美国国务卿长官艾奇逊发表了被称作“艾奇逊防线”的讲话：位于亚太的美国安全防线从阿留申列岛延伸到日本，琉球诸岛，与菲律宾诸岛相连。朝鲜半岛和台湾，以及印度支那半岛被划在了这条防卫线之外。可以说，艾奇逊防线重新确认了美国过去在开罗宣言中承认的中国在东亚的大国地位。⁴

但是，次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缔结，在美国眼中，与其说中国成为了独立自主的大国，不如说沦为了苏联的周边国家。美国惧怕朝鲜半岛、台湾，以及印度支那半岛落入苏联势力范围内，这与《杜鲁门声明》和“艾奇逊防线”所表明的对中国政策自相矛盾。⁵

中苏朝鲜依旧相信《杜鲁门声明》和“艾奇逊防线”的有效性，认为美国不会对中国统一与朝鲜统一进行干涉。金日成计划统一朝鲜，斯大林认为需征得毛泽东的同意为条件，因此，1950 年 5 月，金日成访问北京请求毛泽东同意开始统一战争。毛泽东在跟斯大林商议后同意了金日成的请求。⁶中共决定优先支持朝鲜和越南的解放事业，解放台湾则放到第二位。

然而，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就立即采取了对韩国的支援措施，同时，杜鲁门总统在 6 月 27 日向台湾海峡派遣第七舰队，发表了“将阻止任何针对台湾的攻击”的声明。⁷

10 月 13 日毛泽东发出了《朝鲜战争参战电报》。这份电报是针对 10 月 11 日从莫斯科发来的斯大林和周恩来联署，以“同意美国对北朝鲜的占领”⁸为主旨的电报的回电。这份《参战电报》不是跟斯大林协商，而是毛泽东单方面将参战决定通报给了斯大林。⁹对于将失去一部分苏联交于自己的支配地区这个事实，毛泽东无法接受。同时亦无法接受中国周边有敌国存在，尤其是敌国数量将有所增加的状况。

朝鲜战争使得东亚地区南北朝鲜、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国家分裂的事实固定化。不仅如此，还使得美国对日本的价值有了重新认识，促使美日同盟的成立，并导致中朝对美日韩台的东亚冷战秩序的形成。

从 1950 年开始，苏中两国共同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并宣布要对其进行阻止。1951 年苏中反对以日本和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阵营各国结成的“单独议和”条约，苏联虽然出席了旧金山和会，但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一起拒绝了在《对日和约》上签字。苏联还行使否决权，阻止了日本加入联合国。

在这样的情况下，1956 年 10 月 19 日，鸠山一郎首相和苏联的布尔加宁总理发表了《苏日联合宣言》，决定恢复邦交，并在签订《俄日和平条约》后，苏联需将齿舞群岛和色丹岛返还日本，并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但是，在中国看来，苏联虽然在语言上积极支持中日讲和，

²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中国外交官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29-30 页。

³毛泽东《人民民主主义独裁论》（1949 年 7 月 1 日）、毛里和子·国分良成编『原典現代中国史 政治・上』岩波書店、1995 年、30-32 页。

⁴太田勝浜・朱建荣编『原典中国現代史・外交』岩波書店、1995 年、45-48 页。

⁵同上、50 页。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国部会編『新中国資料集成』第三卷、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1969 年、36 页。

⁶陶文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二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2004 年、1-43 页。

⁷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和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年、190-193 页。

⁸太田勝浜・朱建荣编、前掲书、53 页。

⁹沈志华、前掲书、240、244 页。

但苏联轻易地对美日让步，则有损中国的利益。

从 1960 年开始，因为反对新的美日安保条约，苏中又开始共同展开了对日批判。1960 年 12 月，苏联撤回了 1956 年《苏日联合宣言》表明的将齿舞群岛和色丹岛返还给日本的规定。日本对此表示抗议。

这一时期的中苏日关系，也有过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的中、苏、日本共产党（以下简称日共）三党关系的局面。东亚各国共产党直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50 年，苏中两党在一个时期内，批判日共的和平革命论，支持日共中的武装斗争路线派，从而导致了日共的分裂。而日共由于内部的混乱，失去了迄今为止日本国民的高度支持。

斯大林去世后，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起，毛泽东跟苏联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导权。这实际上是变相的大国间领导力的争夺，也造成了中苏关系的敌对化。¹⁰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在中苏论战、决裂的进程中，日本共产党和北朝鲜、北越等东亚各国的共产党，几乎都支持中共。1963 年日共跟中国一起，批判了在苏美英三国主导下缔结的停止部分核试验的条约。苏联支援日共中的志贺义雄等条约支持派，苏日共产两党关系交恶。

1964 年 1 月，毛泽东会见日本共产党访问团时指出，“在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上，我们的矛头主要指向赫鲁晓夫。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上，我们集中力量将矛头指向美帝国主义”，将苏联与主要敌人美国相提并论。¹¹

接着在 7 月 1 日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访中团，首次公开提到中苏领土问题，在指责苏联的同时又突然支持日本对北方四岛的主权，更进一步说到：“应该将千岛列岛全部还给日本”。¹²

以日共为首的位于东亚的北越、北朝鲜、印尼等主要共产党对中共的支持，一直持续到 1965 年。3 月 1 日中国反对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国际会议”的筹备会上，苏联将其名称改为“协商会议”，邀请各国共产党参加，但上述各党均缺席。翌年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批判日共和朝鲜劳动党也是修正主义，与这些党的关系走向恶化。中共和日共的政党关系在 1998 年才终于得以恢复。

二、东亚冷战的缓和——中美日反苏统一战线（1972~1989）

1972 年 2 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东亚的美中势力均衡关系得以重建，美中和解。在尼克松和毛泽东的秘密会谈中，对以下问题达成了共识：美日同盟不是反中同盟，而是抑制苏联和日本自身的装置；不允许日本介入台湾问题；美军从台湾和印度支那撤军。¹³从上述美中共识中能够嗅到“艾奇逊防线”复活的气息。尼克松与毛泽东的共识也被称为《七二年体制》。可以说冷战体制是以东亚为先驱开始溶解的。

同年，田中角荣首相访华使得中日邦交正常化得以实现。田中角荣又于次年 10 月访问苏联，与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发表了《日苏联合声明》，意图改善日苏关系。但是，之后在中美日三国对苏联这样的对立机制形成的过程中，日苏关系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逐渐降温直至首脑交流长期中断。

日中邦交恢复后，中日协商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方强烈要求写入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刺激了苏联。此后 1978 年缔结的友好条约中加入了作为一般论调的“反对霸权主义”。

同年 12 月，得到苏联支持的越南开始对柬埔寨进行全面侵略，翌年，苏联亦加入了阿富汗内战。中美日和东南亚各国均认识到了苏联是个具有强烈攻击性的军事威胁，迅速形成了旨在反制苏联和越南的统一战线。邓小平于 1978 年 11 月开始历访美国、日本和东南亚四国，

¹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556 页。

¹¹左凤荣《中苏同盟破裂原因析》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年、543-556 页。

¹²朱建荣『毛沢東のベトナム戦争』東京大学出版会、2001 年 82 页。

¹³『日本外交主要文書・年表第二卷』鹿島平和研究所、原書房、1984 年、「(八) 日本の北方領土返還要求を支える毛沢東中国共産党主席の日本社会党訪中団に対する談話 7 月 10 日」517-518 页。

其中有一项工作即为，想从各国获取他所说的“对越进行军事惩罚”的支持。¹⁴中国军队在中越边境从2月17日起进行了持续一个月左右的军事进攻。此后，邓小平指示进行“实战训练”。中国军队每年轮换两个集团军，进行“轮战”，持续对越南施压。¹⁵

（按照越南的逻辑，有了和苏联的盟约就可以制衡中国，安全上会有保障。可按照邓小平的大国逻辑则是，苏越盟约损害了中国的周边利益和中国的安全保障，所以必须惩罚越南。而苏联在中国真的对越动武之后，就要选择是否尊重相关大国中国的周边利益，并且当时中国得到了美日的支持。结果，苏联按兵不动，没有采取军事行动支援越南，即选择了尊重中国的周边利益。）

中越边境战争以及苏联加入阿富汗战争后，形成了中美日与苏越对立的构图。中美日建立了堪称“蜜月”的关系，一直持续到1989年6月。

三、后冷战期的中俄日对等三角关系（1990-2011）

1989年冷战结束，中美日的反苏统一战线也自然消亡。此后约到2010年为止，中国努力加强与俄罗斯关系的亲密化。而日本对中国崛起的牵制意识不断增强，并为此努力改善对俄关系。俄罗斯则积极推进对中日两国的外交以谋求平衡，可以说中俄日关系形成了这样一种对等三角关系。

同时，中日俄三国关系，在冷战时期特有的意识形态和军事集团的对立关系自然消亡以后，领土问题、历史认识问题这类的具体问题，还有作为近邻的地缘政治意识所衍生的力量竞争问题成为了赤裸裸的争论点。

邓小平于1982年宣布了“独立自主全方位的外交方针”，¹⁶换句话说就是突破此前中国力主的中美日反苏统一战线外交，而要致力于中苏关系正常化。如前所述，邓小平在1979年2月果敢地实施了自己所说的“对越惩罚战”，¹⁷而苏联虽然在1978年11月缔结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规定：“一旦双方中之一方成为进攻或进攻威胁的目标，缔约双方将立即进行协商以消除这种威胁，并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保障两国的和平与安全”¹⁸，但是对来自越南方面的军事支持的请求，苏联以条约上没有军事规定为由而拒绝。邓小平是对苏联有可能在中苏边境挑起冲突做了准备的。笔者父亲曾率当时沈阳军区仅有的三个坦克师中的两个奔赴了黑龙江前线。可是苏联选择了按兵不动。因此可以推断，邓小平由此确认了苏联并没有对中国使用军事力量的意思，可以认为邓小平解除了他对苏联的不信任感。邓小平此后在中苏和解问题上，对苏联提出了有名的“邓小平三条件”，即“从中苏国境和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不支持越南的反华政策。”1989年戈尔巴乔夫总统满足了这些条件，并且访华与邓小平达成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和解宣言。此后，中苏于1991年缔结了国境协定，1992年中俄批准了该协定。中苏（俄）事实上把两国国境、蒙古，及从苏联独立出来的与中国接壤的中亚各国一带，作为了中苏（俄）共同的周边地带，消除两国在地缘政治上的负面竞争，开拓了两国关系亲密化的道路。¹⁹综上所述，可以说中国终于在1972年与美国、1989年与苏联完成了在中国周边地带的三大国势力均衡格局的构建。

1989年6月，邓小平向军队下令，镇压由学生和市民发起的民主化运动，造成了天安门事件，中国受到了西方各国的制裁。此前构筑的中美日之间的蜜月关系，使得西方的制裁较快得到缓和并终结，但是中国跟西方的蜜月关系也就此终结。从那个时期开始，中国所处的地缘政治局面发生了下述构造性的变化。

¹⁴毛里和子・毛里興三郎译『ニクソン訪中機密会議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1年、7-8页。

¹⁵益尾知佐子「鄧小平の対外開放構想と国際関係——一九七八年、中越戦争への決断」『アジア研究』2007年第四号、1-19页。

¹⁶张铨秀《军旅生涯》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38-439页。倪创辉《十年中越战争》天行健出版社、2009年。林載桓『人民解放軍と中国政治—文化大革命から鄧小平へ』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4年。

¹⁷太田勝浜・朱建榮編、前掲書、188-190页。

¹⁸J・カーター（日高義樹観修、持田直武・平野次郎・植田樹・寺内正義訳）『カーター回顧録』上、NHK出版、1982年、316-318,329-333页。

¹⁹小笠原正明『外国学研究XI』興文社、1980年、38页。

①美日对中国的关系因不同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的问题，及历史认识问题和钓鱼岛、台湾问题等框架性问题的存在，国家利益的对立有可能激化。②中俄关系在框架问题上都得到了解决，两国关系将有可能继续保持亲密化。③中俄是两个陆地接壤的大国，从国家利益上来说两国除了保持良好关系外，无其他选项。④美中俄是世界三大国，中俄亲密合作，就宿命性地成为了在对美力量平衡上的唯一选择。

这个时期的中国领导人——国家主席江泽民、李鹏总理等，大多都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有过留学苏联的经历。作为知俄派，他们积极推动中俄关系亲密化。1994 年 9 月江泽民从邓小平那里全权委任权力后，就立即以中俄为核心规划构建北部周边国际秩序。江泽民在约一年多的时间里做通了叶利钦俄国总统及跟中国接壤的中亚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各国首脑的工作，于 1996 年 4 月在上海招待各国元首，成功举办了起名为“上海五国”的国际会议。²⁰这是中国首次主导建立的多边集团合作组织，也是中国首次进行的集团主义外交。标志着中国外交从标榜不结盟双边外交向主动创新推动多边集体合作外交的结构性转变。²¹中国推行每年由成员国轮值主持召开首脑会议。在 2001 年轮到中国主办时，江泽民说服乌兹别克斯坦参加，并改名为“上海合作组织”，进而制定宪章，设置常设总部于北京，水到渠成地建设成了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²²

I. 2015 年现在，上海合作组织在上述的六个成员国的基础上，陆续增加了印度、巴基斯坦两个新成员国，白俄罗斯、伊朗、蒙古、阿富汗四个观察员国，斯里兰卡、尼泊尔、土耳其、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柬埔寨六个对话伙伴国，以及作为会议主席国客人与会的永久中立国土库曼斯坦，成长为了涵盖白俄罗斯和土耳其以东的亚欧大陆且没有西方国家与会的巨型国际组织。

II. 中俄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参加国在阻止恐怖主义、民族独立运动、原教旨主义势力的活动，以及阻止西方民主主义革命的渗透上看到了一致的利益，结成了维持既存政治体制的现代版“神圣同盟”，并在其二十多年的历史中也确实保障了包括参加国在内，尤其是中俄的政治安定，并使得中俄之间的关系更为亲密化。这一点对饱受颜色革命冲击的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吸引力，致使越来越多的亚欧大陆国家希望以某种形式参加上海合作组织。中俄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契机，在长期合作中培育了相互高度信任的亲密伙伴关系。同时，中俄以上海合作组织为阶梯，从 2003 年开始成功举办了中俄印外相会议·首脑会议、并于 2009 年成功创建 BRIC，与包括印度在内的巴西和南非等新兴国家建立了伙伴关系。成功扩展创立了金砖四国，之后中国又邀请南非，建成了今日的以新兴工业国金砖五国为中心的非西方国家全球伙伴关系。

日俄两国在对华关系上为寻求力量平衡，有一致的愿望。在此因素下，日俄长期以来冀求改善双边关系，但是日俄难以克服北方四岛的领土争端，日本又难以摆脱美国对日俄改善关系的负面牵制，因此日俄关系难以达到中俄关系的发展水平。

1991 年 4 月，戈尔巴乔夫作为苏、俄最高领导人首次访问了日本，但是 12 月 25 日苏联便解体。两年后的 1993 年叶利钦总统访日，之后叶利钦和桥本龙太郎首相实现了互访。两国为解决北方领土问题进行了努力，但是没有结果。2000 年就任的普京总统和小泉纯一郎首相屡次进行会谈，但也未能看到两国关系的明显进展。

这期间日俄着力发展两国经济关系，其中围绕俄罗斯远东地区石油出口的输油管线的建设，中日两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在中俄首脑 2001 年缔结的协定的基础上，中俄的石油公司

²⁰「ゴルパチョフ・ソ連書記長のウラジオストク演説（86 年 7 月 28 日）」『極東の諸問題』ナウカ発行、第一六卷第二号、23、29 页。

²¹潘光、胡键《21 世纪的第一个新型区域合作组织——对上海合作组织的综合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年、1、57 页。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上海合作组织——新安全观与新机制》（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 年、63 页。

²²参照下面的研究——展开中国外交的集团主义外交。赵宏伟等编著『中国外交の世界戦略』明石書店、2011 年、序章、第二、第十、十一、十二章。

在 2003 年 5 月 29 日缔结了从俄罗斯远东到中国石油基地大庆市的中俄管线建设合同，但是两天后的 5 月 30 日，普京总统却在公开场合对此发表了异议。其背景是小泉首相提出了由日本支援建设太平洋管线的方案，此方案否定了前述的优先建设陆路直达大庆市的中俄管线的计划。日本提出了不途经中国的，太平洋路线的建设方案和资金援助。另外，有俄方报道认为，中俄管线地处人口稀薄的俄罗斯远东，担心因此会加大中国人口的流入，加大中国在俄远东的存在感。对于俄罗斯来说，日本提出的太平洋管线，无需担心主导权被中国掌握，并且可以通过日本海，不仅对中国还可对日本、台湾、东南亚，甚至美国西海岸出口石油，且可以按照国际价格出口石油。2003 年小泉和普京首脑会谈的联合声明写进了建设太平洋管线的合作项目。²³中国将日本的举措看作是日本对中国反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所进行的对华报复。

可是，日俄协商了两年多，俄方未从日本得到令人期待的建设资金，从中国融资 60 亿美元后，作为太平洋管线的支线，恢复了中俄管线，²⁴并于 2010 年竣工，投入使用。而太平洋管线在 2015 年仍然在建设之中。

日俄的经济合作始终存在着国家意向和市场经济导向上的结构性矛盾。无论国家多么积极，日方能做的只是鼓励民间企业对俄投资，而民间企业是不会冒亏损风险去投资的。俄国辽阔的远东地区只有 600 万人口，没有市场也没有劳动力，除油气资源的开发出口之外，对日本民间企业没有投资吸引力。所以日俄两国政府努力至今，日俄的经济合作从来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反观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尽管中日关系持续恶化，也连年保持世界前列的水平。

2009 年 6 月，中俄签订了《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计划纲要》。笔者 9 月在莫斯科就此问及俄罗斯外交官和财经界人士，他们都说：远东和东西伯利亚的经济除了走与中国及东亚搞经济一体化之外别无出路。看来，俄罗斯精英们已认识到，在资金、劳务、市场等经济要素上无法期待中国以外的国家，那就只能克服自身的“中国过敏症”，把振兴远东和东西伯利亚的希望寄托于中国企业了。

这时期，中俄日在以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为中心的构建东北亚集体安全保障体制上，展开了外交战。²⁵2002 年 10 月起，美国布什总统三次向江泽民国家主席要求中方介入朝鲜核问题。放弃了美国单独与朝鲜进行谈判的政策，改换成由美中日俄与韩国、朝鲜六方会谈，进行多边谈判的政策。提出：以中国为主席，召开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解决朝鲜核问题。开始，中国仅反复阐述一贯立场说，朝核问题是美朝问题，没有表示接受召开六方会谈的美方提案。²⁶布什向江泽民提出，“如果北朝鲜不停止核开发，日本也不会放弃进行核开发的想法”“外交上如果不能解决朝鲜核问题的话，就不得不考虑军事手段”。结果，在布什的强势要求下，终于，江泽民同意了参加谈判。布什作为新总统是放弃了至今为止的美朝单独谈判，孤立中国的政策。在北朝鲜问题上将领导权交给中国，以东北亚地域为框架共同管理北朝鲜，这个新通道最终在美中之间达成了一致。江泽民在承诺了布什的要求后立刻行动，经筹备于 2003 年 8 月中国作为主席国正式召开了六方会谈。

2004 年 11 月，美国派总统助理赖斯女士（后继任国务卿）访华，正式提出了“六国协议框架恒久化”的提案。其内容要点是：①在北朝鲜核问题谈判成功时，立即扩充六国会议的机能，升格为安全保障会议体。②就替代 1953 年《朝鲜停战协定》，谈判缔结新的多边和平协定。²⁷实际上，从 2003 年 8 月召开第一次六方会谈会议开始，中国的研究者就已经公开发表了“战后东北亚国际关系最大的转折点”“新地域安保系统的诞生将是划时代的变化”“中国的目的是构筑由六国组成的东北亚集体安全保障体制”等言论。²⁸也可以观察到，中国政府 2004 年就已经按着自身的经验模式开始构想并推动东北亚集体合作体制的形成。

²³ 《人民日报》（中国共产党机关报）2001 年 6 月 16 日。

²⁴ 岩城成幸「東シベリア石油パイプライン計画と我が国の取り組み—現状と問題点」、『レファレンス』2004 年 10 月号、9-33 页。

²⁵ 『日本経済新聞』HP、2005 年 2 月 2 日。

²⁶ ジョージ・W・ブッシュ『決断のとき』日本経済新聞社、2011 年。

²⁷ 春原剛『米朝対立』日本経済新聞社、2004 年、407-431 页。

²⁸ 同上、2004 年 11 月 19 日。

当时，中国在周边已经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和中国·东盟集体合作机制。从其形成过程中可以看出的一个共同的做法是，积极谋求经济一体化、用以加厚并稳固共同的利益基础。而其中的一个方法即为，在广西省和新疆每年召开“中国·东盟博览会”和“欧亚大陆博览会”。中国政府 2004 年决定，2005 年于吉林省长春市设立“东北亚投资贸易博览会”，此后一直到 2015 年现在，这一博览会年年在长春召开。可见，中国是继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集体合作机制之后，又构想并推动了第三个同类型的东北亚集体合作体制的构筑。东北亚集体合作机制包括了美国是其最大特征，也是中国的目的。中国意识到，东北亚六国框架中，美国的影响力提供一个在亚洲存在的位置，当时美国在既存的“东盟加三”和“上海合作组织”中都没有存在的正当性。在东北亚流过框架中包摄而不是孤立美国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特别是东北亚六国框架有利于培育美中俄三大国家的信赖和合作关系，而在这其中就可能引发美韩·美日同盟渐次相对化，这些都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六方会谈经过五年多的努力，途中在 2006 年 10 月克服了北朝鲜进行初次核试验所带来的危机，2007 年，终于达成全面协议。其要点如下：①北朝鲜放弃所有的核开发，核计划。②与之相对应，美国不在朝鲜半岛配置核武器，承诺不对北朝鲜使用武力。③美朝以步骤对应步骤，同步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美朝、日朝关系的正常化，以及各国对北朝鲜的经济援助。④为了完全履行六方会谈协议，设立了五个分会组织——朝鲜半岛无核化分会、美朝关系正常化分会、日朝关系正常化分会、经济和能源合作分会、东北亚和平·安全机制分会。第五个分会的设立，是就东北亚集体合作体制的构筑，由六国一致同意并以国际协定确定下来的历史性成果。俄罗斯自告奋勇当上了第五分会的主席，并于 7 月末召集各国在北京的俄罗斯大使馆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笔者 9 月在莫斯科访问了担任第五分会主席的俄罗斯六方会谈特使乌拉吉米尔·拉夫马宁，他自豪地表示全员一致赞成他提出的正式建立东北亚集体合作组织的提案。²⁹

2008 年 6 月赖斯美国国务卿访日，对福田首相说“将朝核六方会谈升格为外长级别，正式宣布建立东北亚和平·安全保障机制”。布什总统是在任期届满之前，将东北亚集体合作体制建立起来，作为成果传承下去。

可是，对于赖斯国务卿的提案，日本首次表明了对建立东北亚集体合作体制的困惑。日本政治家和主流媒体频繁宣扬旧时的日英同盟终止的那个“噩梦”：“日本在 20 世纪初，与当时的超级大国英国结成同盟，勉强挺过日俄战争。可是，日英同盟大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二十年左右被终止，（被华盛顿体制所替代）进入多边安保体制时期。其时日本在多边体制中陷入孤立，其后走上了战争的道路。中曾根康弘曾经说过：日英同盟被废弃的结果导致了日本的失败。现在在美国也产生了同样的想法，即在亚洲建立多边安保机制，用以减轻美国在履行同盟义务上的负担。”福田对赖斯的提案表示反对，他认为，“应该以日美同盟为轴心，来应对亚洲的安保问题。”³⁰

结果，六国外长会议没能召开，从布什到奥巴马，美国权力交替，进入了政策再研讨时期。但是直至 2015 年奥巴马两届任期结束，美国也没有提出新政策仅仅是放弃了老政策。奥巴马声明回归亚太，参加了东亚首脑会议，强化了与日韩的同盟，但是对于在这之前应该考虑的朝鲜核问题却难以决定其政策。放弃了六方会谈的全部成果。八年之间，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安全局势持续恶化，但是，美日似乎更乐于也有声音认为，“朝鲜威胁”的持续存在，有利于强化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牵制“中国威胁”，破坏东北亚和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六方会谈以及相关活动，目前处于完全停止的状态。

在这个时期，针对领土问题，日本与中俄以及韩国之间也展开了外交战。但是，不存在中俄韩合作与日本进行较量。如前所述，中国在 1960 年代，在毛泽东批判苏联时，虽然说了北方四岛是日本的领土，但是不介入他国领土纷争是中国一贯的政策。不过，2010 年前后，中俄虽然没有采取相互支持对日领土主张的政策，在对日领土主张的论述上是达成了一致的，

²⁹『朝日新聞』2003 年 12 月 11 日。金熙德《东北亚构筑集体安全》《中文导报》2003 年 8 月 28 日。

³⁰笔者参加的第五回日俄学术·报道关系者会议访俄团与俄北朝鲜核问题担当大使弗拉基米尔的研讨、2007 年 9 月 17 日。

加强了对日本的压力。

2009年梅德韦杰夫总统在新加坡，登上了来访中的俄罗斯导弹巡洋舰瓦良格，针对北方四岛问题声明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认为“在地缘政治上不能容忍对其重新审视”明确提出了这样的“战后秩序领土论”。³¹第二年9月，在钓鱼岛海域，日本巡视船和中国的渔船发生冲撞，在日中关系正处于紧张时期，梅德韦杰夫总统访华，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六十五周年联合声明》，指出“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文件已经对二战下有定论，决不允许篡改。”³²梅德韦杰夫并于这一年的11月和2012年7月作为俄罗斯首脑首次登上北方四岛。中国或是学习俄罗斯的论述，或是被俄罗斯的行动力所推动，在之后的2012年9月，对于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进行强烈反击时，首次正面提出了战后秩序领土论。中国过去一贯主张“自古以来领土”这种固有领土论或说历史领土论，但是此次是重点批判日本政府“公然否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直接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是对联合国宪章的主旨和原则的重大挑战”。³³

四、安倍·普京友情外交对中俄“特殊关系”（2012~）

2012年，是普京、习近平、安倍作为俄中日最高领导人的就任之年。比起与中韩的关系，安倍优先强化与俄罗斯的外交，其特点是倾力从于与普京建立友情入手。日本与中韩的关系，由于历史认识问题和领土问题的恶化达到了史上最坏的状态，不要说首脑会谈，部长级的外交都停滞不前。安倍在历史认识问题和领土问题上，在信条上属于日本最右翼，因此也就很难期待日本与中韩关系的改善，对安倍来说在东北亚重视日俄关系就是其外交的唯一选择了。

不过，安倍在对俄外交上手上并无好牌。对于俄罗斯最需要的开发远东的资金和劳动力，日本并无投入余力。即使筹集了资金，远东没有劳动力，而本来就在劳动力供应上处于人手不足状态的日本也无法从日本调集劳动力，结果在劳动力上也还是要依靠中国大陆。友情外交确实是安倍可以打的牌，可是等待他的还有一直不希望日俄关系亲近化的美国的牵制。

看透了一切的普京，虽然接受了安倍的“友情外交”，显然友情是不足以交换来归还北方四岛的，更无力交换俄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但普京目的明确，远东的太平洋石油管线已经开通，希望油气的大宗消费国日本，放弃一些传统的中东卖家，大批量购买俄罗斯油气。苏联·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管线网铺遍欧洲，从冷战时代到现在即使国际情势和各国亲疏变幻无常，俄罗斯对欧洲的油气出口能够持续发展。这对俄罗斯来说不仅是财富和国力的维持和增长，还有国际地位和外交力量的维持和强化。俄罗斯是要把这个成功经验战略性的在日本、也在中国和亚洲推广开来。

安倍包括利用国际会议的场合，和普京总统在2013年实施了4次首脑会谈。日俄关系，可以说达到了史上友情最好的时期。4月29日安倍访问俄罗斯，和普京总统在联合声明上宣布“加速对两国都能接受的最终解决方案的摸索，为此开展谈判”。8月19日日俄召开了协商日俄和平条约谈判的副外长级会谈。在2014年2月8日的索契冬季奥林匹克开幕式上，在西方首脑集体缺席的情况下，普京高度评价了前来参加的安倍首相，并在官邸招待安倍，以示欢迎。安倍邀请普京于当年10月访问日本，意图在北方四岛和日俄和平条约缔结问题上取得进展，实现日俄关系的亲近化。

但是，同月俄罗斯参与了乌克兰内战，且强行合并了克里米亚。美欧强烈批判俄罗斯，日本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被迫与美欧一起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

普京总统在5月，针对日本在乌克兰问题上参加美欧的对俄制裁，表示：“知道之后很惊讶”，并质问说：“我们是有谈判（日俄和平条约）的准备的，但是日本准备好了吗！”³⁴

7月，日本又不得不参加美欧对俄罗斯的追加制裁。俄罗斯外交部批判说：“这次不管日

³¹『日本経済新聞』2010年1月22日。

³²共同通信社、2009年11月18日。

³³「人民網・日本語版」<http://j.people.com.cn/94474/7154399.html>2015年1月28日确认。

³⁴《中国外交部长助理乐玉成演讲》《人民日报》2012年9月15日。「中国外相の国連総会発言」時事通信社、2012年9月28日

本如何声称制裁不似美欧那样严厉，都会给两国关系带来了全面的损失，必至倒退”。³⁵俄罗斯取消了定于8月的日俄副外长级会谈与10月的普京访日。8月12日，俄罗斯国防省还宣布了在南千岛群岛（日本声张主权的“北方四岛”）开始了军事演习。日俄关系又陷入僵局。普京访日推迟到2016年12月才得以实现。此时，主张改善美俄关系的特朗普已经当选美国总统，美国反对改善日俄关系的压力变小了。但是，日本仍然无法脱离美欧对俄国的经济制裁，普京访日也仅仅是在日本支援俄国远东地区经济开发上签署了一些共识文件，在和平条约等两国政治关系上没有进展。

与其相对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4年7月9日会见了访华的俄罗斯总统府长官，定性“中俄关系是特殊关系”，宣布不参加西方就乌克兰问题对俄罗斯的任何制裁，并表明如果有需要会尽力支援俄罗斯。³⁶

如前述，中国在世界战略上，追求美中俄三大国关系中的中俄特殊关系对美国的势力平衡，推行不接受来自他国的压力的“独立自主外交”。习近平在2013年3月就任国家主席的一周后访问俄罗斯，展示了不考虑美国好恶的现实主义的姿态。中俄的联合声明提倡主权和领土的保全、反对霸权主义和不干涉内政、反对独善的安全观、主张对等和不可分割的共同安全，倡议构建亚太集体安保架构等，展示了习近平外交的基本原则。特别是构建亚太集体安保架构，曾是过去苏联在70年代提出的，直接遭到了中美的拒绝，但是这时习近平鲜明地展示了携手俄罗斯对美再平衡的选择。

2014年习近平最初的外访国也是俄罗斯，2月作为中国国家元首初次参加了奥林匹克开幕式（索契冬季奥林匹克），与普京进行了会谈。3个月后的5月，习近平在亚洲相互合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ICA）上，在上海迎接普京，发表了第二个中俄联合声明。两国元首亲临两国海军东海联合演习司令部共同发布了演习开始命令。这是中俄海军混合编成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实弹演习。5月21日，中俄还缔结了高达4000亿美元长达30年的天然气进口合同。

“亚洲主导”是习近平在这次上海CICA第四回首脑会议上提出的纲领。习近平提出“亚洲问题应当由亚洲主导来解决，亚洲的安全保障也首先应该通过亚洲各国自身加强合作来实现，这是完全可能的。”³⁷《CICA上海宣言》中，针对美国及西方的霸权行为宣言：“我们认为任何国家不能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加强自身安全。”“我们强调任何国家、国家集团或组织在维护和平与稳定方面都不具有特殊优先责任。”“强调安全具有共同、不可分割、平等和全面的特性的重要意义。”“谋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³⁸这些新原则被国外舆论称之为“习亚洲主义”“习安全保障观”。2013年中国就周边外交提出的“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在2014年亚洲也被纳入范围中，提出了建设“亚洲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³⁹而“亚洲命运共同体”在2015年的中央外交工作会议上，更被提升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成为了中国的世界战略的最高目标。

“中俄联合声明”也呼吁实现“欧亚大陆经济统合”。⁴⁰习近平在这之前访问欧洲时，以“东西两大文明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关键词来评价与EU的关系。并在布鲁塞尔提出，中国与EU之间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的合作，将带来和平、成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

2014年的中俄联合声明，对习近平所构想的亚太集团安保框架，欧亚大陆经济统合，中俄战略协作远远超出了两国和周边及亚洲范围，呈现了全球战略的协作格局。习主席提出“一带一路”战略计划，与普京总统达成了与俄罗斯等旧苏联数国建立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对接的共识。俄罗斯参与的叙利亚内战、伊朗核开发、乌克兰内乱等问题上，中俄双方都表明了支持对方的态度。2015年，中俄共同举行对德日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表示“坚决反对歪曲历史，破坏战后秩序”，声援了中国的对日批判。联手反对美欧的干涉，进行反恐

³⁵ 『日本経済新聞』2014年8月5日。

³⁶ ロシアNOW 2014年7月30日。

³⁷ 新华社2014年7月9日。

³⁸ 《人民日报》2014年5月22日。

³⁹ 新华社2014年5月21日。

⁴⁰ 《李克强总理：2014年度博鳌亚洲论坛演讲》（新华社2014年4月10日）。

维和促安定。中俄紧密合作，促成了中美俄三大国以及三大国加欧盟的世界顶级力量格局，促进了全球治理，维护并改善了国际秩序。

中国通过天然气管道长期间以较便宜的价格大量从俄罗斯购买天然气，使得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掌握了定价权。曾计划以 LNG（液态气）的形态向中国出口的北美和非洲产天然气的期货行情，至 5 月份下跌了五成，讴歌页岩气革命和能源霸权的美国，突然面临了价格跌破成本的可能。中俄联手确保了在能源的权益和安全保障方面的战略优势地位。

转而再看东北亚的日中韩三国。习近平于 2014 年 7 月访问韩国，与朴总统发表联合声明，①对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和解除宪法对集团自卫权的解释进行批判；②对日本解除对朝鲜制裁表示担忧；③决定中韩 FTA 项目于年内缔结。习近平提出中韩两国在实现亚洲梦，振兴亚洲方面将担负起主导作用。对此，朴总统回应道，韩国希望成为习近平提出的新丝绸之路经济纽带的大门。

结论

俯瞰 20 世纪 40 年代末以来的日苏（俄）中关系。大致的进程是从战后中苏同盟对日美同盟的对立关系开始，到中美日统一阵线对苏联的对立关系，经过了中俄日的对等三角关系阶段，发展到了现在的中俄关系的亲密化和特殊化及全球战略协作，和与之对比仍处在没有走完双边关系正常化阶段的日俄关系。

关于日苏（俄）中关系的历史法则和变动机制，能看出什么呢？

俯瞰日俄关系和其对华关系的历史，①日俄的对华牵制及谋求势力平衡的意识，②日俄的领土问题，③美国的负面牵制等要素发挥了作用。第①点的日俄对华牵制及谋求势力平衡的意识，随着历史的推移，其作用已经甚微，可以说现在几乎没有起到作用。②和③这两点在日俄关系和两国对华牵制上一直都是起负面作用，即阻碍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也使两国不可能有效地牵制中国，而对中俄关系的亲密化却起了促进作用。这两点可以说反复向中国显示着日俄关系的亲近化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日俄关系始终只是在局限于“四岛值多少钱”这类归还四岛及其相关问题等，狭隘浅薄的层面上，对此我们不禁想问日本外交除了牵制中国之外还有何目的。

放眼中俄关系中的对日关系历史，可以认为是以下几个要素在发挥作用：①世界大国中俄的周边秩序中的对日关系，②世界战略面的中俄关系中的对日关系，③中俄日三国间的利益调整。

①中俄关系虽然经历了迂回曲折，但是两大国关系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世界大国间的势力均衡的法则。中俄虽然都犯过错误，但是共同构建起了互不侵害对方周边利益，联手维护共同的周边利益之地域秩序。经过磨合业已成熟的中俄关系，几乎没有留给日本对华牵制外交以可乘之机。

②中俄关系是两国世界战略层面的伙伴关系。其是谋求对美势力平衡的关系，是在上海合作组织、BRICS，还有联合国、G20 等的国际舞台上联手发挥领导力量的伙伴关系。而中俄关系中的各自的对日关系就没有这种世界战略层面的内涵，基本上是各自处理对日业务的双边关系。

③也有需要中俄日三国间进行利益调整的事项，如前述俄国石油出口的中国管线和太平洋管线的优先度竞争就是其中的一个事例。

这样看来，在中俄日关系中的日本的外交课题，除了关注日俄、日中双边关系，还应该认识到建立三国间乃至多国间的伙伴关系对日本开拓新的外交领域是极其重要的。例如，前述的朝核六方会谈，及以其为杠杆构筑东北亚集体合作体制，这对日本是参加国际事务，提高国际地位，避免国际孤立的贵重良机。日本应该积极致力于这种有规模、有深度的多边国际活动，已发展日本的外交。日本外交的现状，当局者即使自我感觉良好，也请自问一句：除了之于美国盟主，日本在国际社会又有多少存在感？

书评·书介

评 森川裕贵《政论家的矜持——中华民国时期章士钊与张东荪的政治思想》

水羽信男

(广岛大学)

- 原书评刊载于[日]『史学雑誌』第125卷第3号、2016年3月。
- 原书为[日]森川裕贵『政論家の矜持——中華民国時期における章士釗と張東蓀の政治思想』勁草書房、2015年1月30日。

根据著者的表述，文题中的“政论家”指的是不直接从事政治，而从发表与政治相关的议论中找到特有价值的人物。这种人在日语当中通常被称作“政治评论家”，而著者关注的重点是他们在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中形成的自我认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产生了一种观念，认为品行出众的人物不会去当官吏或议员；而与此同时，认为中国的根本性变革无法由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实现，只有通过新文化的创造才有可能实现，这种理解也获得了一定的支持。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能够既始终不放弃对于政治的坚持，又认识到从政界“外部寻求救赎政治的方法”之有效和重要，这其实并非是不证自明的（209页，以下括号内数字表示本书页数）。著者论述的章士钊（1881-1973）和张东荪（1886-1973）“对身为政论家的自己深感自豪感……深信政论家的存在能够带来政治的改善”（13）。因此，为了使自己的批评更有说服力，选择走“不依附任何党派的道路”，以此作为一种自我矜持（103）。

那么，著者为何选择章士钊和张东荪作为探讨对象呢？是因为这两位知识分子多年以来一直在论述的，一是关于为了创造出更好的中国而必然需要的中国政治蓝图，二是关于容许异议存在的公共言论空间的设立。且二人之间有着思想上的继承关系，“要想理解张东荪的论述，对于章士钊论述的理解是必不可少的”（24）。另外，对于著者来说，章和张表现出的矜持以及上述两点并不是已成过去的问题，而是在思考今日中国的种种问题时也“可以给予我们许多启示”的论题（23）。

本书结构如下：

序章 政论家、章士钊与张东荪

第1部 章士钊的政治思想（①对英国式政治的希冀——《民立报》中章士钊的政治制度构想；②对“好同恶异”的抗拒——《甲寅杂志》中章士钊的政治思想；③从对议会政治的失望到对职能代表制的希望——由《联业救国论》看章士钊的转变）

第2部 张东荪的政治思想（①政论家、张东荪的出发；②如何应对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论战与张东荪；③围绕民主和独裁的论争中张东荪的理论；④注视政治的士——张东荪在战后中国的政治思想）

终章 政论家的矜持

补论 高一涵的思想形成——以五四前后为中心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知识分子不断探索能够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危机中脱身的策略，著者找出这些策略的蓝本，阐明相应的知识分子是如何改造蓝本的

以及改造的理由，追问其中所包含的意义。这种方法论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正统，但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不少并不明示自身理论的来源根据，因此操作起来极为困难。然而，著者却展示了大量宝贵的研究成果。例如，梁启超把伯伦知理当作依据而极为重视国家和民族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高一涵（1885-1968）根据加纳的记述，指出梁启超式的伯伦知理解释实为“曲解”（225）。著者通过如此这般极为详实的实证，以还不曾得到充分阐释的政论家这一分析视角，对章士钊和张东荪的思想条分缕析。

此二人围绕中国政治蓝图所进行的讨论自足于何种根基？于章士钊是“政治的善恶正是由政治制度的善恶决定的”这一基本立脚点（74），于张东荪也是“法律或者政治制度的力量可以切实地抑制住人的恶性”这一理念（127）。而能够一直坚持这种基本立场不变这一点，如著者指出的，是需要注意的地方。原因在于，正如林毓生指出的，在传统言论强有力的影响下，文化的变革可以带来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整体变革这种思考模式也是为当时的知识界普遍所共有的¹。

然而不管是章士钊还是张东荪，他们的制度构想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是很难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开始强调品行的重要性。于章士钊，他在强调了品行的重要性之后，却开始和实际的政治扯上了关系。著者认为，由于这一选择，章士钊的言论失去了信用，失去了作为政论家的“光芒”（106）。与此相对的是，张东荪则自始至终苦守住了政论家的身份。然而在著者看来，张东荪重视品行这一点有康德的影响，而不是单纯向中国传统的返祖。张对于儒学的重视，是将其作为在没有基督教等欧洲人文传统的中国推广“自觉的自由”的杠杆（199）。从这个意义来说，他对于品行的重视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儒学的肯定性评价，可以说是为了让自由主义在中国立足的一个策略。

二人在提出自己的蓝本之际，将他人的批评看作是为了使自身提案更加缜密而所必经的阶段，因此意图创造出一个能够实现这种议论的言论空间。章士钊试图通过其自身参与编纂的《民立报》实现的目标正在于此，而在一九三〇年代的中国，随着日本侵略的逐渐加深，言论界对于“新式独裁”的期待开始抬头，但张东荪直至最后也未予声援，其重要原因也正在于此。张东荪宣扬具有认可批判性精神这一宽容态度的“文化的自由主义”在中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196），结果在进入一九五〇年代后遭到了共产党的镇压。

在本书的终章里，著者参照金子肇的研究，将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思想的两大潮流推想为意在强化政府的议论与以强化议会为必须的议论，强调以此二者的角逐重新检讨政治思想的必要性。在金子看来，所谓的立法权至上主义这一立场的抬头亦有带来了袁世凯等人的行政权至上主义的一面，但本书证实了已有知识分子在当时就理解了金子描述的“议会专政”这一问题²。章和张的主张及其转变显示出为了基于当时的政治状况来调和这两大潮流而进行的知性营为。而他们思想的根源，则在于章士钊强调的对于“好同恶异”的抵抗，以及张东荪“试图均衡巧妙地照顾到”向心力和离心力这个原则性的立场（124）。

关于章和张围绕职能代表制以及省自治所作论述之变迁，详见本书各章的小结及终章，而贯穿在这些论述深层部分的，是对于一般民众政治能力的极低评价。二人寄希望于基尔特社会主义，论述如何保证人们的日常生活，但他们却从未将受到社会主义恩惠的民众认同为政治的主体。原因是他们恐惧现实政治中民众的失控，不信任试图利用民众暴力性力量的政治势力，这可以从章士钊对于孙文派的批判以及张东荪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批判中看出来。而且，张东荪思想中的所谓平等是指机会的平等，这显示出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界，英国功利主义性的自由主义影响力很大。对于他们来说，布尔什维克作为理念宣扬的对于实质性平等的强调，剥夺了人们各自发展能力的机会，会阻塞自由。

本书对于学术界最大的贡献，在于呈现了政论家这个概念。在历来的研究中，或是将中

¹林毓生着，丸山松幸、陈正醒译『中国の思想的危機—陳独秀、胡適、魯迅』，研文出版，一九八九年。

²如金子肇『近代中国における民主の制度化と憲政』，『現代中国研究』第三一号，二〇一二年等著作。

国民主同盟等作为取代国共两党的第三方势力举出，或是设定下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这样的思想体系，将其发展过程放入中国历史中进行阐述。然而，还少有研究将焦点对准围绕议会制度及联邦制等中央与地方关系展开的政治体制论，分析在野知识分子的制度构想。这其中或许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近代中国缺少由法律来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这种想法”这一被近年的思想史研究所证明的事实（205）。但本书通过设定出政论家这一课题，极为绵密地以事实论证了中国也有一直在强调政治制度之重要性的人物存在。这一点是本书的独特匠心所在。

另外，著者在审视当时政治状况的基础上，阐释各个思想家论述变迁的主要原因及其意义。例如，当时橘朴痛批一九二〇年代的章士钊与军事势力妥协，而结果橘自己却也逐渐屈服于日本的军事势力。关于二人对军人的评价，著者指出“虽然也有被时代状况所制约的一面，但也可想见当时要判断军人在国家中的准确定位是很困难的”（98）。被迫面临艰难的选择而不得不在苦恼中选择应该走下去的路，著者不是为了给这样的个体人物断罪而叙述历史的。同时，只要是基于“自然欲求”的选择，即使这种选择给当事人带来了巨大的损害，著者也不对其加以否定（105）。像这样基于当时的状况来评价各个人物，作为历史研究者来说虽理所当然，但也极为困难。书评者从著者的研究姿态中感受到了作为人文科学的历史学的应有面貌，相信读者亦有同感。

本书结构严整，书评者并无基于其论述的疑问。然而，尚可以在汲取本书养分的同时从中发现一些今后需要探讨的课题。

第一个问题是有关针对思想史或者知识分子研究而发出的如下批评。中国社会中得以经验过海外留学的超精英阶层所进行的知性营为，到头来只能说是无法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纸上谈兵；或者欠缺对农村基层社会分析的研究无法逼近中国史的本质等等。对于这样的批评采取何种手法来应对可以有各种不同的选项，但书评者认为需要从正面应对，选取知识分子的中国社会论深入分析。因为在政论家论述的前提中，就包括了他们各自所持的中国社会论。

的确著者也指出，“二者【章士钊和张东荪——书评者注】虽颂扬地方和职能团体的力量，但实际上对其究竟有多少程度的理解是值得怀疑的”（211）。但在书评者看来，本书中关于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关注中间团体的章士钊和张东荪论述的分析，是极为耐人寻味的。

例如，张东荪曾在一九二〇年对中国“行”的排外性和垄断性之强敲响过警钟，但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却认为地方自治的传统可以为中国的民主化所用，开始寄期望于“同业公会”。著者指出张东荪为此调整了自己的言论，“故意不去触及同业公会的缺点”（190）。也就是说，地方上的精英一方面利用各种中间团体来支配当地的民众，一方面也相应地从中央权力那里保障自己支配下的一般民众的生存权利，张东荪认为这就是中国农村的现实。同样的预想也可见于费孝通，他也试图将中国民主化的可能性寄托给农村当地精英所进行的地方自治实践³。另一方面，长冈新吉的研究指出，日本的猪俣津南雄也几乎在同一时代考虑过“中国的村落共同体也在一定时期向反帝国主义、反封建斗争的组织转化的同时，亦有可能成为变革后生产社会化的基石”⁴。

最新的研究当中，也有强调中国中间团体的凝聚性之弱以及人员流动性之高的地方。但是，即使成员在流动且形式与欧美及日本不同，事实上很难设想社会秩序能够在不活用由中间团体构成的某种网络的条件下得以维持。岸本美绪指出，一九三〇~四〇年代在日本学术界进行的关于中国中间团体的论争是以西方式的社会观为前提的，因此错误判断了中国的现实；她将费孝通的中国社会论置于这种论断的相反处，认为只要以费的论述为参照系，“中国中间

³关于费孝通，同时可参照水羽信男『近代中国「民間社会」史再考—日本との比較から』、『アジア社会文化研究』第十二号，二〇一一年。

⁴长冈新吉『「講座派」理論の転回とアジア認識—平野義太郎の場合』、『経済学研究』第三四卷第四号，一九八五年，十一页。猪俣的『農村問題入門』（一九三七年）的昭和前期农政经济名著集（农山渔村文化协会，一九七八年）复原了当局避讳的字，易读。

团体的强大与软弱都能得到毫不牵强地整体性解释”⁵。书评者在向本书学习的同时，也感觉到再次审视政论家的中国社会论是有意义的。

第二个问题是作为学术思想的社会主义与政论家之间的关系。本书的研究对象章士钊和张东荪如前所述，是接受了以英国为中心的自由主义的学术成果，并进行了自我风格的改造来构建论述。英国的影响在罗隆基以及王造时等清华大学出身的自由主义者身上也能看到，虽然他们是否能称为政论家还要另作讨论⁶。然而书评者感觉到，也无法否认在同一时代的思想界，亦有包括日本留学生在内的非（或是原）共产党员的社会科学者所撰关于政治的耐人寻味的论述。

例如，本书的补论部分探讨了一九一三~一六年留学明治大学、学习政治学的高一涵。对于著者来说，恐怕高一涵也算可列为一位政论家，而众所周知高一涵自留日时代开始就与李达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一九二五年由李牵线加入共产党，二七年脱党。即便如此，高一涵于一九一五年一就已经将意指传统性王朝更替的“革命”与“Revolution”区别理解，表现出历史唯物论式的政治认识⁷。另外，一九二〇年他还同被中国共产党日本支部成员施复亮（1899-1970）称为密友的谢晋青⁸一起，在日本设立了东京通信社。高一涵比施复亮还要年长一轮，两者之间有无直接的交集，书评者无法知其详。但著者认为这个东京通信社的设立不可“带过”，对其加以注目（229）。进入一九三〇年代以后，即使是反共的历史学家也开始无法对马克思主义视而不见⁹，而日本留学以后的高一涵论述中至少有一部分，也是有可能看作政论家身上社会主义影响之一例的。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政论家的论述与现实政治之间的联系。本书的第一大课题在于政论本身内容的分析，但既然政论家自身以给现实政治造成影响为目标，那么关于论述的现实性效用这一点，除了著者特别加以关注的制度方面以外，在运动方面也有进一步深入讨论的必要。关于这一点，比如书评者认为能表现张东荪政论家的本色之事例，是为了抗日而追求国共合作，在一九三六年的《自由评论》杂志上将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引入了公开的议论场所，虽然仍保持批判性立场。张东荪等人将说明了“八一宣言”内容的刘少奇书简以及与其相关的评论登载在杂志上¹⁰，这是张为了创造出他追求的自由的言论空间而进行的具体实践。

最后还要多嘴说上一句无关发想。书评者认为正如著者所强调的，政论家孜孜以求的制度问题十分重要，但愈是如此，就愈有必要对参与了法的制定的官僚所拥有的政治思想作进一步探讨。原因在于，正如曾田三郎所关注的，清末到民国为止参与法的制定的官僚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构筑，在其过程中发展出了很有意思的论述¹¹。他们是“官吏”，是政论家所断然拒绝的人物，但我相信著者也会承认有必要深入考察这些人的政治思想。

（祝世洁 译）

⁵岸本美绪『中国中間団体論の系譜』，岸本編『東洋学の磁場』（「帝国」日本の学知，第三卷），岩波书店，二八三頁。

⁶关于罗隆基，参照中村元哉『雑誌「觀察」と羅隆基』，赵景达等编『さまざまな戦後』（講座 東アジアの知識人 第五卷），有志舎，二〇一四年。关于王造时，参照水羽信男『一九三〇年代中国における政治変動と政治学者—王造時を素材として』，村田雄二郎编『リベラリズムの中国』，有志舎，二〇一一年。

⁷水羽信男『《新青年》杂志上的“辛亥革命”』，《地域文化研究》第三一卷，二〇〇五年。

⁸水羽信男『ある中国共産党員と大正期の東京—施存統における日本留学（一九二〇～二一年）の思想的意味』，曾田三郎编『近代中国と日本—提携と敵対の半世紀』，御茶の水书房，二〇〇一年。

⁹G. Barraclough 着，松村超等译『歴史学の現在』，岩波书店，一九八五年，二七頁。

¹⁰水羽信男『抗日言論の一潮流—「自由評論」誌上にみえる抗日論』，「史学研究」第一七八号，一九八八年。

¹¹曾田三郎『立憲国家中国への始動—明治憲政と近代中国』，思文閣出版，二〇〇九年。

评 彭慕兰《大分歧——中国、欧洲、以及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 ——超越“大分流”

村上 卫

(京都大学)

- 原书评刊载于[日]『歴史学研究』第949号、2016年10月。
 - 原书为[日] K. ポメラantz 著『大分歧——中国、ヨーロッパ、そして近代世界経済の形成』
-

前言

- I 内容与意义
 - II 对观点、方法论的疑问
 - III 个别内容中的问题
 - IV 实证方面
- 结语

前言

受到欧美强烈的影响，日本学界对于“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介绍、提倡由来已久。¹除了由“全球史”的角度省视日本历史学现状，还提出革新的主张。²在此种问题意识的背景之下，项目研究以各种各样的形态成立，冠以全球史之名的书籍也陆续被出版。³

这些在日本刊行、与全球史有关的书籍，大多都提及前年终于出版日文译本的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著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日文译名：『大分歧——中国、ヨーロッパ、そして近代世界経済の形成』川北稔監訳、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年)。这些与全球史有关的书籍虽对《大分流》的评价极高，认为此书自2000年出版以来给全球史研究潮流带来极大的影响，但却几乎未对其内容加以探讨。这是因为此书虽是由美国的中国史学者以中国与西欧为主所撰写的比较史著作，⁴但在日本却是由非中国史领域的学者作的介绍，故未能对书中有关中国的论述之正确性加以评断。结果，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网站亦未充分传布此书的评论，⁵而关于此书的有效性进而关于全球史的问题所在，迄今似乎

¹ 参见以下的入门书：水島司編『グローバル・ヒストリーの挑戦』山川出版社、2008年；水島司『グローバル・ヒストリー入門』山川出版社、2010年。

² 桃木至朗『わかる歴史・面白い歴史・役に立つ歴史 歴史学と歴史教育の再生をめざして』大阪大学出版会、2009年。羽田正『新しい世界史へ——地球市民のための構想』岩波書店、2011年。

³ 秋田茂 桃木至朗編『グローバルヒストリーと帝国』大阪大学出版会、2013年。秋田茂編著『アジアからみたグローバルヒストリー 「長期の18世紀」から「東アジアの経済的再興」へ』ミネルヴァ書房、2013年。

⁴ 彭慕兰的第一本专著是以近代黄河下游的华北平原地带为对象。Kenneth Pomeranz, *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 Stat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 1853-1937*,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Oxf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⁵ 包括笔者在内，中国史学者虽屡次提言此书，但有些因篇幅的关系，未充分加以探讨。笔者曾在『図書新

尚未被充分讨论过。

因此，本文对于《大分流》的内容及意义，由于迄今已有许多文献有所介绍，故将仅作最低程度的叙述，而对于《大分流》所具有的问题则将加以重点性的探讨，最后再尝试由中国史学者的立场来思考今后日本全球史研究发展的可能性。此外，本书的主题所涉及的年代是至 18 世纪为止，而笔者的专业是 19 世纪以后的晚清时期，故本文中难免会出现根据中国近代史研究而作的批判，尚请见谅。

I. 内容与意义

《大分流》首先对以往比较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提出批判。然后，第一、二部由家畜、人口史（寿命、出生率等）、资本积累、技术水平和市场经济（土地、劳动、农产品等）的实际情况、家庭劳动、奢侈性消费（砂糖、纺织品等）及资本主义等论点，比较 18 世纪之前的西欧与亚洲的核心区域，强调西欧未居于优势。第三部则阐述这些以“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为目标的先进地区，在 18 世纪末皆面临生态环境的限制。结论认为英国等西欧因取得美洲大陆和煤矿资源才能脱离这些制约，并将此视为西欧与亚洲以外地区之间出现“大分流”的原因。

此书的一大贡献在于，彻底批判以往如埃里克·琼斯（Eric L. Jones）所提出的典型的西欧与其他地区的比较史，⁶认为其比较乃是以西欧为标准，欠缺对亚洲史的理解，因此是不适当的。另外，此书也大大改变了欧美对中国经济的否定性印象，例如其指出中国对土地、劳动、农产品市场的限制比西欧少（原书 70~91 页，以下将不特别说明出自原书，仅直接标示页码）。再者，此书还有一个很大的贡献是，重新揭示环境问题在经济史研究上的重要性，扩展了经济史的视野。

王国斌（R. Bin Wong）曾在《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⁷一书中，指出西欧与中国历史路径的相似性和相异点；《大分流》基本上虽延续此书，但内容却比王国斌更具刺激性，故给欧美学者带来不小的冲击，引发包含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的批判在内的热烈讨论，⁸结果大为促进了欧美的比较经济史研究的发展。这是《大分流》一书最大的贡献。当然，其背景是这 30 年来中国经济的急速发展及其在世界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扩大的影响，而这样的背景也引起了更多的关注。

首先，在计量经济史方面，实质薪资等与生活水平相关的比较史研究有显著的进展。⁹再者，还出现由政治、社会实态方面进行比较的研究，例如：马德斌和范赞登（Jan Luiten Van Zanden）针对法律制度与经济的长期性变动的关联所作的世界性的比较史研究；¹⁰王国斌和罗圣所（Jean-Laurent Rosenthal）着眼于都市化所作的西欧与中国的比较史研究；¹¹和文凯着眼于财政国家所作的英国、日本与中国的比较史研究；¹²皮尔·弗里斯（Peer Vries）着眼于

聞』（3226 号、2015 年 7 月）中介绍、评论过此书，而在本文中希望能显示更具体的根据来进行评论。

⁶ エリック・ジョーンズ（安元稔・脇村孝平訳）『ヨーロッパの奇跡——環境・経済・地政の比較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0 年（原書は 1981 年刊行）。

⁷ R.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⁸ Philip C. C. Huang, 'Development or Involu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and China?: A Review of Kenneth Pomeranz's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1 No. 2, May 2002.

⁹ Robert C. Allen, Tom Bengtsson, and Martin Bräbe, *Living Standards in the Past: New Perspective on Well-being in Asia and Europ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斎藤修『比較経済発展論』岩波書店、2008 年。

¹⁰ Debin Ma 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 eds, *Law and Long-Term Economic Change: A Eurasian Perspectiv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¹¹ Jean-Laurent Rosenthal, and R. Bin Wong, *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and Europe*, Cambridge, Mass. &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¹² Wenkai He, *Paths toward the Modern Fiscal States: England, Japan and China*,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所作的英国与中国的比较史研究。¹³然而，日本的中国史学界却未对这股全球史潮流表现出灵敏的反应，其原因何在？

第一个原因在于，彭慕兰的著作并未给日本带来冲击。日本的中国史学者原本就对前近代的中国经济未抱持偏见，毋宁说还对其有极高的评价。彭慕兰认为西欧和中国的经济水平在 18 世纪末几乎是相同的，这个看法对日本的中国史学者而言并无新颖之处，未引起广泛的讨论。

另一个未在日本学界引起热烈反应的原因，应来自于日本中国史学者对于包含《大分流》在内的欧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观点、方法论、各别内容及实证性所感到的格格不入和怀疑。以下将试就《大分流》的观点、方法论、内容及实证加以检视。

II. 对观点、方法论的疑问

首先，关于《大分流》一书的观点，彭慕兰在书中批判以西欧为标准的比较史，并仿效王国斌，不以其中的一方为经常性的“规范”（8 页）。但彭慕兰为了批判以往的研究，结果反而被欧美以往的研究，特别是西洋经济史的论点所局限。这就是前述此书进行比较时的论点。因此，结果导致由西洋经济史的视角所无法看到的中国特色更难显现出来，而因为比较的前提存在太多的差异，故很多比较是无效的。继彭慕兰之后的比较史研究大多是自欧洲史或西欧经济史的脉络选择论点，由此现象亦可看出，此点可说是欧美比较史研究根深蒂固的问题。此问题的根本在于欧美根深蒂固的观点，认为世界各地虽有时间的差异，但都会有与欧美或先进地区同样的发展。对此，一面意识到世界的多样性一面切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研究的日本中国史学者，由其立场来看不得不感到格格不入。

由此点来说，作为历史的解释方式，“分流”这个观点本身就蕴含着问题性。各区域原本就各自经历过不同的发展途径，只以经济水平来判断“分流”果真是妥当的吗？倒不如自始即视为“分流”，如此即使世界的整体化有所进展，经济水平的差异或扩大也就丝毫不足为奇。

其次，《大分流》在方法论上令笔者感到疑虑的是比较的框架，特别是东亚的框架。彭慕兰为了强调西欧与亚洲是同等的，关于印度虽谨慎地言及其与中国的差异，但关于东亚，特别是日本与中国的差异却舍弃不提。然而，所得分配的高度平等（50 页）并无法让人认为日本与中国是相同的。由 17 世纪的危机来看，中国和日本并非同样“面临严重的政治上与社会上的不安定”（154 页），而且不同于清朝，德川幕府并非是在“17 世纪中叶”获取权力之座（154 页）¹⁴。行论至此，彭慕兰对日本史的基本知识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再者，比较的框架不固定也是一个问题。彭慕兰认为将英国与中国、印度比较是不适当的，国家不是适合作比较的单位（7 页），而他虽认为以核心地区的长江三角洲（即江南地区）、关东平原、英国、荷兰、古吉拉特邦（Gujarat）作比较才是适当的（8 页），但部分是因中国的相关数据不足的影响，此书中的比较对象并不固定。在森林覆盖率的问题上以岭南和法国作比较等（229~231 页），无视各自的历史性条件而显得很突兀。在卫生方面，以日本和东南亚为事例阐述东亚卫生的良好（46 页），但不以卫生不算良好的中国而以东南亚为例，被批评恣意选择比较对象亦是无可奈何之事。

此外，以江南地区为比较对象也是有问题的。原本，就中国而言，即使比较对象限定为除少数民族地区以外的汉族居住地区，江南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差异也太过显著。若只看如江南地区的核心地区，各种指标的平均值就会升高，并会得到与西欧无太大差异的结论，但这是否就已足够？日本的中国史学界认为中国的市场结构是各地方未完全断绝交流。¹⁵再

¹³ Peer Vries, *State, Economy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1680s-1850s*,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5.

¹⁴ 译本中作 18 世纪，原书的记述为 17 世纪中叶。

¹⁵ 关于中国的市场结构，参见岸本美绪「明末清初の市場構造——モデルと実態」古田和子編『中国の市場

者，内陆地区的问题与 19 世纪的各种叛乱相连，其中太平天国之乱也给江南地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故只以江南地区为比较对象无法说是适当的。

III. 个别内容中的问题

《大分流》书中的个别内容在日本中国经济史学界的眼中亦有许多颇有疑问之处。首先，大资本和大规模企业的存在乃是比较史的重点，而此书指出中国较大规模的企业无论何时都能聚集到足以实践铁路出现前时代主要技术革新之多的资本（18 页）；其强调与西欧的相似性，但清代中国的商业资本规模被认为比日本的小。¹⁶再者，书中举出 19 世纪初陕西一家拥有 3000 至 5000 名劳工的大木材加工公司作为大规模企业的事例，并称其为世界最大规模的公司，拥有充足的资本足以渡过工业化初期而存留下来（168 页）。此公司指的是陕西省的木厂。¹⁷但这个称作“厂”的工作场所并不是安定的事业体，依赖不稳定的山区经济，而山地环境因开发而恶化，木厂在 1823 年的记述中已经衰退，¹⁸可说极为短命。此外，彭慕兰以盐商的事例强调长期持续经营的企业之存在是这种资本积累的背景（168 页），但这些商人与“厂”并无关系。由晚清的工业化是以开港后的资本积累为背景之事可知，中国商人的资本积累是暂时性而非长期性的。不如说，由无数零星的商人负责庞大的物流是中国经济独特的一面。由激烈竞争带来的不安定使得商人谋求财产的保护，组织名为宗族的父系“血缘”团体，并热衷于科举考。此书为强调中国对长期资本积累的限制很少而阐述天津和福建的豪商是在 20 世纪以后才将子弟送入官界的（171 页），但由代表明清时代的山西商人和徽州商人的事例来看，亦知此事并非整体的倾向，¹⁹而且天津盐商一直与官界有密切的关系。²⁰

若由国家在经济干预的角度来看，财政是一个很大的重点。本书叙述清代国家允许独占或寡占的市场只有两种（即盐和广州贸易），而租税与其说是委托征税承包不如说是直接征收（196 页）。但是，政府在广州干预贸易的方法是：由扮演中介者角色的牙行负责管理交易和承包征税，其他贸易港的方法也几乎相同。²¹更进一步地说，其他市场的交易管理和征税基本上亦是采取同样的承包制。并且，对于主要财源的土地税（农业税）之征收完全依赖承包制的这个基本事实，²²彭慕兰并未有所理解。

中国政府之所以不得不依赖这些业者来承包征税，是因为与国家规模相比财政规模太小的缘故。此种“小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此书论述清朝为维护中国北部和西北部的生态环境做了非比寻常的努力，并举出黄河的管理为例，认为其所花费的金额占 19 世纪初期全岁出的百分之十以上，超过其他国家政府在战费、债务偿还、官吏俸禄等几项支出上花费的总额（250 页）。但此处所显示的清朝岁出数字是中央政府公定的金额，不包含地方财政和非正规的财政，所以只不过是整体财政支出的一部分，而且若根据这个中央的正式数字，则中国的军费、官僚俸禄也会占岁出的一半以上。²³

秩序』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13 年。

¹⁶ 足立啓二『専制国家史論——中国史から世界史へ』柏書房、1998 年、198 頁。

¹⁷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第 439 页。

¹⁸ 上田信「中国における生態システムと山区経済——秦嶺山脈の事例から」溝口雄三ほか編『アジアから考える 6 長期社会変動』東京大学出版会、1994 年、114 - 126 頁。此外，《大分流》中记述，1800 年前后中国没有“人口过多”或紧迫的“生态环境危机”的问题（251 页）；此点也甚是可疑。

¹⁹ 藤井宏「新安商人の研究（4）」『東洋学報』36 卷 4 号、1954 年 3 月、115 - 132 頁；寺田隆信『山西商人の研究——明代における商人および商業資本』1972 年、273 - 283、291 - 295 頁；臼井佐知子『徽州商人の研究』汲古書院、2005 年、55 - 65 頁。

²⁰ Kwan Man Bun, *The Salt Merchants of Tientsin: State Making and Civi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pp. 76-85.

²¹ 岡本隆司『近代中国と海關』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9 年、43 - 77 頁。

²² 西村元照「清初の包攬——私徴体制の確立、解禁から請負徴税制へ」『東洋史研究』35 卷 3 号、1976 年 12 月。

²³ 岩井茂樹『中国近世財政史の研究』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4 年、32 頁。

在与此书结论有关的部分方面，关于煤矿有几点必须先加以说明。书中阐述中国煤矿的出水问题较小，不需要强力的抽水机（65 页）；但事实上 18 世纪后期煤矿仍因淹水而相继废坑，然而大多以人力来应付处理，²⁴故彭慕兰的论述完全与事实相反。再者，彭慕兰强调华北的煤矿与先进的江南地区在 18 世纪以前并无联系（63~64 页），然而在已知悉煤炭的有用性且铁路等运输技术发达的 19 世纪后期，试问为何华北与江南地区在中国未产生联系？

其他尚有许多可疑的论点，探究其原因大概可分为两大点。一点是，对研究史的理解或取舍选择的偏颇。正因为中国的地区具多样性，只要从各种各样的研究中恣意撷取一部分，无论如何都能导出结论。另外，此书在引用日本学者的研究时，其引用方式也有所偏颇；这是因为用英文传布的日本研究成果明显偏向于某方面，特别是中国史网站传布的信息不足也有影响。

另一点是，对 19 世纪至 20 世纪前期中国经济的缺乏了解。此书虽对 19 世纪前期的经济恶化有所论述，但毋宁说那是为了显示 18 世纪经济水平之高才加以强调的。再者，对 19 世纪后期的情况了解不足也严重影响到实证方面。以下将尝试以数值方面为主来进行探讨。

IV. 实证方面

关于实证方面，在此试就《大分流》在消费方面所强调的砂糖问题加以检视。彭慕兰根据某数值所显示的 18 世纪 20 年代台湾砂糖输出量为 1 亿 400 万磅而将此套用于 18 世纪中叶（120 页）。此数值约相当于 78 万担左右。但是，19 世纪后期台湾的砂糖输出量在开港后不久的 1868 年约有 26 万担，而 1880 年的巅峰期约有 98 万担，此乃包含日本等海外市场才首度达到的数字。²⁵若考虑到台湾的开发自 18 世纪后期以后才展开，以及 18 世纪中叶海外市场极小之事，18 世纪中叶的输出量应低于刚开港后的输出量，故 18 世纪中叶台湾砂糖输出量的推算值应是此书所推算的 3 分之 1。同样的，彭慕兰用推测的耕地面积，推算广东省年产 6 亿 7200 万磅砂糖（121 页），约相当于 504 万担。但根据海关统计，中国和广东省最大砂糖输出港汕头 1864 年的输出量约 68 万担，加上广州也不过约近 75 万担。其后输出量增加，1884 年汕头约 182 万担、广州约 28 万担，共计 210 万担，达到巅峰，而其中的 4 分之 1 相当于对海外的输出。²⁶汕头的甘蔗栽培也是在开港后才扩大的，²⁷故还是 1864 年的数字较接近 18 世纪中叶，而即使将海关统计中所未包含的中国帆船贸易和广东的域内消费列入考虑，生产额也极可能是彭慕兰所推算的 5 分之 1 或者更低。如此看来，此书所举出的砂糖消费、生产量的推算几乎毫无意义。

另一个重要指标是纺织品的消费量。彭慕兰假设 1900 年的生产量与 1750 年相同，推算 1750 年平均每人的棉花消费量（141~142 页）。但中国自 19 世纪 80 年代末起由于印度棉纱的输入激增而使得原有的棉纱生产衰退，导致棉纺织业发生重组，²⁸故近代棉花生产的变动极大。说到底，150 年后的数值等只是显示上限，所以彭慕兰的用法是不恰当的。

此外，《大分流》所依据的研究中有不少研究的可信度是有问题的。例如书中数度引用的森林覆盖率的问题是，彭慕兰用的森林面积推算来自凌大燮的研究，但凌大燮却完全未记载推算 1700 年时所根据的史料，其推算的根据不明，²⁹故不应轻易使用。现阶段并无史料能在数量上显示 1700 年或更早以前的森林面积。除此之外，还有以有偏差的资料为根据的人口史等诸多问题的存在。

²⁴ 宫寄洋一「清代前期の石炭業——乾隆期の炭鉱政策と経営」『史学雑誌』100 編 7 号、1991 年 7 月。

²⁵ 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1860—1895）》，联经出版，1997，第 25 页。

²⁶ 数值是利用各年度的海关统计得来的。此外，香港近代制糖业的发展是始自 1884 年以后。

²⁷ 关于汕头的砂糖贸易，参见宫田道昭『中国の開港と沿海市場——中国近代経済史に関する一視点』東方書店、2006 年、113-132 頁。

²⁸ 小山正明『明清社会経済史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92 年、435~531 頁。

²⁹ 凌大燮：《我国森林资源的变迁》，《中国农业史》3 卷 2 期，1983 年。

如上所述，由于中国史料至 19 世纪后期为止无经济统计的存在，且留存下来的资料有所偏差，加上以往的研究也有缺陷，故此书所揭示的数量资料有许多无法信任之处，因此根据这些数值和其他地区作比较是毫无建设性的。此种问题之所以被搁置不顾，是因为欧美经济史研究在根本上有所缺陷，其无法对原典和第一手史料加以探讨而只能依据二手史料，此也可说是全球史研究的一大问题。

结语

如上所述，《大分流》在欧美的研究史上虽具有极大的意义，但因存在着许多问题，故不是可随便引用、参照的文献。原本，日本的中国史学者在十几年前原著出版时也应该对此书加以适当的批判、讨论。在此点上，日本的中国史学者对英语圈的研究反应太过迟钝。此外，还有许多研究中国史的日本学者未阅读过此书亦是一大问题；就此点而言，此书被译成日文具有重大的意义。³⁰

《大分流》出版后，如前所述，欧美的研究有显著的进展，对中国经济也有较深入的认识，如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的著作中所显示的长期性经济史亦逐渐受到注意。³¹日本的中国史学界已非处于只由《大分流》一书的水平来评价欧美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而认为可以加以忽视的阶段。此外，另一个问题是，欧美的论述有所错误时，若不发言指正就等于肯定现状，并且如《大分流》受到的待遇所显示的，那将成为一种全球标准而被引入日本。

那么，日本的中国史学界今后对于全球史该如何应对？日本学者大概很难像欧美学者那样大量阅读欧文的二手文献。再者，若完全追随欧美潮流便会失去在日本从事研究的意义。因此，倒不如发挥日本在研究上原本具有的优点。

首先，必须贴切地传达中国经济的独特性和吸引人之处。在传达之际，必须一面根据长期性的历史一面探究左右中国经济的因素。重要的不是将中国经济现在的发展直接与 18 世纪清朝的繁荣结合在一起，而是将对 19 世纪后期以后中国所面临的困难，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经济发展和现在遭遇的困难所作的各种关于中国经济特殊性的见解，加以整合性的掌握。对此，习惯、常识、规范、秩序、行为模式等广义的“制度”或许也能成为线索。³²那时，一面累积微观的分析一面将其抽象化是很重要的，并且对政治、社会加以注意也是必要的。

在思考中国的特征时，必须与其他地区作比较；中日两国的比较似乎被认为依然有效。日本史的近代化问题可视为，在某种意义上流动性高的中国和日本社会在 16 世纪至 17 世纪走上分歧之路，中国的流动性越发升高而日本则越来越低。此种分歧对其后两国经济的分歧亦有所影响，因此厘清分歧的内容亦极为重要。

若考虑到此点，日本在欧美传布研究时必须有组织地进行，传布的内容应包含中国史和日本史。在解决此种研究传布的问题上，翻译和出版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包括参加能成为其线索的国际会议，有必要采取更具战略性和组织性的应对方式。今后且期待此种传布研究的尝试能有所进展，日本的研究所以具有的独特性能广为传布，进而能稍微改变世界的全球史研究潮流。

（王诗伦 译）

³⁰ 翻译虽然并非全无问题，但因篇幅有限，且对本文主旨无太大的影响，故在此不做讨论。

³¹ Richard von Glah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From Antiquity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当然，日本学界对于长期性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性已有所讨论。近年代表性的研究有：岡本隆司編『中国経済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3 年。

³² 关于笔者对制度的看法，参见拙著『海の近代中国——福建人の活動とイギリス・清朝』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3 年、6-8 頁；拙稿「清末華南沿海の制度——秩序形成のあり方を中心に」『孫文研究』56 号、2015 年；同「中国近代経済史研究と「制度」」『現代中国研究』35・36 合併号、2015 年。

评 俞敏浩《国际社会中的中日关系—1978~2001 年的中国外交与日本》

井上正也

(成蹊大学)

- 原书评刊载于[日]『中国研究月報』70(3)、2016年3月25日、29-30页。
- 原书为[日]俞敏浩著『国際社会における日中関係—1978年~2001年の中国外交と日本』勁草書房、2015年2月7日。

本书以1970年代末至2001年为研究对象，尝试阐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谓改革开放时期加入国际社会的过程。在序章中，作者探讨了对于中国来说“国家利益”是什么的问题。这是因为为了说明中国外交的变化，有必要解释清楚中国政府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追求怎样的“国家利益”。但是作者并没有使用“国家利益”，而是引入了可操作性更高的“外交优先课题”的概念。作者采取建构主义的立场，认为“国家利益”也是在社会进程中被建构的，其定义本身也会发生变化。在此基础上，本书将改革开放分成了四个时期：后文革时期（1978-1982年），1980年代，1990年代，全球化时代（1999-2001年）。作者厘清了各个时期“外交优先课题”是如何变化的。

本书的分析视角颇有意思。作者为了从实证的角度阐明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采用了以中日关系为案例的分析方法。作者指出采取这种分析方法的理由是：日本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中的重要伙伴，“改革开放时期的中日关系是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一个缩影”（18页）。正如作者所强调的，可以说本书的独创性是与已有的中日关系论划清界限，通过将“中国”·“国际社会”·“日本”这三者结合起来解释“在国际社会中中日关系的相位”。

接下来简要说明各章的内容。在第一章中，作者详述了后文革时代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扩大的过程。在这一章中作者特别强调，文革刚刚结束时的中国政府领导人必须与拥有绝对权威的毛泽东外交路线保持一致性的基础上开展对外开放政策。也就是说，作者主张，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扩大被定位成强化“一条线”战略的手段（一条线战略提倡构建对苏包围网），并且在对外政策上也能观察到这种倾向很强。这种战略在新冷战升级的过程中是暂时有效的，但是1980年代以后，“一条线”战略开始出现动摇，从而有必要构建新的理论。作者论述道，在1980年代后半段之后，平等互惠原则成为了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新的支配性逻辑，而随着中日关系“去国家安全化”的进展，就造成了中国对外经济路线中的“最重视日本”。

在第二章中，作者着眼于1980年代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的自我认识，以中国对南北问题的认知为中心展开了讨论。对于1980年代的中国政府来说，南北相互依赖论是支持对外开放政策的主要理论。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差距扩大的事实面前，中国方面强调的南北相互依赖论面临着深刻的矛盾。作者论述道，南北差距问题在中日关系中也以贸易不均衡问题的形式出现。中日两国在经济领域的非对称性依赖的结构被强化的过程中，中国方面开始产生对日本的不信任感（历史问题等）。

在第三章中，作者考察了1990年代以后围绕人权和民主主义规范的争论是如何成为中国外交中心课题的。冷战结束之后，宣扬“普世价值”的西方各国与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

之间的规范争论活跃起来，中国反驳西方各国的态度是“干涉内政”。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在中国被国际孤立的情况下，重视中日“特殊关系”的日本政府开展了对华包容政策。但是，作者主张在1990年代后期之后，中日“特殊关系”后退，中日两国之间围绕台湾的民主化问题而产生的规范性矛盾变得明确起来。

在第四章，作者探讨了中国接受全球化的过程。中国是1990年代以后经济层面的全球化最大受益者。中国将全球化作为经济飞速发展的机会，以加入WTO为目标，大胆进行市场开放。作者论证道，这样的结果是在中日关系中也产生了新课题，如竞相与东南亚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农产品紧急进口限制措施问题等。

如上所述本书提出了广泛的论点。作者在分析框架中着重反驳了外交史和国际政治学中的现实主义，他们都强调中国外交中“不变的部分”。本书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出发，论述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外交优先课题”的变迁：从国家安全到扩大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再到应对普世价值，对全球化风险的管理。

就像书中所指出的，中国外交的变化不是由领导人和政权交替带来的戏剧性变化。正如对外经济关系的扩大当时被定位为对苏包围网的一环，为应对新的国际环境而登场的“外交优先课题”最初是以旧的名义出现，在已有的外交课题之上多层累积起来的。而那些看起来像被埋在地下的外交课题也没有消亡，有些在经过很长时间之后又会突然冒出来，中日关系当中的台湾问题和历史问题就是这样，可以说中国外交这种独特的风格正是其产生的背景。

必须要指出的是，本书的问题是欠缺分析视角的一贯性。作者在序章中写道，为了对“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这样的抽象命题进行实证，“将中日关系作为案例”（17页）。但是在最后一章中作者却说，“这是以中国外交为重点的中日关系的研究，也是将中国与国际社会这种多线程的研究对象和中日关系这样单线程的研究对象结合起来的一种尝试”（223页），透露出本书的目的其实是把两个研究对象综合起来。实际去看各章的记述，却不得不留下如下的印象，即前半部分（第一节）中记述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开展，后半部分（第二节）中叙述其对中日关系产生的影响，中国与国际社会和中日关系这两个题目是分别叙述的。

当然上述的问题并不能掩盖本书的学术价值。本书最大的贡献是从中国的角度分析了1970年代末开始的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过程。本书最大的亮点是使用『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等，明确阐述了中国方面试图使用“反霸权”理论来将扩大对日经济关系正当化的逻辑。近年来1970年代的中日关系史研究取得了飞跃发展，而今后1980年代将正式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本书作为其先驱性业绩，可以说意义很大。

（王瑞 译）

评 吴茂松《现代中国的维权运动与国家》

及川淳子

（樱美林大学）

- 原书评刊载于[日]『中国研究月報』70(3)、2016年3月25日、31-33頁。
 - 原书为[日] 吳茂松『現代中国の維権運動と国家』、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14年12月23日。
-

要了解中国的社会变化，“维权运动”（维护权利的运动）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词。现在，维护权利的各种运动主要是通过对侵犯权利的行为采取抵抗、提出诉求的形式展开。有时维权运动得到了媒体和人权律师等知识阶层的支持会成为整个社会的焦点，有时则会演变成群体性事件，造成与权力当局的紧张对立。所以，在考察急速变化中的社会-国家关系时，“维权运动”绝对是无法回避的观察点。

本书把厘清中国的社会变化及其对政治的影响作为课题，是一部对1990年代之后兴起的维权运动进行详细分析的呕心力作。这项研究对具体事例进行周密调查的同时，试图以宏观的视角探明维权运动的机制来解释维权运动与国家的关系，可以说是划时代的。为此，对作者如此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笔者深表敬意。

作为评论者，笔者主要研究现代中国的社会，特别是言论空间，并对“人们的意识行动等变化如何对政治变化起到作用”这一问题抱有强烈的关注。所以，当把这本腰封上写着“这是向民主化的起跑吗？”的书拿到手上时，笔者就立刻难掩兴奋的读起来，通读此书实在是收获良多。

下面，来俯瞰一下本书的结构和各章节概要：

序 章 现在为什么关注维权运动

第一部 维权的现场

第一章 中国消费者维权的兴起和大众传媒

第二章 城市中有产者的维权行为

第三章 出租车行业中司机的维权行为

第四章 工人的维权行为

第五章 围绕上访制度和维稳的力学

第二部 维权运动与国家

第六章 维权运动的构造和话语

第七章 国家如何应对维权运动的兴起

终 章 结论和今后的课题

主要参考文献

初出一览

后记

索引

关于中国社会与政治的关系，作者的问题意识不在于“制度”与“组织”的静态关系，

而在于对“制度”与“行动”这组动态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目的是重视维权运动作为“自律性社会向国家渗透的过程”这一特质，并提出自己独有的定义。

第一部以“维权的现场”为标题，以事例研究为主，对维权行为的实际形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在第一章，作者以消费者维权的兴起和其发展经过为例，将媒体的角色提高到新的社会运动的角度进行论述。对媒体的自主性进行了积极评价，但是同时也指出这种自主性尚未完全从政府独立出来。

第二章通过深圳、北京、上海的事例，分析城市中的不动产拥有者的维权行为。对于这些行为，作者认为一定程度上不仅具有社会运动的性质，而且正成为改变基层政治结构的原动力。作者从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这两方面指出了维权运动中看到的可能性以及限制，这一点非常引人入胜。

第三章的内容是考察出租车行业中司机的维权行为。作者从产业结构的层面出发，指出形成罢工及劳动纠纷等问题的诸多因素，并认为这种不断要求改善劳资关系的诉求，迫使政府方面开始应对。

第四章以国有企业职工和农民工为中心，描述了不断激化的劳资纠纷和工人的维权行为。作者进一步提出如何构建劳动争议的解决机制是关乎党和国家治理能力的重大问题，对此敲响警钟。

第五章从陕西省西安整流变压器厂职工的案例入手，充分运用实地调查的成果，以上访制度为主线，对维权和维稳政策的力学关系进行考察。通过现有制度下官民关系的结构性分析，尖锐的指出上访制度的机能缺陷。

与事例研究为主的第一部不同，在本书第二部中，作者从结构层面阐述“维权运动和国家”的构造，提出应为中国社会运动研究提供新的分析框架并展开讨论。

其中最能引起笔者关注同时也最有趣的部分，是第六章论述“话语上的维权”，它与“行动上的维权”所处的维度并不相同。根据作者论述，如果把维护权益行为定义为“狭义维权行为”，是有别于“广义维权行为”的，那其应属于“基于民生的民权运动”。作者更进一步指出，“话语上的维权”包含①对于权益侵害的被害者意识，②对权益侵害的抵抗，③利益的补偿、保障的要求、政治权利的主张等基本内容，“维权”一词已从“媒体用语”转变成为“市民用语”，现在正在“政治用语”化。维权运动作为一种话语，其影响从社会拓展到了政治，作者对这个过程进行的解读非常出色。

第七章对于兴起的维权运动 and 国家的应对进行论述，在比较社会和国家双方的维权观的基础上，指出围绕维权运动的社会和国家处于“同床异梦”的关系。虽然国家依然强而有力，但是，作者十分确信“维权运动无疑是民主化运动的一部分”。

最后一章论述维权运动的意义和对今后的展望。通过这一系列的考察得到的结论是，维权运动已经呈现出社会运动的样貌，可作为构筑更广泛参与政治权利的保障制度的一种展望，作者认为其已具备了导致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生变化的某种“投企性”¹（用作者的话语来说是“面向未来的价值多样化意义的重要程度增加，这是种能动的、开放的可能性”）。作者提出，“维权运动是民主化运动的起跑，也是实践民主化的练习”、“维权运动虽然不是民主化的充分条件，但无疑是必要条件”、“当社会的诉求和追求国家体制改革的社会一方的实践能够和国家政治改革的步调达到一致时，民主化条件就具备了。在社会层面这种条件已经形成了”。今后，国家针对上述问题的将如何应对，笔者认为有必要继续加以分析。

贯穿于作者维权运动研究的，可以说是对如何构建中国的“civil society”（公民社会）这一问题意识，联系这个问题，笔者想指出几点。作者从尊重汉语语境和含义的立场出发，未对“维权”一词进行日语翻译而直接使用，并认为其具有“投企性”这一重要意义。作为

¹ 即海德格尔所说的筹划自身，Entwurf，或萨特所说的谋划，project，译者注。

评论者虽然痛感翻译的必要，但与直接采用汉语原文的作者的共鸣更强。同时，作者对于“civil society”，没有使用汉语的“公民社会”，而是置换为日语的“市民社会”。这让人不禁会问，作者对于中国围绕“公民社会”的讨论又会有什么样的理解呢。同时，在最后一章的脚注中，作者做出说明：对汉语的“市民”是“城市的居民”、“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构成单位是“公民（citizen）”。另外，本书还对“臣民”、“人民”、“群众”、“大众”的含义进行了比较和探讨，指出人们的意识正在发生改变，从历来作为政治性存在的“人民”变为作为经济性、社会性、政治性为主体的近代“市民”（汉语作公民）。果真如此的话，对于“公民社会/市民社会”的语境和含义，是不是应该引入更加详细的探讨呢。包括这点，非常期待作者今后的进一步研究。

手持本书颇为感慨的是，作者亲笔在封面所挥“民生·民权·民主”之笔迹，特别是“民”这一字用尽全力传递出作者对于本研究的强烈的意志。使人感觉到出身于中国的作者，在作为研究者分析维权运动的同时，以“生活在同时代的当事者”的身份对维权运动投入了非比寻常的关切，这些研究和写作正是基于作者自身对维权运动的参与。那么，作为“生活在同时代的邻人”的本书读者们，又该如何关注中国社会的变化呢。本研究可以说为我们提供了太多的启示。

（王瑞 译）

评 知足章宏《中国环境污染的政治经济学》

北川秀树

(龙谷大学)

- 原书评刊载于[日]『財政と公共政策』、第 37 卷第 2 号 (通卷第 58 号), 2015 年 10 月。
- 原书为[日] 知足章宏『中国環境汚染の政治経済学』、昭和堂、2015 年 4 月 15 日。

中国环境问题的严峻性, 早已见诸于众多文献和新闻报道等中。特别是 2013 年初北京发生的重度 PM2.5 污染, 其影响甚至波及日本, 引起了众人的关注。另外, 以“癌村”为代表的水质污染问题和近年公布的土壤污染的调查结果等, 对饮食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也严重影响着居民们的健康。可以说中国的环境污染在广度与严重程度上是前所未有的。

那么, 造成这些环境污染的原因何在? 经济的快速发展毋庸置疑是第一要因。可以说这与战后高度经济成长期中, 优先经济发展、轻视环境保护而引发严重公害问题的日本有着相似的构造。而且, 新中国建立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一路走来的历史进程中, 宪法规定“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大气和水为公有资产属于可不受限制地廉价使用的资源, 也可以说是不考虑排废成本进行生产、消费所欠下的债凸显出来了。

本书以此认知为出发点, 指出中国的环境研究受到既有学问领域框架的细分, 难以解析根本性课题的现状, 因此本书作者着力于“解析政治、经济、社会体系复杂多样的原因和构造”和“摸索一套理想的制度、社会经济体系以救助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并将污染防患于未然”。本书作者是一位三十来岁的青年学者, 主要研究中国的环境问题, 在研究调查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本书以田野调查为基础, 阐明了环境问题的构造、主要原因和环境政策的现状。特别是中国的环境问题与世界相关, 本书着重突出了外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引发的环境问题, 还阐述了占世界二氧化碳排量四分之一的中国在气候变动政策方面的现状和课题。

下文笔者将介绍各章概要, 阐明本书的意义, 并在此基础上略作评述。

第 1 章“最严重的大气污染中的政治经济学”论述了于 2013 年 1 月达到污染峰值的 PM2.5 问题。作者指出紧邻北京的河北省对污染的影响很大, 这是由于钢铁、建材、石油化学、电力等高污染高耗能产业集中于河北省。作者还指出其中一因是河北省属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贫困地区, 因此根据倡导“绿色奥运”的 2008 年北京奥运行动规划, 北京市区的大量工厂搬迁到了河北省。而且, 北京市为了控制机动车排气污染实行了单双号限行规定和限制黄标车上路的规定, 这使得旧型机动车流入了河北省。对此北京市实施了一系列对策, 但是作者认为仍然存在企业处罚规定不全面、信息公开受限、无健康受害问责制度等问题, 希望民间 NGO 能够共同收集、分享和公开信息。

第 2 章“癌村与宠物食品的关系”关注了铬公害导致癌症多发的问题。云南省曲靖市兴隆村的县重点企业——陆良化工大量生产宠物食品中含有的维生素 K₃, 出口到日本为主的外国。生产维生素 K₃ 的原料铬酸钠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铬残渣, 却未经处理便直接丢弃, 引发了居民罹患癌症等健康危害。本章指出了造成这种严重污染的原因是污染被不断地转嫁到铬盐处理水准低、经济发展落后的中西部地区, 还刻画出了污染成为出口品进入全球化经济的现状。作者认为有必要进行信息公开并让国际社会的消费者掌握污染状况。

第3章“在废弃物、资源、污染的夹缝中摇摆的政策”就废电气电子机器(E-Waste)进行了论述。据作者介绍道,中国自2011年起将电视、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脑这五类电器指定为需要进行适当回收处理的电器产品,旨在进行资源再生。然而从日本为主的外国流入的废旧家电却集聚到广东省贵屿镇等地,仅仅进行了简单的拆解处理。未安装正规的净化污染设备等是否会引发环境污染与健康问题令人担忧。其背景是,促进农村更换家电的“家电下乡”政策和促进城市换购家电的“以旧换新”政策使得二手家电在短期内遭到废弃。作者认为根据现有条例规划的回收处理渠道,目前仍面临路径繁多的问题,也未实行厂家回收义务责任制,生产商虽有缴纳基金的义务却无实施回收、搬运、再利用的责任,因此依然存在非正规的拆解、回收业者,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第4章“能否承担气候变化问题的责任”中,作者考察了当今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应对全球变暖的政策。这既是因为中国高度依靠煤炭的能源构造对全球变暖影响很大,又是因为无法忽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生产出口品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正策划快速引入以风力为首的各种可再生能源。作者介绍了决定国家政策过程中,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主导地位和CDM的积极性活用以及尝试导入碳排放权交易、碳税的情况。作者还将以下事项的必要性作为今后的课题予以了论述,即实施对应全球变暖政策过程中对财政透明化及效果进行探讨的必要性、建立地方和社区级别地域资源及人才活用体系的必要性、认识绿色经济框架下二氧化碳间接性排放问题的必要性等。20世纪90年代中国声称各国对环境问题负有共通又具有差异性的责任,中国不承担任何数值性改善目标。随着经济影响力的不断上升,中国承担相应主要责任的时代到来了。

第5章“4兆元经济刺激政策与中国版新政的实态”中,作者介绍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奥巴马政权为首的各国为促进对环境保护领域特别是可再生资源领域的大规模投资和人员雇佣而实施的绿色新政,作者还从政策的实施现状这一角度考察了中国版新政的成败。截止至2010年末中国实施了4兆元的经济刺激政策,但是多为铁路、公路、水利相关的传统型公共基础设施和灾害复兴相关的建设性投资。环境领域相关的污水处理、废弃物处理设备的建设、重点流域的防污与改善、重点保护林与天然资源保护项目的推进、节能项目仅占计划总额的5%。从中央政府在环境方面的支出状况,可以看出中国在对荒废和污染加重的自然环境进行改善、保护以及应对污染的同时,扶持节能、可再生能源的动向。中国于2006年起开展了节能事业,开始实施购买绿色机动车相关的扶持政策。2008年4月实施了修订后的《节约能源法》,实行节能目标责任制和家电产品能源效率标示义务制。2007年起,环保部门与银行联手调查了环保设施的配备、运转等情况,实施“绿色信贷”限制高耗能企业和高排污企业的融资。另一方面,在再生能源方面也设定了具有积极意义的目标,实行扩大政策。中国的风力发电总量在2013年末达到了9141万千瓦,占全球导入总量的近3成。太阳能光热发电领域的就业增长也十分显著。支撑这一领域的是农村与城市可再生能源与建筑一体化样板建设补助金政策,2006年还导入了固定价格收购制度。对此,作者认为这是在“加速开发与经济增长的同时实施环境政策”,对这种相背政策的“两面性”表示了担忧。

第6章“补助金与指令的环境政策”在前一章的基础上,着眼于地方级别的低碳城市政策能否改善环境污染,能否对现有的行政构造、产业构造、生活方式带来一定的变化,作者分析了太阳能资源丰富的云南省的事例。虽然是根据行政公文进行分析,但是主导单位却是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而非环保部门。因此,气候变化问题与环境污染的对策各自而行,产生了一种矛盾的现象,即气候变化对策不断得以完善,新的严重污染却不断产生,既往的严重污染也持续不消。云南省的特点是太阳能热水器的爆发性普及。太阳能热水器与建筑一体化政策及“家电下乡”带来的农村补助金政策对此做出了贡献。作者列举了以下问题作为今后的课题,即财政来源缺乏明确的规定;政策的成否依赖政府,居民和环境NGO参与不足;环保部门干预不足等,还强调了环境NGO等第三方检验的必要性。

末章中作者论述到,有必要具备能够认识到当地环境问题背后潜在的国内、国际社会与

经济相关的意识，有必要进行“污染对策与气候变化对策的连动”，而且这两点的关键在于市民与环境 NGO 的监督。

本书作者在积极进行了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直击了中国环境问题背后的政治、社会、经济构造现状，书中各处都展现出了作者的正义感与追求社会公平的真挚态度，是值得一读的佳作。

另一方面，也希望今后作者能就以下几点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一是对环境 NGO 和居民所起作用的期待。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不可或缺，但是不同于西欧的民主主义和三权分立，中国政府倚重经由人民代表大会的间接民主制，居民的直接参与和环境 NGO 的设立也有一定的限制。因此有必要从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中明文记载的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是否得到了实质性的保障这一角度进行考察。第二，将污染转嫁于经济上的弱者和贫困地区也是日本在高度经济成长期屡见不鲜的现象，这是各国都存在的问题，并非中国特有。国际社会应当采用怎样的框架解决跨国企业等以利益为上的企业活动产生的问题，这一视点也是不可或缺的。第三，进入“新常态”后的中国逐渐从传统的世界工厂发生转变。与此同时环境问题的内涵和成因等也在变化。习近平政权推行的生态文明与具化的生态补偿、环境经济政策等是否有效，还需要对此进行监督与检验。最后，从重经济发展转向着力于环境保护，设置第三方机构确认党和政府的政策是否有效，以及司法体制等政治方面的改革亦不可或缺。

评 北川秀树 编著《中国干燥地区的环境与开发 —自然、生计与环保》

知足章宏

（京都大学）

- 原书评刊载于[日]『人間と環境』42卷1号、2016年。
- 原书为[日]北川秀樹『中国乾燥地の環境と開発—自然、生業と環境保全』、成文堂、2015年4月。

中国各地的环境污染与自然环境破坏日趋严重，然而各地的情况不尽相同。中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在急速的经济增长和开发过程中，各地的产业、经济、社会构造都有所变动，随之而来的环境破坏、污染、环境污染问题也不断发生变化。

中国的西北地区原本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农田，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开发和经济增长自2000年以来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号令加速前进，然而环境的恶化也在不断加剧。另外，西部地区本是干燥地域，慢性且严重的水资源不足等地域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也使得生态环境的恶化加剧。本书聚焦于中国西北地区的环境状况、污染实情、生态环境与环保政策、水利、农田管理、林业相关的诸多问题等多个侧面，主要以陕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甘肃省为调查区域，依据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对当地的实际情况和面临的课题进行了细致地考察与分析。

本书在序章之后分为4个部分。第1部（第1~3章）以“自然与环保政策”为主题，分别论述了中国西北地区的气候变化和异常气象现象（第1章）、环境问题·环境政策和环境治理（第2章）、资源税制度（第3章）。

第2部（第4~7章）以“农业与水资源·土地”为主题，分别论述了干燥地区的农业开发与水资源保全（第4章）、甘肃省农村地区的水资源管理（第5章）、灌溉水利史（第6章）、农田抵押权制度（第7章）。第3部“防止沙漠化与自然保护”（第8、9章），论述了干燥地区的沙漠化对策（第8章）和草原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第9章）；第4部“特别投稿：陕西省的林业与可持续性发展”（第10~12章），论述了干燥地区的植物栽培（第10章）、沙地的针叶树造林（第11章）、黄土高原的植被恢复实践（第12章）。

如上所述，本书从多样的主题和不同的视点分析了中国西北地区的环境问题。参与本书各章撰写的执笔者既有社会科学（政策学、经济学、社会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研究者，也有中国西北地区林业相关政策的当事人等多重领域的研究者和专业人士，因此本书可谓是一本从多重视角跨学科地论述中国西北地区环境问题的综合性专业书籍。

本书的意义和各章节分析得出的真知灼见跨度广阔，无法逐一介绍，在此仅论述其中给评书人留下极为深刻印象的以下三点。

第一点是拥有资源开发地的西北地区存在的开发优先主义与环境政策执行的问题。本书的第2章就这一点，指出了环境影响评估的项目建设后的事后评价问题、信息公开的不全面、政府机关对参与评价的主体设限等制度实施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此外，第3章指出了，有着

30 年历史的中国资源税制度无法抑制过度的资源采掘，甚至反倒体现出了地方政府为征收资源税收而促进矿产资源开发的一面性。这些现象反映出在资源开发地区，地方政府为促进开发实行的开发战略使环境对策受到轻视的实情。

第二点是西北部干燥地区的农业与水资源开发、保全的困境。西北地区总体上属于水资源不足地区，同时又保有大范围的农田。在这种状况下，若不实行恰当的水资源分配与管理，则会给农业造成决定性的损害，也可能会引发村民之间的纷争。而且，贫困问题比较突出的甘肃省等地的农村地区必须在保护、发展村民的生活与利益（生计）的同时，推进水资源的保护。

第 5 章聚焦于农民参与型水利组织（农民用水者协会），以甘肃省为例考察了制度的内容、效果及问题点。作者认为可以看出该制度在减少村民间的水利纷争、改进节水技术和提高节水意识方面等具有效果，但也存在农村进城务工的增加（管理者的减少）、村民自治的停滞、政府部门与农民的协调不足等管理方面的问题。中国西北地区农村进城务工者多，城市化推进速度快，因此今后仍有必要慎重且持续观察农民参与型水资源管理的实效性、持续性。

第三点是干燥地区建设自然保护区的问题（第 9 章）。为了保护生物的多样性，中国自 2000 年以来开始快速建设自然保护区，与此同时也开始撤离在当地放牧和耕作的居民，限制放牧和农耕。特别是中国采取了退耕还林等将农耕地强制转为林地的措施作为保护、复原生态环境政策的一环，然而对农民进行的补偿有很多不透明之处。这一点与第 2 章中论述的生态补偿制度有关，但是其概念仍处于形成过程中，存在各地的制度内容与实施项目各不相同等问题。

另外，不仅仅是农民补偿问题，传统的土地所有、管理、自然资源的使用以及对当地生计（如放牧）的强制性排除，这些是否都是保护当地生物多样性最理想的措施，这一点也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其他各章还考察了气候变化、农田管理、沙漠化对策与植树造林、恢复植被的实际情况等，刻画出了西北地区面临的课题与相应政策的现况。这些不仅提供了了解西北地区环境问题特性与困境必需的知识与见解，也通过具体事例展现出了中国的环境问题存在地区性的多样性这一现状。

最后，如果硬要举出本书未尽的课题，那就是本书主要关注政策分析及其历史进程，因此对急速推进至今的西北地区的开发给农民、居民、环境带来的实际影响的情况和处理相关损失与弊害的政策及其局限性的论述与考察有些薄弱。本书明确了急速开发带来的环境问题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西北各地区实施的多种多样的水资源、森林、植被相关的政策，然而任凭开发摆布的居民们、牺牲环境与资源推动开发的国家和西北部地区地方政府的开发、经济战略的历史及其进程也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尤其是西北地区相比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较慢，今后在开发与发展基础设施方面仍有很大空间。这就意味着西北地区面临严重环境污染与自然破坏的危机正在增大。如果西北地区有成功防治严重环境污染的区域，那么这些区域具有哪些特性（开发战略与环境对策），也是值得探讨的课题。

不过，这些问题与其说是本书的课题，不如说是今后研究中国西北地区环境问题时应留意之处。

中国西北地区因开发造成环境破坏的风险正在增大，加之有着大规模的农业用地却又面临严重的水资源不足以及依旧严峻的贫困问题凸显等，这些问题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范围内臻待解决的课题。在此意义上，本书定能增强人们对西北地区相关问题的关注，值得广大读者一读。

评 久保亨・波多野澄雄・西村成雄 編

《抗战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容》

松本俊郎

(冈山大学)

- 原书评刊载于[日]『社会経済史学』82-2、2016年8月。
- 原书为[日]久保亨・波多野澄雄・西村成雄編『戦時期中国の経済発展と社会変容』、慶應大学出版会、2013年。

2013年9月13-16日，在重庆召开了第五次“有关中日战争的国际共同研究”国际会议，本书是此次会议成果的集大成之作。本次会议共收到60多篇论文，从中选取了18篇编入本书。会议主旨与历史将会在序言中进行说明。本书章节构成如下。

【本书的构成】

关于《抗日战争的国际共同研究》（第五卷） 全体编者

总论 抗战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容 久保亨 波多野澄雄 西村成雄

第1部 战时经济的发展与继承

第1章 战时中国的工业发展 久保亨

第2章 抗日战争与重庆银行业 林幸司

第3章 抗战时期中国的保险业 刘志英（林幸司译）

第4章 战时中国的贸易 木越义则

第5章 战时首都・重庆市内交通网 内田知行

第6章 抗战时期四川的制丝金融与制丝业 赵国壮（吉田建一郎译）

第7章 抗战时期重庆工厂之间的劳动力转移 耿密（菊池敏夫译）

第8章 战争初期的中国和日本与上海租界经济 今井就稔

第9章 日本的华北支配与开滦铁矿 吉井文美

第2部 社会体制的变容

第10章 中国的倾力之战与基层社会 笹川裕史

第11章 蒋介石与总动员体制的构筑 段瑞聪

第12章 战时中国的宪法制定史 中村元哉

第13章 战国策派与中国的民主主义 水羽信男

第14章 战时国民党政权的边疆开发政策 岛田美和

第15章 抗日战争与华北的日本居留民 小林元裕

第3部 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新突破

第16章 抗日战争的新历史图像的摸索 ハンス・ヴァン・デ・ヴェン（外国人名）（李仁哲译）

第17章 抗日战争与兴亚院的历史地位 加藤阳子

第18章 重庆轰炸死伤人数的调查与统计 潘洵（柳英武译）

后记 所有编者

改善中日关系的提案 傅高义

本书第一部分主要讨论经济。第1章《战时中国的工业发展》(久保),利用生产统计与工厂登记统计的数据,论证了到1942年为止,重庆政府统治下的工业以四川重庆、云南为中心发展的情况。并与华北与东北的动向进行对比,同时论及这些发展对战后复兴的影响等问题。作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较均衡的说明。

第2章《抗日战争与重庆银行业》(林),探讨了重庆的金融系统与当地的银行等问题。作者首先阐明了20年代,在创办银行的风潮中所成立的金融体系的特征,并认为重庆政府迫使此金融体系向更广大的体系延伸,以强化统制。然后,作者又阐述了重庆当地的银行(聚兴诚银行)在新规定与从上海避难而来的大银行的双重压迫之下,如何通过实行包括“违法”活动等诸多办法从而维持了旧有的营业规模,存活下来的过程。

第3章《抗战时期中国的保险业》(刘),把目光转向了迁都重庆后开始发展的中国资本的保险业,并将焦点集中在战争保险与生命保险方面。为了确保运输和生产,政府迅速出台了各类战争保险。同时,满足民众需要的生命保险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不断成长的保险业是以国家资本为中心的。

第4章《战时中国的贸易》(木越),论述了从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前期的对外贸易。作者此前曾使用汪伪政权时期的资料进行过分析(《近代中国与广域市场圈》),在本章中作者补充了重庆方面的资料,进一步进行了分析。作者从地域市场圈的发展出发论述国民经济的形成,其构想在这两篇著作中得到了互补,希望能同时阅读这两篇论文。

第5章《战时首都·重庆市内交通网》(内田),论述了战时的交通状况。作者认为,在空袭激烈的抗战前期,人力车及马车等得到了灵活使用,而在空袭结束后人口急剧增加的抗战后期,交通网开始得以整顿,公交车及渡轮的扩充也在逐步进行。作者还从主要的运输工具由人力转向近代交通工具、就业模式从非正规就业到正规就业的变化这一点,对重庆政府的应对表示了赞赏。

第6章《抗战时期四川的制丝金融与制丝业》(赵),论证了四川制丝业的发展。由于经济不景气、战乱以及日本丝的倾销等因素衰退的四川制丝业,被在30年代后期由省政府主导成立的官民合办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统合起来。公司在采购原料、制造、销售等获得了垄断性地位,并从主要银行那里获得了丰厚贷款,得以改良蚕种及制丝技术,并实现了发展。但因其依靠国家支持比重较大,并负担了不断扩大的贷款,因此公司实质较为脆弱。

第7章《抗战时期重庆工厂之间的劳动力转移》(耿),讨论了30年代后期开始的重庆技工数量不足的现象。作者在文中论证了由于急剧增加的工人逃亡、挖人、相关企业之间的竞争、国民政府及资本家团体的应对、培育技工取得一定成果等问题。同时,也论证了尽管劳动市场有强大需求,但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仍不断下降的事实。作者强调由于国民政府统治能力的局限性而导致了这些现象的发生。

第8章《战争初期的中国和日本与上海租界经济》(今井),探讨了30年代末至1941年为止的上海经济情况。尽管日军占领了上海,但直到1941年12月为止日军并未能控制租界地区。作者通过寻找国民政府和日军、日本资本家、中国资本家的关联来论述国民政府是如何应对“自由”的租界的。作者阐明了国民政府的动向,包括中断有利敌国的物资交易、救济与日占区有交易往来的租界内的中国资本、以及研究如何从租界地区调运战略物资等问题。

第9章《日本的华北支配与开滦铁矿》(吉井),将目光聚焦到分裂华北运动后的开滦铁矿,作者把当地英国人的动向与日本政府及国民政府的行动结合起来论证。通过观察纳税地区及警察权力的变化,验证国民政府是如何通过对日本及冀东伪政权的绥靖政策来推行其现实主义的。与此同时,也可观察英国政府的亚洲观。

第二部分讨论社会体制。第10章《中国的倾力之战与基层社会》(笹川),列举了对于出征士兵家属的救济及援助事业,对强化征兵与维持农业的兼顾问题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中国与日本相比,基层社会对于国家及地域社会的约束是“自由”的,所以征兵方式也更粗暴(P.233)。以及尽管民众的不满及对救济援助事业的期待在增加,但受限于国民政府的财源不足及基层行政能力的欠缺,该事业并未得到良好的推行。作者对战前日本及革命后的中国进行了对比,这一点令人瞩目。

第 11 章《蒋介石与总动员体制的构筑》(段,)通过列举 1937 年 8 月成立的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探讨国民政府的国家总动员体制的变化。作者认为组织的名称及机构的变迁得到了整理,在出台应对日军攻势的法案上却显得滞后。

第 12 章《战时中国的宪法制定史》(中村),讨论了国民党的有关自由与权利的宪法观。作者认为从间接保障主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36 年公布)到直接保障主义(中华民国宪法,46 年制定)的转换反映了向自由主义转变的世界宪政的潮流。(P.297 页)然而本章中所注目的却是在国民参政会议(38 年 7 月~47 年 6 月)以及宪政实施推进会(43 年成立)上,尽管处于尊重自由和权利的立场,但却提倡间接保障主义一事。同时对轻易断定直接保障主义者和间接保障主义者的优劣以及过低评价国民党的论调进行了批判。

第 13 章《战国策派与中国的民主主义》(水羽),把目光聚焦到了西南联合大学(昆明)的林同济、雷海宗、陈铨及沈从文诸人,对战时的自由主义进行了再次评价。作者在确认重视传统文化的林与雷在东西文化论战中的地位,及陈与沈之间的围绕英雄评价的不同意见的基础上,强调了林与雷通过中国文化使西洋文化扎根是富有创见的,以及陈与沈处在一个“尊重消极自由的立场”,并对重视对话的陈的态度进行了肯定。(pp.314-6)

第 14 章《战时国民党政权的边疆开发政策》(岛田),探讨了非汉族居住地区的开发政策。国民政府自 1941 年开始追求非汉族的向心力,为了获得战争资源招募了边疆工作人员。作者根据应聘者超过实际需求人数,以及在农业牧畜部门有登记的 204 名工作人员的记录这两点,得出了国民政府从涵盖沿海地区的全国范围内选拔出了拥有专业技术和经验的人员的结论。可惜的是作者没有对他们被派遣的实际情况进行探讨。

第 15 章《抗日战争与华北的日本居留民》(小林),论述了 1937 年 7 月至 9 月在北平与天津所发生的日本居留民的混乱及中国驻军的保护活动。北平的大多数居留民前往大使馆避难,在天津,居留民团和领事馆警察组成了义勇队来维持治安。作者认为中国驻军虽然与北平的大使馆和义勇队进行了合作,但同时也对日本人进行监视(北平),并差别对待朝鲜人(天津)。

第三部分把重点放在问题的提出上。第 16 章《抗日战争的新历史图像的摸索》考察了伴随着战略与战术的变化所展现的抗日战争的意义以及日军实施的一号作战的影响。作者认为,日军与国民党军队虽然都有“近代工业战”的想法,但到了 1938 年末国民党军队导入了游击战及焦土作战等新战略,红军则引入了规范的党员制度、动员体制等新的要素,从而获得了优势。至于一号作战则除了对国军施加了打击,还使得在共产党支配下的区域的日军数量减少,从而决定了内战的风向。本论文的考察有一个世界史范围的前提,即“近代工业战”这一战争原理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已然终结了。

第 17 章《抗日战争与兴亚院的历史地位》(加藤),通过研究兴亚院的历史地位来考察日本的战争指挥者选择不合理的战略背景这一问题。作者以由预备兵组成的特设师团在上海及南京的战役中陷入苦战为切入口,认为战争指挥者被两个问题:一是受到美国海军制约的资源输入能力;二是苏联海军的威胁所捆住了手脚,多次做出缺乏理性的选择。作者还通过研究围绕兴亚院对占领区经济置喙的权限,军部与外务省的对立过程,说明在曲折的背景之下这两个问题的重要性。

第 18 章《重庆轰炸死伤人数的调查与统计》(潘),讨论了由于重庆轰炸导致的人身伤亡。作者考证了采取不同对象领域及调查方法的资料所收录的死伤人数数字,论述其可信度。冷静的考察,是评论无差别轰炸的重要成果,我们可以为之共享。

本书认为抗日战争是由日军实施的侵略战争,中国对其进行抵抗的战争。通过研究新的资料与观点、对战后的影响以及在社会经济史领域的论证,第一部分的经济发展及第二部分的中国社会的变化进行了阐述。第三部分的论文也引起了广泛的思考。在资料及成果不多的领域得出了那么多的成果,让我感到了研究者视角的广度。如果说还有什么更多希望,那就是希望在第 9 章及第 16 章内容的总括中能体现关于系列论集对研究课题的抗日战争的国际意义(p.11),末尾的傅高义的建议很有建设性也很中肯。期望本书能被广泛阅读。

评 岸本美绪著《风俗和时代观》、《地域社会论再考》

则松彰文

(福岡大学)

- 原书评刊载于[日]『史学雑誌』2016年10月号。
- 原书为[日]『風俗と時代観—明清史論集〈1〉』研文出版、2012年。
『地域社会論再考—明清史論集〈2〉』研文出版、2012年。

岸本美绪是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学者之一，一直引领着中国史研究和东洋史研究，2012年春天出版了两册明清史论文集。自那以来已经过了四年光阴，在这期间，此书被众多的论文以及研究书籍引用的同时，和此书关系密切的研究书籍等也公开出版，笔者感到现在是重新评价此书的时刻了。此书，和详细分析汉文史料的专门论文集不同，内容是1990年至2009年期间向一些讲座及特辑等投稿的论文和专栏等的汇总。

如果用一句话表现此书魅力的话，那就是该书充满了远超书名范围的各种疑问和信息，是具有世界史论文集远大展望的一本著作。无论是谁，只要一读，都会被本书中世界史范围的广阔视野和极为准确的观点所震撼。

两册二十六篇论文的书评究竟应该如何书写。笔者所从事的仅仅是明清时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仅凭一己之力，要如何评价这本内容极为丰厚的世界史论文集，颇令笔者苦恼。然而，考虑到探讨此书提出的大量具有批判性的疑问才具有书评之意义，因此对于各篇内容只做简单介绍，将更多篇幅用于批判性的探讨，尤其是其中两个问题的探讨。以下对各篇内容进行简单介绍。

《风俗和时代观》明清史论文集1

I. 历史变动和时代划分论

<时代划分论>，是刊载在1998年岩波书店出版的新版《岩波讲座 世界历史1 对世界史的探讨》中的文章。

“未来，作为必然发展的结果并不是可预测的，或者说是我们自身的选择更为恰当。和未来互为表里，历史与其说是遵循必然方向的发展过程，倒不如说是人们根据状况而变化的，不断摸索尝试的积累。(23页)”

上面一段文字象征性地反映了岸本老师的历史观。再者，<补记>中，西嶋定生对新《岩波讲座 世界历史》的批判和针对此批判，岸本老师进行的反批判，读来令人深思。

<时代划分论的现在>，是刊载在2002年由青木书店出版的《历史学中的方法上的转向——现代历史学的成果和课题 1980~2000年》中的论文。在此处提出了之后将会提及的“半开放式体系”的概念。

<风俗和时代观>，是被用作本书题目的基调论文。是通过明末清初知识分子顾炎武的时代观，历史社会观，经世致用论等提出各种问题的一部作品。

<现代历史学和《传统社会》形成论>，是和岸本老师其他的论述考察，尤其是后面会论述到的<东亚·东南亚传统社会的形成>相呼应的内容。

<十八世纪的中国和世界>，是关联了十八世纪的世界来论述清朝雍正皇帝的统治理念的论文。关于此处提出的<十六世纪后的共通问题>，想之后再作探讨。

II. 身份和风俗

“只有下降到‘感觉’的水准后，才能首尾贯通一致并动态地理解中国的身份关系的各个侧面”（<补记>177页），<明清时代的身份感觉>就是基于岸本老师这一思考的一篇论文。

<名片的效用——明清时代士大夫的交际>，是以明清时代的名片为素材，将当时士大夫的真实形象呈现在读者眼前的论文。当时的名片，是在相对评估“对方与自身的上下、远近关系后，自行书写自称。名片的自称“表现了一种策略的人际关系”的形成”。

<“老爷”和“相公”——从称呼来看地方社会的阶层感觉>，和前篇一样，是从老爷、相公这些称呼来展现明代士大夫真实形象的论文。这一篇从当时的小说，士大夫的文集，利玛窦等欧洲人的著作中可见的这些称呼来论述明清时代的地方社会以及平民百姓中存在的“阶层感觉”，颇有趣味。

III.历史中的风

<历史中的“风”>，对于明清时代的“风俗”一词，可解释为：“包括例行节日活动和服装发型等，通过关联秩序意识后才具有意义的，所有的生活及行为方式，皆可用‘风俗’一词表现”。虽仅为专栏文章，但可如此评价：此解释，决定了之后对明清时代“风俗”的定义。

<China-centered approach>，是围绕中国“中心主义”论述的短篇。其中针对增渊龙夫所阐述观点的疑问，引人关注。

<从亚洲的各个视角——“交错”和“对话”>，是针对1993年至1995年东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从亚洲视角来思考》系列全七册的介绍和提问。

《地域社会论再考》明清史论文集2

I.市场和货币

<市场和社会秩序>，是收录进2002年有斐阁出版的社会经济史学会编《社会经济史学的课题和展望》的一篇论文，总括了以1990年代为中心的市场史研究。

<清代中国的经世致用论中的货币和社会>中，针对引领中国货币史研究的黑田明伸的研究，岸本老师的见解饶有趣味。

<卖土地，卖人——围绕“所有”的尝试>，是围绕“所有”这一话题，以清代中国为中心论及欧洲、伊斯兰世界、以及日本的论文。可以说是独具岸本老师个人特色的论述考察。

II.国家和社会秩序

<《市民社会》论和中国>，列举了梁启超，戒能通孝，内藤湖南，橘朴等人的论述，是考察中国史中有关中间组织问题的论文。

<中国的暴力和秩序——从前近代的观点>，从“暴力和秩序”的观点，整理了明清时代到中国近代的民众反叛和革命，并且进行了提出了有益的问题。

<明末清初的暴力和正义的问题>，和1999年东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岸本老师的专著《明清交替和江南社会——十七世纪中国的秩序问题》相呼应，是令人瞩目的明末论。

<动乱和自治——中日历史面貌的交错>，本论文是对在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瓦解、中华民国建立如此动乱的时代中发表的，日本中世史专家三浦周行的论述考察进行的分析，同时指出中国史研究者内藤湖南研究中的“动乱”、“自治”两者互为表里存在。除此之外，还有中日间的内在比较，是相当有见地的论文。

<“中国”的抬头——从明末的文章书写格式来看国家意识的一个侧面>，则如其副标题，在公式文书中，要把“中国”两字写得比其他的文章开头要高。本论文把关注的焦点放在这种抬头书写格式上，揭示了明清时代国家意识的一个侧面。

<清朝皇帝的江南巡幸>，是关于广受赞誉的名君康熙帝江南地方巡幸的相当详细的分析。“清朝国家是具有包含各种世界多元性的国家”，该论文阐述了康熙帝的南巡具有“和清朝国家的性格密切相关的历史意义”。

III.震惊的历史学家，震惊的读者

<惊讶的历史学家，惊讶的读者——读加藤博《アブー・スィネータ村（埃及某村庄）的丑闻》>，是副标题中著作的书评。现场调查里的“震惊”是一个关键词。

在<比喻和《中国社会论》>里，岸本老师颇具同感的中国社会论，是“排除静态的‘共同体’的并存形象，在不安定的社会状况中相互形成策略性关系，在这种伸缩自如的人际关系里能发现中国社会的特征”。用比喻有效地揭示了中国社会的面貌。

<妖僧大汕和广东的文人们>，是通过“妖僧”大汕和尚的轶闻趣事，展现了广东地方社会从明末到清初转折点的短篇。

<上海的城隍庙>，着眼于城隍庙（祭祀城市守护神的庙宇...笔者），描绘从明清到民国时代的历史变迁和城隍庙之间各种关系的作品。

<不结婚同盟——广东纺纱女工的人生设计>，是介绍关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在中国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带可见的女性们略显不同的结婚和分居形态，以及抵抗结婚同盟的一篇文章。

<另一个“（历）史学研究会”>，组合了1934年在中国北京组建的“史学研究会”的趣闻轶事。

以上是极其简略且杂乱无章的，各个论述的介绍。那么，以下一起围绕两点探讨岸本老师所提出的问题。

一、围绕“十六世纪后的共通问题”

此书提出的众多重要的问题中，首先应该列出的是这个正题，这点大概各位都不会有异议。也就是，“十六世纪后的共通问题”。这是在明清史论文集1（以下简称论文集1）的第五篇论文<十八世纪的中国和世界>中，岸本老师自己首次提出来的。这篇论文，以2000年9月福冈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主办的七隈史学会上的公开演讲为基础，次年刊载在《七隈史学》二号中，<补记>中说到：

“‘十六世纪后的共通问题’这一表达，强调了世界各个地方为秩序再构建而进行的尝试，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种皆是对世界史所共通课题的真挚的解答。即在十七世纪后半叶后各个地方形成的新秩序的根本中，明确了想要探究的，作为课题而存在的时代性的意图。”

这里说的“世界史的共通课题”是什么呢。关于这点，在更早期发表的其他的论文中已经有涉及，在论文集1的第一篇论文<时代划分论>（1998年）中，如此论述到：

“这个时代（从明末到清代中期...引用者），全球性的冲击——白银的大量流通构成了以前就经常被称为‘近世’的欧洲的绝对主义体制和日本的所谓的幕藩体制的成立的背景。伴随着白银的大量流通的交易活跃化和社会流动化，以及政治秩序重组的动态，都可看成明朝解体和清朝兴起的背后的东西。（中间省略）这些体制，就好像是把世界史的冲击作为共通的背景而诞生的各个体制，并且即使大家答案不同，那个冲击难道不是给世界各地的人们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吗。（论文集1，30-31页）”（其他也有涉及，论文集1，103页，可参照）

将十六世纪白银的世界性大流通和伴随它的世界规模交易的活跃化，理解为“全球的冲击”、“世界史的冲击”、“十六世纪的共通的冲击”，把伴随这些冲击的十七至十八世纪旧秩序的混乱解体以及新秩序的形成理解为“世界史的共通课题”，因此把这些总的命名为“十六世纪后的共通问题”。

那么，“十六世纪后的共通问题”这一表达在2000年的阶段首次被用，世界史中的十六世纪该怎样去理解，之后的十七至十八世纪，以中国史，东亚史为轴心的情况下，如何去解读呢。关于这个问题的关注，就像之前引用的那样，1998年已经提出了。实际上这次，把此书未收录过的岸本老师的著作中具有代表性的记录如下，均为1998年前后集中发表的：

1.<清朝和欧亚> 历史学研究会编 《讲座世界史2 通往近代世界的路——演变和摩擦》 东京大学出版会，1995年6月

2.<明清和朝鲜李朝的时代> 世界的历史12，中央公论社，1998年4月（和宫嶋博史合著）

3.<东亚、东南亚传统社会的形成> 《岩波讲座 世界历史13 东亚、东南亚传统社会的形成16-18世纪》岩波书店，1998年8月

4.《东亚的“近世”》世界史手册 13, 山川出版社, 1998 年 11 月

这四篇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对世界史理解, 尤其是十六至十八世纪世界和中国、亚洲相关的岸本老师的理解, 可以看作是集中在“十六世纪后的共通问题”范围内的问题。

(一) 十七世纪的危机和十七世纪的繁荣

15 世纪末的哥伦布的“新大陆的发现”和瓦斯科·达·伽马的“印度航路的开拓”, 极大地改变了那之后的历史, 这是不容动摇的事实。依据这一事实的十六世纪, 成为了对于世界史、人类史来说的大分水岭, 尽管这点是大家的共识, 但围绕所谓的“世界一体化”, 很多理解存在分歧也是众所周知的吧。毋庸置疑, 岸本老师倡导的“十六世纪后的共通问题”, 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 而倡导本身也与这些问题密切相关。但笔者首先想就岸本老师对十七世纪的理解, 提出朴素的疑问。岸本老师理解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就是因十六世纪的“急剧的商品经济的活跃化”、“战争和商业热潮”, 在以前的秩序崩溃的混乱状况中, 新秩序形成的时期, 把日本德川政权的成立、中国的明朝的瓦解和清朝的兴起看作是和欧洲的绝对王权成立具有同步性的相同节奏, 也就是我们说的“近世”。从其他的观点来看的话, 也认可了“十七世纪的危机”不仅是指欧洲, 也适用于欧亚全体这点。话虽如此, 岸本老师在更慎重地介绍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者罗威廉和东南亚史研究者安东尼·雷德等人见解的同时, 如此阐述道:

“笼统理解的情况下, 从十六世纪的上升转向十七世纪的下降乃至停滞的‘局面’的变化被看作是包括东亚、东南亚在内的欧亚全体是共通的, 可以说这一点是不拘泥一个国家历史的框架, 而需解读这段时期历史的很多研究者共同认可的”。(上述, <东亚、东南亚传统社会的形成>, 33 页)

但是, 说是欧亚全体, 但中华帝国以外的亚洲三大帝国的动向并不包括在内, 或者说未提及这些事显得相当重要。况且, 如果对于三大帝国而言的十七世纪和之前的见解有所不同的话, 那么还能首尾贯通一致地说明吗。虽然只是大概说明, 但想先进行史实地确认。

从东边开始, 印度的莫卧儿帝国, 奥朗则布治世(1658-1707)下的十七世纪后半叶之后被称为最盛时期, 还有评价说“莫卧儿时代, 尤其是十七世纪, 是使印度的商业和贸易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山崎利男 《悠久的印度》视觉版世界的历史 4, 讲谈社, 1985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自 1613 年首次把印度产的棉织品带回英国之后, 因为英国国内的生产革命带来的棉织品需求的增加, 棉织品成了十七世纪后半期东印度公司的主力产品。即可以说, 面向英国的印度平纹布出口的展开和莫卧儿帝国的繁荣如出一辙。对于莫卧儿帝国而言的十七世纪, 至少不能评价为“下降乃至停滞”。

进一步地, 在它的邻国萨菲王朝, 阿拔斯一世的治世期间(1587-1629), 被称为该王朝的巅峰。十七世纪前半期的最盛时期过后, 这个皇帝驾崩的同时, 王朝也渐失去光泽, 在十八世纪前半期(1736 年)走向灭亡, 但把它仍旧理解为是和欧亚共通的节奏, 是否妥当。

而且, 西邻的和欧洲关系最深切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情况, 它的最盛时期是苏莱曼一世(在位 1520-1566)的十六世纪中期, 那之后直到十七世纪末期, 大家说是凭借着从古老体制到新体制的确立一直保持着势力, 这个案例应该如何理解。十六世纪中期之后的欧洲物价上涨的影响, 在 80 年代也直接波及到和当地贸易繁盛的奥斯曼王朝, 但是另一方面, 有提到“整个十七世纪, 伊斯坦布尔中央政府的权限在小地方也很稳固”。(羽田正 <三个“伊斯兰国家”> 《岩波讲座 世界历史 14 伊斯兰·环太平洋世界 16-18 世纪》岩波书店, 2000 年 30-33 页)。

也就是说, “十六世纪后的共通问题”, 即使在亚欧大陆的东端, 以及东南亚上是成立的, 占据那之间的广大地区和空间的亚洲三大帝国是否也适用, 其论证是不可缺少的, 这是笔者初步的疑问。笔者认为岸本老师的“世界各地的人们”和“世界各种各样的地区”这些认知, 在现阶段, 是否有些模棱两可且评价过头了呢。

另外, 被强行拉至世界史“舞台”的美国大陆土著民, 和被欧洲与美洲大陆间的“新型关系”制约, 被奴隶贸易和环大西洋经济圈的构成所压迫的众多非洲人民, 把这两者也收入至视野中时, 对于他们而言的十六和十七世纪, 又究竟该如何描绘, 这个大问题也错综复杂。

再者，笔者认为现在应该考虑的一点，是欧洲的十七世纪。伴随着这个世纪北半球寒冷化（气温降低）而导致的农作物歉收、十六世纪的人口增加、以及被规定大幅度的价格上涨（被称为“价格革命”的现象），受这些因素影响的社会、政治的混乱和叛乱、革命的爆发，作为“十七世纪的危机”早就被大家所知，但是与此同时，这个世纪后半期，发生了所谓的“生活革命”也是事实。和从上流阶级到平民百姓的衣服、饮食生活相关的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变化的前兆，恐怕不能也理解为下降、停滞局面。十七世纪初，相继成立的英国、荷兰、法国的东印度公司，之后一边重复着相互牵引、竞争、对立的过程，一边把亚洲的“有诱惑性”的物产直接带回欧洲。就像之前叙述的那样，英国东印度公司直接把印度的棉布带回国是在1613年，中国茶是1689年开始在厦门直接购买。西欧的都市精英的餐桌上，开始摆放非欧洲产的丰富的进口食品，饮食生活相对的变得“多彩化”，这些是从十七世纪，尤其是从它的后半期开始。即如果参照生活方式和饮食生活环境这些判断标准的话，所谓的十七世纪的“生活革命”，难道不是指在西欧贯穿上流和下层阶级的“展开、扩大”的局面，并且和近年主张的“长期的十八世纪”相关联的十七世纪吗？

（二）“富饶的亚洲”的物产和白银的流通

众所周知，十六世纪作为在世界史上具有历史性的划时代意义的时期，被命名为“商业革命”，商业革命表现了“发现新大陆”和“印度航路的开拓”以后的世界贸易的结构转换。近年崭露头角的全球·历史研究的先锋之一，“加州学派”的代表论客丹尼斯·弗莱恩，说到：哥伦布和麦哲伦的航海“在交易、疾病、自然环境、文化中联系了所有人居住的大陆”。（丹尼斯·弗莱恩著，秋田茂、西村雄志编《全球化和银》山川出版社，2010年，59页。再者，关于弗莱恩，秋田、西村的<从银的流通来看世界史的构筑>同一本书，5页有介绍）

不过，“价格革命”学说把美国大陆白银向欧洲的大量流入看作十六世纪的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学者全汉升主张这一学说适用于十八世纪的中国而有名。全汉升的研究<美洲白银和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1957年），依据货币数量学说把十八世纪清朝中国的物价上涨评价为起因于美洲大陆白银的大量流入中国的“价格革命”，这一点可以说是全球·历史领域的先驱。对全汉升研究也批判性继承的岸本老师的专著《清代中国的物价和经济变动》（研文出版，1997年），在国内外都受到颇高评价，在彭慕兰和丹尼斯·弗莱恩的研究中，也继承了岸本老师的见解，尤其是物价史和白银相关的见解。（彭慕兰著，川北稔监译《大分歧——中国、欧洲，还有近代世界经济形成》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年。原著的出版是2000年。以及丹尼斯·弗莱恩，如前述所言）。

即便是这样，在“十六世纪后的共通问题”中笔者依然较关心其核心问题，即围绕白银的世界流通的相关问题。作为“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的大前提的美洲大陆产的白银，和近年备受世界瞩目的日本的白银，是十六世纪世界性交易活跃化的一个方面的主角，这个事实难以动摇。与此同时，在这个时代的中心，“富饶的亚洲”，其物产的世界性交易存在的事实也有必要同时提及。伴随着把都市作为活动据点的富裕阶层的新的生活文化的形成等，以及“贫瘠的欧洲”的变动带来的需求的扩大，若没有新成为“国际商品”、“世界商品”的中国茶、印度棉花等的亚洲物产，以及亚洲以外的非欧洲产物产，作为交易方式的白银的大量流通亦是不可能的。当然，欧洲-中国间的金银比价的压倒性差异（在中国的金和银的交换比率要比欧洲更加有利于黄金的交换），更加促进了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即便如此，白银向中国大量流入的主流，是对中国物产的等价报酬。亚欧间，尤其是欧洲-中国间的贸易，是因长期不平衡贸易造成的欧洲的入超。而且，亚洲海域频繁的国际交易从以前就已存在，加上亚洲商人网络的存在，以及进驻亚洲市场的欧洲商人的新兴亦是实际的情况。本来，“印度航路的开拓”其本身，可以说是基于不让印度商人和伊斯兰商人经手，欧洲人想直接得到亚洲物产的强烈的动因。

而且，把视线转向亚洲区域内的国家间的交易的话，据说莫卧儿帝国和萨非王朝间，在十七至十八世纪进行活跃的交易，相互进行各种各样的物产交易。像这样的交易，与其说是白银为直接的动因，倒不如该评价为追求相互丰富的物产。

综合地认知十六世纪世界的时候，它在伴随着美洲大陆白银和日本白银大量流通的世界

规模交易活跃化和贸易量的扩大方面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同时，也有必要列举出其他各因素。如使之成立的“有诱惑性的”亚洲物产的存在，直接在亚洲采购亚洲物产的欧洲人的强烈欲望，以及欧洲新的需求扩大，对亚洲生活文化的强烈憧憬等等。换言之，就是与“银的冲击”同时存在的“亚洲的冲击”或者“亚洲物产的冲击”、“东方冲击”的存在（川胜平太《日本文明和近代西洋——“锁国”再考》NHK出版，1991年，参照）。十六世纪除了“商业革命”的另一个主角是对整个世界具有魅力的美洲大陆原产作物和亚洲物产。具有挑战性的是，白银归根结底不过是仅占一个方面的主角的宝座，应该予以这样的评价。

二. 共通的节奏·同步性和“半开放式体系”

关于我国的西洋史研究中作为时代划分的“近世”这一称呼，川北稔曾经介绍过饶有兴味的一段插曲。即在历史关系的百科事典的编辑中，和二宫宏之、阿部谨也三人一起说到“因为方便，在西洋史中也用‘近世’这个称呼”（川北稔《英国近代史讲义》讲谈社现代新书，2010年，117页）。

本来，说起中国史里的近世，即京都学派提出的宋代以后的近世学说。围绕中国的10世纪，相对立的历研派的评价是中世，两者之间的争论一直看不到结果，经历数十年直至今日。岸本老师在1998年山川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史手册中提出东亚的“近世”，和这种中国史的时代划分争论不同，进一步地，脱离发展阶段学说，确实是从世界史的观点出发，在敏锐地意识到世界史上的同步性、共通性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至少在关注十六、十七世纪的明清时期中国的时候，和是近世的同时代的日本和西欧相反，把中国看作中世这点，显得很不自在。她认为即使参照那段时期的中国的经济水平和生产力、流通能力，平民百姓的生活，以及当时的实际状况，评价为近世也是非常妥当的。岸本老师暂且脱离了中国史中国固有的时代划分争论，认定为是近世的这件事，可说在意义上十分深远且极为妥当。

那么，在这里应该发问的是，关于岸本老师提出的对世界同步性和同时代性的有效性问题。岸本老师前述的<清朝和欧亚>中，介绍了内陆亚洲研究者约瑟夫·弗莱彻的见解，并且在<东亚、东南亚传统社会的形成>中再次引用，可以窥见到对弗莱彻所述观点的高度评价。即，岸本老师介绍到，弗莱彻是把人口的增加、历史性的旋律加速化、以经济活动为中心的“地方”城市的发展、都市商业阶层的崛起、宗教的再度兴起和传教活动、农村的暴乱、游牧民族的没落（同前论文，6页）等作为记号，从而来主张“同步的同一性”。中国史（宋代史）研究的泰斗斯波义信，把这种弗莱彻学说评价为以“相互关联性”和“横向连续性”为关键词的“对于普遍历史的探索”（斯波义信<被再次发问的十六至十八世纪的世界状况>浜下武志、川胜平太编《亚洲交易圈和日本工业化 1500-1900》リブレポート（出版社名），1991年，所收）。

弗莱彻主张的“同步的同一性”和“被统一的《近世史》”的构思，在岸本老师的见解中能够看出受其构思或明显或隐晦的影响。在《东亚的“近世”》中岸本老师叙述到：

“以宏观视角观察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的东亚历史，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在十六世纪急剧的商品经济活跃化、社会流动化的趋势之中，以前的秩序逐步走向奔溃混乱状况。新的国家诞生，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新秩序被建立，世界发生了整个的，巨大的变动。十七世纪初成立的日本德川政权和同世纪中叶占领中国的清朝政权，在那样的情况中的确是诞生于‘同时代’的事物，并且从更宽泛的视点来看的话，也可以理解为欧洲的绝对王权的成立也是在同一节奏中诞生的。（同一本书，4页）”

先前也已经引用过了，岸本老师主张“即使大家答案不同，那个冲击（十六世纪的白银流通...引用者）难道不是给世界各地的人们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吗”（论文集1，30-31页）。在这里，笔者关注的是“世界各地的人们，即使大家答案不同”这个评价。笔者感到，这个问题提出，好像是在避开某个重要问题的解答。总之，就是对在经历了“近世”这个“相同问题”的亚洲和欧洲的之后的历史性展开的“分歧”存在于何处的问题的解答。换言之，就是为什么针对同一个问题的解答，亚洲和西欧会不同。就是关于这两者差异的原因论的相关内容。作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众所周知，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和彭慕兰的“大分歧”论等要被列举出来，那些论证的妥当性、有效性现在暂且撇开，如同岸本老师那样，止于同一性

和同步性的问题的话，就变得不能充分说明那之后的各地区间的差异的起源、要因了。

川北稔，在 1998 年出版的《亚洲和欧美世界》（世界的历史 25，中央公论社，和加藤佑三合著）中，提出了“亚洲世界体系为何未处于优越的地位”这一小标题，从中华“帝国”和欧洲的“国民国家”间的差异的视点出发，论证了东西方的武力差距（111-113 页）。并且，川北在前述的《英国近代史讲义》中，在“膨胀的欧洲世界体系、封闭的中华帝国”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标题下，从世界体系论的观点解说了帝国体系中皇帝、中央的政治支配和武力的独占、惯例，以及西欧中主权国家的并存和相互竞争带来的武器等技术的发展这两者的区别（127-132 页）。比起这个解说的有效性和正确与否其本身，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川北的尝试其本身，即“近世”以后的世界各地的明显差异，怎样去解释，能否解释。关于这点，即使向岸本老师寻求见解，也肯定是得陇望蜀。

而且，岸本老师，和“共通的节奏”一起提出了“半开放式体系”这一独特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内容是“不是把世界作为不可比的闭关锁国的体系的集合来理解，而是理解为显示相互影响的、动态的视点之物”（论集 1，63 页）。这里说的所谓的“相互影响的、动态的视点”，是指和前述的弗莱彻学说中的“相互关联的”、“横向连续性”相互影响之物。但是，对于笔者来说，这个用语和比喻即使在现阶段，依然处于不能充分咀嚼的状态。因此，在这里，就只能到阐述此事这一步为止了。

上述，在这篇笔者的书评中，把焦点放在岸本老师提出的两个重要的问题上，笔者提出了几点疑问和一些个人见解。针对此书的书评，已经有中国史研究者所著的两篇发表了，很期待评论者进一步地，通过其他领域的专家，尤其是西洋史和南亚史的专家的视点来论述的“十六世纪的共通问题”。之所以这样期待，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仅凭评论者的力量未能充分探讨此书所具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很多有益的问题，有进一步充分探讨的必要性。

由于个人原因导致撰稿大大延迟，不仅对岸本老师本人，也给编辑委员会和相关各位人员带来不便，在此衷心地向诸位表达深切的歉意，就此搁笔。

评 深町英夫 编《中国议会 100 年史》

——从中国议会史看立宪制和代表制

光田刚

(成蹊大学)

- 原书评刊载于[日]『史学雑誌』第122編第4号，2013年4月，539-548页。
- 原书为[日]深町英夫編、『中国議会 100 年史：誰が誰を代表してきたのか』東大出版会、2015年。

相信看到本文的标题，最普遍的反应是：“中国存在所谓的议会吗？那样也能称得上有‘100年’的议会史吗？”虽然日本媒体会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成“中国的国会”来进行介绍。但同时，日本报道的前提是中国处于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下，这一点自是不必多言。中国的议会不过是其一党执政体制的附加物和装饰物罢了。而且，这也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民国前期的议会，在袁世凯的影响下无力软弱并遭到解散，之后便成了“军阀”中央政府的“一言堂”，选举也腐败横行，最终失去了国民的信赖。国民党体制下，在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下，并未实行议会政治。只是在抗战期，为了安抚国民的不满，设置了并无立法权的“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长期以来也不过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决定追认有效的“橡皮印章”罢了。如今也不过是起到了正当化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微弱作用。

本书并不全面否定以上对于中国议会史的评价。从中华民国初期的临时参议院开始，中国常态化设置了议会或者说议会性质的国家机关。不管是在“军阀”统治、国民党一党执政还是共产党一党执政，这些政治机关在主流的政治体制中虽说只不过起到了一点“补全”作用，但也还是存在一定效果的。本书试图重新审视中国议会从成立开始的这100多年，试着重组“议会史”的框架。

本书分为14章的内容：总论整体问题的序章、第1章到第12章的12篇论文、以及完全可以与正文匹敌的第14章“补论”。中华民国前期（北京政府时代）、中华民国后期（国民党政府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现代（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特别是2000年以后作为重点），各3篇相关论文，补论内容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满族的代表选举。以日本研究机构的研究者为中心，中国、美国的研究者共同参与了本书的撰写，是一项国际共同研究的成果。担任编者以及序章·补论作者的深町英夫，不仅选定·招募研究的参加者，还负责整体理论性的构成，作为发起者发挥了足够充分的作用。

本书的特征之一是将研究方法以及问题着眼点设在中国近现代史框架之外。代表是全国民的代表，还是选举区的居民、原选举单位的代表？对于选民们的意见代表要忠实执行到何种程度？围绕代表制（代议制）的根本问题，权威主义体制中何谓“议会”，以冷战下的权威主义体制国家的比较为主要视点，以及从宪法角度论述立宪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关系等，将政治学·法学的问题意识和思路导入在中国近现代议会史的研究中。

此外，民国前期、民国后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至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政治史研究，都是以各个不同的研究框架为前提的。本书大胆尝试一方面保留各种方法论及问题点的相异，另一方面通过“议会史”这一共通的题目建立起各方法论和问题点之间的“对话”。

民国前期的议会在万众期待下诞生，但这种期待很快就变成了失望。当选议员的尽是传统社会本来的权力者，并且裙带关系、贿赂投票等不正手段横行。导致议员及议会整体失去了国民的信赖。一方面，根据基本法的《临时约法》，规定了“议会专制”这一强力的议会权力。因此，议会并没有单纯地被“军阀”所操控。比如，被视作是安徽派“军阀”（段祺瑞派系）的花架子的“安福国会”，该组织的一系列活动，一方面背离“民意”，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了对“军阀”政府的妥协。民国前期的议会没有取得国民的信任，再加上法西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上影响的扩大，对议会制的不信任成了社会上的主流思潮。此外，受国民党领导者蒋介石的“自由·民主”观念的影响，国民党体制对于实现议会制也极为消极。而在国民党为主导实现的宪政体制下，通过立法院来选举议员（立法委员）使得“民意”和国民党体制渐行渐远。

在如此状况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上想要建立新体制的中国共产党，在人民代表制度的确立上也反复摸索尝试。是继续“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的体制？还是更加接近社会主义？这和领导层内部的意见对立也不无关系。如此，代表选举最终落实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仅靠单方面的“共产党领导”是无法实现的，很大程度也是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影响。而如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其说是“议会”还不如说是维持着国家“权力机关”的本质，不仅是共产党体制向民意传递的桥梁，逐渐也起到了将民意传递给政治体制的沟通作用，开始履行“代表”的职务。

从民国初期至今，“议会政治”在中国并没有发挥充分的作用，代表民意的议会也没有被固定为政治体制的一部分。但在国民信任不足以及被权威主义体制制约功能的不利条件下，议会还是发挥了超过“装饰品”的作用。而当今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开始有代表民意的功能。这就是本书描述的中国议会 100 年以来的历史。希望在立足于众多先行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在中国政治史研究的新方向上迈出一大步。

代表制并不能简单的等同于民主制度。正如在欧洲议会制度普及之前，卢梭所道破云：“英国人只有在选举的时候才是国政的主人，其余时间都被铁链拴着”。对政党、代议士（类似众议院议员）的影响和游说、压力集团的活动、议会以外的政治运动、政治报道、民意领袖的活动等，只有当这些政治舆论活动形成并产生感染力，现代代表制才能健全地开始运作。而此前提条件是选民对于代议士、政党的信任，势必对代议士、候选人以及政党也有一定的道德要求。此外，马克思也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分析了在代表制运作下，基于代表制的一党执政体制（行政权力的专制）的实现过程。纳粹主义当然是以纳粹党（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各种暴力威胁为条件，而议会则是在全权委任法的决议上成立的。民意倾向于“非立宪”性质的政府、政策，但将“非立宪”性质的政治正当化的话，又会产生立宪主义和民主主义对立的难题。而在貌似已经克服此难题已久的“先进国家”，如今正又成为了大问题。本书所展开的方法论和问题焦点，从中国议会史中探寻对当今的中国政治，乃至对解决现今全世界议会制所面临问题的启示。

本书在有限的篇幅中，包罗了共同研究者的诸多关注点，涉及的主题纷繁多样。尽管如此，不可避免依旧有些课题尚未涉及，例如：关于二战后台湾的议会政治，只有在第十二章阐述立宪制的观点时提及；香港·澳门的情况也几乎未曾涉及（但《补论》中关于人民共和国初期满族参政的问题值得注目）。另外，清末的议会论、立宪制论的影响以及他国的影响也未集中论述。相信广大研究者在受到本书启发的同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将会展开更为深入的分析。

评 菱田雅晴、铃木隆《超大国、中国的去向 3 共产党和治理》

毛里和子

（早稻田大学）

- 原书评刊载于[日]『中国研究月報』2017年1月号。
- 原书为[日]菱田雅晴、鈴木隆『超大国・中国のゆくえ3—共産党とガバナンス』東京大学出版会、2016年4月15日。

绪言

本书是《超大国、中国的去向》系列的第3册。此系列有历史认识、外交、经济大国、“崛起的民族”及本书共5卷，是一位中坚和一位青年研究者对2012年第18届党大会产生的第5代政权、习近平政权下的政治、经济的各种现象进行研究的共同著作，是非常有魅力的系列丛书。

本书是从中国共产党治下的权威主义体制为什么拥有意想不到的坚韧性和自我恢复、再生能力（本书中基本上使用“治理（力）”这一用语）这一问题出发，为得到政治学的、社会学的答案而进行的勇敢挑战。序章（菱田雅晴负责）中本书的目的如下。

本书不是对通过行使国家权力的单方面的政府统治行为（government）的分析，而是对政治行为者和政治课题等多样且广泛的治理行为（governance）的状态进行分析。著者所述如下。对于“后高度增长期的中国政治”以“政治行为者和制度、政策两相交错的治理为关键词来分析”（11页）。著者强调治理，除了伴有强制力的政府行为以外，重视超越统治具有一定的政治、社会的影响力，也就是说重视“政治行为者的广泛的影响力”（治理）。

本书概要

先来介绍一下本书的概要。本书里有两个关键词（新常态，治理）。第一章“中国政治社会的新常态”（菱田负责）中对本书第二章的关键词“新常态”作了解释。本章注解3（222页）中，新常态的“新”是不同于以往的意思，“常态”是指相对稳定的状态。中国的网络辞典—“百度百科”是怎样解释的？“不同于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意思是说中国经济进入了不同于过去30几年高度增长的阶段。其具体特征为，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特征1），经济构造不断合理化、刷新、升级（特征2），要素和投资驱使更新和发展（特征3）（百度百科—新常态 20161126 阅览）。著者在本章中描述了“中国政治社会的新常态”。

第二章“新常态下的中国政治行为体”（菱田负责），分别分析了党和国家行为者（治理的主体）与社会行为者（治理的客体）的变化。在中国出现了用以往的两项对立的国家—社会观念不能解释说明的新情况。

第三章“作为政治认识的根本的‘中国梦’”（铃木负责），试图分析了领导层对政治目标和实现手段的认识的概况。当天的中国发现各种社会问题、次民族主义抵抗、集团骚乱等治理机能的不健全，著者特别关注要应付腐败的蔓延和贫富差距的扩大等难题是否可行。

第四章“无民主化的治理改善”（铃木负责），通过探讨领导人对民主主义和法治的态度，评价习近平体制下正在进行的是“无民主化的治理改善”。

第五章“治理改革和统治体系的重组”（铃木负责），著者在其认为5个非常重要的政策领域（财政、社会管理、户籍/社会保障、司法、环境保护），分析了习近平政权成立以来治理改革的主要经过，想要透视未来的发展方向与民主化的关系。著者站在年轻人特有的乐观的心情上对未来的展望是很受欢迎的。但作为评论者感到些许不妥。

比如，关于社会保障制度，原封不动的肯定了中国人研究者的“经过过去 10 年多的全国性推进，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已经基本实现全民保障”的判断（145 页）。我的疑问是，这里面也包含农村吗？社会保障网络已经覆盖了超过 2 亿人的农民工吗？

其次是关于户籍制度改革。对户籍改革著者进行了比较乐观的叙述，“新型城市化，特别是通过社会保障改革国民待遇的平等化能比较顺利地实现”（147 页）。“顺利”的判断依据是什么？1980 年代出现的农民工的身份问题，针对他们的户籍制度改革被提出来已经过了 20 多年。虽然好像进行了一些“治理”改革，但是只是局部的，对症下药，要作为国家制度来实现还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时间。

而且著者对财政改革和司法改革牵动民主化也于寄希望。“也不能否定围绕新型城市化的税制和社会保障的讨论可能关系到将来新的政治改革的提出。……违背指导层的无民主的治理强化的目的，其中可能隐藏着中国的（软着陆）民主化发展的转机”，这样的描述很好地体现了著者的“治理到民主”的“期待”（151 页，154 页等）。

第五章颇有意思的另一个课题是司法改革。司法改革的核心是司法从属地性独立出来，也就是说停止地方权力对司法的介入。怎样回避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或者地方化？为了这个课题，进行司法系统由横向的“块”向垂直的“条”改变的治理改革（155 页）。我们发现 80 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行政一直都困惑于合理调配“块”和“条”的平衡，现在仍未解决。

第六章“围绕着治理改革的习近平领导能力”（铃木负责）中，将习近平的领导能力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政权等进行了比较。习没有“如毛泽东的群众动员的社会影响力”、“也不似邓小平那样可以把官僚机构的职位与权限置之度外”（183 页）。对于这样的结论大部分中国研究者肯定是赞同的吧。刻画出“官僚政治家”习近平的面貌。

本章值得重视的论点是对 18 届 3 中全会的决议的评价。著者细心的实证工作的结果是这次会议的决议“不是特定领导人的属人的产物，是共产党为对应‘新常态’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政治环境，赌上统治体制的生死而取得的一大集体成果”（186 页）。虽然习近平取得所有“头衔”，但是他却没有完全掌握实权。

终章“漂流的中国？缺乏航海术的航行”（菱田负责）中提出了三个问题：1. 中国政治中的治理是什么？2. 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能力如何？3. 习近平是怎样的人？著者对作为制度改革的引导者的中国共产党的变革能力和统治能力进行了评价。党的治理分为政治和经济，领导类型也分为群众型与自上而下型，所以提出可以对这两点的两面性进行观察（209、210 页）。著者认为虽然“小民主”或“选举民主”等治理改革具有局限，但仍然对调配统治的正统性和维持安定有一定的贡献。

终章中还有值得关注的是，指出了咋看之下强大的习近平权力是一定条件下的非绝对性的权力，政治权力精英中的“共同的危机意识”才是习权力的基础（216 页）。评论者也认为只要高层精英集团内的“危机意识”仍然可以共有，就可以延迟其体制的崩溃。

关于治理

本书的关键词是“治理”和“新常态”。关于治理，本文中几乎没有说明，序章的注解 4、5（221 页）中的定义是引用的岩崎正洋的先行研究，依据《大辞海》的解释说明，即“公共或者私人的各个领域的个人或组织为管理其共同事务的方法的总和”。“新常态”在第一章中有最小限度的说明，第四章介绍了《十八大以来》的解释，即“经济的‘新常态’即增长速度的变速和构造调整的阵痛这两个时期的重叠阶段”（117 页）。除了这些以外，在文中几乎是作为一般词汇来使用的。

评论者对“治理”的理解也很苦恼，因为不能把握其含义，其与统治或权力、支配等有什么样的不同？为什么要特别使用治理一词？为了解答此疑问，阅读了关于治理的文献共 4 册。

菱田雅晴编《中国 来自基层的治理》法政大学出版社，2010 年

岩崎正洋等编《国家治理论的现在》劲草书房，2012 年

铃木隆《中国共产党的支配和权力 党和新兴的社会经济精英》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12 年

东大社研编《再论治理①》东京大学出版会，2016 年 12 月。特别是宇野重规《政治思想史中的治理》等。

结果得到了以下见解。第一，由于政治行为者的多样化、政治课题的广泛化、多层化等，仅用以往的统治（government）已经不能确切地分析解政治领域，因此治理（governance）这一古语复苏了。第二，统治体系是在以具有约束力和强制力的法治制度为依据的权力、义务的基础上，维持组织的正统性和一贯性，并形成决策达成协议的体系。相比之下治理体系是指，基于主体性、自发性及公益性，相关参与者持有强烈的目的意识进行决策决定、达成协议的体系（岩崎，前掲书等）。第三，“全球治理”、“地方治理”等是具有通用性的便捷的概念，因为使用方便被随意运用在各个领域，因此只能作为“共同游戏规则下，规定包含国家以外的多样的行为者之间关系的规律的笼统定义”（前掲，宇野重规论文）。

我觉得，问题是使用治理一词，政治权力、力量、强制或暴力等方面就淡化了，因此使用治理一词只是想用治理来重新解说中国的强制权力的一党统治体制（或者是党＝国家体制）。这只是评论者的个人意见而已，不知道著者们是怎样思考的？

中国研究和话语分析

本书是精心地收集了中国共产党、习近平、王岐山等的话语，分析他们“在想什么？”“想干什么？”的很优秀的著作。但是其所处理的时间范围是习近平执政以来的 3 年，非常短。此书本身忠实认真地进行总结，并从“无民主化的治理论”出发探寻新的切入点，但是仍然留下了以下一些印象。

第一，观察者对包括现在的仅 3 年的短时间的现象进行社会科学的分析可行吗？例如，习近平没有戴上“核心”头衔显示了他的权力相对较弱（172 页），但是 2016 年 10 月的 4 中全会的公报上为他冠上了“党中央的核心”头衔。事态是在变化的。习政权是怎样实现“治理改革”的？结果改变了什么？要验证这些问题的话 3 年时间太短了。

第二，对中国政治、社会的分析大体上分为两个方法。验证当局的认识、话语是怎样变化的？为什么变化？的方法。以及阐明正在发生着什么？其结果是什么？为什么？等问题的方法。本书主要是采用的前者，现在正在发生着怎样的政治变化在本书中并没有解释清楚。话语或认识的系统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可是，另外方面我觉得，只一味关注中国当局者的话语，并深陷其中无法超越的评论者的“痛苦的教训”。甚至可以认为中国政治固有的修辞对研究者来说是麻醉剂是陷阱。在此意义上，无论是“治理”（governance）、“新常态”、“协商民主”等概念希望可以用日语再论或充分说明。

评 坂元ひろ子著《中国近代的思想文化史》

张 碧惠

(早稻田大学)

- 原书为[日]『中国近代の思想文化史』岩波书店, 2016年5月20日出版。

一、引言

本书为“新书I”版本,其内容主要是探讨从清朝末年到抗日期间的思想文化思潮。虽然书名定为“中国近代的思想文化史”,但著者亦将讨论的视野延伸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文化大革命、以及天安门事件等时期。书中论述的知识分子包括耳熟能详的康有为、孙文、梁启超、胡适、毛泽东等数十名以上,并且大量地引用珍贵的新闻媒体史料,因此本书在深度与广度上均是值得一睹为快之作。

诚如著者于前言中所指出,本书之特色乃有别于以往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以往的研究多偏重于政治思想史,而本书则侧重对文化史和社会史的探讨。但并非因此就“脱政治化”,而是不针对特定的政治动向或政治家,欲从思想文化的营造和体现,来探讨以特定的政治权力为背景的精神面向。但是,以一本“新书”的容量,若欲将跨越一百年的思想文化史全数载入,那非得限定探讨的范围不可。因此本书着眼于“初期全球化的近代中国”,同时也留心从清末到中华民国这一时期,促使思想文化出现连锁反应的新闻媒体之刊行情况。

有关“中国近代”的起点,作者虽言明因探讨的面向不同,故其起点的设定亦不同,但在本书中作者将起点设定在19世纪前半,亦即清朝末期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市场、港口的开放、同时卷入以英国为中心的自由贸易圈等等,所谓西洋冲击的时期。作者解说其理由为,此现象正是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佈》)所谓的“初期全球化”,因此也可视为是近代中国的起点。本书分析了为对应西洋近代化的冲击,知识分子的思想起了何等的变化,原来被认为是“传统”的思想,终究也不过是一种“创造而来的传统”,而作者认为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正是在如此的情境下形成的。

二、本书的基本观点与内容介绍

首先对本书的内容做简要的介绍后再进行评论。本书将时代先后依序分为清朝末期、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大时期进行论述。其篇章结构如下。

前 言

第一章 清朝末期与初期全球化

第1节 前近代思想史俯瞰

第2节 从遭遇西洋文明相到迈向洋务--教育、出版的充实

第3节 变法运动期间的传统之创造

¹ 日本岩波书店在1938年创刊的“小型丛书”,内容为一般启蒙书籍,有别于其在1927年创刊的“岩波文库”

系列。相对于“岩波文库”都为古典重刊之作,而“岩波新书”则都是当代的论著,因而取名为“新书”。其他

的出版社亦有此类书籍的出版,如“中公新书”、“筑摩新书”、“讲谈社现代新书”等。

第4节 清末立宪准备与民族 / 共和革命
第二章 中华民国和新文化潮流
第1节 “共和国”的成立--从混沌迈向五四新文化运动
第2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文化建设
第3节 抗日战争以后的文化和思想论战
第三章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展望
结 语

首先，著者在第一章“清朝末期与初期全球化”第一节中，对于中国前近代的思想史从先秦到明末清初，做了概括性的叙述。作者指出，因为思想文化虽是由传承而来，但并非自形成后就一成不变，许多的“传统”均是“创造而来的传统”，因此在进入正题之前，预先对思想文化形成的背景做一番梳理是必要的工作。

接着在第二节中，作者叙述了中国近代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外患、太平天国的内忧、以及日后在甲午战争后，对西洋这个“他者”有了认知。“内为中华”、“外为夷狄”的世界观，以清朝为中心的册封制度的世界观也开始渐趋崩坏。在此状况下，相对于中国的“中学”，西洋的“西学”的存在感渐趋明显。由于鸦片战争前的西学提供者是耶稣教传教士，本节整理了其传教活动与相关出版品。论述龚自珍·魏源·徐继畲等知识份子思想学说的出版品与鸦片战争这个时代大事、太平国的布教和镇压、开港后的媒体和卫生医疗、洋务和近代教育的启动、上海的商业新闻“申报”的发展、幕僚的活动与中体西用论、传统科举型幕僚冯桂芬和薛福成等思想、非传统科举型幕僚王韬·郑观应·马建忠等的思想、教育及出版的普及等，来探讨当时中国的知识份子“从遭遇西洋文明相到迈向洋务”的过程中，已渐渐体会到“中体西用”的极限性。

在第三节“变法运动期间的传统之创造”中，作者叙述了自甲午战争失败后，政治改革的声浪日渐高涨，如“中体西用论”这般，从原来是为了引入西洋文明而提出的并存理论，到大胆地将其解释为中国的制度变革理论之下，对此抱持危机意识的知识分子等的思想。对于康有为的大同乌托邦·进化论、强学会和机关报、梁启超所创刊的《时务报》对大众启蒙所做的贡献、谭嗣同的《仁学》与湖南新政、严复与翻译--《天演论》、杨文会与清末居士佛教、在迈向身体的近代化的风潮之下，缠足批判运动如何与女子教育和优生学思想结合，最后作者提到了变法维新虽然失败遭受挫折，但其打破社会束缚的精神却为日后的革命志士所继承。

第四节“清末立宪准备与民族 / 共和革命”中，作者叙述了因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最后签订了辛丑和约的过程中，国内外要求清朝施行政治改革的批评渐强。在此情况下，知识份子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保皇立宪之外，另外反清朝革命派也逐渐抬头。而在禁止结社之下，革命派将政治运动据点移至海外，著者将它称为是安德森的“远距离民族主义”论，并主张在这活动中媒体的活用是极为重要的。著者从科举制度的废止与教育改革使得留学生人数的增加、身为黄种人对欧美的抵抗思潮萌生、对清朝的批评风潮亦日益高涨、中国国内媒体新闻的胜兴、女性革命家的登场、最后牵引了中华民国的诞生的过程进行描述。

第二章“中华民国和新文化潮流”，首先在第一节“共和国的成立--从混沌迈向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将讨论的时间点设定在北京政府时期。论及虽然经过辛亥革命成立中华民国，政局仍处于混沌状态，然而思想文化虽然仍处于新旧、东西、左右的拉扯现象。但是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自信心的恢复，“新青年”的文学革命·五四文学的登场，进行教育改革、“劳工神圣”与无政府主义主张，平民·乡村教育的普及，文字改革及国语统一的摸索，两性差别的议论高涨，伦理革命与恋爱、结婚的自由主张，民族主义与排日运动日渐兴盛，共产国际的影响及共产党的成立，最后谈及出现在优生学上的“重质不重量”的论争延续到抗日时期的民族复兴论。

第二节“南京国民政府的文化建设”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为中心，探讨了国民身体的近代化与至今的女性运动得以开花结果如缠足的解放等等，教育制度得以重编、学术朝向制度化，应对日本的侵华行为知识份子的团结意识形成，中共的彷徨与中华苏维埃的成立，1935年提

出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和“全面西洋化”的论争，中间阶层大众及现代女性的产生与大都会的形成，都市的发展促进戏剧文化的活性化，并且此时期牵引着中国内部的意识形态对立激化，

第三节“抗日战争以后的文化和思想论战”讨论了从中日战争全面化到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内战、中华民国迁退至台湾期间的思想文化思潮。在日本的文化侵略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占领区亲日媒体的登场，1937年开始为确保文物·文化及其未来的中坚分子，国民政府将高校迁往后方的经过情形，在抗日时期现代新儒学思想加强了民族意识，蒋介石与毛泽东的“战后”展望到土地改革与共产党的胜利最后言及中华民国的分解与毛泽东的“人民民主独裁”的过程。

第三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展望”中作者将视线延伸到“现代中国”，讨论范围扩大到邓小平南巡讲话与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其间。内容言及农地改革对地主的剥削情形，女性议员的登场，思想文化统制与肃清与苏联关系的恶化，简体字·拼音·普通话的确立，迈向文化大革命的历程，在劳动强化之下女性被所塑造成“超级女性”，在文革终结后迈向改革开放之路，及其后的高度市场经济路线的发展经过。

三、本书的特点和意义

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史²看来，谈及全球学界思想史研究呈现普遍衰退现象，而唯有中国大陆的思想史研究兴盛的原因，诚如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³一书中所言：“学术界有时就像时尚界，喜欢不断除旧更新，当生活史、环境史、医疗史、女性史等等逐渐在新理论的支持下成为新潮流时，而思想史研究就如其他学者所说的看不到前景”。自21世纪之后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新潮流的出现，本书除了对思想家的个别探讨之外，同时将更多的焦点聚集在社会史、医疗史、女性史的发展上。而本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不仅是弥补了上述的缺憾，更是融合了思想家们的学说精华之大成与此新潮流的代表之作。

本书的出版其计划甚久，此点可从作者在下列的两本专书中的叙述得知。一是滨下武志编《世界历史大系中国史 5 清末～现在》（日本山川出版社，2002年），二是《连锁性的中国近代之“知”》（日本研文出版社，2009年）。而就著者坂元教授的著作史看来，本书亦是综合了上述的两本论著以及《中国民族主义的神话—人种·身体·性别》（岩波书店，2004年）一书的精华拔萃之作。阅读各章节内容后，可得知本书以近代教育制度的演进、新闻媒体的出版、性别差异及优生学·医疗史为论述轴心。在讨论中国思想文化思潮的同时，著者亦与同时期的日本思想文化思潮之关联性，如同时期的女性运动等等进行比较。虽因篇幅的限制无法做详尽的论述，但同时亦提供了读者更宽广的视野。

而本书最大的特色之一在于作者强调思想史不应该是“单性史”，而应该将“单性史”的思想史两性化，亦即对女性史的重视。著者论述了太平天国非但没有“解放女性”，而是迫害女性；到变法运动期间，立足于优生学的观点将女性缠足视为“种族弱化”，批评其为“国之耻”；而中华民国成立后，北京政府期间的思潮却认为女性参政权的制定为时尚早；进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虽然“摩登女性”登场，但女性应回归家庭的主张却日趋高张；抗战期间女性的主体性追求论反倒成为批评的对象。作者在论述女性解放运动的同时，也对当时日本的情况进行讨论，并得知中日两者在这方面上是同步的。另一方面，对从计划生育来探讨女性解放的侧面以及对“现代女性”的书写也是极为独特的见解。因此，对两性差异、女性社会地位提高等都是崭新的视点。

然而，诚如作者在本书的结语中所言及的“由于版面的限制使得本书仅能集中在对都会汉人知识分子思想的探讨”上。但是都会的知识分子与地方庶民之间的“中间层”的存在亦是不可

² 参考文献如下所列：葛兆光『文化史、学术史、そして思想史——中郷学术界にける最近30年の变化の侧面——』『中国：社会と文化』(25)，2010年7月。左玉河〈3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安徽史学》，

2009年01期，2009年1月15日。王泛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想〉《新史学》第14卷第4期，2003年12月。

³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华书局，2015年1月。

忽视的。因此在重视媒体所发挥的宣传作用的论述上，都会知识分子的思想主张如何藉由“中间层”传达、影响在地社会的过程无法从本书中获知。故“中间层”的思想文化并未加以探讨乃是遗珠之憾。此外，相形之下本书从少数民族的视点作来论述的篇幅不多，而这却是至今仍困扰着国家统合的问题之一；既然作者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都市学生、文化人的下放多少唤起了对少数民族的认识，那么若能在第三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展望”中对此“认识”多加以阐述，则能更进一步理解当今的民族统合课题。

四、结语

本书为“新书”版本，即是也将一般读者纳为阅读对象而撰写的书籍，但是整体而言本书的用词稍嫌艰涩。若能再加入索引等，则有助于降低阅读上的难度，促使读者更深入理解本书的内容。另外，如同作者也于文中提及，可辅以阅读岩波书店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一系列的“新书”，则更能掌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过程。本文的前言中也曾谈到本书可说是著者至今论著的集大成之作，特别是本书有多数的章节是从《中国史 5》中精选拔萃而来，因此建议可参照《中国史 5》与本书一并阅读。总而言之，本书对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后进者而言，乃是不可或缺的必读之作。
